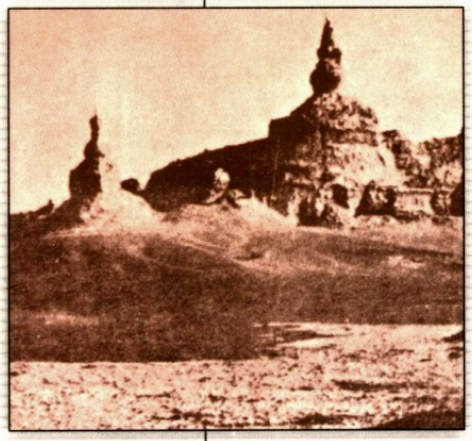
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外二种）

世界汉学论丛

SHIJIE HANXUE LUNCONG



[法]闵宣化等 著
冯承钧 译

04

世界汉学论丛

SHIJIE HANXUE LUNCONG

责任编辑：梁　彦
责任美编：刘　丽
ISBN 7-101-04222-8
9 787101 042221 >
定价：20.00元

世界汉学论丛

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

（外二种）

〔法〕闵宣化　等著

冯承钧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外二种/(法)闵宣化等著;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

(世界汉学论丛)

ISBN 7-101-04222-8

Ⅰ.东… Ⅱ.①闵…②冯 Ⅲ.古城遗址(考古)-内蒙古-辽代 Ⅳ.K878.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7300 号

书　　名	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外二种)
丛 书 名	世界汉学论丛
著　　者	[法]闵宣化等
译　　者	冯承钧
责任编辑	梁　彦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 3/8　字数 203 千字
印　　数	1-25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4222-8/K·1784
定　　价	20.00 元

出 版 说 明

中华书局曾经在20世纪的30—50年代出版过一批外国汉学家名著的中文译本,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由于这些书印行的年代较早,于今已不易觅得。近年来,随着中外学术文化交流的迅速发展,世界汉学研究亦呈逐渐兴盛之势,读者对这些译著的索求更为迫切。经认真研究,我们决定将这些书列入"世界汉学论丛",修订后重版,以飨读者。

我们考虑到既要保留原译著的行文风格与译文的连贯性,又要适应现在读者的阅读习惯,符合现行的译名规范,此次重版,编辑部对原书做了必要的修订:一、改定版式。原书大多为繁体竖排,字迹繁密,字号也较小,读者颇为吃力;现一律改为简体横排,新式标点,并适当放大字号。二、有些原书如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只有旧式断句,没有标点;此次逐句重新加以标点。三、书中的外国人名、地名,凡后附原文的,一律以新华社编定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及中国地名委员会编定的《外国地名译名手册》为参考,或改换,或出注,视具体情形酌定。四、书中的一些翻译,依照审慎的原则,据今天的习惯做了少许更定。如《罗摩延书》改为《罗摩衍那》,歹族改为傣族,兰沧江改为澜沧江,等等。五、有的旧版书后曾附有专家所做勘误表,这次则逐一对照,改正于正文中,以利读者。六、原出现的印刷错误,凡经发现,即予改正。

由于原书有些译者已去世多年,这些书的外文原著又很难找

到，加之我们水平有限，此次修订重版肯定还会有不少疏误之处，恳切希望得到读者朋友的批评，以俟今后再行订正。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2年6月21日

总 目 录

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1）
附:乘轺录笺证 ……（75）
西域考古记举要……（97）
附:中亚佛教艺术 ……（157）
占婆史……（173）
附:占城史料补遗 ……（272）

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

附：乘轺录笺证

〔法〕闵宣化　著

冯承钧　译

目 录

译者序……（5）
前言……（7）
薛映之行程……（9）
薛映行记疏证……（10）
潢河石桥……（13）
饶州故城……（15）
保河馆及黑水河……（19）
祖州旧城……（23）
祖山……（28）
绰庙……（30）
上京……（31）
怀州……（39）
怀陵……（41）
庆州……（44）
庆陵……（50）
边墙……（56）
次要之城……（59）
毕卢台河流域之废城……（60）
古腾河之废城……（61）
庆陵南之废城……（62）

浩珀都之废城……（63）
川心河之废城……（64）
四废城……（65）
卢川县城……（66）
契丹之墓……（67）
乌牛台诸墓……（68）
头道湾子诸墓……（69）
补注……（70）
附：乘轺录笺证……（75）
后记……（94）

译 者 序

中国历史应用科学方法整理，今日略具科学常识者，莫不知之。书本不可尽信也，兹举一例以明之。司马迁，西汉时人也，著所谓五帝本纪。五帝时无书，则五帝本纪之史材，必未取材于五帝时之书；只能取材于其最近数百年间留存之简策以及古代传说而已。严格言之，五帝是否有其人，尚属疑问也。予常见今人所绘之关羽像，手执唐以后所装之春秋本，后人之述古史，得无类是。今日欲知古代之史事，非取古人直接留示吾人之遗物研究不可。实地探考，科学发掘，盖为今日史学家不可少之方法。此埃及之所以能有八千年之历史也。

吾国史书少所整理。研究史学者，囿于所谓正史，故亦少所发明。近二十年始稍稍有人整理，然亦仅九牛之一毛耳。予曾以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数年前先从古史着手。研究愈久，困难愈多。盖既不愿追踪马骕之剪裁事业，亦未能实地探考，与史书对证。虽读遍史书，又有何益。乃改而翻译外人已经整理之著作。此《中国之旅行家》及《中国史乘中未详诸国考证》二书翻译之缘起也。近又于1922年《通报》中，获见《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Les Anciennes Villes de l'empire des grands Leao au royaume Mongol de Barin.)一文，系闵宣化(旧译牟里)神甫实地探考之成绩，将千年来无从寻觅之上京位置，一旦发见，亦整理中国史有价值之著作。爰为译出，以示今之治史学者，俾知不必远至敦煌，遍地皆有历史宝藏也。1927年7月，冯承钧识。

前　言

闵宣化君以此稿寄予，并嘱校订。顾此稿关系甚巨，除将错误显明之处，如误以薛映为富弼一点校正外，其他一仍原稿之旧。鄙意则附注于括弧之中。至其地理考证，是否正确，俟将来比较俄、日学者之著作，再事诠考云。

伯希和附注。

广袤之蒙古，常为战场。历代民族更迭扰乱中国北部，侵略其城市，屠杀其人民，而为中国皇帝之忧者，已有数世纪于兹矣。

东蒙古一地，自亦不乏此类骁勇之人，契丹其一种也。

当纪元五世纪时，中国史书记述契丹之来源云："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辽史》卷三七。)

前记之潢河，即蒙古人今日文言所称之西喇木伦(Sira-muren)，俗称之洒喇木伦(Sara-muren)；土河即今中国人所称之老河，蒙古人所称之老哈河(Loxa-muren)是已。马盂山在今塔保洛洼大平原之西，平地松林在潢河源附近围场以北。此高地平原，应为今日赤峰县西之大高原，即土人所称之漫垫子是也。

契丹最初即居东蒙古西喇木伦及老哈河汇流之处，其先世为东胡之馀众，保鲜卑山，因号鲜卑，至太祖阿保机统一八部时始强，太宗德光于公元938年建大辽帝国。

辽国之历史，人已知之。中国史书中之《辽史》、《契丹国志》等书，久已为汉学家所引用，其地理方位，亦非人所不详之秘。《辽史》卷三七至卷四一所载京府州县，已甚详晰矣。在长城以内之城镇，史书记载明了，不难知为今之何地。顾长城以北各地，频经战争，如女真之侵入，元代之统治，以及明初皇帝之攻掠，昔日行政中区，已毁灭净尽。今日土人因蒙古人之传说，只能记忆二三故城之名。至若久据东蒙古之契丹民族，则忘之久矣。虽然，城镇虽毁，废址犹存，此种古迹，尚散布于蒙古各地，详细研究史地著作，终不难发见此种废址之旧名也。

契丹发源地，即在今之东蒙古巴林旗中。予之探考，仅限斯地。辽之上京，中、日、欧洲学者意见不同，迄今尚难确定为何地。此予一再旅行巴林左右二旗之动因也。予留大营子传道会二年，右旗地理知之甚稔。至左旗则已经过二次，第一次在 1912 年 9 月，第二次在 1920 年 5、6 月间。

夫欲探考上京之地理方位，应遵十二世纪时中国之一旅行家所经行之途程，辅以其他著述，收效较易也。此旅行家即《辽史》所志之薛映。

薛映之行程

沙畹(Chavannes)君于《亚细亚报》(Journal Asiatique)中(1897年5、6月刊,377至442页。1898年5、6月刊,361至439页。),已将旅行契丹、女真之中国旅行家游记译载。其间有名薛映者,即今日吾人之向导也。其留存之行记虽略,然不乏地理知识。其与胡峤之《陷虏记》异者,自中京至上京,明载路程,且迳向北行,较之迂曲绕行之迹为易寻也。

据《辽史》卷三七《地理志》所引:"宋大中祥符九年(西元1016年),薛映记曰:'上京者,中京正北。八十里至松山馆。七十里至崇信馆。九十里至广宁馆。五十里至姚家寨馆。五十里至咸宁馆。三十里渡潢水石桥。旁有饶州,唐于契丹尝置饶乐,今渤海人居之。五十里保和馆,渡黑水河。七十里宣化馆。五十里长泰馆。馆西二十里有佛舍民居,即祖州。又四十里,至临潢府。自过崇信馆,乃契丹旧境,其南奚地也。入西门,门曰金德,内有临潢馆子城。东门曰顺阳。北行至景福门,又至承天门,内有昭德、宣政二殿,与毡庐皆东向。临潢西北二百馀里,号凉淀。淀在馒头山南,避暑之处。多丰草。掘地丈馀,即有坚冰。'"

薛映行记疏证

吾人首应注重者，确定上京之方位也。《辽史》所引宋王曾《上契丹事》，予将有志译刊。兹将中京大定府位置于老河左岸之证据，暂不申述，仅说明该处有大明城废址（大明或为大宁之转。考辽金之大定，即元之大宁，盖北方之京语，n 声逐渐变为 m 声，东蒙古亦两声混而不分，如棉花读如 Niao-houa 之类是也。）。此城在老河左岸，昆都河及霍尔霍河之间。兹举一事以证大明即为中京大定。据王曾所述，中京大定府城，城内西南隅有小冈，东蒙古各故城中具有此地势者，惟有斯城。除不信赖王曾之说外，实无法反证今之大明废城，非辽之中京也。况王曾之说外，尚有证实王曾所述之材料欤？

薛映自中京至上京之行程中，有一最重要之点，足以指示吾人者，潢水石桥是也。石桥以南各站，吾人现在固无法探考，盖薛映《行记》只记载所宿馆舍之名，及其间之距离而已。第昔日东蒙古有居民之处甚多，欲知此种馆舍之所在甚难。薛映并未识及山岳城村之名，即其所述之水道，亦未完全留示后人也。

虽然，其行程则明言自南而北，自中京至上京也。由此推之，其所经之路程，大致首途于今日之大明，经西桥、楼子店、糖房营子，而抵今日之赤峰县（Olan-Xata）。此道山岳甚多，不容另觅他道。此外更有一道，循老河行，经二十家子、高粮杆子店、没里河、大拉明安，而抵赤峰，然又与“正北”之记载不合，薛映必未经行此

途也。

薛映并未经过高州及松江州，否则必于行记志及。其行程在二州之间，可无疑也。薛映至赤峰附近渡英金河。其渡英金河必不在上游。如在上游，须渡锡伯河、半拉箭川、英金河三水，绕道甚远也。稍明此地路途者，必以为欲赴巴林桥，必经大木头沟。至此始有歧道。再经四道沟梁、乌丹城，而抵石桥。

由大木头沟向西北行，另有一道过沙子梁、杜家地。登高原，过三叉口。下高原，过广德宫、黑水梁、七棵树，而至石桥。

自大明至石桥，并不循水道流域行。盖此处流水方向为西东，而薛映行程为南北也。是其行程所经，必越山渡河。顾此处山岳，非到处可越者，须经队商可越之峡道。此种峡道，予以为大致今昔多同也。旧道固有变更者，如黑水梁峡道，昔日在山峡之中，今山峡已凹落，峡道改在西面山腹之上矣。

薛映经过乌丹城，亦非不可能之事，盖此途较黑水梁一道远近相距不多也。自赤峰至乌丹一百八十里，自乌丹至石桥一百二十里，都三百里。黑水梁一道则有二百八九十里。难者曰，薛映如经乌丹，必志及今日尚可见乌丹城之废址。殊未知此城辽时尚未建筑，元时始有之。斯又不足证明薛映未经此道也。

《辽史》所志薛映之行程不一。卷三十七所引薛映记曰："八十里至松山馆。"而卷末又增改为"八十里至临都。四十里至官窑。七十里至松山馆。"

据此二说，自中京至石桥，由前一说为三百七十里，由后一说为四百八十里。予曾计算路程，自大明经沙子梁、黑水梁至石桥，约五百里。如经乌丹城，当不止此数。由是观之，《辽史》前记有缺文，后记乃根据富弼之行程改正也。

关于松山馆，吾人应为说明者。《辽史》卷三九列有松江州，统县一，松江县。州城废址在盔甲山半拉箭川流域之中，兔儿都(Txolatho)地方附近。兔儿都之西有村名城子。城子附近，可见松江州旧城。《承德府志》卷二一误以此城为在小乌珠穆沁，盖是处亦隐有一旧城废址也。据《志》载，是城应在遮盖山西北二十里。《热河志》引《一统志》，亦云松州(即辽之松江州)东南二十里，有遮盖山。此山即今之大碾子洞，1143年金代碑文尚存。

金时于辽之松江州旧治设松山县，元时为松州。辽时此城在昔日松漠边界，包括今之围场及克什克腾旗。松江县境内有松山，薛映《行记》之松山馆，疑在此山之间，或山谷之内。此外馆舍，后别有说。

前此予以为12世纪之石桥，即今之巴林桥，兹于下节证明之。

潢河石桥

昔日潢河石桥，今应尚在旧处。理由有二：一因此处可以建桥。蒙古河桥类多临时建筑物，冬建春毁，不能久存。只有此处有建永远河桥之可能性。二因与薛映所志五十里至黑水河之距离相符也。

潢河之河床为沙质，流水不断冲运黄沙。平时固可徒涉，然领导之人亦有时陷于河床中动沙或沙井之内。潢河两岸为沙洲，河身广隘不齐，河岸间有奇形岩石，而且河身甚宽。用寻常方法建石桥于此种不坚固地盘之上，绝不可能。惟有二处河岸岩石相距不远。有此天然桥基，建桥自易。此二处一名桥头，一为今日巴林桥址。桥头地方在巴林桥西，距离甚远，大约在百五十里以上。昔日已建一桥，今尚能见其桥基，现闻有重建之议。且闻数华人言，已经动工。薛映赴上京所过之桥，决非此桥。盖其所经之桥至黑水河只五十里，而桥头至黑河最近亦不止百五十里，且须向西绕道，况近处有桥可涉乎。

辽时已有此桥，绝无可疑。薛映所涉，盖即今之巴林桥。予前已说明在潢河两岸沙洲之上，不易建桥。欲觅昔日石桥，须注意下列两点：

一、应有一种天然易于建桥之处；

二、此处应距黑水河五十里。

只有巴林桥具有此两条件也。

假道此桥赴巴林，在河以南须经十里沙地，始至河岸。平时河床干涸，河岸有一岩石，距此第一岩石两三丈，又有第二岩石，岩面尚宽，北岸又有一第三岩石，建桥者只以桥联此三岩石，桥即成矣。第一岩石至第二岩石有一桥，渡桥有石路，栏以石栏。第二岩石至第三岩石有二桥孔，第一孔之桥基，大水时尚露水面。第二孔之桥基，一经大水，即没于水内。平时水于桥下分为二流，水涨时合而为一。大水及解冻时，水不能全流桥下，更向桥南流出。故蒙古人于冬季建一临时渡桥，春日即拆去。

自巴林桥北七十里至大板[蒙古人名大瓦房(Ixe-basen)]。大板为一大村，约有华人、蒙人三百家。巴林王府所在处也。巴林王府原在洒波尔台(Sabortha)，1913年东三省军队攻蒙古时，毁于兵燹，乃改以1912年所建之大板王府为驻所。然巴林右旗之蒙王常在北京。

大板之南有一河流，今名察罕木伦，华言白水也。是即古之黑水河，后此别有说明。欲赴上京，似不应经过大板，盖其地在薛映渡河处之上游。薛映所止之保和馆，应在黑水河之南，与石桥相距五十里之说方符。此为赴上京之惟一道路。关于此节，后别有说。

由是观之，辽之石桥，与今日之巴林桥，在同一处所，敢断言也。

饶州故城

薛映记曰:“桥旁有饶州,唐于契丹尝置饶乐,今渤海人居之。”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四六所引亦同,然作“饶乐州”,而《蒙古游牧记》则更正其误,作“饶乐府”,且《唐书》亦作“饶乐府”也(伯希和注:《契丹国志》著于《通考》五十年前,亦作“饶乐州”,《通鉴长编》卷八八亦作“绕乐州”。吾人应知者,唐代所置为都督府,非散府也。)。

薛映未说明饶乐在河北,抑在河南,仅言“旁有”。然此“旁有”二字,不能据以为寻求之根据也。河之南沙丘遍布,不宜建城。河北沙地较平,固有建城之地,然桥之两岸皆无建城之迹也。

薛映所记之路程,自石桥至上京,都二百一十里。然据《读史方舆纪要》,饶乐距临潢(上京)二百三十里。然则饶乐旧城应求之于桥南二十里欤。此种里数,洵能认为正确欤。要之薛映所记在《读史方舆纪要》数百年前,数目之价值,亦不可过于根究也。

古代城址,或为河南之活动沙丘所埋没,亦意中所必有之事。河之西南二十里,胡迭都地方,居民中有赵姓者,其儿童所玩之小件物品,皆发见于沙中者,此予所亲见者也。斯地之基督教徒告予云,胡迭都沙中不乏古物。此地前此已有居民,绝无可疑。沙中之物,或为古东胡所遗,此民族或结幕于斯地也。饶乐旧城如在河南,恐不易探求其故址,盖流沙移动,旧迹已不存也。旅行家经行此沙地者,忽见道路为流沙所没,可以类想及之。

是否应认饶乐为一游牧之城，为一种幕帐聚落，致无踪迹可寻欤。此种城聚，昔已有之。考《旧唐书》卷三九云："安东都护府领羁縻州十四，并无城池，是高丽降户散此诸军镇，以其酋渠为都督刺史羁縻之。"其例之著者也。

顾辽之府州无城者为例外。所有潢河南北之京府州县，皆有城池，惟西喇木伦及老河汇流处之永州，或为例外耳。宋使宋绶（伯希和注：《通考》作宋缓，乃宋绶之误，兹为改正。）由中京至木叶山，《行记》有云：（木叶山在永州境内）"离中京皆无馆舍，但宿穹帐，至木叶三十里许，始有居人瓦屋。"

顾《辽史·地理志》卷三七所志之饶州，为有城池之州。盖既云太祖完葺故垒，则前此必有建筑也。

兹录其全文，俾详知此州之真相。

"饶州，匡义军，中节度。本唐饶乐府地，贞观中置松漠府。太祖完葺故垒，有潢河、长水泺、没打河、青山、大福山、松山。隶延庆宫。统县三。"

"长乐县本辽城县名，太祖伐渤海，迁其民，建县居之。户四千，内一千户纳铁。"

"临河县本丰永县名。太宗分兵伐渤海，迁于潢水之曲，户一千。"

"安民县，太宗以渤海诸邑所俘杂置，户一千。"

考《新唐书》卷二一九，《北狄列传》，629年（贞观三年）奚始来朝。后其长名可度者内附，帝为置饶乐都督府。

考《旧唐书》卷九《玄宗本纪》，又有奚饶乐都护之号。

据《承德府志》卷六云："唐代，奚酋内附者，皆授饶乐都督。契丹内附者，皆授松漠都督。"

又考《新唐书》卷二一九,《契丹传》,载开元二年(714年)诏,复置松漠府,以李失活为都督,封松漠郡王。天宝四年(745年)契丹大酋李归秀降,拜松漠都督,封崇顺王。此皆契丹酋授松漠都督之证也。《新唐书·契丹传》又云:帝(太宗)伐高丽,悉发酋长与奚首领从军。帝还过营州,尽召其长窟哥及老人,差赐缯彩,以窟哥为左武卫大将军[1]。大酋辱纥主曲据又率众归,即其部为玄州,拜曲据刺史,隶营州都督府。未几窟哥举部内属,乃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为使持节十州诸军事,松漠都督,无极男,赐氏李。以八部置八州,俱隶松漠府,即以辱纥主为之刺史。

前所引各书,皆证明松漠、饶乐为契丹、奚之治地。松漠在今之潢河发源之地,包括今之克什克腾、巴林、翁牛特各旗。饶乐则据《承德府志》,在流经赤峰县之英金河流域。原为奚种居地,后渐为契丹所役属。契丹之势,遂渐南侵。

《承德府志》引《北蕃地理志》,以高州距石桥一百五十里,饶州在石桥西北六十里。巴林桥西北六十里固有一旧城废址,顾高州距桥百五十里错误显明,此城是否为昔之饶州,尚待考也。此城在雷霹山之西二十里,潢河沿岸。前引《辽史·地理志》,饶州有临河县,潢水之曲。此城或为昔之临河欤?

至若安民县,疑即今日南至大金沟北抵老胡史沟小山谷口之废城。由好来井子至雷霹山,顺林西县至潢河之道路行,即可见此废城。

《辽史》所志之青山,或即中国人今日所称之大青山。山在潢河之北,在巴林桥即可远瞩也。

长泺县之名,得自长水泺,距桥似不甚远。由小坝头至巴林桥不远之处,道右有一沮洳之地,或即昔之长水泺欤?

注：

〔1〕峻岭按：《新唐书》卷二一九《契丹传》作左武卫将军。

保河馆及黑水河

薛映记曰："渡潢水石桥。五十里至保和馆，渡黑水河。"

此道尽沙丘，须多方绕道，始抵毛胡卢沟山谷。半拉山旧道已为流沙所闭塞。路左有村，名骆驼井子。东方有山，华人名曰巴林山，亦名大青山。一蒙古人告予云："这是我们巴林旗的风水山。"蒙古人名此山为汗山（Xan-ola），又名巴颜汗山（Bayan-xan-ola），又名巴尔登哈尔山（Barthenn-xar-ola）。《蒙古游牧记》卷三以此山在巴林右旗之南六十里，即今之王爷府之南六十里，而名此山曰巴尔达木哈喇山，但蒙古人则名巴尔登或巴尔当也。《蒙古游牧记》亦志有巴尔当山，然为别一山，在王爷府南三十里，并认为《辽史》之勃突山。

考《辽史》卷三七《地理志》庆州条下云："辽国五代祖勃突，貌异常，有武略，力敌百人，众推为王。生于勃突山，因以名。没葬山下。在州二百里。"

又考《清一统志》，此山在庆州之东南。顾庆州为今日华人所称之白塔子，蒙古人所称之察罕苏布尔罕（Tsxaga-Soborga），设其距离及方向不误，勃突之墓应在大板附近大青山中探寻之。今日蒙古人知此处有古墓，然不能明指其处。至勃突山名，彼等从未闻之也。

巴尔达木哈喇山与巴尔当山是否为一山，予尚未能解决此问题。顾蒙古人既以汗山名大青山，并附以种种灵奇，山中又有古

墓，详细探考之，或能发见勃突之墓于此山也。

毛胡卢沟之尽处，为沙墩行列。越过沙墩之后，抵赛洛木沟(Sarm)流域。沿此水行，径达察罕木伦，即华人所称之白水是已。

此白水即薛映所记之黑水河欤？若以石桥之距离言，此水应为黑水河，盖吾人见有一水，且为巴林旗此处最巨之水。

《辽史》志有黑河，吾人既未见另一黑水河，此二水当然为一水无疑。

有学问之蒙古人，且记得百年前，白水原名喀喇木伦，即华言黑水也。所以易名者，因旧名不祥。蒙古人因迷信，变更山水名称之例甚多，不仅此处为然。

由是观之，今之白水，即昔之黑河或黑水河。矧黑河与潢河时常联称，应求黑河于潢河附近，可无疑矣。

保和馆之位置，应在黑河之南，昔日必有一大聚落，详细探考之，自不难发见其旧址。

保和、宣化、长泰三馆之名，与临潢府所属三县之名相同，知县之所在，似不难知馆之所在。

予今未能解决此问题，特将《辽史》所志之资料列举于后，以供将来探考家之参考。

《辽史》卷三七《地理志》所志三县之文如下：

“保和县本渤海国富利县民。太祖破龙州，尽徙富利县人散居京南。统和八年(990年)以诸宫提辖司人户置。隶彰愍宫。户四千。”

“宣化县本辽东神化县民。太祖破鸭渌府，尽徙其民居京之南。统和八年，以诸宫提辖司人户置。隶彰愍宫。户四千。”

“长泰县本渤海国长平县民。太祖伐大諲譔，先得是邑，迁其

人于京西北，与汉民杂居。户四千。”

如前所述，保和、宣化二县应求之于上京之南，惟长泰县在上京之西北耳。

《辽史》卷三七云：临潢府所统十县，九县在府城之中（译者按：《辽史》无此文，不知著作者何所据而云然。）。临潢府城之中，宫殿庙观衙署固多，然决不能容一万九千五百户之居民。此种户口，应散居各处。查斯地当日可以建城之处，为类有三。一为历史区域，辽帝建城以为纪念之地，此种城聚，只有纯粹契丹人建筑之。二为皇陵所在，守卫所居之地。三为移民垦植之地，是为县城，吾人欲寻求此种城聚，应于土地饶沃之处探考之。

巴林旗中之旧城，多于《辽史》所列之州，而金元两代并未建筑多城，可知当日县治必在府州城之外。顾史书所志之地理方位不明，而蒙古人又多疑，不愿指示吾人。是欲知其方位，应详知各地山岳流域，始能发见昔日城迹。予所见之废城，别列于后，以待后来者之探考。

至若前述之保和、宣化、长泰三县，尚待探考，予今无暇寻求也。

研究至此，道路及意见之分歧见焉。若以今之白塔子为辽之上京，如沙畹（Chavannes）及其他学者之考证，则行程应溯白水而上。若以今之波罗城（Boro-xotxo）为辽之上京，则应由白水北岸沿廓尔戈台河（Guorgoltha-gol）流域北行。吾人兹就此二途寻究之。

保和馆至宣化馆七十里，宣化馆至长泰馆五十里，共一百二十里，再四十里至上京。设以波罗城为上京，则长泰馆之方位应在其南四十里今之乌兰二格（Olan-erxe）蒙古村之南。由长泰馆南行，路经分廓尔戈台河及巴颜河（Bayan-gol）二水之山冈。过冈，沿廓

尔戈台河行，在廓尔戈台庙附近，又越数冈，抵洒洛木河。宣化馆应在廓尔戈台庙之北，济门庙(Tsimen-sum)之南求之。

据前述之路程，薛映所记之距离甚确也。又据其所记长泰馆西二十里即祖州，当日彼在途中，可见山腹所建之祖州城及其中著名之西楼也。即在今日，吾人尚能远望城之废址及其中之“石屋”。

只此一事，已足证明波罗城之为上京。设以白塔子为上京，距白塔子四十里之地，并无废城，惟在浩珀都流域有一废城，然距白塔子有五十至五十五里。观此城之形状，与《辽史》所志之祖州无一相符，而城西五里诸山亦无辽代建筑物之痕迹。

尚有一事可以证明白塔子为上京一说之误者。薛映记中惟言一次渡黑水河，如白塔子实为上京，则薛映或不渡黑水河，或“两渡”黑水河，其渡河之处，不应在距石桥五十里之保和馆，而远在宣化馆及长泰馆之间也。

赴白塔子之道途，由洒洛木河偏左行，沿白水右岸，经五十家子、关地，至榆树林子。其左岸无大道，薛映不能于大板地方渡河，循左岸行也。左岸之山，有延至河岸者，如沿左岸行，须攀越险峻之山道。至右岸之道路平坦，只数处有沮洳而已。行至榆树林子，为取近途，须渡河，再于乌牛台(Unitha-gol)复渡回右岸，经头道湾子、五十家子、十二家子而抵白塔子。此城在白水之右岸，故欲莅其地，或不渡河，或两次渡河也。

辽之上京有涞流河、曲江二水，而白塔子只有一水。此水辽时即名黑河，而辽之上京并无黑河流绕。足证昔之上京，必非今日之白塔子。

祖州旧城

溯廓尔戈台流域而上，抵黄城子或洒喇图拉(Sara-txala)，逾山至巴颜河(Bayan-gol)流域。河之北为满济克山(Mantsik-ola)，山后即古之祖州。

经过黄城子，行近乌兰二格(Olan-erxe)之蒙古包时，即见西方山腹之上，有一方城废址，中有一屋，不类此地之建筑。此城望之似近，然须在榛莽中骑行一小时始达。此处即昔之祖州欤？

欲解决此问题，须搜集种种史料。兹先录《辽史》卷三七《地理志》原文于下：

“祖州，天成军，上节度。本辽右八部世没里地。太祖秋猎多于此，始置西楼。后因建城，号祖州，以高祖昭烈皇帝，曾祖庄敬皇帝，祖考简献皇帝，皇考宣简皇帝所生之地，故名。城高二丈，无敌棚。幅员九里。门，东曰望京，南曰大夏，西曰液山，北曰兴国。西北隅有内城，殿曰两明，奉安祖考御容。曰二仪，以白金铸太祖像。曰黑龙，曰清秘，各有太祖微时兵仗器物及服御皮毳之类，存之以示后嗣，使勿忘本。内南门曰兴圣，凡三门，上有楼阁，东西有角楼。东为州廨及诸官廨舍，绫锦院、班院，只候蕃、汉、渤海三百人，供给内府取索。东南横街，四隅有楼对峙，下连市肆。东长霸县，西咸宁县。有祖山，山有太祖天皇帝庙，御靴尚存。又有龙门、黎谷、液山、液泉、白马、独石、天梯之山。水则南沙河、西液泉。太祖陵凿山为殿，曰明殿。殿南岭有膳堂，以备时祭。门曰黑龙。东偏

有圣踪殿，立碑述太祖游猎之事。殿东有楼，立碑以纪太祖创业之功。皆在州西五里。天显中太宗建。隶弘义宫。统县二，城一。”

“长霸县本龙州长平县民，迁于此。户二千。”

“咸宁县本长宁县，破辽阳迁其民置。户一千。”

“越王城，太祖伯父于越王述鲁西伐党项、吐浑，俘其民，放牧于此。因建城。在州东南二十里。户一千。”

《读史方舆纪要》卷一八所志亦同，其文较简。据云：“长霸、咸宁二县县治，在州城之内。”

“县治在州城之内”云者，盖言县署在州城之内。居民大多数似散居县城之外，州城之中不能容三千户也。

至若越王城，据蒙古向导言，自大板至波罗城之途中，距旧城二十里，有蒙古人居留旧址，在绰庙（Dzo-sum）西南十里。绰庙在祖州东三十里，是处尚有古墓，就地详细考之，不难发见昔之越王城及述鲁家族之坟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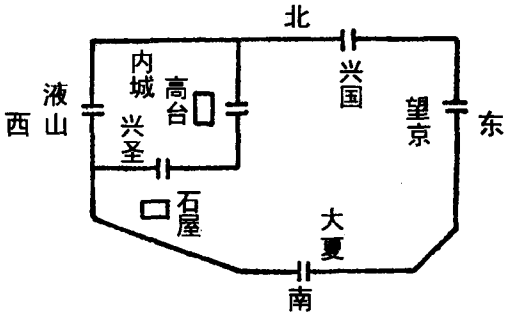
胡峤《记》曰：“上京西楼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绵诸工作。宦者、翰林、技术、教坊、角觝、儒、僧、尼、道士，中国人并、汾、幽、蓟为多。”（伯希和注：前人误以上京为西楼，盖沿胡峤《记》及《三朝北盟汇编》所引《金虏节要》之误，据云“昔金人初破上京，尽屠其城。后以有罪者徙其中，彼人视之以为罪地，如中国琼崖之类。地居燕山东北一千七百里，乃《五代史》所载契丹阿保机之西楼者是也。”其实西楼在祖州，不在上京。）

昔人所志如前，兹述今之所见于下：

城在狭谷之中，雨水山泉流注巴颜河。有一大河床在城之东南，现正干涸。

城墙非完全方形，东西两面均长一百八十弓。城门皆在城墙

中间。北城宽三百九十弓。内城在一百七十弓与外城相连。北门在内外城相连处与东北城角之中。南城分三段,长短不齐。东一段北接东墙,南接南墙。南墙大致与北墙等。第三段东接南墙,西连西墙。其形如下:



全城位置山坡之上,内城及西南角为全城最高之处。

城之西北角与一山沟相对,下有干涸河床。此河在近城之处分为二流,其一沿北墙流入前述之大河,其一沿西墙流入大河。

内城之东门,昔为一大建筑,今尚留有痕迹。门内有一高台,似为昔日宫殿旧址。此处昔为皇城,决无可疑,地上尚留存昔日之黄绿色瓦,及大柱基石。观砖瓦焚毁之迹,此壮丽之古城,似毁于火也。

祖州亦名西楼。此外尚有北楼,《五代史》卷七二云:"在上京之北三百里。"有东楼,《五代史》云:"在上京东千里。"然《辽史》以其地在上京东二百里之龙化州,然则须于阿噜科尔沁旗求之。有南楼,应于潢河及老河汇流之处求之。

兹四楼昔作何用,史未详志其建筑,吾人亦无从揣度也。祖州有一奇异建筑,蒙古人名曰石屋(Tsxolon-ger),南西北三面以整花

岗石为壁，东面左右各一石，其中为门。兹将屋外所量之容积开列于下：

厚，三十公分。

高，三公尺十公分。

南北长，五公尺二十五公分。

东西宽，六公尺十公分。

东西二石各宽，二公尺四十公分。

门宽，一公尺三十公分。

屋顶亦以整石覆之，厚与壁等，檐与壁齐，四隅有角。建屋时顶壁皆联以铁钩，今尚能见其痕迹。

今日屋中空无所有。据蒙古人言，屋隅昔有一白石神像，已为人碎作磨刀石。此外尚见有破碎大绿瓦。

此屋昔作何用，吾人无以知之。惟此种建筑，据吾人所知，盖为蒙古绝无仅有者也。此石屋在内城之南，内城南墙与外城南墙之间。

此屋是否即昔日之西楼，吾人无从知之。但根据下述之论据，可以断言此地为辽之祖州。

一、此废城即在薛映《记》中祖州所在之地，距长泰馆二十里，距上京四十里。

二、有内外城，内城即在西北隅，亦与薛映所记相符。

三、辽太祖所建之城，废基尚存。

四、外城四门，今尚可见。内城亦有三门，亦与《辽史》所载相符。惟内城之西门亦即外城之西门，盖一门也。

五、附近有祖山，亦足资证明也。

其惟一不符之点，则祖州幅员九里，而此废城只三里有奇。此

种不符之点，不惟祖州为然，上京之幅员亦大过今地。或者《辽史》所记之幅员，系包括附郭而言，或者所载有误也。

祖　山

《辽史》“祖山有太祖天皇帝庙，御靴尚存。又有龙门、黎谷、液山、液泉、白马、独石、天梯之山。水则南沙河、西液泉。太祖陵凿山为殿，曰明殿。殿南岭有膳堂，以备时祭。门曰黑龙。东偏有圣踪殿，立碑述太祖游猎之事。殿东有楼，立碑以纪太祖创业之功。皆在州西五里。”

祖州之西门既名液山门，其对西门之山当然为液山，西门外之泉水，当然为液泉，沙河应为注入巴颜河之大河。

祖山在城之西，其形如盆。惟一入山之口，距祖州不远。史云，州西五里，盖指自州城至山中之三建筑物之距离而言也。

此山口为两岩所夹持，岩石甚高，东一峰上矗云霄。山口昔有建筑物，今尚于荆棘中见砖瓦，更有残物堆积，似为昔日山口建门之废迹。此应为昔之龙门，其中山谷应为黎谷也。

山口有小溪，疑即液泉，蒙古人名之曰大泉。

入山口后，谷中泰半荆棘，有时发现屋基，正对山口山腹之上，尚有残砖断瓦，将荒原中古代之遗迹，留示后人。

蒙古人熟知此处山谷，有时放牲畜于谷中，守其谷口，无一失者。西北山脊似有小道可通山内，然已筑墙隔断，此据蒙古向导言也。

山后山谷草中尚卧有若干翁仲，然辽代之碑已无存矣。但据郭比耳(Gaubil)神甫所记，此碑康熙时尚存。

沙畹误以为上京在白塔子地方，又误以俄人波质勒夫所拓之碑文，即郭比耳神甫所言纪阿保机创业之功之碑，乃研究之结果，颇为失望。此碑今日尚存与否不可知，惟不可在白塔子地方寻求也。

数年前乌兰二格地方之蒙古人，偶见地有一洞，试以套马杆子探之。出其杆，杆头有红缎，以手拂之，即为灰尘。旋为巴林旗王所闻，封塞其洞。此盖契丹古墓。契丹人殡葬不用棺椁，惟掘土室，设木床置尸其上，设有空洞，以杆探之，不难勾取其衣服也。

绰　庙

祖州有僧尼道士佛舍，胡峤及薛映《记》中已言之矣。该处今尚存有东蒙古各旗所同奉之佛教圣地。

长泰馆道，在祖州东二十里。巴颜河流，在乌兰二格之东。距此十馀里，有喇嘛庙，蒙人曰绰庙（Dzo-sum），华人则名曰小五台山，其地风景甚佳。

蒙古人告予云："庙后洞中有辽王像。"是时予尚未知祖州所在，以为辽太祖阿保机之墓或在斯地。孰知大谬，即山后洞中所供者，亦为寻常佛像，无所谓辽王也。然喇嘛庙则颇值一游，不特其风景甚佳，且亦不乏古迹。庙之后，有断碑，全文不可考，惟于一石之上，见有"陀波利仪凤元年从西国来至此土，到五台山，"残文，可以证明纪元676年时，绰庙山洞已有庙寺游人也。中国人名斯地为小五台山者，或本于此。佛教当时传布于契丹，又可藉此碑知之。（伯希和注：碑文盖《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志静序中之语。陀波利盖为佛陀波利（Buddhapala）之残文。序谓：佛陀波利676年至五台，然不久即回天竺求《陀罗尼经》，于683年重来中国。此碑文所刊，盖为《陀罗尼经》及其序文。此种碑文，各地方多有之，不特此处为然也。）

吾人所至之绰庙，为后庙，尚有前庙在山之前，风景亦甚佳。

上　京

溯巴颜河上行，即于薛映所记之距离，抵上京废址。兹先录《辽史》所志上京之地理于下，以备参考：

“上京临潢府，本汉辽东郡西安平之地，新莽曰北安平。太祖取天梯、别鲁等三山之势，于苇甸射金龈箭以识之，谓之龙眉宫。神册三年城之，名曰皇都。天显十三年，更名上京，府曰临潢。浹流河自西北南流，绕京三面，东入于曲江，其北东流为按出河。又有御河、沙河、黑河、潢河、鸭子河、他鲁河、狼河、苍耳河、辋子河、胪朐河、阴凉河、潴河、鸳鸯湖、兴国惠民湖、广济湖、盐泺、百狗泺、大神淀、马盂山、兔儿山、野鹊山、盐山、凿山、松山、平地松林、大斧山、列山、屈劣山、勒得山。唐所封大贺氏勒得王，有墓存焉。户三万六千五百。辖军府州城二十五，统县十。”

“临潢县，太祖天赞初南攻燕、蓟，以所俘人户散居潢水之北，县临潢水，故以名。地宜种植。户三千五百。”

“长泰县，本渤海国长平县民。太祖伐大諲譔，先得是邑，迁其人于京西北，与汉民杂居。户四千。”

“定霸县，本扶馀府强师县民。太祖下扶馀，迁其人于京西，与汉人杂处，分地耕种。统和八年，以诸宫提辖司人户置。隶长宁宫。户三千。”

“保和县，本渤海国富利县民。太祖破龙州，尽徙富利县人散居京南。统和八年，以诸宫提辖司人户置。隶彰愍宫。户四千。”

“潞县，本幽州潞县民。天赞元年，太祖破蓟州，掠潞县民布于京东，与渤海人杂处。隶崇德宫。户三千。”

“易俗县，本辽东渤海之民。太平九年，大延琳结构辽东夷叛，围守经年乃降，尽迁于京北，置县居之。是年又徙渤海叛人家属置焉。户一千。”

“迁辽县，本辽东诸县渤海人。大延琳叛，择其谋勇者置之左右。后以城降，戮之，徙其家属于京东北，故名。户一千。”

“渤海县，本东京人。因叛徙置。”

“兴仁县，开泰二年置。”

“宣化县，本辽东神化县民。太祖破鸭渌府，尽徙其民，居京之南。统和八年，以诸宫提辖司人户置。隶彰愍宫。户四千。”

“上京，太祖创业之地，负山抱海，天险足以为固。地沃宜耕植，水草便畜牧。金龈一箭，二百年之基壮矣。天显元年，平渤海归，乃展郛郭，建宫室，名以天赞。起三大殿，曰开皇、安德、五銮，中有历代帝王御容，每月朔望节辰忌日，在京文武百官并赴致祭。又于内城东南隅建天雄寺，奉安烈考宣简皇帝遗像。是岁太祖崩，应天皇后于义节寺断腕，寘太祖陵，即寺建断腕楼，树碑焉。太宗援立，晋遣宰相冯道、刘煦等，持节具卤簿法服至此，册上太宗及应天皇后尊号。太宗诏蕃部并依汉制，御开皇殿，辟承天门受礼，因改皇都为上京。城高二丈，不设敌楼，幅员二十七里。门东曰迎春，曰雁儿。南曰顺阳。西曰金凤，曰西雁儿，曰南福。其北谓之皇城，高三丈，有楼橹。门，东曰安东。南曰大顺。西曰乾德。北曰拱辰。中有大内。内南门曰承天，有楼阁。东门曰东华。西曰西华。此通内出入之所。正南街东留守司衙，次盐铁司，次南门龙寺街。南曰临潢府，其侧临潢县。县西南崇孝寺，承天皇后建寺。

西长泰县。又西天长观。西南国子监,监北孔子庙。庙东节义寺。又西北安国寺,太宗所建。寺东齐天皇后故宅。宅东有元妃宅,即法天皇后所建也。其南具圣尼寺,绫锦院,内省司,蒻院,赡国、省司二仓,皆在大内西南。八作司与天雄寺对。南城谓之汉城。南当横街,各有楼对峙,下列井肆。东门之北,潞县。又东南,兴仁县。南门之东,回鹘营,回鹘商贩留居上京,置营居之。西南同文驿,诸国信使居之。驿西南临潢驿,以待夏国使。驿西福先寺。寺西宣化县。西南定霸县。县西保和县。西门之北易俗县。县东迁辽县。"

据前引《辽史》所志,吾人应注意下列数点:

一、辽太祖建都之地,原名苇甸,后为龙眉宫。918 年城之。926 年乃展郛郭,建宫室。938 年更名上京府曰临潢。

二、地距祖州四十里,在涞流河、曲江汇流之处。

三、有二城。一为北城,谓之皇城。一为南城,谓之汉城。

四、两城各别。南城高二丈,不设敌楼。北城高三丈,有楼橹。

五、北城中有大内,为皇帝之所居。

六、涞流河绕京三面。

七、汉城有六门,皇城四门,大内三门。以《辽史》所志,与薛映记对照,薛谓西门曰金德,而《辽史》谓西门曰金凤,曰乾德,或者薛映混二名为一欤?薛记谓东门曰顺阳,与《辽史》"南曰顺阳"之记载亦不合。薛记又有景福门为他记所无,至承天门两记皆同也。

八、上京之面积较他城为大,《辽史》谓幅员二十七里。

就此八点与现今之波罗城对证,能相符欤?

在巴颜河(一作布雅乃河,又作布雅鼐河)与二赤木伦(Uldzimuren)汇流之处,今有一大城之废址。此处二城相接,其一在北,

其一在南。南城现有巴颜河横贯其间。巴颜河自西南来，流向东北入此南城之西，出此南城之东。数百年间，此河穿过西城数处，今已难寻昔日金凤、西雁儿、南福三门之故址。河之南有二洞，疑为前之河道。今复于第三门穿一河道。南城墙较北城墙为低，与东蒙古一带辽之故州城高低相类，且无已毁敌楼之迹。各种建筑材料，如石条石座之类，散弃于荆棘之中。城南为山足。当时薛映不入南门而入西门之理，吾人今始知之，盖由大板至上京，若入南门，须登山下山也。

在此城之北，又有一城，较此城为高壮。《辽史》谓南城较北城垣低一丈，观今日南城不及北城之厚，其不及北城之高，更可知矣。其间更有一不同之点，北城每七十弓必有一土垛突出城外，必为昔日敌楼之故迹。

此城既非正方形，亦非长方形。南、东、北三方为直线，西城分为三段。中段与东城平列，长七百四十弓；南段长二百八十五弓，其线为自西北至东南之斜线；北段长三百弓，其线为自西南至东北之斜线。中段有一山角，城墙斜跨此山，山之北西门废址在焉。

北城宽一千弓，北门偏在西北角。

东城长有一千二百二十弓，其城门距北端较近。南城宽一千弓，为巴颜河所冲毁者二处，南门亦因之无从寻觅矣。

此城与《辽史》所志上京之北城相符，城墙高于南城，有四门及楼橹。

在北城之内最能引起注意者为山角，阶级层列。登此山角，全城在望，其上亦有古代壮丽建筑之痕迹。石基甚多，且有鼎屃二具，足证昔有二碑，今已不存。若不读《辽史》，必寻求辽之宫殿于此山。《辽史》明言大内东、西、北有三门，若辽宫在此山，只能有

东、南、北三门，西面必无门。盖西面外城此处无门，可以推想及之。第此山之遗迹为何种宫殿寺观，尚难言也。

大内似应在北城之北求之。大内之城今虽不存，然城北不乏高丘，似为昔日宫殿所在，今尚留有石基残砖断瓦。有一处在丘之西，虽不甚高，观其所遗之绿瓦石基，足证昔日必亦为宫殿旧址。

皇城南门北面之小丘，应为大内之承天门遗址，今尚存有一对残缺不完雕刻甚劣之石狮。

至若当时之宫殿寺观衙署，今暂未能寻求，惟见残石废器散布各处而已。城之东南隅，有一石像，高五公尺，面手现已不存，是岂当日天雄寺中宣简皇帝之遗像欤？

《辽史》云："涞流河绕城三面。"现在巴颜河惟流经南城，东行与二赤木伦会。昔日巴颜河或曾绕城三面，观河道屡更之迹，及东北角之凹处，似为当日绕流之故辙。其所以流经三面而不环绕全城者，因西方有山角阻隔也。

《蒙古游牧记》卷三云："波罗城址周二十里，内有三塔久毁。"三塔之一，疑即应天皇后之断腕楼。其二塔在城外：一在城西，一在城南，其式与东蒙古一带辽代故城所建之塔相类。

准是以观，波罗城即为古之上京。盖一因其地有南北二城。二北城高于南城，北有敌楼，南无敌楼，与史志相符。三在二水汇流之处，又距祖州四十里也。

可以证实吾说者，不惟此也。尚有下述各事，可以参证。

波罗城昔有宫殿，有绿瓦可以证明，大内所在亦容易寻求。

城门所在与史志所记相合，其数亦符。

薛映入西门之原因，予已解说于前。

巴林旗中废城之广袤重要者，莫若此城，其位置之优先，可以

想见。《蒙古游牧记》以波罗城与和戈图绰农(即前之廓尔戈台河)东岸之古城,皆得为昔之上京,疑不能决。此另一古城,在巴林与阿噜科尔沁接界处,汉名为白墙子(Tsxagan-xeren),处波罗城之东北,距巴林桥太远。予虽未莅其地,惟据蒙古人说,此城不及波罗城宏大。

其可以反证吾说者,惟《辽史》之"涞流河自西北南流,绕京三面,东入曲江。"一节,盖西有山角,河水不能南流也。予以为史志之"西北南流"疑为"西南北流"之误。总之,波罗城之为上京,绝无可疑。东蒙古河流固不乏二水汇流之处,但欲于其间求一废城,洵罕见之事也。

兹将就其水道山岳考证之:

巴颜水既为古之涞流河,曲江应为今之二赤木伦。二赤木伦之名,中国地理书中未见,《清一统志》与《蒙古游牧记》二书,惟有乌尔图绰农河。若以蒙古语表其音,应为 Ortxo-taxonon-gol,华言长狼河也。发源于巴颜乌蓝峰(Bayan-olan-tawa),向东南流,北有支流名水头河(Osin-txuru)者来会,至波罗城,巴颜河来会,东南流入阿噜科尔沁境之达布苏图池(Tafsatho-nor)。此池应为《辽史》所志临潢府之盐泺。

据蒙古人说,二赤木伦之名,非古名也。二赤为佛教一种符号,其形弯曲,二赤云者,盖表示水道之曲也。则二赤木伦或者系译自契丹曲江原名。金代此水名金粟河,盖《金史》只记临潢一水,此水应指主要之二赤木伦也。

史之按出河,疑为今之水头河。

史之阴凉河,疑为白水支流之古腾河,华言凉水也。此水在庆州,而亦列入上京水道之内者,盖包括临潢一府之河道而言,与潢

河、黑河并列之理由同也。

兔儿山,《蒙古游牧记》指为今日札噜特右翼札萨克驻地北方之图尔山,《清一统志》则名兔尔山。

马盂山,《蒙古游牧记》指为今之阿尔坦额墨尔,译为蒙文,应为Aitan-emel,华言金鞍也。山在札噜特右翼西北二百二十里。《蒙古游牧记》所记阿噜科尔沁旗东北二百六十五里,亦有马盂山,蒙古亦名阿尔坦额墨尔,予以此二山为一山,一名互见也。

野鹊山,《蒙古游牧记》云:"札噜特左翼百二十里有野鹊山,蒙古名巴颜喀喇山。"《辽史》云:"上京有野鹊山。"此山是否古之野鹊山,尚待考也。

《蒙古游牧记》云:"札噜特左翼北八十里有酋山,蒙古名阿尔坦噶达苏。"华言金钉也。

大斧山,《蒙古游牧记》指为今之伊克托灰山。此山汉名大釜山,在札噜特西七十里。接阿噜科尔沁界有伊克托灰(Ixe-txogo)山,华言大釜也。

列山,今在札噜特左翼北百八十里,实名霞列山,蒙古名吉尔巴尔,亦据《蒙古游牧记》之考证也。

札噜特左翼东北九十里有屈劣山,蒙古名布屯华陀罗海(Butungui-txologa)(《蒙古游牧记》),华言头暗也。

平地松林,若以《辽史》卷三《太宗本纪》所记,"四月甲申地震,幸平地松林,观潢水源。"一节,不难寻求也。

其地应在今之克什克腾旗。"平地"应含有高原平地之义。《契丹国志·序》以潢水发源于饶州之西,高原平地松林之中。顾饶州应在今日巴林桥附近,前已说明,则《蒙古游牧记》所言"札噜特左翼东南六十里有平地松林,蒙古名阿它尼喀喇莫多,密林丛翳二

十馀里”之平地松林，别为一地，非昔之平地松林也。

予前所引《蒙古游牧记》之指证，当然由原著者负其责。

怀　州

《读史方舆纪要》云："怀州本唐时归诚州地(693年)。松漠都督李尽忠与归诚州刺史举兵反，陷营州，州旋废。"又祖州一条下云："祖州西五十里有西山，辽太宗葬此，曰怀陵，置州以奉焉。"

《辽史》卷三七云："怀州，奉陵军，上节度。本唐归诚州。太宗行帐，放牧于此。天赞中，从太祖破扶馀城，下龙泉府，俘其人，筑寨居之。会同中，掠燕、蓟所俘，亦置此。太宗崩，葬西山，曰怀陵。大同元年，世宗置州以奉焉。是年有骑十馀，猎于祖州西五十里大山中，见太宗乘白马独追白狐，射之，一发而毙。忽不见，但获狐与矢。是日太宗崩于栾城。后于其地建庙，又于州之凤凰门绘太宗驰骑贯狐之像。穆宗被害，葬怀陵侧，建凤凰殿以奉焉。有清凉殿，为行幸避暑之所。皆在州西二十里，隶永兴宫，统县二。"

"扶馀县本龙泉府。太祖迁渤海扶馀县降户于此。世宗置县。户一千五百。"

"显理县本显理府人，太祖伐渤海俘其王大諲譔，迁民于此。世宗置县。户一千。"

契丹灭渤海，辽史太祖本纪纪其事云："天显元年(926年)7月辛未，卫送大諲譔于皇都西，筑城以居之，赐諲譔名曰乌鲁古，妻曰阿里只。"

据《辽史》所记，怀州，唐为归诚州地，后以渤海俘置此，始有城。继又以所掠中国俘实其地。太宗崩后，州愈发展。

《读史方舆纪要》云："扶馀县为怀州之附郭。"至显理县予尚未详其位置何处。

上京之位置既指证于前，怀州之所在，不难寻求得之。据《辽史》所志，上京、祖州、怀州、庆州，相距不远，兹举一例以证之。《辽史·道宗本纪》，"清宁元年十一月甲子，葬兴宗皇帝于庆陵，壬申次怀州，甲戌谒祖陵。"则怀州距祖州不远也。

《读史方舆纪要》云："怀州在上京西南百里。"从上京向西南行，经济穆尔沁山（Tximurthin-tawa）、图林包拉村（Txalin-bolak）、喀英山（Xayin-tawa），而抵廓尔戈台河。是处有喀僧阿马村（Xasen-ama），村在河边。河之下游为巴林左翼贝子府。河之上游有一废城，其地正距上京百里。

此废城处两急流汇合之处。城西北之流域，有道可通北方，似为城墙堵塞，是以由北方川心庙（Dzurgin-sum）下注之急流，在城西北角与对面岩石之间始获下流。就此点观之，此城之特质，不难知之，其作用即在防卫此流域。顾辽之怀州之目的，即在防卫怀陵。吾人欲寻怀陵，当溯河流上行。

吾人现认为怀州之废城，宽长各二百弓，南北西三面有门，东城在山，无门。

怀　陵

《辽史·太宗本纪》云："天显十年(935年)正月戊申，(穆宗之母靖安)皇后崩于行在。五月甲午朔，始制服行后丧。丙午葬于奉陵，上自制文，谥曰彰德皇后。"

《太宗本纪》云："天显十二年七月癸丑，幸怀州，谒奉陵。"则奉陵应亦在怀州。《辽史·地理志》云："怀州军名奉陵军"，则吾人欲寻靖安皇后之墓，须寻之于怀州。

《太宗本纪》云："大同元年(946年)四月丁丑，(太宗)崩于栾城，年四十六。是岁九月壬子朔，葬于凤山，陵曰怀陵。"

胡峤曾随辽世宗赴上京，复由上京至太宗所葬处。其《陷虏记》未指明为何地，观其"东行"二字，似怀陵在上京之东。但胡峤记述此事在归国之后，记载或有误也。是以沙畹君云："胡峤之行程，颇难以地图对照，盖峤随赴战军队行，夫军行有进退。胡峤之行程，非径由中国赴契丹也。"(《亚细亚报》，1897年5、6月刊391页。)

吾人知世宗乘太宗之死，即皇帝位于中京，与其祖母述律相拒于石桥，述律所将兵多亡归世宗。盖太祖之死于扶馀城，述律曾屠杀诸酋长，兹太宗死于中国，恐又遭屠戮，故归世宗。

据胡峤《记》云："会部人葬德光(太宗)，自此西南行日六十里。行七日至大山门，两高山相去一里，有长松丰草珍禽野卉，有屋宇碑石，曰陵所也。兀欲(世宗)入祭，诸部大人惟执祭器者得入，入

而门阖。明日开门,曰抛醆。礼毕。问其礼,皆秘不肯言。”

当时世宗所祭之陵,决非显陵、乾陵。盖显陵在满洲之广宁县,为世宗之陵名,而世宗未死;乾陵为景宗之陵名,而景宗未帝。且广宁在上京之东南,不在上京西南也。

木叶山亦在上京之东南,不在上京或怀陵之西北。

予以为世宗所祭者为祖州太祖之陵。胡峤所记之大山门,即祖山之龙门也。

《辽史》所志辽帝谒陵之事甚多,未记有世宗祭祖陵或怀陵一事。《辽史拾遗》及《辽史拾遗补》,亦未引关于此事之遗文。

《辽史·穆宗本纪》云:“应历十九年三月己巳,如怀州,猎获熊,欢饮方醉,驰还行宫。是夜近侍小哥,盥人花哥,庖人辛古等六人反,帝遇弑。”(参阅《契丹国志》卷五。)

《辽史》卷二七云:“穆宗被害,葬怀陵侧。”卷七云:“附葬怀陵。”则穆宗之墓,在太宗墓之侧也。

《景宗本纪》只记有“保宁八年九月己巳谒怀陵”一事。

在喀僧阿马北方之废城,若为怀州,怀陵应在附近。《辽史》云:“殿在州西二十里。”探考所至,此废城之西二十里,实有古代建筑之迹,而此处之建筑亦非寻常建筑也。

就此城之位置言,吾人应寻求怀陵于城之北。城北十里有川心庙,喇嘛庙也,在廓尔戈台河两河源汇流之处。

溯西北之河源上行,不久即见破碎砖瓦,转角处,即见一坂,坂上留存古建筑之迹。地上之瓦,有宽二十四公分半者,其砖亦大于他处所用之砖,可见此处之建筑物,非寻常建筑物也。

此大建筑基址之西,又有一小建筑基址,疑即太宗、穆宗二代之陵殿。

《契丹国志》以穆宗所游之赤山、黑山、太保山，在上京之东北，但据《辽史·地理志》，则明示在上京之西北，并证明怀陵在其间也。依吾人所探考之结果，敢证明《新五代史》及《契丹国志》太宗葬于木叶山之记载有误。

喀僧阿马北方之废城，地处上京及庆陵之间，而陵之附近，合于记载之距离地方，实有宫殿之遗迹。而其地在祖州西五十里，上京西南百里。怀州及怀陵，应在此处，必无疑也。

至若两墓之所在，非发掘不能知之，特先指证于此，以俟后来者之发明。

庆　州

《辽史·地理志》曰："庆州、玄宁军、上节度。本太保山、黑河之地，岩谷险峻。穆宗建城号黑河州，每岁来幸，射虎障鹰，军国之事，多委大臣，后遇弑于此。以地苦寒，统和八年（990年）州废。圣宗秋畋，爱其奇秀，建号庆州。辽国五代祖勃突，貌异常，有武略，力敌百人，众推为王。生于勃突山，因以名，没葬山下。在州二百里，庆云山本黑岭也，圣宗驻跸，爱羡曰："吾万岁后当葬此。"兴宗遵遗命，建永庆陵，有望仙殿、御容殿，置蕃、汉守陵三千户，并隶大内都总管司。在州西二十里，有黑山、赤山、太保山、老翁岭、馒头山、兴国湖、辖失泺、黑河。景福元年（1031年）复置，更隶兴圣宫，统县三。"

"玄德县，本黑山黑河之地，景福元年，括落帐人户从便居之，户六千。"

"孝安县。"

"富义县本义州，太宗迁渤海义州民于此。重熙元年（1032年）降义丰县，后更名。隶弘义宫。"

《金史》卷二四《地理志》曰："庆州，下，玄宁军，刺史。境内有祖州。天会八年（1130年）改为奉州。皇统三年（1143年）废。境内有辽怀州，辽太祖祖陵在焉。（此处有误。）旧置奉陵军。天会八年更为奉德军。皇统三年废。辽太宗、穆宗怀陵，北山有辽圣宗、兴宗、道宗庆陵。城中有辽行宫。比他州为富庶。辽时刺此郡者，

非耶律、萧氏不与。辽国宝货，多聚藏于此。北至界二十里，南至卢川二百二十，西至桓州九百，东至临潢一百六十。户二千七。县一。旧有孝安县，天会八年改为庆民县，皇统三年废。朔平。有榷场务。”

《清一统志》卷四〇七曰：“庆州古城在巴林右翼西北一百三十里。（本书又云：“上京在巴林旗东北一百四十里。”）城在喀喇木伦旁，蒙古名插汉城（即前述之察罕），周围五里。喀喇木伦即黑河。黑山在城东北三十里。”

据前引各书，可摘举其要点于下：

一、黑河源附近有一古城，应为庆州，其旧名为黑河州，明言州在黑河也。（黑河今名白水）

二、其地岩谷险峻。

三、其地苦寒，因此废置已久，土地不沃。

四、城内有辽行宫。

五、比他州为富庶。

六、金国界在州北二十里，临潢在州东一百六十里。

以上各点，皆今之白塔子（察罕城）所具有者也。

辽之黑河，即今之白水，业经吾人证明于前。设于白水上流，山高气寒之处，发见古城废址，必为辽之庆州。

自怀陵至白塔子四十里，须绕山行。山在白水之东，为廓尔戈台河、毕噜台河（Pilutha-gol），及白水之分水岭，辽时名曰黑山。白塔子之北有三河源，合流为白水。其一源来自赛音阿拉山（Saxn-ola），中一源来自天和梁，西一源来自洼林漫额山（Warin-Manga）。合流处之下三里，有一废城，即今之白塔子城是也。城方形，已崩毁，宽长各七百五十弓，约二华里弱。城外间有土堆，盖为昔之敌楼废址，仅北城一面已有六处，北门左右各三。

城中西北角有一八角高塔，上有佛教符记偶像，然不能详其年月也。门左右有二大天王像。据云，塔高约三十丈，有梯可登围塔之台。塔中有佛殿、佛像，1911 年时，尚为蒙古人所崇奉。然于1913 年毁于兵燹，塔门已焚毁，殿已毁掠殆尽。幸前此修塔之时，庙中之喇嘛将升至塔巅之梯撤去，塔上之门以砖堵塞，否则上塔必亦毁于兵燹。

塔前之庙塔，业已全毁，无一喇嘛住持其中。即附近之蒙古人，亦逃避净尽。

城中之东北角有一内墙，其中有土丘数处，满地破碎黄瓦，似为昔日宫殿之遗基。地上有白石碎碑，其上“圣祖”二字尚可辨识，此碑盖康熙时所立者也。另有一蒙文红石碑志，为人改作磨石，其旁尚有西藏文字，然已不易辨认矣。

辽帝猎于庆州，《辽史》志之屡矣。城东北隅之建筑物，疑即其行宫。

观其地之贵重瓷器碎块，各种器物，以及无数古钱，足证《金史》所志富庶之语不虚。中国人亦知其地之富庶，故藏金发见之故事，亦甚多也。

城外亦见有昔日居屋之迹，然无外城。据下之数点，白塔子与上京绝不相类。

一、城中无两水汇流。

二、设将水引至城外，可以绕城四面，不仅三面。

三、无两种城聚，或两种城垣。

四、白塔子之面积，不能容上京之居民。

五、白塔子周围大致七里。至波罗城之北城已有四千五百四十五弓或十二里二百二十五弓，若合计南北城，则据《蒙古游牧

记》,周有二十里。

《辽史》言其地苦寒,亦实事也。庆州在高原之下,冬季颇长,气候甚寒,多沙地,不适于耕种。

薛映所言馒头山之气候,虽言过其实,然亦可见其地之寒。1920年5月16日,白塔子周围山上之冰,尚未溶解,怀陵河流,有数处河冰尚厚一尺。白水流域与二赤木伦流域,气候之悬殊,中、蒙人皆知之。在阴凉河(Xuten-gol)流域,今日见野杏之花甫开,明日逾山至二赤流域,其地杏实已大如榛子。至高原之上,气候更寒。

当吾人溯白水上行之时,远望有大山,蒙古名赛音阿拉,华言美山也。此即《辽史》之黑山。《辽史》卷三二云:"黑山在庆州北十三里,上有池,池中有金莲(Tropoeolum majuis L.)。"现在有无金莲不可知,惟距白塔子十馀里之赛音阿拉山巅,实有二池。此事予未见《辽史》前,已早闻之矣。

兹将《辽史·拾遗》卷一三所引关于黑山之文,转录于下,以供参考。

《使辽录》曰:"虏中黑山,如中国之岱宗,云虏人死魄皆归此山。每岁五京进人马纸各万馀事,祭山而焚之,其礼甚严,非祭不敢进山。"

《燕北杂记》曰:"冬至日杀白羊、白马、白雁,出生血和酒,望黑山奠神,言契丹死魂为黑山神管系。"

《梦溪笔谈》曰:"昔人文章用北狄事,多言黑山。黑山在大幕之北,今谓之姚家族。有城在其西南,谓之庆州。予奉使尝帐宿其下。山长数十里,土石皆紫黑,似今之磁石,有水出其下,所谓黑水也。胡人言黑水原下委高,水曾逆流。予临视之,无此理,亦常流

耳。山在水之东。大抵北方水多黑色，故有卢龙郡，北人谓水为龙，卢龙即黑水也。黑水之西有连山，谓之夜来山，极高峻。契丹坟墓皆在山之东南麓。近西有辽祖射龙庙，在山之上。有龙舌藏于庙中，其形如剑。山西别是一族，尤为劲悍，惟啖生肉血，不火食，胡人谓之山西族。北与黑水胡，南与鞑靼接境。”

蒙古人今尚视此山如神山，禁止樵采。《梦溪笔谈》所志各事，如西南有庆州，山长数十里，山在水之东，水多黑色，庆陵所在之山为种族分界之山等记载，非亲历者不得知之。皆足以证明昔之庆州，即为今之白塔子。

赤山在黑山附近，观《辽史·穆宗本纪》：“应历十二年秋，如黑山、赤山射鹿。”之记载，可以知之。

《契丹国志》将黑山、赤山、大保山位置于上京之东北，显系错误。三山固在一处，然不在上京之东北。《清一统志》以为巴林右翼东北二百五十里二赤木伦发源之巴颜五蓝哈达，即为古之赤山。

《后汉书》及《魏志》所志，昔日居东蒙之乌桓，风俗习惯，颇与后之契丹相类。据云，俗贵兵。死哭之哀。至葬则歌舞相送。肥养一犬以彩绳缨牵，并取死者所乘马衣物，皆烧而送之。言以属累犬，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如中国人死者魂归岱山也。

乌桓之赤山，或即契丹之赤山，今日尚称为巴颜五蓝哈达(Bayan-olan-xata)，(《蒙古游牧记》名巴颜乌兰岭)华言赤山。蒙古人亦称为五蓝塔洼(Olan-tawa)，亦赤山之义也。

薛映《记》曰：“临潢西北二百馀里，号凉淀，在馒头山南避暑之处。”《辽史》卷三二云：“吐儿山在黑山东北三百里，近馒头山。此二山即为一山，在科尔沁左翼北二百五十里。”(参考《清一统志》卷

四〇五。)

太保山据《蒙古游牧记》卷三,在巴林右翼西九十里,今名满札尔;此说恐有误,盖庆州东界不能远至此地,其东尚有怀州、祖州及临潢十县也。

《辽史》所志庆州一条中,有一误兹应更正者。据云:"庆云山本黑岭也。"是混庆云山、黑山为一山。圣宗之墓,实在庆云山,黑山并无殿墓遗迹,后别有说明也。

庆　陵

《辽史》位圣宗之陵于庆州西二十里。但庆陵中不仅有圣宗之墓，其二后以及后之兴宗、道宗及其皇后，亦皆葬庆陵也。

“圣宗驻跸庆云山，爱羡曰：“吾万岁后，当葬此。””语见《辽史·地理志》。至本纪中未见此语，惟记“圣宗四五月常驻跸此山。”其发此愿之年，或在太平三年（1023 年），盖是年七月丁亥，赐缅山名曰永安也。《辽史·本纪》并未说明赐名之原因，或与其发愿葬于庆云，不无关系也。

考圣宗崩于太平十一年（1031 年）六月己卯，年六十一岁。

兹将《辽史》卷十八《本纪》所志关系庆陵之事，摘录于下：

“景福元年六月乙未，奉大行皇帝（圣宗）梓宫殡于永安山太平殿。”

“七月丙午朔，皇太后率皇族大临于太平殿，高丽遣使吊慰。”

“癸丑，诏写大行皇帝御容。”

“甲寅，建庆州于庆陵之南，徙民实之，充奉陵邑。”

“丁巳，上谒大行皇帝御容，哀恸久之。”

“丁卯，谒太平殿，焚先帝所御弓矢。”

“八月壬午，迁大行皇帝梓宫于菆涂殿。”

“九月戊申，躬视庆陵。”

“戊午，焚弧矢鞍勒于菆涂殿。”

“庚申，夏国遣使来慰。”

“庚午，以宋使吊祭，丧服临菆涂殿。”

“十一月壬辰，上率百僚奠于菆涂殿，出大行皇帝服御玩好焚之，纵五坊鹰鹘。”

“甲午，葬文武大孝宣皇帝于庆陵。”

“丙申，谒庆陵，以遗物赐群臣，名其山曰庆云，殿曰望仙。”

圣宗之葬仪，再参考《辽史》卷五〇《礼乐志》，可以见其详矣。由前引之文，吾人知山名数易，初名缅山，圣宗赐名永安，兴宗又名庆云。由此可以证《辽史·地理志》“庆云即黑岭”之误。山名虽易，然永安之名常见《本纪》。兴宗以后，如其子道宗，常于夏日驻跸此山。

太平殿及望仙殿，或者为一殿。

庆州城中有大安殿。《辽史》卷一八《兴宗本纪》云：“重熙三年（1034年）皇太后（圣宗之后）还政于上躬，守庆陵。”

《辽史》卷二一《道宗本纪》云：“清宁三年（1058年）十二月己巳太皇太后崩。四年五月庚午，上大行太皇太后尊谥，曰钦哀皇后。癸酉葬庆陵。”

《辽史》卷二〇《兴宗本纪》云：“重熙二十四年，七月壬午，如秋山。八月己丑，帝崩于行宫。”此山应在怀州及黑山附近。

《辽史》卷二一《道宗本纪》云：“清宁元年（1055年），十一月甲子，葬兴宗皇帝于庆陵，名其山曰永兴。”

《辽史》卷二三《道宗本纪》云：“太康二年三月辛酉，皇太后（兴宗之后）崩。六月乙酉，上尊谥曰仁懿皇后。甲午葬于庆陵。”

《辽史》卷二六《道宗本纪》云：“寿隆七年（1101年）正月癸亥，如混同江。甲戌，上崩于行宫。”

《辽史》卷二七《天祚皇帝本纪》云：“乾统元年（1101年）六月

辛亥，葬仁圣大孝文皇帝(道宗)宣懿皇后于庆陵。”

据前引之文，庆陵所葬之帝后如下：

一、圣宗及仁德皇后、钦哀皇后。

二、兴宗及仁懿皇后。

三、道宗及懿德皇后。

由是观之，庆陵应有三种皇陵，及三种殿宇。

白塔子之北，山势蜿蜒，为其西北之保障。此城得避西北大风者，赖此山也。赴庆陵之道，向此山行，西距白塔子二十里有凹地，蒙古人名曰洼林漫额(Warin-manga)者，即庆陵之所在也。1913年后，此地已无居民。蒙人不敢于中国军队附近支帐幕，欲莅其地，非有向导不可。其地为一沙谷，两面为高山，西面诸山连延向北，此即昔之连山也。南面之山为辽陵所在，即圣宗所名之永安山，兴宗所名之庆云山也。

陵地有三，在山坂之上，为山涧所分。

三陵以中一陵为广大，其地有白石柱础，黄绿色大瓦，同色屋顶之鸱尾，皆足以证实其地即为辽时之陵殿。坂下有土丘及残毁材料，明示昔日此地建有三门。自此门至陵殿，有一直道。殿建于高阶之上，掘地二三公尺，阶石尚存。此石为人工所置，其迹显然。

阶殿废址之东西，亦有废殿之迹。阶殿之后有墓，三十年前，闻已为蒙古人发掘。当时掘者百馀人，曾掘开两室，见有明器及一旅行所用之车。车有银钉，蒙人焚其车取其钉。予不信有二室，观其遗址，只有一室。此室为盛水之所，外方而内圆，蒙古人毁其屋顶。顶厚八尺，有砖三层。予曾往探，其下似井，井以砖为之，是时水尚深九尺，掷以石，即可闻沉底之声。井之轮廓，以柏木炼灰筑之，中国人曾下探之。屋之内有道可通山内。蒙古人是否入此隧

道，发见宝物或古物，予未能知之。

所掘之墓，不在殿后之正中，地稍偏东。此墓为圣宗与其二后之墓欤？此三墓为合葬抑分葬欤？今皆不可考。如系分葬，被掘之墓或为二后之一墓也。

《契丹国志》卷一一及第一九，记天庆九年（1119年），“金人攻陷上京路，祖州则太祖之天膳堂，怀州则太宗之崇元殿，庆州则望仙、望圣、神仪三殿，并先破乾、显等州，如凝神殿、安元圣母殿，木叶山之世祖殿诸陵，并皇妃子弟影堂，焚烧略尽，发掘金银珠玉。所司即以闻，萧奉先皆抑而不奏。后天祚虽知，问及陵寝事，奉先对以初虽侵犯元宫，劫掠诸物，尚惧列圣威灵，不敢毁坏灵柩，已经指挥有司，修葺巡护云云。”

则似辽陵已尽毁掘矣。

《契丹国志》所志，不无可疑也。盖金人如毁诸陵，则其后无保护之必要，然则何以解于后之三事。

《金史·太宗本纪》：“天会二年（1124年）二月，诏：‘有盗发辽诸陵者，罪死。’”

又“天会七年二月，诏：‘禁医巫闾山辽代山陵樵采。’”

又卷七一《干鲁古列传》：“乾州后为闾阳县，辽诸陵多在此，禁无所犯。”

按乾州、显州只有辽代二帝之陵，其他诸陵皆在今之巴林旗内。

墓陵应皆有碑，惜皆已毁失。惟在中一陵见一白石柱倒卧，柱身半埋土中。柱长二公尺四十四公分，为六角形，外露一面，隐有文字，然已漫漶不能辨别。其没于土中各面文字，或能保存，而吾人力又不能立其柱。惟稍见其一部分文字，尚能辨识，盖华文《陀

罗尼经》也。

柱之狭面宽二十四公分，字五行。柱之宽面，三十八公分半，字七行。其上文字似梵文而异。

予在白塔子及庆陵二处所拾古钱甚多，列志于下：

年号	公元	朝代
开元	自713年至742年	唐
淳化	自990年至995年	宋
咸平	自998年至1000年	宋
景德	自1004年至1008年	宋
祥符	自1008年至1017年	宋
景祐	自1034年至1038年	宋
熙宁	自1068年至1078年	宋
元丰	自1078年至1086年	宋
绍圣	自1094年至1098年	宋
熙元	原著者注“未详”。按：即安南陈氏时，伪熙元王所铸之钱。	

以上系在白塔子所见者。

至道	自995年至998年	宋
祥符	自1008年至1017年	宋
太平	自1021年至1031年	辽
天圣	自1023年至1032年	宋
嘉祐	自1056年至1064年	宋
熙宁	自1068年至1078年	宋
元祐	自1086年至1094年	宋

以上系在庆陵所见者。

前志之古钱，除开元钱外，类皆辽时之钱。由前述考证之结果，可以指证白塔子即为辽之庆州，洼林漫额即为辽之庆陵。读者必能与吾人作相同之结论也。

边　墙

试取东蒙之地图检阅之，今日林西县之水道，大致皆自西东流，其源皆在西部高山之内。在乌牛台、浩珀都及白塔子之北，逾山即抵乌珠穆沁旗之高原。在此种流域之内，有一土墙，在巴林旗中，自南至北，横断流域为高低二部。墙有敌楼西向，有营居在墙之东。由此墙建筑上观之，必为御当时西方之敌所筑无疑。浩珀都及乌牛台二处入高原之处，敌楼尤多。浩珀都一地，每十丈至十五丈即有一楼。

此逾水越山之土墙，似非辽时所筑。盖庆陵即在土墙之西，当时决不能以皇陵置之于不能防守之地。矧昔日辽之境界，北抵胪朐河，西迄克什克腾境内捕鱼儿海以西之金山，与此土墙之位置不符欤。昔日上京之西北有边城三，三千里有镇州，千七百里有河董城，千五百里有静边城，上京北千五百里有皮被河城，与土墙之位置亦不符也。土墙之方向为自东北至西南，据日本刊行之地图，此墙有数段不相连。齐齐哈尔一图，墙一段在绰儿河及洮儿河间。一段在科尔沁中旗右翼、左翼、札噜特左翼、及阿噜科尔沁之北。一段在巴林旗之西北，自白塔子之北至乌牛台。一段在克什克腾之西，在蒙古中部喇嘛庙（多伦）之西南，闪电河之东。又有一段，七苏木传教会之北一段，约长二百里。

据《金史》卷二四所志此边墙之原来云："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三月，世宗以东北路招讨司十九堡，在泰州之境及临潢路，旧设

二十四堡障，参差不齐，遣大理司直蒲察、张家奴等往视其处置。于是东北自达里带、石堡子至鹤五河地，分临潢路。自鹤五河堡子至撒里乃，皆取直列，置堡戍。评事移剌敏言，东北及临潢所置土堵樵绝，当令所徙之民，姑逐水草以居，分遣丁壮，营毕开壕堑，以备边上。令无水草地，官为建屋，及临潢路诸堡，皆以放良人戍守。省议临潢路二十四堡，堡置户二十（按：二十似为三十之误，），共为七百二十。若营建毕，官给一岁之食。上以年饥权寝，姑令开壕为备。四月，遣吏部郎中奚胡失海，经画壕堑，旋为沙雪堙塞，不足为御。乃言可筑二百五十堡，堡日用工三百，计一月可毕；粮亦足备，可为边防久计。泰州九堡临潢五堡之地斥卤，官可为屋外，自撒里乃以西十九堡旧戍军舍少可，令大盐泺官木三万馀，与直东堡近岭求木，每家官为构室一椽以处之。"

按撒里乃地名，《辽史》亦见有之，考《辽史·道宗本纪》"寿隆二年（1096年）六月辛酉，驻跸撒里乃。七月丙午，猎赤山。"

《读史方舆纪要》以其地在上京之西北。按今日巴林西北高原之上有地名坝后，疑即其地也。辽帝夏日常驻此（见《辽史·拾遗补》卷一）。《契丹国志》名其地曰冷陉，今日蒙古人亦常避暑于此。

撒里乃西之十九堡，应于此高原之下各流域中寻求之。

1181年时，增临潢府边堡为三十六，他处亦有增加。

当此时之前，临潢十九堡已早建筑。既云旧设，必非新筑也。其非辽代之堡，已说明其理由于前，疑为金建国时为防御突厥所筑。但中蒙古所筑之土墙，又为何时所筑耶？

观《金史·地理志》，今日之边墙，盖为昔日金之边界，兹举证于下：

《金史》卷二四《地理志》曰："金之壤地，……北自蒲与路之北

三千馀里，火鲁火疃谋克地为边，右旋入泰州婆卢火所浚界壕而西，经临潢金山，跨庆桓、抚昌、净州之北。”

《金史》卷七一《列传》曰：“婆卢火，安帝五代孙。……天辅五年(1121年)，摘取诸路猛安中万馀家，屯田于泰州，婆卢火为都统。……婆卢火旧居按出虎水，自是徙居泰州。”

按金之泰州为辽之长春县，据《辽史·地理志》所志，应在洮儿河及松花江附近。《满洲源流考》卷一一以其地在白都那之南。至《吉林通志》及《盛京通志》，未指明所在何处，尚待考也。

《金史·地理志》云：“泰州北至边四百里”，北者西北之谓也。今日本刊行之地图，边墙在绰儿河及洮儿河之间。

《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云：“庆州北至界二十里。”

桓州应在滦河发源之地。此河之上流名闪电河及上都河，北至界一里半。据日本刊地图，多伦西南边墙附近，及平地脑色传教会之西北，有废城，或即其地也。

抚州旧为桓州支郡，自亦为边墙所必经。昌州旧隶桓州，旋隶抚州，其地应在桓、抚二州之间。

《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云：“净州北至界八十里”按金之西京在今之大同，全路应皆在边墙以内也。

将来地理学者必能将各段之边墙连合为一，使金之国界完全明了也。

次要之城

临潢府各县县治在府城之中，前已言之。但各县居民，势不能不散居各地。予在该处所见之山坂，颇多垦田之旧迹，巴林旗之蒙古人，鲜有务农者，必非彼等所垦可知。即为彼等所垦，所需之田，亦无如此之多。

然则此种山田，必为辽代之俘虏所垦治矣，是亦当时生计所必需也。今日巴林旗之居民，据调查内蒙古及沿边各旗统计报告，共有三万零四百人。至辽代当时此处之户口，据《辽史》所载，临潢一府及祖、怀、庆三州，共有三万六千户。益以户口不详之四县，都不下四万户。每户以四人计算，共有十六万人，驻兵尚不计焉。

巴林旗中可以垦治之地甚少，类多沙丘沮洳。如欲垦种，应于流域之间，择肥沃之地。县治虽在府城，但各处既有居民，应有城郭以备防御。予所见之旧城不少，皆属当时遗迹。兹虽未能指明为何县之城，姑先志之，以待考证。

毕卢台河流域之废城

上京西北约八十里之乌兰巴济(Olan-batsi)地方,闻有废城。欲至其地,须溯二赤木伦上行,至水头河流入之处。其西另有毕卢台河(Pilutha-gol)流入水头河。顺此河北岸西行,不久即抵乌兰巴济。

是地有一废城,城中残破砖瓦甚少,然城内外瓮罐及家用器具之碎片颇多。城东西宽二百三十弓,南北长一百五十弓。东城墙迹不甚显,南城墙非直线,可以见也。城内有建屋之石基无数,磨石一具,柱之基础一具。

此处土地肥沃,山坂之间,已有耕种遗迹。毕卢台河在黑山之东,应即《辽史》之黑山、东川,应历十六年(966年)冬,穆宗曾驻跸此间。

上京西北昔有易俗、迁辽二县,北有长泰县。此城属何县,尚待考也。

古腾河之废城

白塔子东北约四十里，古腾河(Xeten-gol)流域之间，又有一废城，宽长各二百四十弓，南北各有敌楼二，东西各有敌楼三。城内西北隅有一内堡，方一百二十七弓，东面有大敌楼一。堡之中昔有一行面南之建筑。此城似毁于烈火，观火焚之砖瓦，可以知之。建筑材料残遗甚少。此城昔日似为堡寨，盖城在狭谷之中，不能多有居民，只能为一军寨也。

城中发见古钱二枚，其一年号为崇宁，其一文为皇宋。

庆陵南之废城

自白塔子至洼林漫额，未过边墙之前，即见左方有一山谷，四围有山环绕，其中有一废城。城每面有二百五十五弓，边墙近在城北，庆陵亦在其北，此处可以见之。城中发见古钱二枚，年号为淳化及景德。

浩珀都之废城

边墙东南数里，浩珀都流域之南，有一废城，其地居民名曰大城。南垣长二百六十弓，北垣长二百八十弓，东西垣各长二百三十二弓。南北有门。城无敌楼。亦无内城。地尚肥沃。是处为林西县界，亦农业之中国与游牧之蒙古分界之处也。

《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云："庆州，旧有孝安县。天会八年(1130年)改为庆民县，皇统三年(1143年)废。"

上京道之祖、怀、庆三州，即杂处临潢府内。欲寻求其属县，应在州之附近求之。设当时孝安县不在州城，必在今日之浩珀都。《辽史·地理志》于孝安县下，未注明设置之年及户口，吾人今亦无从考求矣。

川心河之废城

川心庙之西(此喇嘛庙现毁)在十八里台河及营上河之合流处,有一废城,中国移民名之曰四方城。城方一里,城垣较浩珀都之城为高,边墙在城之西。

四废城

在赛波洛沟流域左近，及四方城之北，有废城四：

一、名头道城子，在赛波洛沟。

二、名二道城子，在文德坑。

三、名三道城子，在毕勒台沟门。此城附近有山，山有一墓，墓顶已毁，七八翁仲尚存，应为当时一要人之墓，疑即辽太祖之母宣简皇后之德陵。宣简皇后崩于天显十一年(937年)葬祔德陵。

四、名四道城子，在十八里台河谷口。

予未至此地，亦不详其地位，姑志所闻于此，以待考证。

卢川县城

卢川县为金代设置之县，因其与巴林旗辽代各城颇有关系，不能不附带言之。

中文卢字之义为黑，如卢龙之名，即本于青龙河。此处之卢川，犹言黑水也。

考《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临潢府属县有卢川，“承安二年(1197年)以黑河铺升隶全州，后复来属，有潢河。”

黑河铺应在黑河附近。黑河即今之察罕木伦，华言白水也。其境有潢河，则此城应在二水汇流之处。

前既以浩珀都之城为孝民县，而今以黑河与潢河之汇流处为卢川县，前此所志古腾河之城、庆陵南之城、川心河之城，又为昔之何城耶？

考《辽史·营卫志》所志各部族，有迭剌迭达部，戍黑山北；品达鲁虢部，戍黑山北。此古腾河城或为其营帐之所。在庆陵南之城，或为守陵蕃、汉之所居，而川心河城，或为庆州属之富义县也。

契丹之墓

契丹初建国时，其殡葬之法，与中国不同。《图书集成》卷一二九《边裔典》云："以车载尸入山，以尸置于山树之上。"

此种风俗不特契丹为然，中国西南之黑苗、天苗，堪察加之流鬼国，风俗亦同。

契丹后染中国之风，酋长亦有坟墓，如《辽史·地理志》所志庆州之勃突墓，临潢府勒德山之勒德王墓，其例之著者也。

巴林旗之多数古墓，不知葬于何年。然因建筑材料之类似，故暂断定为辽墓。

乌牛台诸墓

乌牛台河为白水之支流，流域颇狭，然愈上行愈宽。上有三小溪，合注于此河。此三溪自1910年来已有居民。北一溪名察罕索伦，华言白峰也。中一溪名绍集。南一溪名喀喇索伦，华言黑峰也。

边墙即在其旁，居民即利用之，掘一洞于城垣之中，以草泥涂其壁，以砖筑小墙于前，开一门一窗，以草作扉牖，屋即成矣。

流域之中，虽无城郭，然边墙之东，昔日居民之迹颇多，墙西且有一处附近筑有三堡。当1910年时，白峰地方尚存许多磨石，其式大于中国人所用者，与在波罗城所见者相类。

白峰地方有石佛一尊，高四尺，无头。更东有一刻龙之碑头，碑已不存，地上尚存绿瓦。此处或建有庙殿，此庙殿与乌牛台之古墓不无关系也。

黑峰地方民居附近有一已掘之墓，形如方室，以石筑之。

边墙之西，山坂之上，有四墓，早为蒙古人发掘。最大之墓为一砖筑之室，堂前有小隧道，左右各有一小方室，隧道已为泥石所塞。

关于此种坟墓，无一材料可供研究。惟据《辽史》卷三三《营卫志》云："迭剌迭达部，本鲜质可汗所俘奚七百户。太祖以戍黑山北。部民居庆州南。"云云，然亦不足为考证之根据也。

头道湾子诸墓

乌牛台河口以北，居有一基督教徒，广有产业，在其地发见古墓二十。只有二三墓尚未开掘，其馀皆为附近中国兵营之兵所发掘。

诸墓之中较大者为一方室，以砖筑之，四壁尚有中文南北东西文字。室之内有一木台，置尸之床也，常置男女二尸，且有置一男尸二女尸者。其丝制之服，触手成灰。

中国人目击者云，靴甚大，靴为皮制，底已无存。

台前陈列祭品，如枣梨等物，尚可辨识。有瓶，其式与今制不同。有鞍勒，有钏环，有种种器具。常有一铜镜，悬于室顶。

关于葬具，据《辽史·兴宗本纪》曰："重熙十一年十二月禁丧葬杀牛马及藏珍宝。"又"重熙十二年六月，诏世选宰相节度使旗属，及身为节度使之家，许葬用银器，仍禁杀牲以祭。"

东蒙古、建平县、深井他方之西七十里，孩子沟，发见一墓，墓室之中，有马骸一具。

在大营子附近亦有相类之墓，然发掘已久矣。此种古墓，东蒙古一地常有发见也。

补　注

地图　予所用之地图，为日本大正四年刊之《东亚舆地图》。今日东蒙古地图，此图较佳，惟错误亦在所不免。如发源于毛金坝，流经科尔沁右翼，至赤峰注入英金河之河流，实为锡伯河，而此图作西路嘎河。至锡伯河则误位置于此河之西。此西面之河，上流名半拉箭川，下流名鸭子河。至锡伯河之下流，因流经大碾子川，故即以大碾子川为名。

林西县南之河，非察罕木伦，实察罕木伦右岸之一支流，因其流经嘎寺台之喇嘛庙(Galdestha-sum)，故名嘎寺台河。至察罕木伦之源，在白塔子之北(参观《蒙古游牧记》卷三)。

齐齐哈尔一图，边墙名曰金源边堡。金源或指按楚河之上流而言。此处今在吉林省，名阿什河。按楚一转而为爱新，华言金也，女真皇朝即以此为名。因其发源于此，故又名金源。

巴林之边墙，日本图则名曰高丽城。考其立名之义，盖此地土人以满、蒙一带之古迹，如坟墓城塔，皆为高丽古物。昔高丽人曾居留满洲，以满洲之古物属高丽，尚有说也，然与东蒙无与焉。吾人惟一解释，则因蒙古占领东蒙之时，以女真为高丽之后裔，故有此传说。

予颇希望嗣后绘图者注意古代废城，明定其位置，则史学家将获益匪浅也。

中国书坊所刊之《直隶省全图》甚劣。绘者之意，未始不求完

善，然东蒙古一部分实为一种漫画，未便以地图目之。

林西县　此县为热河领县之一，林西之名，盖因地在巴林之西。县南界潢河，东界白水（察罕木伦）浩珀都流域为其极北，西界乌珠穆沁、克什克腾二旗。

于越王　按《辽史·百官志》："大于越府无职掌，班百僚之上，非有大功德者不授。辽国尊官，犹南面之有三公。"

秋山　据史载，此山应在怀州辽代诸陵附近。《辽史》卷八《景宗本纪》云："保宁三年（970年）八月甲戌，如秋山。辛卯，祭皇兄吼墓，追册为皇太子，谥庄圣。"据《辽史》卷六四《皇子表》，其墓号太子院。

后围　乌珠穆沁之松林，中国移民名曰后围，别于南部之围场或前围而言也。胡峤《记》以其地在上京之东，故云："西望平地松林，郁然数十里。"胡氏行程，自西往东，如松林在上京之西，彼应已经过。只云："自上京东去西望平地松林。"则此林应在上京西北之乌珠穆沁高原。

图尔山　《辽史·拾遗补》引毛奇龄之说，以为此山在黑山之东北，辽帝避暑之处。又据《辽史》，圣宗德妃之墓在此山之西。

又据《辽史·营卫志》，黑山在庆州北十三里，吐儿山（即图尔山）在黑山东北三百里。然则《蒙古游牧记》之考据，不为无稽也。

勒得山　据《辽史·地理志》，宁州本大贺氏勒得山横帐，管宁王放牧地，在豫州东八十里，西南至上京东北三百五十里。豫州南至上京三百里。

大斧山　《契丹国志》卷七云："圣宗崩于大斧河附近行帐，河在上京东北三百里。"予以为大斧山似在此河之附近，乃《蒙古游牧记》则以大斧山即大釜山。

诸湖 《辽史·地理志》所志临潢、庆州诸湖，似在今之乌珠穆沁旗内，可参证《蒙古游牧记》。

白马山 兀欲幽其祖母述律于扑马山，《辽史》及《契丹国志》皆云迁于祖州，则祖州之白马山或即扑马山也。

木叶山 《契丹国志》以为太祖葬于木叶山，置祖州。太宗亦葬于木叶山，又于附近置怀州。顾木叶山在潢河及老河汇流之处，吾人知此处只有永州。《辽史·景宗本纪》，"乾亨三年(980年)三月乙卯，皇子韩八卒。辛酉葬潢、土二河之间，置永州。"按辽代每陵设一州以卫之，木叶山一处决无设祖、怀、永三州之理，《契丹国志》恐有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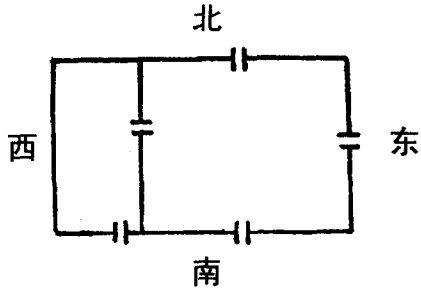
《契丹国志》又云："西楼在上京，南楼在木叶山。"其实西楼在上京西南四十里之祖州，则西楼在祖州不在永州明矣。总之，西楼应在上京之西或西南。然则设州于距陵地数百里之外，有是理欤？二陵之不在木叶山，不待辨而自明矣。

《辽史》亦不免有此种错误，据《营卫志》："太祖陵寝在祖州东南二十里。"(然则在越王城也。)"太宗陵寝在怀州南三十里。""穆宗陵寝在(上)京南。""景宗陵寝在祖州南。"与《地理志》所志完全不合。盖当时修史时所用之材料不同，所以一书之中，记载各异。在将来考订《辽史》所根据史料价值之前，应以《地理志》为较有据之史料。

临河县 雷霹山西二十里樱桃沟流域，中有古城，其形势为巴林旗中所仅见者也。观其废迹，有两城并建，其主要之城东西宽三百二十丈，南北长二百一十丈。城有四门。

其西有一副城，南北与主城同长，东西惟宽一百〇二丈，只有一门在城南主城之旁。

此城不似寻常县治，其城垣较他县之城为高。予以为西城疑即唐之松漠府，东城疑为辽时所建之临河县，兹将其形图列于下，以供后来者之参考。



附:乘轺录笺证

闵宣化司铎传教东蒙古有年,颇悉其地地理方言,撰作甚多,余曾译其《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为华言。辽陵契丹字碑,为今日研究契丹文字之瑰宝,即为闵君所发现。是编载入瑞典人种地理协会1935年《地理年鉴》(Geografiska Annaler),出版后,闵君曾以抽印本转托田金波(Ant Mosteart)司铎赠给译者,并为免检寻之劳,手抄《续谈助》卷三《乘轺录》原文四页见贻。是年冬迁居后,不知此编藏何箧中,客冬又迁居,清理书籍,始重见之。今夏稍有馀暇,爰命九儿先铭笔受,转为华言云。1941年6月1日冯承钧识。

1008年宋遣路振使契丹,振归撰行记,题曰《乘轺录》,曾经伯希和君检出(《远东法国学校校刊》1909年刊238页)。其文今载宋人晁载之《续谈助》(1106年)中,今所据者陆心源刻于1877至1892年间之《十万卷楼丛书》本。

路振《宋史》卷四四一有传。其人殁于1014年,寿五十有八。

今将此文译出,试为笺释,并与沙畹所译之王曾《上契丹事》对勘(见1897年《亚细亚报》5、6月刊412至429页,《中国使臣之契丹女真行记》,沙畹曾误名王曾为王沂,业经伯希和君改正)。王曾行程与路振同,惟在1012年,晚于路振四年,

而所记较振《录》为详云。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知制诰路振所作《乘轺录》云:十二月四日过白沟河,即巨马河也。

白沟河在辽、宋界上,今河北省新城县与雄县间;白沟河村在巨马河北来与易水西北来汇流处。

五日自白沟河北行至新城县四十里。新城属涿州,地平无丘陵。

新城县在保定府东南,同涿州之南。《清一统志》十卷五页著录新城、白沟之距离作三十里。

六日自新城县北行至涿州六十里。地平。十五里过横沟河,三十五里过桑河,涿州城南有亭曰修睦。是夕宿于永宁馆。城北有亭曰望云。

振《录》十五里过横沟,三十五里过桑河,王曾行记未著录。《清一统志》亦无二河名,疑为不重要之河水。

七日自涿州北行至良乡县六十里。道微险,有丘陵。出涿州北门过涿河。河源出太行山,与巨马河合流。

振《录》涿河,今名拒马河,流经涿州城北,距城约二三里,东入后见之琉璃河。《清一统志》五卷3页作拒马。振录之巨马河,今名琉璃河。

五里过胡梁河;十里过协河;四十里过琉璃河,又云刘李河;西见太行山隐隐然。太行东至蓟门,北至虎口,接奚界,凡八百里。

胡梁,《清一统志》五卷3页作胡良,位在涿州北十里。协河,《清一统志》同页作侠河,位在涿州北二十五里,《读史方舆纪要》二卷,直隶二,22页作挟河。琉璃河别名甚多,实名刘李河;刘、李两姓居此河畔,故以名河。振《录》之太行山盖指河北平原西方之山系,包括北京西方三十里之西山,而北抵虎

口(振《录》之说如此)者也。蓟门或蓟邱,《清一统志》四卷7页谓在城西北角内;其遗址在今北京德胜门外。与奚接界之虎口,即古北口,土人尚名其地曰虎北口,与振《录》后此所录之名同。

山之秀拔者有六屏山,属涿州。山多兰若,国业寺石经院,唐旧寺也;五天梵文咸刻石于东峰之上(太行山已下事,顺州刺史梁炳言)。

六屏,《清一统志》四卷6页作六聘,位在房山县西北,并引《房山县志》作距县三十里。五天梵文,L. de la Vallée-Poussin君疑是阎摩(Yama)天《五天使经》。

八日自良乡县北行至幽州六十里。地平无丘陵。十里过百和河,三十里过鹿孤河,五十里过石子桥,六十里过桑根河,河绕幽州城。桑乾河讹而曰桑根也。是夕宿于永和馆。幽州城周二十五里。东南曰水牕门,南曰开阳门,西曰清音门,北曰[1]内城。三门不开,止从宣和门出入。城中凡二十六坊,坊有门楼,有罽宾、肃慎、卢龙等坊,并唐时旧名。府曰幽都府。

百和河应是流经良乡东北注入拒马河之小河。——鹿孤河《清一统志》五卷1页谓是永定河,即一名桑乾而俗称浑河者是也。王曾名此河曰卢沟河;此外尚有其他别名。路振位此河于良乡北六十里,是亦良乡、幽州间之距离,并明言河绕幽州城。则其所指者应是昔之通惠河,今之大通河矣(参看《清一统志》五卷1页)。——石子桥距幽州十里,则此桥不在鹿孤河上,亦不在桑根河上。《辽史》卷四〇著录燕京城外有一石子河。

幽州:此条可与《辽史》卷四〇《地理志》,同王曾行记参

看。路振名此城曰幽州，盖循唐代旧称，不愿从契丹而名此城曰南京。应注意者，路振所录诸城门名，除开阳外，无一与史载相合。《辽史》著录门名有八；振仅识其三，惟在后文言有宣和；此宣和门名可证沙畹（见上引文416至417页注一）之说，不可误作元和，元和应是皇城内之东殿名。路振谓城周二十五里，《辽史》作城方三十六里。[2]复次振《录》谓内城在北，《辽史》则谓在西南隅。

桑根：王曾所记京南河名同（桑乾）。沙畹译王曾行记（418页），谓"桑乾河出北门"，疑误。

幽都府：《新唐书》卷四三下载李尽忠陷营州都督府（696年），以河北道诸羁縻州改隶幽州都督府。《辽史》卷四〇谓南京府曰幽都，军号卢龙，开泰元年（1012年）落军额。

十日自幽州北行至孙侯馆五十里。地平无丘陵。出北安门十里过高梁河，三十里过孤沟河，三十五里过长城。

孙侯馆应在今孙侯屯内。王曾云四十里至孙侯馆，后改为望京馆。——北安门未见《辽史·地理志》著录；疑是古幽州之北门，其城旧址跨辽新城东北角内外。——高梁河，《清一统志》五卷1页谓此河是今北平西北玉河之上流。《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一直隶二，16页亦视为大通河（玉河别名）之上流——孤沟河应是流经东坝南注入潮白河之小河。——路振离幽州三十五里而过长城；王曾亦云出北门过古长城；此长城应指别一长城，非今所见之长城也。

十一日自孙侯馆北行至顺州三十里。地平。二里过温渝河。顺州古城周约七里。

温渝河，王曾作温馀河。《清一统志》五卷2页谓此河自居

庸关南流过昌平州西,东南流,经顺义县西南,复东南流经通州北,而入白河,此河一名湿馀河,一名榆河,俗名富河。——顺州今顺义县,见《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一,直隶二,25页。

十二日自顺州东北行至檀州八十里,路险有丘陵。二十五里过白絮河,河源出太行山。七十里道东有寨栅门,崖壁斗绝,此天所以限戎虏也。虏置榷场于虎北口而收地征。

以下接十五日记、十三、十四两日缺,疑有脱简,原文应志有此二日之行程,盖在上文见有其痕迹也。檀州即今密云县,自顺义至密云经行之地皆属北平大平原,路既无险,亦无丘陵:须过密云以北,始入山地,故王曾云:"自入山屈曲登陟,无复里候。"檀州以后应接述次日之行程而抵天限戎虏之古北口。[3]

白絮河,王曾作白屿河。沙畹(见原刊419页注二)考订其为潮白河,应误;此道应经密云城外之白河,与南天门北之潮河,然后始抵古北口(参看《密云县志》地图同卷一)。如二十五里之记载不误,此白絮河应为来自怀柔县,在牛栏山东注入潮白河之河水,而《清一统志》五卷3页名曰七渡河者是已。更远固有白河之一支流,流经此道而入潮河,然距顺义太远,与振《录》所志不合。王曾《记》云,朝鲤河亦名七渡河,在檀州北之金沟馆(应在今金沟[4]或金沟屯中)与古北口间,横贯此道。则与《清一统志》考订白絮河为七渡河之说不合矣。复次在密云、金沟之间无大川流,金沟南之小溪无关重要,惟在金沟、古北口间必须经过潮河而已。《清一统志》同卷页著录有一近代之朝鲤河,既非王曾所言之七渡,亦非沙畹所拟之潮河;近代之朝鲤河亦名九渡河,仅长二十里,来自怀柔县钓鱼台庄西,与珍珠河汇流经石厂庄东至赵各庄东,与诸小溪合流入

顺义县境。——是皆与王曾所记不合，而路《录》王《录》所言之朝鲤河，只能为近代之潮河也(参看后文)。[5]

虎北口即古北口，今附近土民尚名之曰虎北口。

比较路、王二人里程，自白沟河至幽州里数同；自幽州至檀州，路《录》较王《录》多十里(路《录》五十里，三十里，八十里；王《录》四十里，五十里，六十里)；《读史方舆纪要》十一卷25页密云县条谓此城距北平一百三十里，路《录》作一百六十里，王《录》作一百五十里；同书同卷26页古北口条谓密云、古北口相距一百二十里，王《录》作一百三十里。《密云县志》卷二且作一百里。

十五日自虎北馆东北行，至新馆六十里。下虎北口山，即入奚界。五里有关，虏率十馀人守之。涧水西南流，至虎北口南，名朝里河。五十里过大山，名摘星岭，高五里；人谓之辞乡岭。

王《录》此段距离作八十里。——摘星岭，王曾名德胜岭；疑为奚人土名之同名异译，[6]盖王曾曾谓德胜岭俗名思乡岭也。——朝里河经过古北口，确为潮河无疑。如主张此名之是，则应断言此名后曾移称别一河流；当时奚种曾被契丹役服，多徙热河西南，而完全放弃其东北。吾人行将寻求此新馆所在。

十六日自新馆行至卧如馆四十里。七里过编厢岭。

王曾亦云四十里至卧如来馆，盖山中有卧佛像故也；振《录》应脱来字。沙畹(见原刊422页注四)从高士奇说，位此馆于滦平县西七十里之喇嘛洞附近(《承德府志》卷一六，5页同7页)，是也，盖其地有石刻卧佛像，证其不误。古北口、喇嘛洞间距离一百一十里，路振作一百里，王曾作一百二十里。

此种考订足以并求摘星岭所在。王曾曾云,德胜岭盘道数层;诚如高士奇说,除十八盘岭莫属(沙畹文422页注一)。编厢岭,王曾作偏枪岭,应亦从高士奇说,断为今之偏岭。由是可见路振循自古北口至滦平县之北道行,未遵经行常山峪青石岭之南道也。

王曾逾偏枪岭前,先逾雕窠岭。考《承德府志》(卷一六,7页),十八盘岭有二岭:大岭在滦平县西南一百一十里,小岭在大岭西南四里;然则小岭为路振之摘星岭,王曾之德胜岭,而大岭为王曾之雕窠岭矣。顾两岭相距不远,故路振并以摘星名之。

则新馆所在应在偏岭南七里,十八盘岭北十里寻之。

十七日自卧如馆东北行,至柳河馆六十里。五里过石子岭,道险。三十里过銮河;四十里过缠斗岭;又行十馀里至平州路;六十里过柳河。

卧如馆、柳河馆间之距离,路振作六十里,王曾作七十里,顾喇嘛洞距滦平县尚有七十里;则颇难使此二行人在滦平附近渡过滦河(今日热河城之方位,势须在滦平附近渡河,然当时无此热河城也),而延长其行程三十里(路振)或四十里(王曾),然则抵于热河附近矣。此城距滦平有四十里。此二行人所记之里数不及实在距离远甚。路振曾云东北行,而滦平实在东方,而且在喇嘛洞之东南。喇嘛洞在今兴州河左岸,路、王二人应已渡此河,然未录其名。顾在当时尚未设置兴州,此河必未以兴州名也。

王曾名滦河曰乌滦,《记》云:"过乌滦河,东有滦州,因河为名"。沙畹(见原刊422页注五)因断言王曾在滦平附近渡

滦河，而据《承德府志》(卷一五，25 同 27 页)之文，位置滦州于滦平。是盖沙畹考证之偶疏，缘《志》文仅辨正《契丹国志》“乌滦”为“乌滦”之误而已。况且沙畹已在 414 页注一引证《承德府志》卷四(3 页)同卷二一(2 页)之文，位置北安州于喀喇河屯(滦平之蒙古语名)欤。其实所引之文位置于喀喇河屯之州非北安州，乃大兴州，而《承德府志》此种考订亦不尽可靠，盖北安州在伊逊河上之黄姑屯(蒙古语名博洛或波罗河屯)，而大兴州为金、元时代同一行政区域之称，或者并为同一州治也。讨论此种问题，离题太远，容后再考之。总之，不能位置滦州于滦平；《辽史》卷四〇《地理志》，滦州隶南京道(今北平)，在长城南。王曾渡河时仅言东有滦州因河为名，无他意也。

王曾名滦河曰乌滦，颇难索解。据馀所知，他书未见著录有此乌滦名称。沙畹并译宋绶(《宋史》卷二九一；沙畹误以其人名宋缓，曾经伯希和在《远东法国学校校刊》1909 年刊 239 页注一改正其误)《行记》，曾在 439 页谓乌字契丹语犹言水。然则王曾之乌滦诚寓有此义欤？吾人知契丹语名河曰没里(可与蒙古语之 murën 参照)，而《契丹国志初兴本末篇》所识诸水名，有陶猥思没里等水，足以证明契丹语位置本名于前，没里于后，与蒙古语满洲语同。然则乌滦不可解作滦水矣。意者“过乌滦河”犹言过乌、滦二水，而此乌水或指前一日渡过之兴州河，然此乌河名称未见他书著录。蒙古语名作锡喇塔拉(参看《承德府志》卷一六，11 页)。

王曾过乌滦河后，曾逾二岭，曰墨斗岭，亦名度云岭，曰芹菜岭。今日滦平赴热河，仅逾一岭，即广仁岭，而王曾所记之

里数,不容其过热河而逾第二岭也。由是吾人不能假定路、王二人曾取此道,即经张博湾蓝旗梁滦平县,东向稍偏南行复东北行,而至热河一道也。

路、王二人发自卧如来馆后,应过兴州河同滦河之分水岭。路《录》名此岭曰石子岭,王《录》无此名。喇嘛洞今道未至金沟屯以前须过一岭。路振过滦河后过一岭名曰缠斗岭,应是墨斗岭之误,盖唐时于奚境置有墨斗军也。滦河伊逊河[7]间,自滦河沿赴桥头之道中,应过玉斯梁;[8]王曾独著录之芹菜岭,似为一次要之岭,应在此处求之。余以为柳河应是伊逊河:从喇嘛洞东北行六十里只能抵此。《承德府志》卷二一(12页)引曾亮《武经总要》,位置柳河于北安州内,案北安州即在今之黄姑屯,毫无可疑,而其城在伊逊河左岸。则柳河馆应在伊逊河左岸寻之。

沙畹(见原刊423页注三)曾言不能考订此柳河为滦河右岸之柳河,其言是也,盖此右岸柳河在下流,距路、王二人渡河之处甚远。

《承德府志》同卷页曾云此柳河非豹河,盖从滦河右岸之滦平县,赴豹河所在之平泉县,距离有二百二十里,而路、王二人位置之柳河馆仅距滦河三十里也。由是距平泉、豹河甚远。又一方面卧如来馆、柳河馆间之行程,既非喇嘛洞经滦平而抵热河之一道,吾人只有伊逊一途可取矣。

余之考订似与刘敞之说不符。《宋史》卷三一九敞本传载使契丹事,《东都事略》卷七六所录之文小有异同,兹录《宋史》之文如下:

仁宗时(1028至1063年)刘敞"奉使契丹,素习知山川道

径。契丹导之行，自古北口至柳河回居殆千里，[9]欲夸示险远。敞质译人曰，自松亭趋柳河，甚径且易，不数日可抵中京，何为故道此。译相顾骇愧曰，实然，但通好以来，置驿如是，不敢变也”。

复次刘敞从古北口赴中京，并未迂途，盖从北平经喜峰口松亭馆赴中京一道，并不较古北口一道甚近，前者有九百里，后者有九百二十里。

然则契丹人导刘敞自此馆赴彼馆，故意绕行山径，与路振、王曾等取直道者不同欤？其事似不可能，盖在当时不复能以其地广欺中国人也。意者刘敞欲出喜峰口，而见导者出古北口，因以此道较远而责译人云云。

难者或曰，刘敞习知道径，或曾主张取道松亭、柳河（伊逊）？读者切勿因此谓柳河为今之豹河，盖喜峰口一道适经豹河流域也。《承德府志》主张是说，然其唯一引证，只此刘敞传。《辽史·地理志》（卷三九泽州条下）无豹河，有撒河，《承德府志》（卷一六，42页）误考订其为濈河，此河一名白马川，一名奶儿河，盖为滦河右岸之一支流，发源平泉县西南，在龙井关入长城，在滦阳站附近入滦河。此种考订之唯一理由，则在撒濈二字形近。濈河距泽州远而不重要，不似豹河之流经城下者值得著录也；所以馀以为撒河即是豹河。元代名此河曰薄河，明代乃名豹河（《承德府志》卷一六，39页）。刘敞主张取道松亭柳河（伊逊），实无意识，如从其说，必须绕道甚远，反使契丹骇笑也。又一方面，刘敞之松亭，不得为王曾之松亭岭，脱为松亭岭，应云自柳河趋松亭，不得云自松亭趋柳河，盖如王曾之来自古北口者，应先至柳河，然后始抵松亭岭也。

根据前说,余颇疑其事不属刘敞,而敞并未言及柳河,或有别一佚名之人将两道混合:一道自古北口经柳河(伊逊)而抵中京,一道自喜峰口经松亭馆而抵中京;史官以敞习知道径,误以他人之事属之。惟一可能主张之说,则在刘敞以喜峰口一道为较近,然此道契丹未置驿馆也。

此外在1444年重见此柳河之名,是时世人已识豹河也,时总兵陈怀征兀良哈,古北口渡滦河、柳河而至大小兴州,具见柳河在滦河同大小兴州境内,质言之,在黄姑屯境内(参看《读史方舆纪要》卷一八,38页)。

平州路既在未抵柳河前,只能为村名,而非后之永平府,《辽史》初名平州,后改辽兴府,统营、平二州,路名平州路(参看江苏书局本《辽史》卷四〇后附考证)。

十八日过柳河馆,东北行至部落馆八十里。十里过小山;六十里过契丹岭。

此小山应为伊逊河与流经哈卜齐尔之急流间之分水岭。契丹岭疑是王曾之松亭岭(曾云:过松亭岭甚险峻,七十里至打造部落馆)。《承德府志》卷二一(12页)亦谓松亭岭在柳河馆东。此松亭岭显非喜峰口北一百二十里之松亭关(《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一,直隶三,30页)。应在哈卜齐尔与中关或高寺台之间寻之。后二村在热河沿岸,部落馆应在二村附近。

十九日自部落馆东北行至牛山馆五十里。山势平漫。

此处有一考证行程困难之点。路振已抵热河流域,中关(承德北六十里)、高寺台(承德北四十五里)两村间之某地。欲前行,有两道:

(一)第一道循赛音河行,此河发源于和尔和克山西之三

道沟(《蒙古游牧记》卷二,11 页);过岭至老河流域。此道余未详,然应跋涉若干高山,始抵霍勒霍流域之大营子,然后循河行至黑城子,与第二道合。辽时北安州(黄姑屯)容或有一直道直达中京。此点须详细研究其地地势始能明了。余以为黄姑屯、大明城(中京)之距离应约有三百三十里。路振著录部落馆、中京之距离,有三百八十里,复应加高寺台、黄姑屯间距离六十里;则共有四百四十里。路振所循者似非赛音河之径道。《武经总要》固谓北安州、中京间距离有二百五十里(《承德府志》卷四,3 页),然此书所志之里数颇难作准,余已在他处言之。[10]可以证其误者,此书既言北安州距古北口二百八十里,然取北道只有二百三十里(若取南道,经过热河滦平则有二百九十里),又一方面言北安州距幽州(北平)二百五十里,竟少于北安州、古北口间之距离,有是理乎?

自是至中京,路振不复著录岭名,逐日常言路平。王曾尚录有二岭。无论遵第一道,抑遵第二道,所逾之山尚多于二人之所记也。

(二)第二道自高寺台至头沟而抵于老牛河流域;有一山岭不高,可容车马通行,凡自平泉赴热河之重载大车常循此道而避承德北十五里红石拉之险峻高岭。

牛山馆之得名,似因附近有山名牛山,《承德府志》卷三(30 页)言有牛岭,位在大兴州、惠州之间则在黄姑屯、平泉县之间,与吾人所言之牛山方位正合。[11]

今有一小河即发源于吾人所拟为昔名牛山之山麓,不知与《承德府志》、《蒙古游牧记》、《清一统志》等编业已无考之古牛山,是否寓有关系。总之,承德(热河)东北有一河名牛河,

或老牛河,发源于滦河、老河分水岭之南面,西南流经四沟、五沟、六沟至下板城而入滦河(《承德府志》卷一五,38页)。

应注意者,王曾赴牛山馆,向东北行;余所假拟路振所循之道途(是亦王曾经行之同一道途),亦向东北行而抵于老牛河流域。

二十日自牛山馆东北行至鹿儿馆六十里。地势微险。

王曾云八十里至鹿儿峡馆,设若不误,则导吾人至六沟之东,然尚在祥云岭之西。路振所言地势似不误。此段路途多较从前所经诸站为易跋涉;第若路振取道赛音河流域(第一道),则与所言地势不合,足证其所循者为第二道。是否在六沟之北经过若干小山,未可知也。总之,不久即与平泉、热河之通道会,盖此道北方有高山峻岭,不容其选择别途。

二十一日自鹿儿馆东北行至铁浆馆八十里。山势平远。

王曾在鹿儿峡馆、铁浆馆间过虾蟆岭,此岭得为祥云岭,然则应承认其对于以前之凤凰岭视为不足记录。八十里之距离导吾人至平泉县东十馀里,而自凤凰岭以后,行人已抵豹河流域;山实不高,河谷愈广。

二十二日自铁浆馆东北行至富谷(音浴)馆八十里。山势平远。

王曾记云:自铁浆馆"过石子岭;自此渐出山;七十里至富谷馆"。若将富谷馆位置在茶棚(在今平泉县通赤峰县道上)东北十馀里,则曾应过乌勒呼玛梁(《承德府志》卷一六,24页),车过此岭,行岩石上(疑因此名石子岭);此岭在豹河、老河两流域间,老河最南支流来自马盂山(一名永安山,《承德府志》卷一五,35页),流经乌勒呼玛梁之北。今道左老河左岸有辽代旧县城废址,县隶中京,振等过此时尚未建置,故未记

录(参看《辽史》卷三九,1页)。富谷名称后见明代载籍著录,其城不在乌勒呼玛梁北富谷馆所在,而在梁南:今其遗址尚可在平泉县东二十里沙陀子天主堂侧见之。

岭北不复有山,循老河流域行。

二十三日自富谷馆东北行至通天馆八十里。山□路平。

所见本阙一字,证以后文,似阙远字。

二十四日自通天馆东北行契丹国三十里。山远路平。

今在黑城子所见辽代旧城废址,振等过时尚未建置。王曾云通天馆二十里至中京。案自茶棚至五十家子二十五里,又十里至黑城子,又十里至八里罕甸子,末后八十里至大明城(中京),[12]与路振所记里数大致相符。

契丹国外城高丈馀,幅员三十里。南曰朱夏门,三里至第二重门城。城南门曰阳德门。城幅员约七里。自阳德一里至内城门曰阊阖门。东、西掖门去阊阖门三百步,东西角楼相去约二里。是夕宿于大同驿,驿在阳德门外。二十六日持国信自东掖门入,至第三门曰武功门。见虏主(圣宗)于武功殿;饮凡三爵而已。二十七日自西掖门入,至第三门名曰文化门,见国母于文化殿。二十八日复宴武功殿,即虏主生之日也。正月一日复宴文化殿。四日又宴于文化。五日又宴于武功。七日宴于南园,园在朱夏门外。八日辞国母于文化殿。九日辞虏主于武功殿。

比较路《录》王《录》所记中京,各有异同。

今城南墙外有废塔:南园或在此塔附近。王曾谓城方圆才四里许,而路振则云幅员三十里。馀在1916年12月略为测量,外墙共有九千弓,合二十五里,然应加入土人所称东面北面之外罗城(今尚见其遗迹),则与路《录》所记里数相符。

王曾应有误记,仅就西南小丘有寺之小城言之,(附图 A、B、C、D、E 点内[13]),幅员亦倍于此。案中京建于 1007 年,在路振抵此之前一年(《辽史》卷一四,统和二十五年纪)。1007 年冬阴历十月圣宗驻跸中京(出处同前)。路《录》所称国母,即圣宗母景宗皇后;圣宗即位时,号睿智皇后(《辽史》卷一〇),后殁于 1010 年初(《辽史》卷一四)。

路、王二人所记诸城门名皆同,然王曾则以阳德、阊阖为北门。观废址现状,此城在金、元两代似已改建数次,故与路振所记不尽相合。然余以为相去约二里之东西角楼,应在附图 KJ 两点之上;距离约略相合。阳德门似在 P 点,朱夏门似在 R 点。二门相距二里有馀,三里不足,故路振云三里。第二城得在 FGHI 四点之间,大内似在 KJ 二点之间,而其城墙从此两点抵于北面城墙。阊阖门或在 KJ 两点之中。西掖门似为 GH 两点中间之门,然东掖门现已无迹可寻。东、西掖门去阊阖门三百步较有问题:盖 KJ 两点之中距 G—HF—I 两墙各有六百步。文化门可在内城西墙 K 点之北见之,然在东墙已不复见有武功门之遗迹。王曾谓有市楼门四;附图 Q 点有土堆二得为其二楼门之遗迹,然亦得为王《录》所记之夹道步廊也。

第二城墙周围十一里,路《录》谓有七里,仅与内城幅员合。复次南墙之角楼似为宫墙之一角。此皆未能解说者也。

王曾谓城垣四里许,并非指 GALF 间之城垣,盖此城周围十里馀也。然则所指者为 MNOP 间之城垣欤?是亦一疑问也。此城地较周围为高,城外东南西三面皆有壕。周围三里有馀,四里不足。路振所言形势与此城不合,此城仅有一南门,别有一门在东北角。

虏名其国曰中京,府曰大定。府无属县。中京南至幽州九百二十五里,雄州白沟河界一千一百四十五里。东至灵河五百里。沿灵河有灵、锦、显、霸四州。地生桑麻。又东至黄龙府一千五百里为东京;又东至高丽、女真四十里(自灵河以下结伴副使李询言。询尝使高丽经女真涉灵河凡五十程)。

《宋史》卷三〇二有李绚,仁宗时使契丹(1023至1062年),似非此李询。路振所闻不尽实:盖辽时无灵州;亦不得谓是利州之误,利州固在大凌河左岸,然置于1008年,李询使高丽时尚无此州也(《辽史》卷三九)。霸州后(1041年)名兴中府,在今大凌河左岸朝阳县治。《辽史》卷三九兴州境有小灵河,而名安德州之河水(在小凌河流域)曰徒河。锦州在今锦县治所,然不在大凌河岸,而在小凌河岸。显州,今广宁县治,亦不在大凌河流域。然则为大凌河上建州之误欤(参看辽史卷三九)?

振云府无属县;《辽史》卷三九作统县九,然著录建置年代之六县(1013年),皆证明路振至此时尚未建置(1008年)。

王曾自幽州至大定府,计程九百一十里;振《录》缺两程,颇难确知其里数。若以一千一百四十五里减去九百二十五里,所馀二百二十里,等如白沟河、幽州间之距离,则两录所识里数大致相合。惟东至灵河五百里,里数太多;今至朝阳县治仅有三百里。大凌河之一源仅距中京五十里。黄龙府在今开原县北,然非辽之东京。

东北至辽海二千里。辽海即辽东也,乐浪、玄菟之地皆隶焉(辽海已下事,馆伴使刘经言)。北至上国(上京)一千里,即林胡旧地,本名林荒;虏更其名曰林潢府,国之南有潢水故也。西至炭山七里;

山北有凉殿。西北至刑头五百里。虏小暑即往凉殿,大热即往刑头(亦刘经言)。

乐浪、玄菟在今辽宁及朝鲜境内,汉郡名也。

薛映自中京至上京计程六百八十里(参看《通报》1922年刊108页);此言千里太多。林胡从来未居热河(参看沙畹《史记》译本第5册44页注四),谓本名林荒,毫无所据;林潢应作临潢,犹言临近潢水。潢水,蒙古语名Sira-murën,此盲黄河,恐与中国本部之黄河相混,故作潢河;蒙古语名或本契丹语名(参看《通报》1933年刊183页之饶乐水)。山在上京北,而不在西,昔名七金山,今名九头山,距上京十五里。附近有契丹主凉殿。宋绶行记(参看沙畹《中国使臣行记》438页)亦云有凉殿为奚主避暑之处。此殿或在今窑上、五家儿两村之间。薛映云,临潢西北二百馀里号凉淀,在馒头山南避暑之处(参看《通报》1922年刊109页)。《辽史》卷三七,庆州有馒头山(《通报》1922年刊189页)。则刘经之言不尽实矣。

东北百馀里有鸭池,鹜之所聚。西南至山后八军八百馀里。虏之兵欲南牧,皆集于幽州。兵入幽州有四路:一曰榆关路,二曰嵩亭路,三曰虎北口路,四曰石门关路。榆关在蓟州北百馀里,嵩亭关在幽州东一百六十里,虎北口在幽州北三百里,石门关在幽州西一百八十里。虎北口东三十馀里又有奚关(榆关路,涿州刺史李质言;嵩亭石门奚关路,幽州客司牛营言)。

中京东北百馀里无池沼。所言四路乃(一)山海关,(二)喜峰口,(三)古北口,(四)疑指石门镇,然在遵化县西,不在北平东:有一途较难行,自石门镇至遵化,出罗文峪,别一途径从石门镇北行出马兰峪。蓟州(今蓟县)至榆关与幽州至嵩亭之

距离皆误，盖前一路有四百八十里，后一路有五百四十里。自白沟至契丹国凡二十驿；近岁以来，中路又添顿馆，奚民守馆者皆给上田俾营养焉。国信所至，则蕃官具茖，汉官排顿置，大阉执捂案舍利劝酒食。按录：是岁振受诏充契丹国主生辰使，故其录如此。契丹今改其国号大辽。见宋使无常处，不皆在中京也。自虎北口以南，皆汉唐故地；因续钞之，以备他日辽人归我幽、蓟舆地之考。崇宁五年岁次丙戌八月三日壬戌(1106年9月2日)，陈留县故墙法云寺伯宇记。

路、王二录自白沟至中京皆为十九程。案《录》以下为钞者伯宇后记，并以梁柄、李询、刘经、李质、牛营等之言附焉，然亦得为原录所旧有。契丹在947年改国号曰大辽。幽、蓟之地复归中国，并不如伯宇之所期(宋人仅于1123至1125年间暂时占领燕京)：嗣后女真、蒙古更迭入主中国，晚至明代，其地始内属云。

注：

〔1〕此下疑有脱误，盖据上文，此下应为北门名也；《辽史》卷四〇《地理志》云：大内在燕京城内西南隅。东北隅有燕角楼。皇城西门曰显西，设而不开。

〔2〕参看沙畹《中国使臣行记》，见《亚细亚报》1898年刊387页：许亢宗谓城周二十七里。

〔3〕王曾记云："至古北口。两旁峻崖，中有路仅容车轨。口北有铺，彀弓连绳。本范阳防扼奚、契之所，最为隘束。"此盖记唐代故事，当时契丹已据有河北之地，而以白沟河为界也。

〔4〕《密云县志》卷二云，距密云四十五里；中有大池。

〔5〕应注意者，路、王二人皆未言在密云城下渡白河事。

〔6〕摘星岭名见《唐书》卷二一九契丹传:唐末契丹人寇幽、蓟,刘仁恭穷师逾摘星山讨之。并参看《读史方舆纪要》卷一八,直隶九,39页。

〔7〕伊逊河发源于围场之伊逊色钦;九转出伊逊喀卜齐尔栅,过石片子,入承德县(热河)境;汉名羊肠河(《承德府志》卷一五,36页)。蒙古语名伊逊喀卜齐尔,犹言九峡。——伊逊汉语有伊松、衣素、宜孙、仪粟等别译,而土名又有玉斯、玉素等称。

〔8〕玉斯梁犹言伊逊岭。——译者案玉斯梁三字乃据译音,前注玉斯、玉素等名亦然,旧译俟考。

〔9〕路《录》著录古北口柳河馆间距离仅一百六十里。读者阅此文,当然提出若干问题,首先应问刘敞何以知契丹人欲夸示险远?自幽州至中京之道途,中国使臣往来久矣,刘敞仅在1028至1063年间作此行;顾敞殁于1068年,得年五十,则可推定其奉使在1048至1063年间。以前奉使者路振、王曾、薛映诸人早已记其行程,是时契丹人实无给中国使臣之必要。案此可参看《宋史》卷三三三《阎询传》。询使契丹,迓者王惠导询由松亭径。询曰,此松亭路也,胡不径葱岭,迂枉若是,岂非夸大国地广以相欺邪?惠惭不能对。事在1068年前。可参看沙畹《中国使臣行记》,《亚细亚报》1898年刊,415页所识女真人夸大之语。

〔10〕见 New China Review,1922年刊,188页。

〔11〕《承德府志》卷二一(13页)引《北方地理志》,有一牛山,在北安州西北五十里。则非牛山馆附近之牛山,盖其方位在北安州东也。自卧如来馆至牛山馆,距离有一百九十里,自喇嘛洞至黄姑屯有一百二十里,则至西北之牛山有一百七十里矣。

〔12〕参看《通报》1922年刊110页(译者案即上面所译《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原文)。中京之考证文字太长,兹从略。

〔13〕冯先生遗稿中无此附图,刊登原文的瑞典人种地理协会1935年《地理年鉴》(Geografiska annaler),我们在北京各大图书馆里也没有找到,因此无法补入,谨向读者致歉。

后　记

十九世纪末叶，东、西各帝国主义除公开用武力侵略我国外，并组织各种团体深入我国境内，藉传教和考古调查为名，进行间谍活动。本书著者法帝国主义天主教神甫闵宣化(旧译牟里)就是兼披此二种外衣往返于旧内蒙古东部和热河地区者数年，他校对了该地区的各种地图，记录了各地方的汉人地名和蒙古地名，本书最末的补注中即暴露了他这个阴险的政治目的！他为了仔细地完成这个鬼任务，因而就附带地，也比较正确、详细地把现存于内蒙古东部和热河地区的辽代城址和墓葬记录下来，这样，给我们研究辽代历史和调查、保护辽代文物不无一点点用处。现在中华书局拟将冯承钧先生的这部译本重新付印，并让我们校对一下。我们的校对，并未参阅法文原书，只是把商务印书馆旧印本中显然误植的予以改正，并将其中误引史书处以及史书中的部分异文，尽可能地查出，附注于译文之中，最后又在冯先生遗稿中找出闵宣化的另一篇文章——《乘轺录笺证》的译文，因为它和这《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有关，所以商得中华书局同意，附印在译本后面。

内蒙古东部和热河的辽代遗迹的调查，在闵宣化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也采取了和闵宣化同样的目的，于“九·一八”前和东北沦陷以后，派遣了许多人到东北做所谓考古工作，其中有拿满铁株式会社津贴的黑龙会分子，也有受日本宪兵队支援、保护下的调查队，他们不仅到处摄照各种照片，测量详细地图，并且对辽祖陵、庆陵

以及赤峰、叶柏寿等处的辽代墓葬进行彻底的破坏，更重要的是有计划地破坏了辽上京临潢、祖州、庆州、怀州等辽代城址及其附郭村落遗址，盗走了大批的重要遗物。从鸟居龙藏的《从考古学上所看到的辽代文化图谱》和村田治郎、岛田正郎的《庆陵》二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二。闵宣化书中所提到临潢、庆州附近的遗址、遗物，这两部日文书中，都有照片和较详细的叙述，读者可以参看。

宿白　陆峻岭

1955 年 7 月

西域考古记举要

〔法〕郭鲁柏　撰

冯承钧　译

序

数月前看见一本书，标题好像是《中国经营西域史》。我是有西域癖的人，凡是关于西域的撰作，只要看见，没有不读的。未展卷时，心中非常愉快，不意开卷以后，失望随页数而俱增。此书出版年代记不得，只记得前有朱希祖先生1934年序，足证其为新著，可是内容之旧，不如四十年前的撰作远甚。近四十年东西学者考察研究西域的成绩，同历史、地理、语言、宗教等方面的发现，好像著者皆不知道；甚至于国内撰作如《西域水道记》、《辛卯侍行记》等类的书，亦未寓目。所采资料，类多正史官书档案，同近人游历新疆的记录。前人之误莫不因袭。由是我以为东西学者所撰关于西域之图书，尚有介绍之必要，而其中有系统而关系重要者，莫过于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记》同《亚洲腹里考古记》两大巨篇。姑就《西域考古记》说，仅记录已有三巨册，译出可逾百万言：自量气力，不足办此。不得已姑思其次，取郭鲁柏之《西域考古记举要》之文译之。我所见西贤所撰介绍新刊之文，无过于是编者，读之不但明了斯坦因三次考察之成绩，而且可以并知斯坦因以前诸考察团在新疆考察之经过。译是编已，恐读者对于考察成绩未能得一概念，复取格鲁赛之《中亚佛教艺术》一文附于其后：盖一者为斯坦因个人考察之成绩，一者为诸考察团之总帐，可以互相参考。我很希望有人取斯坦因原书译之，其有裨于国人对于西域之再认识必非浅鲜云。　　1941年6月15日冯子衡识。

这部华丽刊物,使我们知道1906至1908年间,斯坦因于印度政府庇护下,在中亚探考旅行所得的成绩。除此之外,并将著者于1913至1916年间在同一地域作第二次旅行时所辑的文证资料加入。[1]

斯坦因君所记探考的区域,包括有一个很大的长方形地带,东西约长一千五百哩,而其四至:西起帕米尔;北至天山;东抵南山;南达西藏与新疆分界之昆仑雪岭。这些地方包括有塔里木河全部流域,同广延罗布淖尔与长城、甘肃间之沙碛平原。所包含的考古地点是:和阗(Khotan)、拉瓦克(Rawak)、喀答里克(Khadalik)、尼雅(Niya)、密兰(Miran)、楼兰、敦煌、吐鲁番、库车等处。世人要在一张地图上将这些地点作一标志,少不了于思想中在斯坦因君最近题曰《亚洲荒废的中心》的一篇讲演中所讲的那个大沙漠作一次环绕的旅行。

约在百年前,Abel Rémusat刊布他的《和阗城史》的时代,欧洲学者认识新疆尚不甚审。晚至前世纪中叶,才开始有此沙海(Taklamakan)的科学考察,而在当时所用的尚是汉文地图。首先开拓的人所注意的是些测量、地文地理、人文地理、博物学等类问题。而与这些寻究直接有关系的考古学似已屏诸科学之外。当时无人想到这些荒寂而少有商队经行的地方,将有一日,同埃及、美索不达米亚(Mésopotamie)一样成为金石学家同艺术学家一种妙不可言的研究场所。

但在1865年时,有个英国人员约翰逊(W.H.Johnson)曾在他的报告里面,提到和阗县治额里齐(Ilchi)境内有些埋没于沙中的

废城。[2]这件消息很少有人注意,过了十年,欧洲人始又听见有人说亚洲这一部分里面发现有些历史古迹。

约翰逊首先着手的调查,后在1873至1874年间,始有Douglas T. Forsyth赓续。他被英国政府派到叶尔羌地方作印度的政治经济代表,这个兼为外交官的学者,曾在他奉使中得到些库车附近一个废城的明确指示,并知道有些洞窟同崖上雕刻的大像。他本人曾在喀什噶尔附近访过一处旧城。[3]

嗣后关于这些古迹的报道,不像以前那样稀少。1879年执行医业于库车的艾伯特·勒尔(Albert Regel)博士,曾游历吐鲁番窝集(oasis),记录古城废址,他以为同"一个罗马城市"废址相类。[4]他在此地见着中国陶器残片同佛像,佛像虽用泥和草造成,可是形貌壮严。[5]又一方面,普日范斯基(Prjevalsky)于1876年始,即在罗布淖尔地方发现一群废迹,这就是四十年后的发掘而使斯坦因君得看一种无价的艺术作品,如密兰壁画[6]的地方。尚有其他古迹,皆在戈壁南方,曾经同一探考家在他的第四次中亚行记中记录(1888):"现在车尔成(Tchertchen)的居民有时到沙漠埋藏的废址中去发掘,得着些古钱、长方形银锭、珍珠,缝在业已腐烂的衣服上的金饰,以及玻璃碎片。有时见着坟墓棺木。其中的尸体未经用何种保存不朽的方法,然因土地同空气特别干燥,尚保存完好。男子身体高大而有长发;女子辫发。中有一墓有男尸十二具,皆是坐着埋葬的。一棺内有一幼女尸体。眼上用小圆形金片掩盖,头用金叶包裹。衣服毛织,完全霉烂,用小金豆缘饰;跣足不履……。"有时在人尸附近见着马羊骨骸。[7]

这些报道虽然重要,然对于所言古迹的年代尚无定谳。普日范斯基从塔里木河携回的搜集品,既无古籍或刻石,亦无造像或绘

画。[8]总之,在此寻究范围之内,任何寻究尚未开始。新疆的考古学尚是一种须待节节创造的科学。

在此领域中作有条理的研究,实开始于1890年著名的Bower氏写本之发现。此写本由一英国军官从库车携回,是桦皮书,用梵文雅语,而写以婆罗密(brāhmī)字,曾经A.F.Rudolf Hoernle博士在1893同1897年翻译刊布。其他文书比较残缺,然年代亦甚远古,曾经俄国驻喀什噶尔领事伯多罗斯基(Petrovsky)获得,寄到圣彼得堡。杜特类(Dutreuil de Rhins)考察团于1892年在和阗西南购得一本印度写本,亦是桦皮书,然写以佉卢(kharoṣṭhī)字。其内容是印度俗语(prākrit)的《法句经》,写定时代最晚不过纪元后二世纪。[9]

格勒纳(F.Grenard)君[10]带回法国寄藏基迈博物院(Musée Guimet)的古物,亦是从和阗搜集而来。[11]这些古物多属窑制小像同破瓶碎片,与1885年Wesselovsky教授在撒马尔罕(Samarkand)发现的古物颇相类。皆是从和阗县治额里齐西方岳特竿(Yotkān)小村搜集而来,此地定是一个古代都城所在。[12]此地沙碛虽然露出不少小件古物,如玉、刻石、古钱、铜器、陶器以及不少的金叶,可是尚未有人发现建筑物的重要遗迹。如此看来,在岳特竿同附近各地的探求,仅仅对于约翰逊全城埋没沙中一说,作一半的证明。这些城市尚待发现。首先发现其中最要城市之一而实行发掘者,要数瑞典探考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

斯文赫定在1896年1月14日带着四个人、三匹骆驼离开和阗;向玉陇哈什左岸的Islamabad村进行,1月19日行抵其地。同月24日,于摄氏零下24度酷寒中通行一种绝对荒寂的地方以后,到达神秘不可测的"沙海废城",在他未抵此地以前,只有若干土人

来此“求宝”。此城位置可以远瞩，因为全城有些枯杨在作标志。房屋用木料同篱笆构成，上覆粘土，颇受风沙侵蚀，然屋架尚立而未倒。其数可有数百。并有寺院一所的遗迹，应是佛寺，其白壁上尚存有壁画的遗迹。此探考家研究的时间无多，不能作长久的探考。他仅仅作些描写，在土堆中捡拾少数物品；其中有种种姿势的泥制精细佛像几尊。[13]

斯文赫定的发现甫传到欧洲，学界的注意又被新疆别一角落所吸引，其地却在广漠之北。1898 年 Klementz 君奉圣彼得堡科学研究院之命，往吐鲁番窝集去调查，两年前 V. J. Roborovsky 上尉即在其地携回若干古写本。[14]这个考察团的工作使世人知道尚有不少地方未经人探考过，其中有哈喇和卓同回鹘的古都亦都护城(Idikut-sahri)。由是可以预定将来探考的计划，而使中亚一种最富于佛教壁画同雕刻的地带获显于世。[15]

这篇简单说明止于 20 世纪关头，或者足使读者确定斯坦因博士事业所位置的科学范围。他是乔治·比勒(George Bühler)的高足，1888 年左右抵印度，在教育部服务，不用久待，即从事于一种长期工作，耗费光阴约有十年：就是将克什米尔(Kashmir)《诸王史》完全翻译。[16]要使这种工作得到良好成绩，仅仅知道梵语是不够的；必须于鸿博语学知识以外，参加其他种种知识，如测量术同人种学知识之类，而这些知识只能在就地获得。斯坦因在他从事的寻究之中，不久便涉及考古学了。这个幼年学者首先寻访的古迹，就在克什米尔高谷一带；然而不久他的注意并及旁遮普(Penjâb)同班涅(Buner)两地的古迹，趁着随军的机会前去访求。[17]世人可以说斯坦因博士在第一锄下已使他成为一个考古学者，可是使用他的不畏劳苦的发掘能力，而作始终得到印度政府

帮助的大规模事业，则在后来远赴印度政治境界以外。

驱使斯坦因关心喜马拉雅山外区域的理由何在？他在他的一部撰作中告诉我们。[18] 自从 1891 年以来，梵语学者曾注意到有些来自中亚的印度语古写本，从喀什噶尔、和阗流通到加尔各塔(Calcutta)而经 Hoernle 博士求通其读。寄到的写本日见其多，加以这些写本对于语言研究特别重要，有一群学者因而决定委托斯坦因赴其地考察发现的情形。同时有些木刻版文来历很不明了，好像出于伪造，并托他调查真伪。1900 年 5 月 31 日，斯坦因从 Srīnagar 首途，取道 Kaṣangaṅga 山谷，进向帕米尔。此第一次考察的成绩，业在数种撰作中说明，其中最重要的著作就是《古和阗》。[19] 根据此书标题，可见斯坦因寻究的古迹，要在大漠的西边同南边，大致在和阗古国的境内，此国就是中国载籍中的于阗。全书凡 590 页，附图 119 面，足证此探考家在此比较短期的一年中努力之大。他所考出同发掘的地方有：岳特竿、丹丹威里克、拉瓦克、尼雅、喀喇墩(Karadong)、安德悦(Endere)等地。这些古迹的研究，对于于阗同其和中国、印度及西方诸国的关系，供给不少世人尚未想到的论证。由后此之说明，并可见他对于艺术史特别重要。

根据中国载籍，佛教早已输入这一部分亚洲高原，这是世人业已知道的，可是迄于是时，世人尚不知印度文化影响此地之深远，究竟到何种程度。丹丹威里克同安德悦出土的婆罗密字写本业已证明迄于 8 世纪末年，梵语研究尚在和阗风行。又一方面，只须引证尼雅出土的古物，若著名的佉卢字木牍之类，即足表现印度输入的风习，于纪元初数世纪间，在此地社会生活同行政生活中所执任务之重。[20] 这样一来，印度学的领域扩张及于印度本土之外，其境界东方展至罗布淖尔荒原。

艺术作品的审察，所得结论与比附亦甚丰富。《古和阗》有云："在各处所得3世纪至8世纪间的泥塑、壁画、画版、小木作物，业已证明印度西北之希腊同佛教参合的艺术，曾在和阗得着一个新的中心。"[21]斯坦因第一次考察所得的资料，业已表现此中亚小国在艺术史中所占地位重要，盖其为伊兰、佛教的印度同魏、唐诸朝的中国艺术交换的通途。世人已在奈良法隆寺有名的壁画中承认受有和阗绘画之直接影响。[22]

《古和阗》之印刷在1907年始告完竣。此书出版时，斯坦因业已重逾兴都库什山，重游和阗、尼雅、安德悦，通过浑塔格(Koum tagh)沙碛，进向敦煌。《西域考古记》所记录的，就是此第二次探考旅行之事。

在1901年斯坦因从和阗回来的那一年，同1906年他重赴中亚的那一年的中间，新疆考古学的认识大有发展。1901年3月，斯文赫定周历罗布泊北，发现一种废墟遍布而未经人识的区域，他曾考订是汉代史书著录的中国属国楼兰或鄯善。[23]次年，柏林的人种学博物院派遣一个考察团到吐鲁番，由格领维兑(A. Grünwedel)教授同休士(Huth)博士主持其事，主要目的在探考亦都护城的古迹。1904年时，德国又派遣第二批考察团，以勒柯克(A. von Le Coq)博士为团长。这个学者在吐峪沟(Toyoq)不剌益克(Bulayik)等处发现的古物，业经世人认识其中颇有珍贵资料，如纪元初十个世纪中用中亚流行的语言写定的古写本是已。第二次考察团归后，柏林的东方语学专家，始能为继续的研究，而对于1893年来世人曾疑其存在的一种"业已忘记的语言"，名吐火罗语者，尤有成绩。[24]可是大众的注意，要为从吐鲁番运回的壁画所吸引。这些壁画颜色尚甚新鲜，盖从木头沟(Murtuq)、别哲克里克

(Bäzäkliq)、和卓(Khotcho 即高昌)等地壁上剥下。运载虽然困难,大多数业已安然运回,而在人种学博物院陈列室中重再结合。不幸有不少壁画于用剪刀剥取时,在原地毁坏。勒柯克博士正要向敦煌进发,忽接到格领维兑教授又新奉考察之命,已在还赴喀什噶尔途中。他于是转赴其地与教授会合,这两个学者合作迄于 1906 年 7 月,是月勒柯克取道喀喇昆仑、西藏西部、印度等地而还欧洲。至若格领维兑则继续探考迄于 1907 年春天。[25]

三次德国考察团搜集的材料,最为人所识的就是题作"第一二两次普鲁士皇家考察团"的丛刊,诸编陆续出版,大半在战前,其馀在战后。[26]赖有这些著作,同柏林陈列的那些壁画,大众才认识吐鲁番绘画所代表之亚洲艺术的一种新面目,这些绘画可以称得起是"伊兰希腊佛教三种作风参合的绘画"。[27]同时并见有一种从前所未识的"摩尼教绘画"。

我们曾说过斯坦因博士在 1900 至 1901 年间业已想到往中亚作第二次的旅行。斯文赫定的发现,同格领维兑第一次考察的工作,以及新疆其他最近的发现同工作,可以使他将未来的考察范围大为扩张。此次进行者是一种全面的探考,一种真正环绕戈壁沙漠同浑塔格的旅行,而其期限应延至两年以外。原定的路程,纵不能将塔里木河南北已识的考古地点全部包括在内,也要包括其一大部分。应该探考的地方,并列有敦煌的千佛洞(Ming-Öi)在内。这些洞窟连同里面的不少绘画同偶像,皆是东方语言学者久想研究的古物,Béla Széchenyi 伯爵在 1879 年,普日范斯基在 1880 年皆曾游过。[28]

1904 年秋,斯坦因已被任为印度西北边境的总视学,曾将再往中亚的计划呈送库尊(Curzon)爵士,次年经印度部长核准。至

若考察经费,则约定由不列颠博物院担任五分之二,即以将来所得写本同艺术品若干为交换,其馀费用应由印度政府负担。

1906年4月2日,斯坦因自Srinagar出发,携带有印度助手二人,其一人是Rai(Bābū)Rām Singh,曾在1900年随他到过和阗。大约相距有数星期中,伯希和(Pelliot)适奉命自巴黎出发,将取道达尔岬(Taldyk。注:今译"塔尔德克"。)山峡同喀什噶尔而赴新疆。尚应附带言及者,两个考察团的路程虽然要在好几处可以会合,可是这两个学者在道中未曾遇着。等待后来回到欧洲才能见面,一同审视他们灿烂的科学收获。

1908年11月,斯坦因重回到克什米尔的都城,逾昆仑时着实受了不少劳苦同酷寒,可是对于他的广大探考计划,幸而节节实行,并且出他希望之外。不久一百多箱古物也安然到达,运往伦敦。

利用他两年又三个月的假期,他在英国安安逸逸地编辑他的"个人叙述",并照料搜集品在不列颠博物院装置。1911年《契丹沙漠废迹》出版。[29]同年终,斯坦因重赴印度,将约计一万四千部写本,数千件绘画、货币、刻石及其他发掘的古物,委托若干英法学者编纂目录。

斯坦因重回印度时,目的盖在预备再赴中亚作第三次的旅行,因为第二次考察的成绩虽然光耀,而他以为他的作业尚未完全终了。[30]读者在1916年的《校刊》中可以见着这次1913至1916年间旅行的说明。[31]所以我们无须在此处重言这些长远艰苦的路程。可是对于一个不惮跋涉两万公里程途,通行不甚欢迎旅客的区域,而志在继续考察几年前未了的工作之探考家,我们应该对他的科学热忱,他的决心同他的艰忍致敬。

1916至1917年间斯坦因重莅伦敦，他在那里日与不列颠博物院的同僚接洽，写定他的《西域考古记》第十至第二十章，他并利用他的个人势力向印度部长的当局接洽，获取印刷一部敦煌绘画的华丽刊本之必要费用。[32]

斯坦因君假期已满，在赴印度前，曾在巴黎作短时间之逗留，这是他偏爱的城市，他在一篇演说中名之曰"东方研究的神经中枢"。有一个天气晴明的下午，他到 Fontenay-aux-Roses 对于他的好友同合作人沙畹(A. Chavannes)作最后之访问，这部《西域考古记》五册就是题献沙畹以作纪念的。[33]

我们现在距此书出版之时不远。绪说后题 1920 年 11 月 19 日，是在牛津写作的。由是可见撰者又有一次脱离他的行政职务拘束，完成将近印刷的巨篇。

在逐章逐图说明斯坦因的撰述以前，对于此书的标题应该说一句话。Serindia 或 Sérinde，是古地理学的一个名称。[34] 此 Serindia 可以使人想到追随 Strabon 同 Procope de Césarée 之后写"丝国人"(Sères)同其所居之国的希腊同东罗马的撰述家，犹之契丹(Kathay)之足以使人忆及马可波罗者相等。斯坦因采用此名作其书标题，足证他将他的史地学家的著作，附丽于这些远古的先进，不过他们运气不佳，未能亲眼得见这些秘密的丝国人，也未遇见他们运载丝绸的商队而已。

斯坦因仍旧用他编纂《古和阗》的方法，在《西域考古记》中将行记的本文，同他采集的古物之叙述，严为分别。后者在每章之末用专节说明之。[35] 我们在此介绍文中也用这种良法。所以如上所述，每章作一节要。

第一章(1至24页)。〔Swât 同 Dîr 流域〕。1906年4月27日，

此旅行家发自白沙瓦(Peshawar)城,欲在进向妫水(Oxus)高谷诸山道中积雪溶化以前,赶早到达 Chitrâl,免得道途难行。当地虽引起考古兴趣,然不得不放弃需要长久逗留之一切考察。

乌苌(Uḍḍiyāna)是印度的一个古国,可是他能享盛名者,要因北方佛教曾将若干关于佛本行的传说位置在 Swât 流域。将来如有人欲编此国的古迹目录,可以参考法显(399 至 414 年)、宋云(518 至 522 年)、悟空(629 至 648 年)等巡历家的行记,他们曾将其地寺塔记录。[36]不幸印度同阿富汗的边境,因为政治情况,对于欧洲人闭关不纳,不能作有条理的考察,当然谈不上发掘了。

所记属于 Swât 同 Dîr 两地古迹那些页,固然无多新事,可是读者对于古乌苌国同其宗教上的地形描写,可以得到无数情报,可以构成 A. Foucher 君在 1901 年刊布的《犍陀罗古地理札记》的续篇。[37]

《西域考古记》第一章所记的惟一古物,就是 Tâlâsh 流域 7 世纪至 9 世纪间的一个印度小佛寺。此寺在 1896 年已经迪恩上校引起注意,所代表的模型,就是克什米尔同 Salt Rouge 等地习见的模型,或应溯源于犍陀罗艺术。[38]此种模型的特色,就是在正面装饰中采用巢窝形式。

第二章(25 至 59 页)。〔Chitrâl 同 Mastûj 流域〕。5 月 4 日,在发足白沙瓦一星期后,斯坦因通过尚有积雪的 Lowarai 山峡,进入 Chitrâl 境内。此地使他感兴趣者不止一点,可是时间缺乏,不能使他寻究必须多年研究始得答解的历史问题同语言问题。事之好像无可疑者,此奇异小国虽然受过中国侵略,而在国运上所受的重大影响,实以受自伊兰文化国家拔达克山(Badakshân)同西突厥斯坦两地为多。

Chitrâl 古迹甚少。斯坦因在 Pakhtôrîdînî 一个花岗岩上见着一行用婆罗密字写的铭文:“此是耆跋摩(Jivarman)王献给神灵者。”此铭足证五世纪左右 Chitrâl 与印度政治的同宗教的关系之存在。铭文之上刻有一窣堵波(stūpa)像。别有一同类铭文在 Mastûj 境内,斯坦因在 5 月 11 日抵此。

Mastûj 是一个山国,长年积雪,所以能同 Chitràl 一样,对于中国保存一种相对的独立。此国在玄奘时代,由一个释种(çaka)国王统治。顾此国同邻国一样,古迹不多,也不重要,可是古代文证之欠缺,可以在一定限度中用本地的建筑术同装饰术作补偿,其型古异,令人想到犍陀罗的艺术。

第三章(60 至 91 页)。〔妫水同和阗〕。5 月 19 日斯坦因逾 Darkot 岭(5100 公尺)同 Baroghil 岭(4100 公尺)后,行抵瓦罕(Wakhân)饶沃的平原。他现在到了两千馀年连接古代西方同中亚东亚的大路之上。

瓦罕国就是马可波罗的 Vocan,中国人在汉时已识其为五翎侯(Jabgou)所治之一国。他的名称已列在唐代的属国之中。因为时间欠缺,斯坦因的考古调查不能逾妫水上的 Sarhad 以外。他调查的古称最要者,就是自 Langar 到 Bozai-gumbaz 道上的一个石屋,土人名之曰 Kâr-wân-balasi,以为是一回教先贤墓。其实是一小毗诃罗(Vihăra),曾经他考订是《唐书》所载高仙芝讨吐蕃进兵赤佛堂路之赤佛堂。

5 月 27 日,逾 Wakhjîr 岭,嗣后遂入中国境内。引导此探考家进向喀什噶尔的道途,就是玄奘经过的道途。17 世纪时,同一道途曾经葡萄牙籍耶稣会士鄂本笃(Benvît de Goes)同他的同伴阿美尼亚人 Isaac 经行过,他二人在 Chichiklik 高原上遇见暴雪,几乎丧

命。

6月8日,斯坦因抵喀什噶尔,他在1900年曾经来此。此次利用重再逗留的时间,考察从前遗漏的一个古迹。

Utch-meravân 犹言上三洞,在喀什噶尔城北约十五公里。诚如汉语的名称,有三洞在一岩上。洞尚高,颇难进入,必须用绳梯或滑车的卷绳方能上去。三洞中之主洞有一泥佛坐像。全洞在1815年重再装修,工程粗劣。[39]

此地东方二公里别有一群古迹,内有一古堡残迹,同一个 tim,别言之,一个废塔。此同一废迹,伯希和君在1906年见过,而名之曰 Tegurman。[40]

6月27日,斯坦因抵叶尔羌,停留四日。他在1900年头次莅此新疆要城时,曾在园囿种植环绕的城市附近考察,并未发现何种与考古学有关系的遗迹,此次亦然。已而赴哈尔噶里克(Karghlaik),取道 Kizil-jai,此地因为在1895年发现若干回鹘文写本,所以为东方语言学者所熟知。

从哈尔噶里克赴和阗,走了四星期,自7月7日出发,至8月5日始到。斯坦因在昆仑山麓的库克雅尔(Kök-yar)停留十六天,就在那里写定《古和阗》一书的绪说,因为他的行李中携带有此书的末次校样。脱稿后复向东行。

第四章(93至153页)。〔和阗〕。他在和阗窝集停留六个多星期,在附近作种种游行同调查。重访他已识的古迹,并探考他前此未到而经土人报告的其他处所。

拉瓦克是他已在《古和阗》书中叙述的古迹,此次莅此,见那些古迹的形状,因为沙漠边界的沙丘迁移,颇有变更。窣堵波几完全露出,他遂乘势研究塔基的侧面,并核对他在1901年所测之图是

否正确。反之,此塔的四角广院而排列许多大佛菩萨塑像者,则被流沙掩没。[41]

拉瓦克西南有一地名 Kök-koum-ârich,是斯坦因前此未曾调查的一个古迹。此次在其地见着一座寺院废址,其旁有一堆积砖,表示是一座窣堵波的所在。9 月 17 日,到 Kûn-tokmah;18 日到 Ak-terek。在后一地方的发掘,得着若干窑制小像,同些塑像碎块,好像是寺院火焚后的遗物。碎块上尚存有装金的遗迹。此事很重要,因为他能解说迄于现在尚不明了的岳特竿沙中那些小金叶的来源。斯坦因云:"我这一次才知道这些碎金,是从已毁寺院遗留的。这皆是昔日和阗佛教寺院丰富金装的最后遗迹。"他于离开 Ak-terek 以前,曾在西夜里克(Siyelik)地方探考一座佛寺(būt-khāna)的废址。他在其地沙中见些陶器同人骨,并杂有回教货币,因而假定此地在佛教衰微时,曾被回教改作坟园。

《西域考古记》第四章附录的三节古物目录,包括和阗各地所发现及所获有的古物,第一目录言岳特竿之古物,馀二目录言 Ak-terek 同西夜里克两地之古物。

前此言及杜特类考察团时,业已说到岳特竿。格勒纳君记有云:"从这些废墟所得之物,较在他处所得者价值为高,年代为古。诸物为白玉、绿玉、玻璃品、陶器,中有若干其色黑,甚坚硬,非本地现在所能制造者,别有红色陶器残片,观其装饰,亦非现在所识之作风,尚有窑制小像,表示艺术颇为进步,既非发源于中国,亦非发源于印度,盖为发源于希腊、大夏(Bactriane)之艺术,与古撒马尔罕废墟中所得不少小像相类;世人将见其标型不属突厥,不属中国,不属印度,其中有一 Méduse 头像显然是希腊式的作风或仿希腊式的作风。除开这些陶器以外,有不少凹刻宝石,甚小,各式皆有,然

亦出希腊的或仿希腊的作风;我们在其地所得诸物中有一件,不幸仅存蜡印的痕迹,代表一个 Apollon Citha-rède 的形象,作风最纯洁,似可上溯至纪元前 4 世纪时。其他作工较劣,有代表一 Diane 形象者,有些头像与伊兰型或罗马型很相近,有动物小像,这些刻像必是起源于罗马,否则在大夏抑在和阗制作。应注意者,这些古物里面,毫无佛教的痕迹。"[42]

据杜特类考察团同斯文赫定(1895 年)以及斯坦因(1900 至 1901 年同 1906 至 1908 年)在岳特竿所得诸物审查的结果,似无证明格勒纳君所主张和阗艺术很复杂的成分中,希腊作风占优势一说之是者。中有不少物品,如非来自中国,亦具有中国作风;其他物品,令人思及印度或突厥艺术,或伊兰艺术。

古代影响表现最甚者,或者就是刻石。可是这些雕琢的宝石没有一件可以认为是希腊作品。最古之品充其量不过上溯至纪元后二三世纪时,令人想到晚代的那些制作很劣的罗马凸刻同凹刻。[43]

难题就在决定这些物件的确实来源。撰者以为有些在朴质而写实的作风中,用红玛瑙同玉髓雕琢些动物形象如野猪、山羊、象、狮类的刻石,是出自本地工匠之手(图五),可是对于花纹多少采用古代流风的刻石,则不敢断定是和阗作品。然则应该承认此类刻石是在西域以外雕琢?我们的意见以为此种假定只能适用于极少数的刻石。至若其他雕琢品,得由些负贩的雕刻匠人在和阗本地琢成;这些人或是亚洲的希腊人,或是叙利亚人,或是妫水以外的人,因为乐于旅行,或因有利可图,而远赴丝国负贩者。

除开仿古凹刻的圆形或椭圆形刻石外,尚有其他显是仿中国金属印章形式制成者。上有圆纽,下方形。形式仿中国,花纹亦仿

中国。其中有一刻石上刻一鸟，长足而张翼，绘画简单，笔画细微，一似毛笔书写之字(Yo.00159，图五)。

岳特竿出土的那些陶片，大多数是瓶子同人兽小像的碎片。世人对于和阗陶器所受希腊影响，未免言过其实。详审这些残片，很少瓶子具有一个双耳椭圆瓶，或一个长颈瓶之纯粹轮廓者。反乎是，除开显属亚洲形式者外，类多具参合形状(Yo.01 & Khot.00102，图四)。这些瓶腹颇多具有奇形人面或狮面者。

窑制的小像很多，制作几尽粗劣，在艺术方面比较中国明器中的泥俑不及远甚。有若干小猴像，姿态滑稽，仿效人类动作。

最重要的小像，不幸没有一件完全无缺者，其中却有对于古和阗人型同其衣服，供给些明确指示者。例如 Yo.0073(图一)残片，表示一女衣一种袍服(Caftan rembourré)，一短裙、一裤。与中国载籍中于阗传所说的衣服大致相同。[44]人首标型颇异。人面或方或圆，鼻高而眼大张。统观这些种型，可以令人想到位置于古丝道上沙海诸窝集中那些纯血种或混血种之混杂，迄今尚然。

岳特竿出土的窑制人首最感兴趣者，未转载入《西域考古记》中，仅见《古和阗》著录(Yo.0031，四十五图)。此首工作特别精细，所制者是一个中国女子或华蕃混血种女子的形象，头装用本地时样，以发覆额，饰以珍珠同系带。

动物里面偏重的模型，乃是颈有力而具双峰的大夏骆驼；并见有具备鞍辔的马、野猪、孔雀，以及一种幻想的动物。赫士金(J. Hackin)君曾将此物与西藏绘画中的独角麋共比较(Yo.0030B，图二)。[45]斯文赫定以为此神秘的 ekaçrūgā 乃是古代神话中的半狮半鹫怪物，我们宁取后说。[46]

有些浮雕残片比较浮雕小像制作精细，观其作风，显受犍陀罗

艺术的影响。中有一片,在印度、希腊绘式的两重拱门下,可以分辨得出一个男子吹笛,一个女子击铙钹(Yo.02,图一)。

格勒纳君误以为岳特竿出土的物品中,佛教物品完全缺乏。此处出土的物品大多数固然具有俗家性质,然斯坦因所得古物中有少数物品(图一)显然关系佛教。[47]

说明下章以前,我们对于 Ak-Terek 出土的泥雕(图八至图九),应该说几句话。诸物应是唐代以前作品,而其所受印度影响尚属明显。第八图中央之佛像,(A.T.017)表示一种特点,而此特点并在格领维兑君在亦都护城携回之一雕像中见之:[48]发与顶(uṣnīsa)皆隐于一种恰合脑盖的头巾之下。我们应忆及者,摩头罗(Mathurâ,今译"马图拉"。)国所刻最初佛像,头上亦无螺髻,初视之,好像是戴有一顶光滑贴肉的头巾,同我们现在所见的西域佛像一样。[49]

第五章(154 至 210 页)。〔多莫科(Domoko)附近之废墟〕。1906 年 9 月 22 日,斯坦因离开和阗,后在 1908 年 3 月复回此地,中间往来于大漠的两端。多莫科北边的喀答里克,在他未到以前几星期时,曾有人在其地发现些古残写本;斯坦因在此地考察了四天,发掘写本出现的那一行沙丘。他得着不少 Poṭhī,壁画残片,版上绘画、泥塑、信士奉献的小泥塔、贯钱等物。这些古物,根据钱文的年号,皆似大历(766 至 779 年)以前物。

我们所见的喀答里克壁画不幸几尽毁坏。仅存些小残片,很难知道所画的是什么事迹。假如毁坏不大,必定可能阐明和阗绘画同吐鲁番画派的关系,这种关系尚少有人研究过。[50]

有一残片里面(Kha.0029)只见一手两指执一毛笔。[51]我们以为此画全幅或者同格领维兑在大漠那边 Qyzyl 千佛洞那个有名的

画师洞中所发现的那幅画一样。[52]别一残片表示一个体格奇衰而有皱纹的 Gaṇeça(Kha.i.C.0095,图十一)。同一神像并见一木版绘画之上,惟旁有一位祈祷的乾闼婆(gandharvī)而已(Kha.ii.4,图十四)。此神在后一画中,他那四只手,有一只手拿着他例应拿的破象牙,这就是安得鲁君认为的小红萝蔔。[53]这些绘画,连同安德悦、别哲克里克两地所见的其他 Gaṇeça 神像,足以指示这个象头人身的天神之多少变更的形象,经过中亚传播中国、日本所取的路途。[54]

壁画残片中之最重要者,是一佛趺坐说法像,旁侍菩萨二人,各持一长颈小瓶(Kha.i.C.0097,图十一)。佛座下蹲伏二人,说明文字仅谓其为"怪像"。右首一人是一白须苦行的印度人;左首一人猪头而破人腹。此画隐喻者盖为来世所得善恶果报,行恶者受罪,行善者得转生为婆罗门。此种解说如果不误,则可见和阗的艺师所受此种死后果报一说之影响,与不少唐代中国绘画之苦恼的表示相类。这些地狱同来世的幻想,与奉祀地藏菩萨(Kṣitigarbha)很有关系。则在喀答里克所发现的两件壁画小残片中,见有此菩萨之锡杖(Khakkhara)同其神妙的宝珠亦无足奇(Kha.0033 & 0034)。同一处所奉祀的别一菩萨,似是观自在菩萨(Avalokiteçura)。此像在第十二图中(Kha.i.C.0054)不幸仅具上身同半面。[55]

绘画固多表示大乘教造像之一种很进化的状态,而时常参杂有中国同西藏的影响,可是塑像所受之影响尚与纪元初年佛教艺术颇相近。并且有人在若干标本中,如 Kha.i.E.0039 & Kha.ii.W.001(图十五)之类,看出是 Sâñchi 同 Bharhut 两地艺术辽远的反映。

有几个泥制的模子，是在喀答里克发现的，盖古昔用以制作浮雕同窑制偶像者(Kha.ii.0076 & ii.N.0014 图十六)。其中有一模子，是用以模制一个大型佛像的螺髻者。别一模子为一阴文小佛像，坐作手印式。

另一奇怪的发现，则在一所倒塌房屋的积土中，得着生棉同棉荚一袋。此事对于西域纺织工业史很有关系，因为此树是印度产，由是可以证明中亚诸窝集中在八世纪时，或在此时以前，业知种植棉花。尚应附带言及者，格邻维兑所刊布的那些回鹘文中，时常说到棉布。[56]

斯坦因仅在十月初间离开多莫科。他仓猝间作了些调查，表示有许多探考点之存在，可是时间不够，只好作些粗略的标志，等待将来之考察。他遵守他的习惯，务必将这些今日荒废的古迹之地形，详记在心中，并确定这些田亩居室在比较近的时代缘何放弃之理。[57]此种放弃仅因本地逐渐干涸么？或者在一定情况中必须承认有别类原因，如战争抄掠之类而使此地人民不得安居么？撰者讨论这些问题诸页，对于中亚人文地理寓有很大的关系，同他对于沙漠边界植物生长同其抵抗流沙的斗争之观察，一样重要。

第六章(210 至 269 页)。〔尼雅古迹〕。尼雅窝集北边三站，[58]沙漠里面有一群重要废迹，有一干涸的河床横断其间。这些废迹是一个古城的废址，纪元初年很繁荣，可是在三世纪末年被居民放弃。

斯坦因博士初次于 1901 年在中亚考察时，发现这个古迹，首先去作探考，得着不少纪元后数世纪间写的印度文件。是用佉卢字写的印度俗语，或写在皮上，或写在木版上。[59]木版有的是一头尖，形同刀刃一样，有的是长方形。其中有若干可将两版合在一

起,用毛绳编系,凡编系者,上面一版常有一封泥,同一个精细的阴文印迹。

这些文件经 E. Senart, A. M. Boyer, Rapson 三君研究,业已证明西域西部史中有一重要事迹:古和阗国中有不少印度侨民存在,这些侨民疑来自旁遮普,而在他们日常交际中,乃保存印度语言文字之使用。[60]

可是尼雅沙中埋藏的尚有别的文件。斯坦因博士受着他优越的本能之指导,同始终得到印度政府之帮助,终归得着些中国文件,如征发命令、旅行护照、官署公文之类,写在木札之上,这必定是中国纸未发明前所用的"简"。中有一简上写纪元后 269 年的年代。[61]

1901 年 1 月 28 日起,至 2 月 13 日止,发掘出来的房屋有十二所。虽然久已废圮,尚保存些写本、家具、坛子、残破的地毯同毛织物、玻璃器皿同金属器皿。这是一种考古学的美丽收获,斯坦因为行程所迫,不得已离开这个尚可期待不少发现的古迹,他的惋惜当然是意中必有之事。

1906 年 10 月 19 日,他重到尼雅继续考察。同五年前一样,将帐幕位置在活动沙丘里面已死的杨树桑树中间,这些树木就是十七个世纪以上表示沙中埋藏古城的标志。发掘了十二天,成绩灿然同第一次一样。掘开的废址有四十一处之多。内有一处是一个地方官吏的秘密档案库,其中文件皆属印度文,保存完好。对于以前所发现的尼雅侨民生活资料,复又增加不少。中国木简亦在很满足的部分内同时增加。[62]

现在请说艺术作品,其物分为数种,有两种最为重要:(甲)佉卢木版上之封泥印;(乙)家具、小木作物同雕刻的屋架。

泥印之使用好像仅限于印度语的诉讼文件同行政文牍。印文多表示一种凹刻或一种金属上雕刻的痕迹。我们不能在此处列举一切式样,总之,其布置同其技术令人想到岳特竿的刻石。

斯坦因在1901年所得诸印中之一印,上有一希腊女艺术神(Pallas Athena)之立像,执盾与雷(《古和阗》,图七十一;N.XV,24)。[63]其他诸印上可以辨识一个火神(Zeus),一个爱神(Eros),另一女艺术神,一个大力神(Hercule)。有若干式样好像多少直接与印度造像寓有关系。例如有一奇异的三头神(trimukha),将两个有须的半面联在一起,另有一第三首超出其上(N.XXIV,VIII,85,图二十)。[64]另有一印著者以为是北方天王Kuvlra的肖像,和阗信奉佛教时代对此天王奉祀甚虔(N.XXIV,VIII,96,图二三),但是这种考订不能说是绝对不误。印纹之中那个作开弓式的小人物,好像是一战士,可是他左手拿的不一定就是财神的财囊。这种东西在一个西域北方天王手里,同在一个印度半支迦(Pañcika)手里一样,皆出人意料之外。

有时印章模型仿自中国。其纹或是一个几何图案,或是一个形似凤凰的鸟(图二十三;N.XXIV.VIII,82)。并且在一个圆形、椭圆形或方形的范围里面,见有若干古体字。

具有印迹的木版太多,当然在尼雅地方少不了发现些石质或金属质的阴文印章。可用第二十九图来研究,其中有若干印章是指环式,疑是仿帝国时代罗马人带的指环印章而作的。

尼雅的木上雕刻所仿刻的,必是印度输入的模型。其主题是些毕钵罗(pipal)树叶形,八瓣蔷薇花形,小花形,月桂花圈形,菱形,三角形,金刚顶形。这些主题现今尚可在半遮普Kingni艺术中见之。常用的主题是一个四瓣花形,著者以为是希腊同佛教艺术

浮雕中的“紫色仙人草”。[65]反之，那个圆腹盛花的花瓶，倒是纯粹印度的作风，已在 Sâñchi 诸门上见过。

采用动物的主题比较很少。《西域考古记》(图十八)所转录的独一例子，就是一条屋架上两面刻的两对理想动物。这些神话中的动物，虽然可以令人想到 Bhârhut 同 Amarâvatî 两地装饰的动物，也好像是神秘难测的“汉代猛兽”之近亲。

木刻品中应特别注意者，就是《西域考古记》247 页转录之那个信士奉献的木塔。高约八寸，塔顶球形，中为圆柱，下为饰一四瓣花形之立体塔基。全形可以令人想到一种奉祀的阳具(linga)模样。这是在尼雅所发现之一种稀有的佛教古物。

第七章(270 至 292 页)。〔安德悦附近之古迹〕。1906 年 11 月 1 日，斯坦因复向东行，渡“大流沙”。停留 Yar-tungaz-Târîm 后，进向安德悦的废址，他在 1901 年业经到过此地。先前发掘时，曾发现些泥塑像，画在木版上一个象头神的小像，若干婆罗密字、西藏字同汉字的写本。[66]此次发掘从前未曾发掘的所在，在唐代一个堡垒旁边发现若干佉卢字的写本，同在尼雅发现的写本相类。此外斯坦因发现两根用白杨木做的奇怪柱子，显然是印度式(参看 237 页后画图七十)。最大者高逾两公尺。柱子虽大，好像是同制作栏杆的方法一样用回旋法制作的。

第八章(293 至 317 页)。〔自车尔成赴卡克里克(Tcharklik)〕。安德悦河同车尔成窝集中间的距离有六日程。这却是玄奘《西域记》所记的站数。这条路上毫无考古地点可以引起旅行家的兴趣，他在这段从来未有城市种植的地方，也未见着何种废迹。玄奘曾云：“从此东行，入大流沙，沙则流漫，聚散随风。人行无迹，遂多迷路，四远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来者聚遗骸以记之。乏水草，多

热风,风起,则人畜昏迷,因以成病,……由此屡有丧亡。”

马可波罗所记这一部分沙漠亦不足鼓动人之欢心;“全州皆是沙漠,从和阗到 Pen 也是沙漠,从 Pen 到此,无非沙漠……。”

11 月 20 日,斯坦因抵车尔成,停留两日。11 月 23 日又出发,想早到卡克里克。在道上考察两群不重要的废址,一群位置在车尔成河上,北纬 38 度 33 分,东经 85 度 55 分;一群在凹石硖(Ouach chahri)。12 月 2 日,行抵土地饶沃的卡克里克窝集,休息若干时,俾能探考斯文赫定同普日范斯基所发现之罗布泊一带的那些古迹。

第九章(318 至 345 页)。〔罗布鄯善楼兰史录〕。此章内容虽然重要,我们只能在此处录其概略。斯坦因君从格勒纳君之说,以为现在卡克里克窝集,就是马可波罗所记中世纪的罗不城。此城是东西往来的要站,位在和阗沙州一道,同拉萨吐鲁番一道的交叉点上。从西方来的商队于涉足可怕的浑塔格沙漠以前,必须在此处预备粮食饮水。著者进而调查罗布的沿革,曾考定此地就是汉代已识的古鄯善国,玄奘所记的纳缚波。

第十章(346 至 368 页)。〔罗布泊境内〕。1906 年 12 月 6 日晨,斯坦因领着一大队人畜离开卡克里克,计有骆驼二十一头,驴子三十多匹。此次探考的标的,就是密兰,1876 年普日范斯基曾标识其地有一群废迹。行两日,抵其地。斯坦因不久便知道此地的古物,同安德悦地方一样,属于两个不同的时代。最古者是三世纪时物;其他是吐蕃(西藏)占领时代之物(8 世纪同 9 世纪)。斯坦因确信这些废迹很有关系,遂决定作根本的探考。惟在着手以前,必须访问密兰北方曾经斯文赫定在 1900 年指出的另一地点。此点就是楼兰。[67]

欲赴其地，必须经过有些地方被盐块掩盖的沼泽。从前供给罗布泊水源的塔里木河流水现在止于此处。[68]斯坦因在卡克里克东北一个名称阿不旦(Abdal)的渔村发足，行历毫无人烟之地凡七日，至12月17日晚到达楼兰。未到将要发掘的废址以前，他在此动植物久已绝迹的沙漠道上，见着不少新石器时代的器具，约有一百四十件(图三十)；这种发现很重要，他毫无疑问地证明塔里木河流域在一个史前时代已有居民。诸物中有些nuclei，可以假定这些器具就是在此旅行者拾取的地方削制的。

第十一章(369至449页)。〔楼兰〕。斯坦因初见此地，就知道他已到了历史方面与尼雅诸废迹具有关系的废迹之中。可是景物不同。在尼雅一带，尚在沙漠外的屋架同屋壁，有沙丘同柽柳树林防御风来剥蚀。在楼兰一带，废迹则在粘土墩上。尚在埋藏的古物，由是易受沙漠气候之毁坏，所以斯坦因很疑惑他在此地的努力，恐将终归无用。幸而这种忧虑是白费的。

他在首先发掘的房屋里面，发现些汉文木简，汉代古钱，同尼雅木版一样的佉卢字木版。并得着一张毛毯的残片，颜色尚新鲜，定是和阗制品。更有比这些物品有价值者，他在一所破解的地板下面，发现一卷黄绢，可以说是迄于现在所见的最古货样，古代民族中的丝国人即因此著名商货而得名(L.A.I.002，图三十七)。[69]

所见傢具同雕刻的木料甚多，同在尼雅一样。其上表示所受印度或印度犍陀罗的影响始终显然，不过是有若干装饰主题好像是直接采自西方古代艺术的。就制作精粗方面说，这些作品表示一种很不同的价值。第三十四图所辑的那些物样，大多完善可惊。旋制的栏杆，尤具特别兴趣，花版亦然，其上主题或用几何图案，或用花卉图案，大概是用作格子者，同阿剌壁人所用之Moncharabiehs

一样(图三十三)。这些装饰的小木作物是否仿自旁遮普艺术？虽然古代印度所遗留的雕刻木料甚少，我们确很相信。[70]应附带言及者，西域的木栏杆，同古代柬埔寨艺术的石栏杆颇相近。

12月28日晚，斯坦因结束他的工作。翌日率领他的人伕，运载一种丰富掘获品，进向罗布泊南等待发掘的地方去。可是他在1914年又重到楼兰。他在此第二次访问中，在主要废迹之东北，发现一所汉代坟园，其中有不少棺木，里面有些青铜镜，木制兵械的模型，镶金织物的残片。[71]

第十二章(450至484页)。〔密兰古迹〕。1907年1月17日，斯坦因重到卡克里克。他的同伴休息的时候，他却在努力预备作密兰地方的探考。四天预备完竣，22日他率领一大队人伕从此欢迎旅客的窝集出发，这些人伕是从罗布种人(Lopliks)中招募而来，质言之，就是阿不旦同其他罗布泊村庄的居民。行一日，抵密兰河，河已完全冰冻。1月23日晨，结幕帐于一吐蕃旧堡前，六星期前他曾到过此地，现在又来清除发掘其废迹。

工作迄于2月11日。堡内堆积垃圾多至不可思议，这皆是千百年积聚而成的，可是斯坦因的经验知道这些积土堆中时常埋藏有足使考古学者关心的物件。所以他极端慎重地去探测搜索。这种长久而讨人厌的辛勤，兼受沙漠中干燥的冰风侵袭，可是得到报酬，发现些写在柽柳木札同纸上的西藏文字。[72]还有更珍贵者，就是一种用古体字(runiques)写的突厥语写本。[73]同时发掘出不少小件物品，如织物残片，加漆皮革制作的甲胄残片，木制器皿，陶器、军装是已。综观这些古物，可以使人想到八九世纪时，屯驻一个前线战略点，与中国边界戍兵对峙的吐蕃戍兵之日常生活，甚至最细的末节，亦一览无馀。

第十三章(485 至 547 页)。〔密兰之佛教古寺院〕。斯坦因对于他的工作进行虽然很满意,可是他极欲开始清除用 M.II 标识的一所佛寺,寺在堡之东北约一英里半,他深信必能在此寺中得着比较吐蕃占领时代一个更古时代的古物。所以他带着一部分人伕去发掘,果然发现一群泥塑的伟大佛像,不幸诸像毁坏已甚(图画一二一至一二四),此外更有一列仿犍陀罗艺术之印度波斯式小柱的柱子(图画一二〇)。这些古物皆是远在 8 世纪以前很久的作品,果不出他所料。还有更堪注意的,斯坦因在同一废迹标识 M.III 同 M.V.的地方发现两座小砖塔(图画一一九、一二五、一二六)。塔内圆壁上绘有水胶蛋白色的壁画(图四十至四十五;图画一三三至一四四)。这些壁画虽然保存未善,然而尚能剥下运至伦敦,一块一块地重新在不列颠博物院结合。

密兰壁画已在《契丹沙漠废迹》中说明,世人知之甚审,用不着在此处详述。其年代最晚不过四世纪,虽属佛教作品,可是奇类罗马统治的叙利亚与埃及 Fayyûm 城之绘画。画师为何族人,隶何国籍?有一壁画上有佉卢字三行,用墨笔写,其文曰:"此画 Tita 作,得三千 Bhammakas"。[74]斯坦因以此 Tita 是 Titus 印度语化的名称。我们对于此说,有点怀疑。这一个具有印度语尾变化的名称之画师,好像对于一个犍陀罗画师所应知道的许多事物皆不明了。他既不知道印度人缠头的样式,又不知珍珠同牌子装饰的方法。[75]他画的婆罗门,穿的是绿色同紫色的 dhôtîs,黄色的袍服。诸佛王子比丘同有翼的神人,一致着白色带蔷薇色。至若善牙太子《生经》(Viçvantara-jâtaka)中之白象,画得不好,大小亦不相称。只有锯形的树枝流露点印度影响,可也保不住是大夏派绘画中传来的。[76]又一方面可以使人惊异的,人物颇具闪种风度(sémitisme),

而其色彩鲜明，我们只能在波斯、阿美尼亚等地彩色画中见过。

节而言之，虽有佉卢字的署名，我们以为此密兰画师的原籍，好像在印度以外，疑是安都(Antioche)或亚历山大(Alexandrie)某画室养成的一个艺师。[77]他或者同那些教授和阗人仿效罗马人凹刻艺术的雕琢宝石匠人同到西域，那些人不是西方人，便是欧亚人(Eurasiens)。无论如何，著者以为他在兴都库什山南北旅行中，未见有能与密兰壁画可比之古迹，此说颇有理由。[78]因为这些壁画构成西域艺术史中的一个特别章目。他同吐鲁番、和阗、敦煌等地的绘画毫无直接关联。反之，当然可以位置在罗马、叙利亚派同埃及、希腊派范围之内。

第十四章(550至577页)。〔进向敦煌〕。2月11日斯坦因率领他的人伕回到阿不旦，在此地将寄回不列颠博物院许多箱的古物，派人送到喀什噶尔。21日复向东行。他所选择通过“沙山”的那条道路，就是许多世纪前法显、玄奘、马可波罗曾经行过的道路。此道经过罗布泊南，处库鲁克塔格(Kuruk-tâgh)阿勒腾塔格(Altan-tâgh)两山之间。这不是旅行队习惯通行的道途。此道在1860年左右因甘肃之乱遂废，后在1894年经Roborovsky，Kozlov考察团绘图，并标识其水泉诸点后，始列入欧洲地图。[79]

行程亘十七日。3月7日将近中国边境时，斯坦因初见那些古代候望台之一台，诸台现已倾圮，首先著录其存在者是Charles-Eudes Bonin君(1899年)。这些高台建于汉代，构成一种广大防御组织之连环，盖保护帝国西方边塞，以御匈奴者。沿着昔日赴西域古大道边之沙碛设置。[80]

斯坦因首先调查之第一台，在Toghraq-boulaq的东边，寻出铁器残块若干，织物残片一块，雕刻粗劣的木块若干。这些物品外貌

虽然简陋,可以使人希望中国古障塞(Lines)之探考,必能发现些有关系的古物。可是当时斯坦因不能作有条理之寻究,须待他在1907年3月11日到达敦煌后始着手筹备。

第十五至第二十章(578至790页)。〔敦煌窝集同汉代障塞〕。斯坦因选择敦煌作他考古工作根据地者,因为他想实行两种计划。先欲确定汉代在苏勒河流域建设的障塞之形状同组织,并在此目的中,将他到处所标识的古台同城墙遗迹一一发掘。后来拟在敦煌东北十二华里的千佛洞考察几星期,这是第一等考古地点,匈牙利都城的L.de Loczy教授已在1902年引起他的注意。

3月16日,斯坦因初访诸洞。他的印象很佳。他很惊异洞窟之多,同壁上岩上铭刻之众;并很叹赏那些壁画,虽然有作于六世纪者,类多保存完好。他很欢欣,决定在此地作彻底之研究,遂还敦煌。离开千佛洞以前,曾秘密调查数年前一个洞中发现的那些古写本。

占了《西域考古记》五章篇幅的汉代障塞,不在纪元前214年左右秦始皇建筑的长城之列。这条防御线始建于汉武帝在位时(纪元前141至87年)。我们赖有斯坦因的考察,现在知道古中国这个第二边塞之广袤同详图,所包括者有候望台、小堡、仓库,连同芦苇和土建筑的城墙。城墙止于诸图T.IV.标识之点,质言之,在Bech-Togharaq之东。[81]此点以西,仅有孤立的屯戍保护行旅。沙畹曾将此组织之全部,与罗马帝国在远方边塞,如非洲北部所用的防御制度,共比较。斯坦因所认识的一个军屯,可当T.XIV.标识之点,好像就是纪元前94年左右的玉门关,此关常见中国载籍记录。[82]

汉代障塞之探考,发现不少年月不难考订的中国文书。斯坦

因曾在《亚洲腹里考古记》云:[83]"气候特别干燥,所以能在这些地方采掘不少文件,所记者盖为关系纪元前后两世纪中,这些荒远边塞的历史。我在这些倾圮的候望台掘出的汉文木简,约有数百,业经博学无比的大师沙畹通解其读,其中有上溯至纪元前一世纪者。最晚者,也在纪元后二世纪中叶,这就是因为政治事变放弃边塞的时代。这些文件,类多写于木简,然亦有写在绢上,并且有少数写在最古的纸上者,皆是屯所的吏员弃置于垃圾堆中的东西。"

沙畹在他所撰考释斯坦因所得文件那部佳作里面,曾说明当时防守边徼的戍卒,在这些荒徼中所过的生活。戍卒的兵器是剑弩甲盾。[84]似难证明他们曾经用过弓。[85]敌人之来,举火为号,日间用烽,夜间用燧。有雾时骑快马报警,每十里一易骑。这些前防的军屯,有些是用屯田制度,戍卒在戍所耕种田亩,树植榆木,造砖。边塞的屯戍除尽军职外,对于往来西域的使者尚须供给宿所同食粮。

沙畹刊布的那些简书,未言这些远离乡井,谪居边徼的戍卒,处境之艰难困苦。可是三国同唐代的诗人,有时将这些苦役形诸歌咏,描写他们在荒寂无人的沙中,常来侵袭而不能见的敌人前面,所受的种种艰苦。[86]

斯坦因发掘之一台,供给的物件,中有未染色的丝绢两件,其一钤有印章,别一件著录有全件之长度同重量(T.XV.a.i.3)。所言之件,长四十尺,宽二尺二寸,任城国(山东)织。重二十五两。值六百一十八钱。沙畹云:"如此看来,我们对于 Ptolémée 撰作时代中国这类输出品之出产地、价值、重量、长度,因此可以知悉。"[87]

第二十一章(790 至 806 页)。〔千佛洞〕。探考障塞既毕,5 月

15日，斯坦因复还敦煌。一星期后移居千佛洞。

中国之有千佛洞，犹之印度之有阿然吒(Ajanṭâ)。[88]这些洞窟纵不能说是对于中国古代艺术史之直接调查的唯一根据，也可以说是最好的根据，并可对于仅具雕刻的云冈、龙门、巩县等处洞窟之沿革，供给一种丰富的征引。

这些洞窟在山腹上高下设置。除少数例外以外，皆有一长方形窟洞，洞口与洞内有廊连接，尚高大，光线可照洞内。内洞方形，洞顶作弧锥形。洞之大者内塑诸佛菩萨、沙门、金刚等像，排列同一台上。

然使游人注意者，要为壁画。诸画几尽保存完好。惟洞口诸像模糊不明。入口同入廊壁上绘的大致皆为菩萨像，或立，或坐莲台。内洞所绘事物较为复杂。壁上主画之下，绘有男女施主僧尼等像。

这些洞窟壁画虽各有不同，要可分为两类。[89]第一类为信众环绕一佛或一护法圣者像。这些“圣众”后面的背景，则为表示佛教诸天同极乐世界的景色，中有远山、莲池、云彩、宫殿、亭台。别一类则为写实画，初见之，好像绘的是本地风物，细审之，始知是些宗教故事。究为何种故事，须待斯坦因回欧洲会同沙畹、R. Petrucci 等研究这些敦煌造像以后，才能明了。

这些壁画赖有附带的题铭，大致可以考其年代。[90]可是欲识这些题铭，非得一个汉学家之助不可，所以斯坦因不敢以此难事委托他的中国书记，等待将来考订。但是根据若干具有考古学性质的痕迹，不难作一种大致的年代区别。据他说：“此类壁画最佳者，皆属唐代同后来几朝的作品，盖在此时代，此地同附近的窝集一样，曾见有一种平和繁荣时代。”至若其他壁画，尤其是入口同入廊

的壁画，据斯坦因的考订，多属宋元两代的作品，大概是古画久已磨灭，易以新者。[91]

千佛洞的塑像保存不及壁画之佳。有不少像已被人故意毁坏。其他则被不善于修理的人变更原形。一个塑像比较一个壁上绘像易被毁像者之破坏，同信徒之修理，加之千佛洞诸像是泥塑的，易于粉碎。诸像破坏尤堪惋惜者，馀存少数尚未残缺的像，作风甚美，制造亦精，有时令人想到西域那些最佳的作品。敦煌诸洞，同梵衍那及中亚其他佛教名迹一样，也有几尊伟大佛像。其中最大二像：一立佛、一睡佛，长约三十公尺。[92]

斯坦因初访千佛洞时，想到1900年王道士在一个墙壁封闭的洞中发见的那些写本。不幸此道士不在千佛洞而往别处募化去了，必须等他回来，探听确实消息。可是看守庙宇的一个年青唐古特僧人证实确有这种发现。斯坦因第二次访问时，运气较好，由王道士亲自接待。这个老道多疑，而且永远被“人神的畏惧”萦绕于心中，谈判不无困难。已而得他的汉文书记之助，始得道士信从，将所藏诸本拿几种出来作样本。等他认识这些写本就是玄奘从印度携回的佛经之译本时，则其惊喜逾恒可知。

第二十二章(807至830页)。〔墙壁封闭的佛洞〕。复又交涉，王道士才许他进入那间永远封锁，从来没有一个欧洲人疑心里面有宝库的小洞中。他在所撰的那些书籍论文中谈及这件可以纪念的事业，读的人如同阅读一种灵异民话一般。

“在这个道士暗淡的小灯光下，我睁开眼睛。看见一捆一捆的写本，无秩序地堆着，可也没有空处，高达三公尺；共占空间有十四立方公尺之多！这些写本似皆完整：原本如何堆置，现在仍是原样，毫无霉朽的痕迹。在这个小洞里面很难审察，道士许我们在一

间邻近小房内外人不能见的地方等着，他将这些捆写本陆续搬出。我首先展开的几卷，就是满布绘画的绢画布画，用绢或锦制成的供养物，连同些纸画，种种织物制成的幡幢，绣像残片等物。布画同绢画是从前做过旗幡的，卷得很好。展开一看，其上有些很美的诸佛菩萨像；有的纯出印度作风，有的仿印度式，而使合乎中国人兴趣的作品，所题年代是纪元9世纪时。

有佛经，有梵语写本，就中有一贝叶本，保藏甚佳，是为现在所识的最古本，有很多西藏语本，回鹘语本，古突厥语本，还有摩尼教徒用叙利亚字写的经文，最后的是些汉文文籍、信札、本寺帐簿等等。这些文件表示保存这些宝物的佛洞大约在纪元后一千年左右用墙壁封闭，必是预防兵燹而为此。[93]

斯坦因最完备的纪录则见《古和阗》一书中。《西域考古记》第二十二章所加的新事很少，可是他告诉读者这个有名藏书的归宿。

斯坦因虽出四十块“马蹄银”，质言之，五千卢比的巨金，然不能将所藏的一切写本绘画全数购得。他只能运走二十四箱写本同五箱绘画。留下来的，尚有一万五千至两万卷存在洞中，后来伯希和君在那里审察挑选，买去的约有三分之一。[94]至若馀下来的写本，归宿很杂。有一大部分运往北京。[95]1911年，日本著名的探考家橘瑞超君又将王道士暗地留藏的本子购得若干。最后斯坦因在1914年重到千佛洞时，运气很好，又将最后的一批装成五箱，代表不列颠博物院买去。

第二十三章(831至894页)。〔千佛洞之绘画图画版画〕。封在洞内那些卷子，画像者较之写本容易在就地作急速之挑选。这类卷子，道士不甚注意，斯坦因所以能够安然选择。《西域考古记》纪录千佛洞图像那一章，文字很长，连同附刊的不少图画(五十六

至一百〇五图),与 Petrucci 的说明(第三册 1392 至 1428 页),对于中国佛教绘画史,同其在灿烂时代所受之影响,构成一种重大贡献。[96]此外读者在安得鲁君同 F.M.G.Lorimer 女士所编之叙说目录中,可以得着不少有益报告。[97]

用些供养物幡幢图像来装饰佛教寺院的风习,在印度发源甚古。绘画、纺织、刺绣诸幡在 Bharhut 的浮雕中,已作窣堵波同圣树的装饰品,其在佛教传布初年必亦有之。可是这些飘扬的幡幢,起初只有纯粹的饰纹,如莲瓣,杂有珠宝的曲枝,花瓶等饰。自从大乘教兴,于是将佛祖诸菩萨诸天的图像加入此类幡幢之上。

千佛洞那些绢画布画疑作两用。悬在藻井同壁上,则作殿堂同昔日隐蔽洞口的房屋之装饰。若到庆会之日则取出游行。其中两面有画轻如纱的绢幡,似专作游行之用者。至若佛教之图像幡幢在唐代宗教游行中之重要作用,已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著录,兹引其文以资参考:[98]"十二月戊辰,又敕太常卿江夏王道宗将九部乐,万年令宋行质,长安令裴方产,各率县内音声,及诸寺幢帐,并使务极庄严。旦集安福门街,迎像送僧入大慈恩寺。至是,陈列于通衢。其锦彩轩槛鱼龙幢戏凡一千五百馀乘;帐盖三百馀事。先是内出绣画等像二百馀躯,金银像两躯,金缕绫罗幡五百口。宿于弘福寺。并法师西国所将经像舍利等,爰自弘福引出,安置于帐座及诸车上,处中而进。又于像前两边各丽大车,车上竖长竿悬幡,幡后布师子神王等为前引仪。又庄宝车五十乘,坐诸大德;次京城僧众,执持香华呗赞随后;次文武百官各将侍卫部列陪从。太常九部乐挟两边,二县音声继其后,而幢幡钟鼓訇磕缤纷,眩日浮空,震耀都邑。望之极目,不知其前后。皇太子遣率尉迟绍宗,副率王文训领东宫兵千馀人充手力。敕遣御史大夫李乾佑为

大使，与武侯相知检校。帝将皇太子后宫等，于安福门楼执香炉目而送之甚悦。衢路观者数亿万人。经像至寺门，敕赵公英公中书褚令执香炉引入安置殿内。奏九部乐破阵舞及诸戏于庭，讫而还。"斯坦因所携回之供养幡幢，似系模仿昔日印度栏杆同窣堵波上悬挂的旗帜，犹之那些画卷令人想到佛教时代的印度寺院前面悬挂的麻布或棉布画像。这些绘画虽然发源于辽远的印度，而在举行仪式时用之，可是绘作纯是中国风物。其中最精细者，发展的中心必定不在敦煌。所代表者应是中国著述中所言之有名的"北派"，就是李昭道所创之一派。例如第七十二图，除开主题以外，皆属中国风格，人物之有礼貌的风仪，轮廓之纤柔，若干笔画之近乎书法，皆作此种表示。[99]用绢的本色为底，更使其中所着之绀青、白、珊瑚、深青等色愈浓。又在枪头甲胄宝冠之上点着金色，而使其色愈为丰丽。[100]此画精细，色调融和，虽不知为何人所绘，要出一巧匠之手，可惜所摹原画佚而不传耳。

有一少部分幡幢经八十七图转载者，绘画粗陋，世人以为出于印度尼婆罗(Népala)贩画人之手，此说完全错误。应是摹绘多次的绘画，或是根据彩画绘成。Vredenburg 君在 Rūpam 中所刊布的那些精致小画，已足知 10 世纪同 11 世纪时印度尼婆罗艺术家到达的程度了。[101]

著者为便利这些幡幢卷子的画像研究起见，曾将其内容类别如下：

(甲)佛本行(第二十二章第四节)；

(乙)诸佛菩萨(同章第五节)；

(丙)诸天王金刚(同章第六节)；

(丁)诸天集会(同章第七节)；

(戊)佛教极乐世界(同章第八节)。

别有一第六类,内容是些图画,同描写宗教事迹的纸画版画残片(同章第九节)。

描画释迦牟尼佛在生事迹的图像,有一特殊之点,就是将这些故事画得同在中国经过一般。我们的亡友 Petrucci 曾说过,"顶礼佛母怀孕的诸天神,佛父输头陀那(Çuddhodana),佛母摩耶(Māyādevi),所着皆是中国官吏同命妇的衣服。"[102] 尚可以追加者,这些绘画不但将里面的人物,不论主角配角,改穿中国衣服,并且不顾犍陀罗艺术传来的印度造像作风,将画内风物任意着笔。比方有一绘画"离家"的幡幢,菩萨骑着一匹快马,在远远奔驰,后面卷起些彩色云雾。[103] 观者很难以为首先注意的要人,就是这个小小骑士,而在画前者,反是些睡在宫门的卫士。我们以为这种画法大致表示佛教输入前中国艺术特征;对于一幅图像绘画前之构图的动因毫不注意。在此点上,可与沙畹所刊布的一个云冈浮雕照对,浮雕里面同一事迹,著的虽是中国衣冠,而构制恰同一种犍陀罗雕刻一样。[104]

著者曾见所绘佛本行诸事迹,其中人物所服中国衣冠是一种古代衣冠,而与千佛洞 9 世纪同 10 世纪诸大壁画中,所绘诸施主之衣冠不同。应断言此类幡幢是根据较古图画摹绘者欤?设若如是,绘画原本应属何派,应在何时?不幸我们对于北魏以前的中国佛像知识太不明了,不能答复这些问题。

姑置这些关于故事的绘画不言,请言诸佛菩萨肖像,又见这些肖像多仿印度造像法则。除开极微殊异外,衣服装饰与龙门雕像上所见者相同。

画一单独佛像而无侍者施主的幡幢,为数甚稀,这些佛像几尽

作 Vitarka-mudrā 手印式，如画像上无题记，很难知为何佛。画一单独菩萨像者颇为常见。

画观自在菩萨的幡幢之多，足证这个救苦难的菩萨于 9 世纪同 10 世纪时，在此邻近西藏的区域内，颇受供养。我们应忆及者，同一时代在亚洲别一部分，安南沿岸洞阳地方，也有供养卢枳湿伐罗(Lokeçvara)的雕像。[105]

这个菩萨在幡幢中，多具人形。《西域考古记》第七十一图转载的那尊美丽观音像，好像是一件佚而不传原本的摹本，或者是仿吴道子笔法。菩萨立在散花的云端上，手中执一香炉。背光上有一小幡，与斯坦因在千佛洞所发现之幡幢完全相同。别有一画(Ch. i. 009，图七十九)，绘一观音坐柳树下。[106] 仅在大布置的肖像中见此菩萨具有一种“超人”形貌(图六十三，六十四，六十八)。在这类图中至有三头千臂。可是无一绘画表示西藏同尼婆罗艺术中习见的那样怪形。

观自在菩萨旁边，别有一位救苦难的地藏菩萨，他在敦煌诸神佛中所占位置亦高(图六十二，六十七)。Petrucci 云：“此菩萨在古代所执之任务，与观自在菩萨竞立，并且与北方佛教诸大佛分庭抗礼，不意在今日地位减削，遗忘之甚致使他的日本形象变成专适宜于岛国宗派的菩萨，未免使人惊异。”我们将来言及千佛洞的曼荼罗时，对于此菩萨别有说。

四大天王(lokapāla)的地位固不及菩萨之高，然在敦煌亦颇受人供养。幡幢上常有他们的绘像，名称曼荼罗的诸神集会中也有他们的位置。这些勇猛战士，全副武装，在常受侵略钞暴的居民眼中，应视同防御国家边塞的英武将领。敦煌所见这些护持世界的天王，其形状合印度提婆(deva)、突厥伊兰骑士、中国官员，兼而有

之。

我们从前说过有一毗沙门(vaiçravaṇa)像,必是摹仿唐代绘画的一件作品。别有此天王肖像一尊,在诸神同香烟拥护中骑白马(图七十三),亦颇感兴趣。[107]

在敦煌诸幡幢上,有时见着金刚(vajrapāṇi)(图八十六)。同在龙门一样,画得同地狱猛恶魔鬼一般,较之543年一件中国作品中刻的几近人形的神像迥乎不同。[108]

著者将若干大布置的绘画列在"诸天集会"类中,画中或有数人,或会众甚多,环绕一佛或一菩萨左右。此类绘画有一帧(Ch. 0059)上绘瞿昙(Gautama)在鹫峰(Gṛdhrakuta)之图。[109]

幡幢单绘观自在菩萨者甚多,而绘在卷子上者亦复不少。此菩萨冠上绘阿弥陀佛(Amitābha),或立,或坐莲台,会众寂静环绕左右。这类绘画风格同基督教的绘画已很相近,有时更有栏外绘画,与我们的古代画师画法相同。会众同菩萨皆绘在一淡色底上,底亦作青色,茶色或淡黄色,[110]布置均匀,规律甚严。施主时常排列,男女各在一方(图六三至六六、六八、六九)。

这些曼荼罗在造像一方面极端珍贵,可作中国西藏古像之汇集,因为世人可在其中见有代表大乘教之主要肖像,如当时中国边界同西域极东绘画雕刻者是已:佛同菩萨、四大天王、雷神、婆罗门教之男神女神、印度苦行者同沙门、天女(apsara)、诸龙、诸龙王、日、月。除神佛以外,有时加一饿鬼(Preta)作乞求式,一穷人求布施式。

我们从前说过,菩萨在此类肖像中皆未绘作怪形。但次要人物有时作异状,表示一种很近密宗之倾向。节而言之,诚如Petrucci之说,观自在菩萨之曼荼罗,连同其会众施主表示其具有"大慈

大悲菩萨之普及性质”，颇为显然。

研究图绘地藏菩萨诸画，兴趣亦复不减，此菩萨之供养早已移植于日本，在唐代的中国很风行。第六十七图表示其为“六道之主”，手执锡杖。背光左右幡条飘扬，上绘人界、饿鬼界、神界、地狱界、畜牲界、阿修罗(asura)界之小像。并位在十殿阎王之间。诸人之外有时加绘两个配角，一为沙门道明，一为金毛狮子，不知其何所取义。[111]

地藏菩萨之供养是否从甘肃输入云南？世人信有其事。惟事之确实者，此菩萨之肖像曾见云南府梵字塔之浮雕中，雕刻虽在13世纪，然在许多细节里面，尚可令人忆及敦煌之曼荼罗。[112]

中国画师偏爱绘画山水花卉、富丽装饰、灵异宫殿，今在这些伟大布置的佛教极乐世界绘画中(图五六至五九，)又得一证明。此类极乐世界就是：阿弥陀佛的净土(Sukhāvatī)，人魂再生的所在；药师佛(Bhaiṣajyaguru)的极乐世界；未次佛释迦牟尼的极乐世界；未来佛弥勒(Maitreya)的天国，这个天国的乐处，“虽言一劫(Kalpa)尚不能尽”。[113]

在斯坦因发现以前，此类古画之真者，仅见日本有之。今赖有千佛洞之资料，我们获知中国对于此类画像之造成同传布远东、西藏，甚至波斯，颇有关系，波斯输入曼荼罗时在15世纪，曾在彩画艺术中用一回教装束表现出来。[114]

我们结束本章节略以前，有一张小绢画不能不提起读者之注意，画题897年，我们以为是一件价值很高的艺术作品(图七十一)。上绘一佛(Tejaḥprabha)连同诸宿曜辰；佛坐青莲花上，举手作 vara-mudrā 手印，牛车前导，引车者似一仙人(ṛsi)。这幅精细绘画同马丁(F. Martin)君在1914年刊布的那幅中国墨画必定有其关

系，据十八世纪之一证明，此墨画盖为李龙眠仿吴道子的作品。[115]

第二十三章第九节所列之绘画图画，构成一种很复杂的集合品（图九十至九十八）。可以分为七类：（一）神佛小像，有时附有题记[116]（图九十二）；（二）画壁草图（图九十五）；[117]（三）画像粉孔范本（Ch.00159，图九十四）；（四）佛经插画（Ch.00226，图九十、九十四）；（五）画师所用绘画手印姿势样本（图九十七、九十八）；（六）咒语，法术（Ch.00209）；[118]（七）人物模型粗描（图九十六）。这些资料类多表现两重关系。首先对于技术供给不少有益的表示。复次对于中国大乘教灿烂时传布民众之方法供给不少消息。此种方法与现代在信奉基督教的西方，如 Athos 山或 Lourdes 地方所用者无大区别。

我们赖有斯坦因的考察，欧洲始获有现今认识的最古雕版（图九十九至一〇三）。这些珍贵的版画（印的像）有四纸著录年月；可当 868 年、947 年同 980 年。最古者就是一卷长十六尺内容汉译梵本（Vajracchedikā）的卷子卷头所印之像（Ch. Cüi，0014，图一百）。像为释迦牟尼佛在莲座上与其弟子须菩提（Subhūti）共话，比丘诸神随侍之图。雕刻技术颇工巧。敦煌印本保存有两个雕版人的姓名：一名雷延美（947 年），一名王文沼（980 年）。Petrucci 云："这是历史留传两个最古的雕版人姓名。"[119]

第二十四章（895 至 925 页）。〔千佛洞之织物残片同写本〕。我们已向本刊读者说过，斯坦因于 1914 年 2 月曾在罗布泊一废迹中发现些很可珍贵的汉代织物残片。[120]《西域考古记》所刊布之纺织艺术的样本（图一〇四至一二三），盖属晚代作品，自唐迄于宋初。大致以"锦"为多。有不少裁作三角形或长条，盖作制造幡幢

之用者，其馀则为装饰品或法衣之残馀。

著者曾注意到这些织物时常织有仿波斯式的图画。根据本书转载的样本审察之结果，其说果不误。然更有确实者，这些样本并且表示中国风格的痕迹，并无一件可以说是直接模仿伊兰织物制成者。[121]总而言之，斯坦因所言之影响，仅在很变化，很中国化，并适应一种佛教顾客之需要的形式中见之。像欧洲诸博物院主教堂所保存之萨珊式或波斯、东罗马式的织物上所见之纹章图案，皆未见于此类织物之中。[122]千佛洞诸绣品中既不见有上溯至于Hittite艺术中著名的“杀狮子的人”，亦不见有 Chaldée 地方之鹫，又不见有骑而行猎之国王，或引弓而发之骑士。反之，此种美丽织物上既具有活泼的曲枝花纹同几何式的图案，复参以很复杂的动物作装饰，未免使人惊异。

鸟兽图案时常作双双对峙形，同回教未流行前之波斯饰景图案相类，惟此种布置大致难免的单调，则为此类动物之很写实的形状所减轻，不论为山羊、鹦鹉或长鬣蒙古马皆然。

有一颇具特点之主题，用鸟一对作张翅欲飞式，成一圆圈形(Ch.i.0022)。是为吉蔑(Khmèr)艺术史家习见之主题。在 Aṅkor 之诸祠寺中见之，或阴雕，或薄浮雕，作门窗柜围之饰。现在经斯坦因携回之织物既有此种图案，可为将来研究柬埔寨装饰艺术中之中国影响者之一珍贵资料。

第二十四章之末二节略举携归之写本。选录之本，见第四二至一七四图。[123]有一图(第一七五图)转录 851 年之汉文碑，此碑藏同一洞中，斯坦因曾拓一本携回。

这些资料对于亚细亚研究之重要，兹略。其价值之高，业经专家承认，就中若关系唐代中亚所用的种种语言，以及窣利语古西藏

语之认识者尤为重要。汉文写本之数,合足本残本共计,几近九千。印度语写本约有八百 Pothī,中有若干《般若波罗蜜》(Prajñāpāramitā)。这些文件之研究,现尚在继续努力中。然不应讳言者劳作之大,恐非斯坦因所集合的少数著名学者所能终其事,必须尚待多年,始能见此语言寻究的新范围之广大,而今仅着手开拓云。

第二十五章(926 至 1088 页)。〔千佛洞与其壁画〕。著者在这一长章第一部分中重提前此概言(第二十一章)的千佛洞壁画。他在本章根据洞窟之次序述之。可是洞窟太多,不能作一完全编目(图画二〇〇至二三六。)

第二洞引起斯坦因之注意者,就是两躯大千手观音像(图画二〇四)。第四至第六洞画的是净土,附有采诸《阿弥陀经》(Amitāyurdhyāna-sūtra)的事迹。第八洞有一壁绘妇女一群,根据当时画壁的题记,内有 10 世纪嫁给著名曹氏[124]家人名延禄者之于阗(和阗)公主。此外又见 Tejaḥprabha 佛,同其侍者,此佛我们曾在一绢画中见之(图七十一)。

诸画多不难得其解,可是尚有须待考释者,例如有一画中大树被风吹动(图画二三四至二三六),即不知其所本。

读此章所得的印象,则在著者对于千佛洞壁画所引起之种种问题皆未遗漏。须待他人对他所言之端绪续作彻底之研求。未来的寻究,必须一方面注意敦煌壁画假借西域艺术,尤其是和阗派之成分;一方面注意中国佛教艺术对于唐、宋时代日本艺术家所发生之影响。可是还有一点必须阐明,我们以为其关系很重。此点就是中国古代绘画在敦煌艺术中之作用。此作用颇重要,世人不难揣想得到。若能将此点阐明,将来对于我们现在认识未审的华中

画派,或者可能提出若干假说。[125]

章末殿以斯坦因在敦煌所得古物目录。此目编辑很完备精细,可为我们调查技艺的一种最好的根据。

第二十六章(1089 至 1114 页)。〔瓜州〕。斯坦因于 6 月 13 日离千佛洞。调查瓜州古迹,并将他的搜集品寄存安西州署以后,迳向南行。在"教子"(译音)村附近发现一座十二、三世纪的古城,同几座废塔(图画二三七至二四〇)。嗣后访万佛峡,此处岩洞建凿与敦煌千佛洞同时,亦有壁画图画(图画 241 至 248)。[126]

第二十七章(125 至 1140 页)。〔甘肃西北边陲〕。7 月 18 日,斯坦因抵嘉峪关,是为长城同其西与敦煌北汉代所建障塞的接合点。稍停肃州(酒泉),进向南行。他在海拔 3500 至 4000 公尺的地带考察经月,未曾见着一人。他同他的印度助手 Ram Singh 所作的测量,共达面积六万馀平方公里之广。已而赴甘州,进向玉门关同安西的交界地点。

第二十八章(1141 至 1176 页)。〔进向哈密、吐鲁番〕。斯坦因现遵所谓"北道"行,此道就是 8 世纪以来代替沿罗布泊南较古通道之一道。[127]离纪元一世纪以来中国人业已认识的那个窝集哈密[128]不远,发现一座佛教古迹(Ara-tam),其建筑盖始于回鹘时代(图画二五七至二六〇)。尚有其他古迹在伊里库尔(Ilikoul)、托郭栖(Toghucha)、拉布楚喀(Lapchoug)等地觅出。

11 月 10 日,斯坦因抵吐鲁番,此处固是西域考古史中的名城,然经德国那些考察团发掘很久(1902 至 1906 年),很难期待尚有重要发现。可是他仍不免于获得些新发现品,其中就有在雅尔和屯(Yăr-khoto)购得的回鹘语写本、壁画同塑像残片,并有一件很珍异的镀金铜观音小像,显出印度作风(图六,Yh.005)。

此次斯坦因毅然决定不将他的考古学者的运气试验到底，利用他逗留吐鲁番的时间，研究此地的特别地形，此窝集的地形同塔里木河盆地相同，不过具体而微而已。他在 1914 至 1915 年间第三次中亚考察中曾接续研究，同时并作测量，终绘成大地图一幅。

第二十九章(1177 至 1229 页)。〔哈喇沙尔与其废迹〕。斯坦因于 12 月 1 日从吐鲁番发足，同月 11 日抵哈喇沙尔。又从哈喇沙尔赴硕尔楚克，探考其地的千佛洞，这是斯文赫定发现的，并经格领维兑在 1906 至 1907 年间考察过的第一等考古地点。他发掘的结果，所得古物很使他满意。古物中有壁画、木质雕刻、窑制小像同像头。其画同从前所言勒柯克君在他所刊布之《和卓》巨编中所见者相类。其中有佛教沙门、洞窟隐士、施主(图一二四至一二六)。比丘半类印度人，半类中国人。俗家则似伊兰人(Mi. XVIII, 0014)。

木刻品中最佳者要算一躯天王小像，是唐代作品，生气活泼，与寻常所见此类雕刻不同(图一二七)。别有一木版雕刻佛教故事，佛像躯干全露(同图)。

具有实在艺术兴趣者，要算斯坦因在此处千佛洞所得那些模制泥人泥物小像残片(图一二九至一三五。)这些小像同伯希和考察团从图木舒克携回法国的雕刻品[129]颇相类，有时乏人想到中国的泥俑，有时令人想到犍陀罗的窑制品。[130]此类残片多属壁上装饰，不幸没有一件完整。模制多有精者，尤其是头发与缠头巾最为精细。面部表情，无微不至。动物除象以外，制作皆甚佳好。其中有西域骑士像，头带圆锥形盔，身穿软甲，颇类十字军人之锁子甲，于人型同衣服方面之研究颇有关系。相类战士曾见俄国南部 Kertch 地方之壁画中。[131]难道说 Don 河口黑海沿岸之 Scytho-Sar-

mates 种族，同晚古徙居西域之伊兰种族或突厥伊兰种族，具有历史关系欤？无论如何，此事足堪注意。

第三十章(1230 至 1244 页)。〔进向库车〕。引导此探考家赴克里雅河干涸的三角洲之几站，可算得全程中最艰苦的几站。经过高有三十公尺的沙丘，足使牲口疲劳，而队中缺水，尤增困苦。抵喀喇墩，这是他在 1901 年曾经调查过的地点，此次重来，成绩尤其使他满意(图画三〇三至三〇七)。

第三十一章(1245 至 1283 页)。〔和阗东北〕。斯坦因于 2 月 22 日发自喀喇墩，进向多莫科。距此 1901 年业经探考之地不远，有 Farhād-Bēg-Yailaki 废迹，掘出中国五铢钱甚多，并得有刻石、婆罗密字木札、封泥印章、壁画残片。可是最珍贵的发现就是一帧木版上画的鬼子母像(Hāritī)(图十三)，虽是和阗式的作品，然而所受波斯影响显然。[132]

第三十二章(1284 至 1316 页)。〔玛杂塔格(Mazār-tāgh)〕。斯坦因离多莫科后，沿和阗河向北行，适当河水完全干涸之时(4 月)。抵玛杂塔格，在一悬岩上发现一古堡，必是吐蕃占领其地时所建。5 月初，抵阿克苏，气候渐热，沿途颇受沙漠风暴之苦。5 月 15 日抵柯坪，巡历图木舒克，此即伯希和考察团(1906)发掘之地。已而经叶尔羌于 6 月 9 日抵和阗。仍居 1901 年曾经借居之 Niāz Ḥ ākim Bēg 亭院中。

第三十三章(1317 至 1339 页)。〔自和阗赴伦敦〕。至此应还印度。可是斯坦因在其归途经行之雪地中，尚有气候与地势之测量工作，晚至 1908 年 10 月 12 日始抵 Leh。他是刚勇不畏劳苦的人，此次实在筋疲力尽。加之右足足趾冻伤，必须割治。创口痛甚而结痂又迟，须待数星期始能下抵印度平原。降诞节之次日在孟

买登舟。1909年1月20日抵伦敦。行程至是告终。

斯坦因在《西域考古记》第三册刊布有各专家之论著多篇,以作附录,若不将其列举,则此介绍之文不为完备。兹仅将其标题译录于下。

(甲)《汉文碑铭》,沙畹撰。

(乙)《斯坦因考察团发现的或获有的货币编目》,不列颠博物院职员 J. Allan 撰。

(丙)《新疆帕米尔人种学上的笺释》,不列颠博物院职员 T. A. Joyce 撰。

(丁)Ak-terek, Kara-sai, Khādalik, Mīrān, Ming-uï,《敦煌等地若干壁画泥塑样本之分析》,Arthur Church 撰。

(戊)《敦煌千佛洞佛教绘画略论》,Raphaël Petrucci & Laurence Binyon 分撰。

(一)Petrucci 原稿拟撰之绪说,据 1911 年 11 月 16 日信札转录。

(二)前人撰《敦煌壁画中之施主像》。

(三)前人撰《敦煌佛教绘画略论:诸曼荼罗》。

(四)Binyon 撰《敦煌绘画术略论》。

(己)《梵语和阗语库车语诸写本编目》,A. F. Rudolf Hoernle 撰。

(庚)《斯坦因从新疆携归之西藏文件笺释》,A. H. Franche 撰。

(辛)《斯坦因搜集品中之乐器笺释》,Gatherine Schlesinger 撰。

(壬)《西域考古记一七三图同一七四图所转载之千佛洞西藏语写本样本笺释》,F. W. Thomas 据 L. de La Vaïlèe Poussin 教授所编目录撰作。

(癸)《敦煌千佛洞西藏语题铭同佛教绘画笺释》,不列颠博物

院职员 L. D. Barnett 撰。

我们在这篇长文之末，对于斯坦因君在科学方面所建的功绩，无须赘言。这些功绩已将他位置在亚洲近代探考家的前列了。可是这篇报告结束以前，我们对于所介绍的著作表示之主要品性，不得不微贡一言。我们对于斯坦因表示敬服者，就是他在事前决定探考计划与行程之正确不误；还有他无比的坚忍，使他执行其计划到底，并且有时超过他预定目的以外；还有他善于作为的才具，他在一种结晶形式下，表示他工作成绩之不可思议的能力，细情末节无一遗漏，在在皆能引起读者之兴趣。斯坦因的著作不可不读。其叙述活泼，其说明简洁。可以说他从来未与他的大众脱离直接接触，不论是专门家或好奇者，他皆能明了其心理。读《西域考古记》始终皆使人发生同一兴趣，同一关心与读《契丹沙漠废迹》或《古和阗》等书盖同，读者切莫以为我们对于这部佳作表示的是一种普通赞词。

注：

〔1〕最近斯坦因君曾将历次中亚探考的事迹作一节略，题曰《亚洲腹里考古记》，载入《地理学报》1925 年 5、6 月刊。

〔2〕《皇家地理学会会报》第三十七册 3 页。

〔3〕《皇家地理学会会报》第二十一册，1876 至 1877 年刊 38 至 39 页。

〔4〕首先供给此窝集同联接喀什噶尔的道路之明确指示者，乃是俄国参谋部的一个军官亚历山大·郭鲁柏（Alexandre Goloubew）上尉，此人是撰此文者的近亲。可参看 1862 年刊《俄国地理学会记录》。

〔5〕见 Petermanns《地理报告》第二十六册 1880 年刊 207 页。

〔6〕《西域考古记》第一册 319 页注八。这些废迹 Henry Yule 误考订是马可波罗（Marco Polo）的罗不（Lob）古城。顾此地在蒙古人主中国以前

早已荒废,业经斯坦因证明。

〔7〕普日范斯基《中亚行记》圣彼得堡 1888 年刊本 366 页。据普日范斯基说,戈壁南方诸窝集的居民相传车尔成同和阗一带的废迹原来皆同,一部分毁于 8 世纪的回教徒,一部分毁于 13 世纪的达达。关于塔里木河右岸与 Akhtarma 村相对的"金柱城"(Koutek Chahri)者,可参看同书 367 页。此村同 G. Bonvalot 君《巴黎交趾行记》1892 年本 64 页以后所言之 Aktarma,应是一地。

〔8〕约翰逊在沙海携回的"古物"仅有茶砖(原文如此)。此茶在 Urangkach(疑是玉陇哈什)北方一哩出土的不少,曾在和阗市场售卖。参看高节(H. Cordier)《史地杂纂》第二册 142 页。

〔9〕业经 E. Senart 君在亚细亚报 1898 年 9、10 月刊中刊布。写本不全,有若干页已分别售于伯多罗斯基,寄到圣彼得堡。1897 年时 S. d'Oldenbourg 君曾在巴黎东方语言学者公会中声明将以此文公布。不知其后是否实行。

〔10〕杜特类考察团的团员。

〔11〕参看《基迈博物院考古学报》1921 年刊第 2 分册 21 至 23 页赫士金(J. Hackin)撰文。

〔12〕杜特类《亚洲高原科学考察团》(1890 至 1895 年),第三编,1898 年刊 127 页以后。岳特竿同和阗今城的距离有九公里。斯文赫定名此同一废迹曰 Borasan,可参看《亚洲经行记》第四十一章(附有图画数面)。

〔13〕参看斯文赫定《亚洲经行记》伦敦 1898 年刊本第二册 788 页以后,同第四十三章所附的图画。此地在斯坦因《古和阗》一书中名称丹丹威里克(Dandān-Viliq)。

〔14〕此上尉在 1895 年到吐鲁番。他是普日范斯基的一个旧同伴,在是年 10 月 7 日莅亦都护城,见其古迹之多,与年代之古,所受印感甚深。可参看《俄国地理学会所组织之中亚考察团的作业》(1893 至 1895 年),圣彼得堡 1900 年刊本(俄文),第一册 499 页以后。

〔15〕高节，前引书 149 页。

〔16〕斯坦因译 Kalhana's Rājataraṅgiṇī，1900 年 Westminster 刊本二册。

〔17〕参看斯坦因《随军考古报告》，Lahore1898 年刊本。

〔18〕参看《古和阗》卷首绪说。

〔19〕《古和阗》，《新疆考古详录》，牛津 1907 年刊本二册。

〔20〕参看《古和阗》卷首 8 页。

〔21〕《古和阗》卷首 8 页。

〔22〕参看 H.F.E. Visser《印度艺术的影响》印度协会刊行的讲演词，108 页以后。尤应参考滨田教授诸论文，《东方艺术上之希腊印度影响》，见《考古》第十六卷，189 页、232 页、273 页、320 页、350 页。日本古艺术上之西方影响的问题，并经伊籐、高山二博士论及。日本旅行家在斯坦因后游历和阗者，有京都僧人二人，一名渡边，一名堀，可参看《考古》第十六卷 237 页。至若涉及印度、西域、远东间艺术关系之全面问题者，可参看 A. Foucher《犍陀罗（Gandhāra）之希腊同佛教参合的艺术》，第二册第二编 644 页以后。

〔23〕斯文赫定在《亚洲沙迹中》，巴黎 1903 年本，第二十一同第二十二章，三十四至三十九图。

〔24〕参看 A. Meillet《中亚发现之印度欧罗巴系之新语言》（《月刊杂志》第十四册，1912 年 8 月 10 日刊第八十号抽印本）5 页，同 L. Auroussean 君的介绍文（《远东法国学校校刊》第十二册第九分册 148 至 151 页）。

〔25〕参看勒柯克《吐鲁番考古记》，见《亚细亚报》1909 年刊下册 321 页以后。

〔26〕按照出版之先后，其重要刊物是：格领维兑《亦都护城及其附近考古工作报告》，Munich1906 年本；前人，《新疆古佛教寺院》，柏林 1912 年本；勒柯克《和卓》，《第一次普鲁士皇家考察团所得新疆吐鲁番古物图录》，柏林 1913 年本；《中亚之晚古佛教》，1922 至 1924 年本。

〔27〕据格领维兑君说，吐鲁番的壁画作风，可以别为犍陀罗式、月支式、古

突厥式、回鹘式、西藏式等五、六种式样；关于此点可参考 A. Foucher《犍陀罗之希腊同佛教参合的艺术》第二册第二编 54 页。A. Wachsberger 君撰有若干论文，题曰《新疆美术作风之研究》，载入《东亚期刊》(第二册 424 页以后；第三册 277 页以后；第四册 12 页以后)。

〔28〕可参看前一人的《旅行东亚之科学成绩》，后一人的第三次《中亚旅行》(俄文)，圣彼得堡 1883 年版 100 页。

〔29〕二册，在伦敦 Macmillan 公司出版。

〔30〕参看斯坦因《中亚第三次探考旅行》(1913 至 1916 年)，见《地理学报》1916 年 8、9 月刊 71 页，附有地图同照像。

〔31〕《远东法国学校校刊》第十六册第五分册 82 页。

〔32〕《千佛洞》，《中国西境敦煌洞窟之古画》。绪说是 L. Binyon 的手笔；叙述文则由斯坦因自撰。1921 年伦敦 Bernard Quaritch 书店出版，附图四十八面。

〔33〕世人业已知道沙畹在斯坦因考察团诸写本之研究中很尽过力，其中有不少文件是经他译释的。可参看沙畹《斯坦因在新疆沙碛中所发现之汉文简书》，1913 年牛津版。

〔34〕Procope de Césarée(殁于 562 年)在他的《峨特人的战争》中著录有 Serinda。谓此地在“不少印度部落之前”；可参看 George Coedès，《涉及远东之希腊拉丁著作之文》，1910 年本 127 页。A. Herrmann 君最近考订此 Serinda 是 Ser 岛，质言之，锡兰(Ceylan)岛；可参看《东亚期刊》1920 至 1922 年合刊本 304 页。我们以为此种假定与我们所知关于此古代丝国的记载相违，似可不必采取。

〔35〕诸节兼有叙述的名录，乃经安得鲁(F. H. Andrews)君、F. M. G. Lorimer 女士等编辑。

〔36〕这种研究业经迪恩(Deane)上校在三十馀年前开拓，其《乌苌札记》载入《皇家亚洲协会报》(1896 页)。

〔37〕《远东法国学校校刊》第一册 321 页以后。

〔38〕参看 A. Foucher《犍陀罗之希腊同佛教参合的艺术》,143 页。

〔39〕此盖采之于伯希和君之文者,可参看他所撰的《中亚札记》,见《远东法国学校校刊》第六册 255 页以后。

〔40〕《远东法国学校校刊》第六册 261 页以后(附图)。

〔41〕参看《古和阗》,附图十三至十八。

〔42〕《亚洲高原科学考察团》第三编 128 页以后。

〔43〕从岳特竿出土的汉佉卢文同印度月支文的货币供给的年代,与凹刻同陶器之证明相符。有一罗马金钱是经杜特类在此地附近购得,上有罗马帝 Valens Imperator 的名号。

〔44〕Abel Rémusat《和阗城史》16 页。

〔45〕《基迈博物院考古学报》第二册 22 页。并参看 B. Laufer《中国泥像》第一编 120 至 123 页。

〔46〕参看《亚洲经行记》第二册 168 页,同 773 页对面之图。安得鲁君分为两类,而在《西域考古记》第一册 108 页(Yo.0015f—2)各有说明。这些残片皆是破瓶的残片。

〔47〕并参看斯文赫定《亚洲经行记》773 页又 775 页,是页转载有三尊小佛同一个铜质佛光。

〔48〕格领维兑《亦都护城考古》图四,分图一。并参看《古和阗》图八十四。

〔49〕例如 Lacknau 博物院所藏之佛头,参看 A. Foucher《犍陀罗之希腊同佛教参合的艺术》,绘画五五一。uṣnīṣa 犹言"肉色",曾在喀答里克出土的一种壁画残片之说明中提及(Kha i.C.0097),并经《西域考古记》第十一图刊布。此佛头之发是否完全剃除?

〔50〕关于残存的绢画者,可参看《西域考古记》167 页。

〔51〕《西域考古记》169 页。此图未转载,然根据说明,毫无疑义。

〔52〕参看格领维兑《新疆古佛教寺院》,1912 年本 148 页以后。

〔53〕《西域考古记》185 页。

〔54〕参看《古和阗》图七十八,同《新疆古佛教寺院》,图画五一〇。中国

佛教造像在6世纪时,业已知有一个半人半象的神王,有两像可以为证,一造于531年,一造于542年;可参看《亚细亚艺术》第二册15页沙畹说。

〔55〕调察此像代表的造像标型之来源,很有关系,好像不是从犍陀罗传来,而从别处传来。

〔56〕《亦都护城及其附近考古工作报告》1906年刊,186页以后。所说的棉布在当时为一种很流行的交易品。

〔57〕尤应参看《西域考古记》207至208页,撰者在这两页中讨论罕丁顿(Huntington)教授提出的"气候动摇"说。

〔58〕这就是玄奘的尼壤,可参看《古和阗》311页。

〔59〕可参看《古和阗》第十一章。

〔60〕此事在玄奘经过时曾引起他的注意,不过侨民已在许多世纪前早已消灭;可参看《古和阗》368页。据玄奘所记,印度侨民来自咀叉始罗(Taxila)国。关于迦腻色迦(Kaniṣka)侵略塔里木河流域之说者,可参看A.Foucher《犍陀罗之希腊同佛教参合的艺术》第二册642页。

〔61〕这些木简曾经沙畹翻译,供给属于尼雅居民的若干珍奇消息;可参看《古和阗》537至542页。例如N.XV.53简著录有一个月支国人胡支。别有一简(N.XV.61—62),说有一人仿印度式驾牛车旅行。这些文件所说的人皆有胡须;大眼,中等身材,穿的是白布衣。

〔62〕参看沙畹《斯坦因所发现之汉文简书》,牛津1913年本198至200页。

〔63〕此印供给Athena Promakhos的模型,曾经安得鲁君绘于《古和阗》同《西域考古记》的标题同封面之上。

〔64〕两半面结合一虚,并不是印度的发明,希腊远古时代早已有之。后来加一第三首,始化为印度式。

〔65〕其实四瓣花形在犍陀罗雕刻上不及五瓣野蔷薇花形之广用;可参看A.Foucher《犍陀罗之希腊同佛教参合的艺术》第一册218页。反乎是,此形在古印度艺术中颇流行,我们现在Amarâvatî大理石的雕刻

上,同 Bhumara 大自在天祠装饰中见之。

〔66〕《古和阗》第二章。

〔67〕参看斯文赫定《在亚洲沙漠中》第二十一至第二十二章。

〔68〕自 Richthofen 同普日范斯基以来,关于罗布泊实在位置的问题,不断地发生些强烈争论。斯坦因君曾在《中亚第三次探考旅行》一文(120 页以后)中,作了一种很好的说明。

〔69〕著者后在敦煌得见此种珍贵货物之其他货样。可参看沙畹《斯坦因发现之汉文简书》118 页。

〔70〕但是古印度曾用格子窗户,业经 Nasik 同 Bhâjâ 两地的雕刻证明。

〔71〕可参看《远东法国学校校刊》第十六册第五分 86 页。

〔72〕这些写本业经法兰基(A. H. Francke)博士编有目录;可参看《西域考古记》467 页。

〔73〕可参看 471 页以后。这篇文件与在 Orkhon 同 Yénisséi 流域所发现的 8 世纪两种语言碑文之字体相同。可参看《英国皇家亚洲协会报》1912 年刊 181 页以后 Vilh. Thomsen 研究之文。

〔74〕可参看 A. M. Boyer《密兰铭文》,《亚细亚报》1911 年 5、6 月刊 417 页。

〔75〕可将 M. V. 壁画中善牙太子的头冠,同 A. Foucher《犍陀罗之希腊同佛教参合的艺术》图画 396 至 397 页所转载的两个犍陀罗人的头冠共比较。

〔76〕此密兰画师画壁时,或者用了一张来自印度或大夏的绘画作蓝本,而不大了解其中的不少细情,颇亦有其可能。

〔77〕我们不能确知录有画师名称的佉卢文必是画师本人的手笔。

〔78〕但是密兰壁画同 A. Foucher 考察团最近在梵衍那(Bamiyan)拍照的绘画,其作风似有一定关系;可参看《插画报》1924 年 11 月 29 日刊同 G. Talbos 君《梵衍那窟像》,见《英国皇家亚洲协会报》1886 年刊 323 页。

〔79〕马可波罗以后,第一个欧洲人经行此道者是一个法国人,就是 1893 年

死在 Marghelam 养济院那个不幸的 Joseph Martin。可参看 Charles-Eudes Bonin《自北京赴俄属土耳其斯坦行记》,1899 至 1900 年本 174 页。

〔80〕参看上列书 172 至 173 页。

〔81〕参看第五册第七十四号图。

〔82〕可参看沙畹《斯坦因所发现之汉文简书》卷首 6 页。但据中国古籍一条史文,纪元前 103 年玉门关尚在敦煌之东。沙畹引证此文时,以为纪元前 39 年左右,玉门关应当 T.XIV.标识西边之 T.IV.标识点,约在东经七十四度上。然则此关在节节胜利以后,曾经迁徙两次矣。

〔83〕28 页。

〔84〕参看沙畹《斯坦因所发现之汉文简书》卷首 15 页。沙畹云:"我们对于剑,毫无特别参考资料,要知其形式,必须研究山东省的浮雕。"我们现在对于这件兵刃,所知较详;可参看《亚细亚艺术》第七册,Osvald Sirén《藏品中之中国艺术作品》第一图,同 B.Laufer《中国泥像》,第二十同第二十一图。中国古剑常用铜铸,大致两面有刃,刃宽而短(四十至四十五公分);剑柄小,有时柄头平。最近《远东法国学校》在清华省中某地发掘,曾得此类剑一具。若剑刃长而细,则剑为铁质。

〔85〕沙畹在《斯坦因所发现之汉文简书》第十六图云:"我们研究的简札,无一言弓者,仅在涉及胡人之二简中言之。此事似可证明汉代戍卒有弩无弓。

〔86〕参看沙畹《斯坦因所发现之汉文简书》卷首 17 页。

〔87〕《斯坦因所发现之汉文简书》卷首 16 页。

〔88〕在斯坦因考察以前,我们对此很可注意的古迹认识未审;关于此点者,可参看沙畹《十种汉文碑刻》,见《诸学者提出考古研究院之论著》,第一类,第十一册第二编,1902 年本 8 页以后。千佛洞首见普日范斯基《第三次行记》(1883 年)著录。Petermanns 报告,1884 年本

58 页曾节录其文。1900 年 Charles-Eudes Bonin 君从千佛洞携回有版画四帧，盖取之于古籍者，中有两帧题有 776 年同 894 年的年号，别有碑文一通曾经徐松录入所撰之《西域水道记》。碑题 698 年，记 366 年沙门乐傅造窟一龛事。事在前秦(351 至 394 年)建都长安时。千佛洞是近代的名称，不见此处何种碑文著录。据伯希和君说，此处古名莫高窟。此外中亚以“千佛洞”名之佛教寺院尚有数处。

〔89〕或者可以将不少绘有诸沙门像的壁画列为第三类，这类画很精工，中有数帧可以令人想到日本弘法大师同他那一宗派的作品。

〔90〕伯希和君 1908 年 3 月 26 日在敦煌致 E. Senart 君书云：“我以为有不少古迹不难考其年代。各洞几尽由一家的人世代担任保存，或由一个宗教团体担任……。所以那些施主的题铭，若著录有别处可以考见的已识之人，我们不难考出其画绘造的年代”；参看《远东法国学校校刊》第八册 503 页。

〔91〕1908 年时，伯希和君在千佛洞北边发现两洞，其壁画纯粹出西藏密宗，年代必属 13 世纪或 14 世纪。洞中藏有破碎的写本印本，汉文、蒙古文、西藏文皆有，并有若干西夏文的残片；可参看《远东法国学校校刊》第八册 529 页附注。其画曾转录于《伯希和考察团丛刊》第一册，《敦煌诸洞》，第三百四十四图至三百五十一图。颇足注意者，西藏绘画一直到近代尚保存蒙古时代或更古时代的作风。

〔92〕有一像业经普日范斯基在他的《第三次行记》中图绘其形。

〔93〕这一段是从斯坦因一篇法文论文摘录的，原文见《地理学》，第二十册，1909 年刊，148 页。关于此洞封闭的年代，据所藏汉文卷子审察的结果，无一在宋至道(995 至 997 年)以后者；可参看《远东法国学校校刊》，第八册 506 页。伯希和君云：“此洞显然是在十一世纪上半叶封闭，或者就在 1035 年左右西夏侵略时。将汉文本、西藏文本、绢画、壁衣、铜像，甚至 851 年的大碑，全混乱地搁在一处。”

〔94〕伯希和君所购之绘画，现藏 Louvre 同基迈两博物院中。诸画同不列

颠博物院收藏者一样，所题年月，上起8世纪初，下抵10世纪末。最古一张画是729年的作品。参看赫士金《基迈博物院指南目录》。佛教藏品，1923年本23页，又同一撰者，《伯希和同Bacot之考察》，见《基迈博物院考古学报》，第二分，1921年刊，9页以后，同图二图三。甚愿这些珍贵资料连同诸像题记完全刊布。

〔95〕参看L. Aurousseau撰文，见《远东法国学校校刊》，第十二册，第九分，54页，66页，88页。

〔96〕自1911年始Raphaël Petrucci即被委托研究斯坦因考察团所得那些图画。研究的成绩应该在《关于东亚之记录》中刊布。不幸此君去世致未实行。《西域考古记》所刊布的残文，就是原作仅存之稿，全稿若成，有裨于亚洲艺术史者必大。

〔97〕参看第二册937至1088页。

〔98〕Stanislas Julien译本，1853年本第六编312至313页。

〔99〕此外并转载于《千佛洞图录》，图四十五，同《契丹沙漠废迹》第一册封面。

〔100〕诸金色在《契丹沙漠废迹》封面图中亦见有之。

〔101〕Rūpam 1920年1月刊。

〔102〕参看《敦煌佛教绘画》，见《基迈博物院年报》，第四十一册（1914年）123页。

〔103〕业经《契丹沙漠废迹》第六图转载。

〔104〕《中国北部考古调查》，第一册，303页，图画二一二。

〔105〕参看Louis Finot《越南半岛之卢枳湿伐罗》，见《亚细亚研究》227页以后，同十六至二十五图。若将敦煌所发现的观自在曼荼罗（Mand-ala）画像，与Bantäy Chmàr地方同一菩萨的曼荼罗雕像对照，不无关系。

〔106〕观音坐树下是中国造像术的一种创作。这类画样的起源，应系于表示“太子入定”的肖像。参看《亚细亚艺术》，第二册，图四十三，

554 年碑。

〔107〕此类画样不常见，西域艺术中未见有相当作品。或者是唐代某中国名画之摹本。

〔108〕《亚细亚艺术》第二册图十五。

〔109〕此古型肖像必是仿印度古像者。同一内容之像并见千佛洞的一帧绣像(图一〇四)。

〔110〕有时淡色底即用绢之本色为之。

〔111〕此二名乃经赫士金同朱家健二君检出，见基迈博物院藏伯希和君从千佛洞携归之一卷子；参看《伯希和考察团之资料》，载入《基迈博物院考古学报》，第二分 17 页。

〔112〕参看本年《校刊》435 页梵字塔条。

〔113〕并参看《千佛洞图录》，图一、二、七、八、九。《西域考古记》第五十八图之弥勒佛极乐世界，乃据《弥勒成佛经》(Maitreyāvyāarana-sūtra)绘成的。关于中国、日本的弥勒之供养，可参看松本文一郎《弥勒净土论》，《远东法国学校校刊》第十一册 439 页 N. Peri 有说明。

〔114〕尤其是那些小像上绘上帝同预言人坐在诸天使、神人、人、畜之间，完全成为回教化的曼荼罗，其起源应上溯至佛教时代。

〔115〕可参看郭鲁柏《李龙眠》，见《美术杂志》，1914 年刊 295 页。

〔116〕这些小像专供无力购买绢幡的贫穷信众供养之用。因为其幅圆小而所赋救难的效力大，所以流行甚广。

〔117〕或者兼有木版雕刻。

〔118〕这些法术时常见于木版雕刻(图一〇二)。是为现在西藏尚颇流行的一种像型之最古标本，前一世纪中叶曾经 Schlagintweit 昆季研究过。

〔119〕《基迈博物院年报》，第四十一册，138 页。

〔120〕《远东法国学校校刊》第二十册第四分 170 页以后。安得鲁《斯坦因在中亚废迹中发现的中国古绢》，见 Burlington Magazine 1920 年 7、

8、9月刊。

〔121〕斯坦因别为分类之所谓窣利(Sogdien)织物,我们当然不能认其具有中国织物性质。

〔122〕例如 Catalogne 区域 Vich 博物院,同 Seres 主教堂所保存者是。可参看 Emile Mâle《法国十二世纪之宗教艺术》,1924 年巴黎本,就中"世界与天然"一章,附图二〇〇同二〇五。

〔123〕钧案:图数排印有误,原误一四二至一二四,兹据斯坦因原书改正。

〔124〕关于此点者,可参看伯希和说,见《远东法国学校校刊》,第八册 504 页。曹氏曾继张氏为瓜、沙等州州师。

〔125〕自从 1920 至 1924 年 Geuthner 书店刊行《伯希和考古图录》以后,千佛洞壁画之研究现在人人皆得为之。

〔126〕此处壁画造作计划与千佛洞同,可是技术较差。此峡首见 Roborovsky《中亚考察报告》,1893 至 1895(俄文),圣彼得堡 1900 年本,219 页著录。同一撰者曾在此地访过一群名称 Khoïr-Soubourga 的岩洞及铜塔。

〔127〕"北道"曾经玄奘走过,几至迷途。

〔128〕此窝集在纪元后 73 年左右,已为一个战略根据地。15 世纪时,并见沙哈鲁(Chah Rukh)的使臣行纪著录(一四二〇),谓此地有一壮丽的回教礼拜堂,一修道院,一佛寺;参看《西域考古记》1151 页。

〔129〕现藏 Louvre 同基迈二博物院。

〔130〕可与 John Marshall 君前在呾叉始罗所见之雕刻共比较。并参看 A. Foucher《犍陀罗之希腊同佛教参合的艺术》第二册图画三〇八至三一二。此类小像多用模子制成,然后用手工整理。

〔131〕参看 N. Kondakof, J. Tolstoï, S. Reinach 合撰《俄国南部之古物》图画一九一至一九三。

〔132〕参看 A. Foucher《佛教的圣母》,见《考古研究院记录》,1910 年刊,同 H. F. E. Visser 撰文,见《印度艺术的影响》180 页(印度协会刊)。

附:中亚佛教艺术

摘译格鲁赛(Grousset)《极东史》302至320页

我们名称之天山南路(Kachgarie),盖包括喀什噶尔吐鲁番同和阗、罗布泊等地而言,[1]这些地方在中古时代初年使用的是一种印度欧罗巴语言,[2]信奉的是佛教,流行的是印度伊兰文化。就语言一方面说,有两大语言流行境内。北方有吐火罗语,[3]另为两种方言,一种是甲种吐火罗语,流行吐鲁番一带;一种是乙种吐火罗语,流行库车一带。南方有东伊兰语,流行的地方自和阗抵于甘肃。尚有一第三种语言,属伊兰语系,名曰窣利语,[4]曾经来自窣利地方(Transoxiane)的伊兰商旅用作贸易的语言,通行至于敦煌:有一批来自康国(Samarkand)的窣利侨民,曾在7世纪初年移居蒲昌海(罗布泊)南。[5]——就宗教一方面说,天山南路自3世纪达10世纪,信仰佛教之深,与摩伽陀(Magadha)或犍陀罗无异。在此方面说,可以说是一个"新印度"。在鸠摩罗什时代(344至413年)同玄奘经行时代(629同644年)库车和阗等地曾为佛教传布的中心。当地僧人翻译大乘、小乘的梵本为吐火罗语,为东伊兰语,为汉语者不计其数。[6]库车、喀什噶尔等地习学小乘,和阗、哈尔噶里克等地习学大乘。——就物质文化一方面说,天山南路不仅受有印度的影响,而且在西方接受萨珊(Sassanide)时代的伊兰文化[7](并经伊兰输入东罗马的文化,)在东方则接受中国的文化。这些不同的文化,并在艺术范围表现出来。[8]自3世纪迄10世纪

的中亚艺术(除若干摩尼教艺术外),可以说是皆属佛教的艺术。可是其地佛教造像同时模仿的是些印度式、犍陀罗式、萨珊式、东罗马式、中国式等等模型。自从我们认识梵衍那壁画以来,曾见同一式样并在其上结合,此事不足为奇:因为 Foucher-Godard 考察团所发现的梵衍那艺术就是中亚艺术必要的导言。

和阗、密兰等地古迹

从印度赴天山南路途中第一个考古群,就是斯坦因探考的和阗诸废迹(岳特竿、[9]拉瓦克、丹丹威里克、尼雅。)[10]拉瓦克地方受犍陀罗影响最甚:塔院四围墙上泥塑的浮雕皆是菩萨立像(不幸皆无头),最堪注意的,衣褶之广博与调和,纯本希腊作风。不尽属衰微时代的犍陀罗之恶化的艺术,如世人之能想像者,且常见有灿烂时代之犍陀罗艺术。[11]斯坦因曾考定拉瓦克之窣堵波在纪元初数世纪时(东汉时)业已存在。[12]尚应附带言及者,斯坦因曾在拉瓦克、岳特竿、尼雅等处发现上溯至纪元初数世纪中罗马制作的凹刻(神道[13]驷乘)[14]其他凹刻则为东方作品(2 至 3 世纪时),中有若干上具月支战士像,而服安息、萨珊时代的武装;又发现有月支货币[15]同佉卢文字。[16]他在丹丹威里克发现的佛教壁画,乃是 8 世纪的作品,表现作风颇为繁杂。有些壁画或木版绘画,绘的是坐在灰白色叶尔羌种的马匹上之骑士,同一个骑在大夏骆驼上的人;[17]其人型虽然粗具古型,并游移于印度人同中国人之间,可是绘画全面的形式颇类伊兰式:其中的骆驼颇类若干阿剌壁写本中之骆驼。[18]丹丹威里克有一木版画,一面绘一大自在天神样的观自在菩萨,三头四臂,身蓝色,纯具印度形貌;[19]别一面绘一四臂金刚,虽然具此印度特征,然而实在绘的是一个萨珊时代人物(波斯型、高鼻、黑须、波斯王冠、绿袍、马靴)。[20]还有一幅丹丹

威里克的壁画,绘一龙女裸体浮游于一莲盘之上,这个和阗式的美女神,令人想到阿然吒相类的肖像,而其含羞之状又令人想到Vénus de Médicis。[21]

在罗布泊南之密兰,古典派的作风亦甚显然,特偏于小亚细亚画派之作风而已。[22]现据斯坦因携回不列颠博物院诸壁画残片审之,有一佛像,比丘后随,虽有印度式之微须,乃不失纯粹罗马风格(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四册,图四二);[23]有无须的神灵或天使,或有翼[24]或无翼,衣红色外套,亦得谓其来自 Pompei 者,不过这些美貌青年在其古典式的调和中,表现一种纯粹闪族或地中海东人种的憔悴而已;[25]又有相类无须之人,头戴 Phrygien 人所冠之巾,由是表现太阳神(Mithra)之形貌;[26]又有一绘式相类而绘有若干弹琵琶之乐女(地中海东或波斯之美女型,惟仿希腊式绘画头戴蔷薇冠,面容调和而表示肉感);最后有一绘画善牙太子(Vessantara,Viçvantara)同其妃 Mâdrî 之故事;妃亦具地中海东人型,携有二儿,驾一纯粹罗马式之驷马车;一贵人领白象前导,太子骑马后随,主臣二人皆参杂有印度、希腊之混合作风。[27]

伯希和君曾在喀什噶尔、库车中间之图木舒克(Tumšuk)发现些模制泥像同浮雕,希腊兼佛教式的作风亦甚显明(疑是6世纪时物)。最近 John Marshall 君所阐明的4、5世纪呾叉始罗之艺术,应为图木舒克模制泥像者艺术之所本。所制菩萨同无须的神道,印度阿离耶(indo-aryens)种有须的婆罗门、夜叉、篾戾车(mleccha)等型皆同,赖有模子,天山南路同犍陀罗一样,制作此类泥像无数[28](可参看基迈博物院伯希和陈列室诸陈列品,同赫士金之《目录指南》24页又图六,[29])。尚应附带言及者,伯希和从图木舒克携回 Louvre 博物院之多色泥塑版画制作甚美,兼具印度、中

国、希腊等地作风。[30]

库车哈喇沙尔等地古迹

库车境内诸古迹，包括有和色尔(Kīzil)、浑图拉(Kumturâ)两地之千佛洞，应以 Duldurâkur 之露天佛寺附焉，曾经格领维兑、勒柯克、伯希和君等先后调查，所表示之作风混杂亦同。绘画一方面，有犍陀罗式之婆罗门，盖直接摹仿一希腊火神者，衣褶作古式，有长翼之神灵，有微觉干枯的裸体男子，令人思及 Pompei 之画像，[31]有裸体青年，足以置之希腊瓶上而无逊色(和色尔千佛洞中之犎牛洞)，[32]有古代宴饮图，[33]悉皆附有古典派之主题(海马同美人鱼)。塑像一方面，浑图拉有一天女小像，颜色鲜明，胸部裸露；足与亚历山大城所制小像混而为一(唐代中国式 Tanagra 小像中见有希腊作风，或可以此解之)。[34]哈喇沙尔附近之硕尔楚克(Šorčuk)有一泥塑佛像，衣褶绘红色，作风纯本希腊、罗马式。[35]和色尔同硕尔楚克别有若干着色塑像或塑像残片，塑天女形，作风混杂，其半面尚不失为希腊式，然其眼目则已变为华人眼目矣；此类美妇之优丽，谓出自罗马也可，谓出自长安亦无不可。[36]另一方面，有印度式之裸像，与阿然吒诸像颇相近：[37]如舞于佛前之魔女，四大神变图，盖本未生怨王(Ajâtaçatru)故事而见于和色尔之壁画者也，[38]又如邻近一群之龙王龙女而服透明衣者，皆此类已。

复次表现有伊兰、萨珊罗马、萨珊东罗马等作风者，例如：和色尔同浑图拉之壁画，绘有印度欧罗巴型贵人像，有微须，如贵霜时代之印度时样，其馀则令人同时思及波斯之工笔画同若干东罗马之工笔画：短衣或长服，用剑带紧系于腰，着裤与靴，执短剑长矛，[39]中有数人仿安息萨珊式，而衣铁铠。[40]惟其时常类似者，

并非萨珊时代之笨重骑士,然为吾辈峨特时代最优丽的圣阔里吉思(saints Georges);[41]在和色尔名称画师洞之洞中,[42]画师曾自绘本人形象;然所表示者恰为此种伊兰贵人之一人。吾人所见者,必是库车之"阿离耶"贵族(东伊兰种或吐火罗种),所受波斯物质文化必深。[43]和色尔有若干壁画(海马洞),[44]绘有山景,中有菩萨、罗汉、天神、婆罗门、诸龙、诸魔、猎士同野兽、树上猿猴、鸟、山羊、獐等物,表示此种作风结合之密,竟使吾人初视之几不辨其为一种波斯工笔画,或一种尼婆罗,抑西藏绘画。

其东有哈喇沙尔(哈喇沙尔硕尔楚克群),斯坦因曾在其地发现些衣褶纯粹犍陀罗式的泥塑浮雕菩萨,[45]并见有用呾叉始罗、图木舒克两地所用同一模子造成之泥像,中有无须之菩萨,有须之印度欧罗巴型的婆罗门,边地之蔑戾车等等;[46]有木雕之金刚像,[47]与伯希和君携回基迈博物院者无异;[48]复有(硕尔楚克,8、9世纪时作品)马像残片,其优丽生动足以惊人:谓为萨珊罗马式之马也可,谓为唐代之马亦无不可。[49]

吐鲁番等地古迹

更东则为吐鲁番考古群(亦都护城、木头沟、别哲克里克),属7至10世纪作品,一方面曾经格领维兑、勒柯克探考过,一方面又经伯希和探考过。作风同一复杂。前在图木舒克、哈喇沙尔所见仿自呾叉始罗式而"成批"制作之"中亚式"的泥像头面,复在此处见之。[50]亦都护城(Idikutšähri,即中国之高昌,古突厥语之 Koco)有一壁画,今藏柏林博物院者,绘一妇女,衣冠皆希腊式。胜金(Sängim)诸画中有若干星宿(Naksatra)曾经格领维兑转录者,表现有希腊式之优美,印度式之柔和,中国式之绮丽。[51]又一方面在亦都护城见些诸佛菩萨之造像或壁画,间有作欧洲之坐式者,有时

纯用东罗马式，诸作皆属犍陀罗式显然。[52]又如格领维兑同勒柯克所转录之别哲克里克壁画，亦见有犍陀罗式之菩萨，其中亦有用笈多(Gupta)式者。

这些犍陀罗式同笈多式的主题，除少数变例外，大致钝重浓厚化，这是中亚艺术所固有者。[53]例如持花而飞之天女，在吐鲁番所见之绘式，如在梵衍那或库车所见者相同，皆属“中亚”画法。[54]复次在若干容貌之着色中，在各种礼服装束中，在装饰所用主题中，在在皆受中国画法影响。[55]所发生之印象则在其为一种“大陆”艺术，盖用以联络东罗马时代的希腊、罗马艺术同东亚艺术者，有时仅有主题属于印度而已。例如德国考察团携归之佛教沙门木像，[56]由其制作之坚，同微觉干枯的严格，足使吾人同时忆及东罗马之若干雕牙像，同唐人之若干造像。[57]又如亦都护城一观自在菩萨同两金刚之画像亦然；别哲克里克亦有相类之壁画，观自在菩萨旁列可怖之金刚：中亚艺术盖始而采用自在天教同密宗的模型，继而采用孔教或道教的主题，遂创造此类凶猛作战的天王金刚等型，而在唐代的中国同日本成为普及同固有之型，[58]胜金壁画中之饿鬼，亦兼具自在天教、密宗、中国等作风。[59]此外格领维兑曾在亦都护城同别哲克里克发现画马之壁画残片，马窣利种，姿势美而精力显露，斯坦因并在哈喇沙尔发现其造像。[60]

复次格领维兑、勒柯克发现摩尼教之种种壁画或绢画，其中因有白衣白冠的人物，颇易认识。[61]勒柯克携归柏林诸画，中有一画所绘信徒衣服几尽伊兰式；据勒柯克说，中绘摩尼，背有日月光，徒众围绕。[62]此类摩尼教绘画中有数帧颜色鲜明，令人直接思及阿剌壁、波斯式的工笔画。[63]有一部分花纹装饰，亦本波斯装饰作风。[64]此外不论为摩尼教或佛教，吐鲁番之回鹘画皆表现有同

一复杂的作风。其中人物,面肥鼻高,眼有时张开,有时微合,发长而黑,须黑,盖游移于地中海东人型或突阙人型的波斯人之间。例如佛教画中的中亚贵人,绘式与在和色尔所见者同,盖为一种印度、波斯武士,微须或无须,衣裳富丽,甲胄俱全。[65]其他战士见于别哲克里克绘画中者,有天王像,优丽不及前者,较为钝重,然亦全副武装,可以令人同时思及萨珊甲胄同唐人甲胄。[66]别有佛像,环绕左右之有须施主,作突厥、伊兰型,头戴平冠,驼骡后随,令人思及负贩丝绢于中国、窣利间的东伊兰或窣利商旅。[67]亦都护城附近一群壁画,上绘回鹘施主多人,[68]着大礼服,戴高冠,妇女献花,乐人仆辈旁侍,作风与摩尼教绘画同,盖波斯艺术与中国艺术直接联合,而未经印度艺术参加者。[69]《和卓》一书所转载吐鲁番地方之织物,其上饰纹,纯为萨珊式(动物对峙纹)。[70]

敦煌佛教艺术

中亚向东之最后中心就是敦煌,曾经伯希和、斯坦因先后调查过。敦煌千佛洞之绘画经伯希和携归基迈、Louvre二博物院,并经斯坦因携归不列颠博物院者,皆属8至10世纪作品,曾对吾人表示中国艺术之逐渐适应犍陀罗式、笈多式、伊兰式等式的范本。例如吾人在基迈博物院[71]所见之普贤菩萨一躯,与笈多式尚颇相近:上身裸露,体格细窕,飘带透明,手之布置同阿然吒式。斯坦因搜集诸品中有一莲花手,一执剑之文殊菩萨,一执书之文殊菩萨,其印度作风亦不弱于前。[72]基迈博物院陈列之第十八至第二十号菩萨,此印度笈多式业已华化,面部比较浓厚,透明之衣有一部分已易中国式鲜明彩色。不列颠博物院所藏那帧指示善道的观自在菩萨绢画,性质亦同。[73]在地藏菩萨种种绢画中,亦见相类华化情状,绘菩萨作比丘样,手持净瓶或宝珠(不列颠博物院同基迈

博物院藏)。[74]同一菩萨画像右臂裸露者,在此处则加袍服。并无幡幢。衣褶纯粹古式,盖经印度而联合希腊、罗马同中国之艺术者。面貌亦然,纯粹椭圆形,无须,微浓厚,表示希腊、罗马式与中国式相结合,而与印度式无关。[75]此种结合不但在无性的柔和中见之,并且在写实的能力中见之:如基迈博物院所藏729年所造垂颊而皱纹显露的迦叶(Kaçyapa)老人像,即其一例。[76]又一方面中亚既常为战场,其作战影响已与中国神道漫画的倾向相结合,创造勇猛的天王金刚型,全副甲胄,由天山南路之萨珊战士型变化为敦煌唐代战士型(可参看基迈博物院伯希和陈列室诸木像,同不列颠博物院藏诸绢画)。[77]

此类菩萨神道种种标型皆聚集于敦煌广大布置的绘画之中。[78]例如基迈博物院伯希和陈列室[79]所陈列之阿弥陀佛净土,菩萨之前有一天女舞蹈,令人同时忆及阿然吒之印度作风,同大和作风之日本绘画;主画两旁阑外绘有频毗娑罗王同未生怨王本事甚美,可是风物皆仿中国。[80]又有弥勒、药师、观自在、地藏等佛菩萨之极乐世界,环绕之人物,或为印度人,或为中国人,有时为萨珊时代人。[81]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四册六四图所转录不列颠博物院收藏的观自在菩萨极乐世界绢画,可以说是一种仙境;菩萨具千臂与一印度神道相同;面部同时表现佛教的柔和,同 Elephanta 天祠自在天神的威严;下绘诸神;左有优丽中国肖像一躯;右有一苦行人,是亦西藏工笔画中所见者也。[82]基迈博物院藏有魔众诱佛图,盖据《普曜经》着笔,诸色怪物蠢动于其中。[83]就事实言,此类天堂地狱由其布置同色彩之丰富,可以令人想到 Fra Angelico 之天堂地狱。[84]此固是彩色匠同画匠之艺术,然信仰之热烈赋予一种足以动人之性质。魔众诱佛图中有若干细节如战士

甲胄之类,盖受有伊兰之影响。[85]又如第一一〇洞壁画山中群鹿图亦足令人忆及一种波斯工笔画云。[86]

注:

〔1〕在古代同中世纪初年,质言之,在突厥人抵此以前,名其地曰"东突厥斯单",未免与时代相违。斯坦因君想去此弊,所以提出 Serindia 的名称。可是伯希和同 Alb. Herrmann 二君说过 Serinda 的名称(原名不作 Serindia),仅在 Procope 书中一见,而且时代很晚。并且此独见的名称所指的不是中亚一地,而是锡兰(阿剌壁语作 Serendîb),亦有其可能。所以我们为避免这个意义不明的名称起见,而用其地的旧称,名之曰天山南路。可参看 Herrmann 论文,见《亚洲期刊》1921 至 1922 年 10 月至 3 月刊 304 页。——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五册附有天山南路同甘肃的详图足资参考。勒柯克《中亚之晚古佛教》(1924 年)第三册 11 页同第四册叙述编 7 页,皆有天山南路考古图。库车地方专图,见第四册叙述编 11 页;哈喇沙尔地方专图,见同编 16 页;吐鲁番专图,见同编 21 页(关于吐鲁番者并可参看第三册 14 页附图)。

〔2〕有些学者如 Sigmund Feist 者,曾以中世纪时的天山南路有欧罗巴系语言存在一事,与同一时代同一地方有碧眼黄发人型,如吐鲁番地方之壁画或绘画中所表现之形貌共比较。他曾将这种中亚的印度欧罗巴人型刊在他的撰作封面:《文化》,《印度日耳曼人之本土与其发展》,1913 年刊。并参看勒柯克之《中亚晚古佛教》第三册,图一(绘画吐火罗贵人的那幅壁画)。

〔3〕应注意者,说吐火罗语的人自称曰 Arsi。应将此名与月支之 Asioi 古部落共比较么?

〔4〕有一种从窣利语转出之方言名曰 Yagnobî,今在帕米尔 Yagnob 流域尚有人操此方言,Gauthiot 曾亲赴其地调查,其报告见《考古研究院报告》1913 年刊 671 页。

〔5〕康国首领康艳典徙居蒲昌海时，在627至649年之间。可参看伯希和《沙州都督府图经及蒲昌海之窣利聚落》，见《亚细亚报》1916年刊上册111页。应注意者，在新疆发现的窣利语写本，其字母本于阿蓝语(Aram)，与萨珊时代的钵罗婆(Pehlvi)语同，可是与钵罗婆语有别。可参看Gauthiot《窣利语字母》，见《亚细亚报》1911年刊上册81页，此文并研究此种字母同回鹘字母之关系。

〔6〕尚应附带声明者，库车的梵名是Kučī。土名好像是Kūci(伯希和撰《库车阿克苏乌什之古名》，见《通报》1923年刊126页)。

〔7〕勒柯克云："应想象4世纪同5世纪时的库车居民，是一个信奉佛教而使用萨珊时代波斯文化的民族。"参看勒柯克《吐鲁番考古记》，见《亚细亚报》1909年刊第二册321页以后。复有一种伊兰新潮随摩尼教而俱来：有若干中亚摩尼教经文写以萨珊时代的钵罗婆语。

〔8〕可参看A.Wachsberger《新疆美术之研究》，见《东亚期刊》，1914年10月刊277页，1915年1月刊424页。

〔9〕岳特竿就是于阗古都，在今和阗之西七华里(沙畹撰文，见《远东法国学校校刊》1903年刊389页)。参看斯坦因《古和阗》图二十三。

〔10〕尚应附带言及者，岳特竿之古迹业经法国杜特类同格勒纳考察团标识过。可参看格勒纳《亚洲高原科学考察》，第三编128页。斯坦因之后尚有日本渡边堀考察团曾至和阗调查，可参看《考古》第十六册237页。

〔11〕斯坦因《古和阗》第二册第十四等图。

〔12〕至若尼雅古迹，已在纪元后3世纪末废始。又一方面，杜特类曾在岳特竿发现罗马金币一枚，上具Valens Imperator名号(此帝在位始364迄378年)。

〔13〕这些尼雅出土的凹刻同印章，上刻有两个女艺术神，一个大神，一个爱神，一个大力神(《古和阗》图四九同七一)。

〔14〕关于这些仿古的刻石，有一问题必须提出，就是这些刻石是否在就

地雕刻,抑从大夏、叙利亚或小亚细亚等地输入。郭鲁柏君以为和阗的刻石,大半是些旅行的匠人在和阗雕琢的,这些匠人或是亚洲的希腊人,或是叙利亚人,或是窣利人,盖因图利而赴丝国者(郭鲁柏撰《西域考古记举要》,见《远东法国学校校刊》,1925 年刊第二册)。

〔15〕《古和阗》图四九同八九。

〔16〕斯坦因在尼雅古迹所发现的印度文件(其地在今尼雅窝集之北三站),盖为纪元初三百年间物。用印度俗语,而写以佉卢文字,或写于皮上,或写于木版上。诸版证明当时和阗国内有不少移民似来自旁遮普,并保存其母国的语言文字。又在安德悦地方发现相类文件,似另有一批印度侨民侨居此地。可参看 Boyer, Rapson, E. Senart 合撰《斯坦因在新疆发现之佉卢文字》,牛津 1920 年至 1927 年本。

〔17〕《古和阗》第二册图五九。

〔18〕对于同书图六二之骑士,亦可作同一观察。

〔19〕《古和阗》第二册图六十。

〔20〕《古和阗》第二册图六一。

〔21〕《古和阗》第二册图二。

〔22〕密兰古迹同安德悦古迹皆属两个不同时代。最古者为 3 世纪时物。其馀则属 8、9 世纪吐蕃占领时物(郭鲁柏《西域考古记举要》,见《远东法国学校校刊》第二十五册 1926 年刊 517 页)。

〔23〕参看格领维兑《新疆古佛教寺院》109 页转载和色尔(Kizil)壁画中之相类作风。

〔24〕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四册图四十。

〔25〕希腊爱神亦有变为剃发的中国肥儿者,可参看勒柯克《中亚晚古佛教》第四册图十六。

〔26〕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一册,图画一三六,一三七等,520 页以后。

〔27〕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一册图画一三四等,517 页以后。可参看郭

鲁柏《西域考古记举要》,《远东法国学校校刊》第二十五册 519 至 520 页。

〔28〕斯坦因在多莫科西北之喀答里克地方发现制造烧像同浮雕之泥模数具(《西域考古记》第四册第五章 Kha.图十六。)

〔29〕同一像首柏林人种学博物院亦藏有之,可参看勒柯克《中亚文化史美术图录》(柏林 1925 年本)图画一八〇至一九一,88 至 93 页)。

〔30〕已见转载:Maybon《新疆佛教艺术》,见《装饰术》1910 年 8 月刊。

〔31〕格领维兑《佛教古寺院》141 页。

〔32〕同书 125 页。

〔33〕同书 125 页、126 页、128 页。

〔34〕勒柯克《中亚晚古佛教》第一册图三五。

〔35〕同书图三九。

〔36〕同书图二二、二七、三〇。

〔37〕格领维兑《佛教古寺院》121 页,123 页,135 页。

〔38〕同书 167 页,图画三八三。又勒柯克《图谱》82 页,图画一五七。

〔39〕《佛教古寺院》26 页、27 页、58 页;勒柯克《中亚晚古佛教》第四册图四同图五。此类壁画残片现藏柏林人种学博物院,而最具特征者,已转载于勒柯克《图谱》37 至 48 页、68 同 73 页。

〔40〕《佛教古寺院》131 页;勒柯克《图谱》68 页。——和色尔之"分舍利"图集有此类战士种种模型。参看勒柯克《中亚晚古佛教》第四册图六,又《图谱》47 至 48 页。此书出版时,获见 Ernst Waldschmidt 君之摘要佳作:《犍陀罗库车吐鲁番》(Leipzig 1925 年本)。其中十六至二十一图,曾试将库车、吐鲁番绘画中表现之各种人型作一种有条理之区别:(一)吐火罗人,(二)同鹘人,(三)西亚人。

〔41〕《佛教古寺院》189 页。

〔42〕同书 148 页。勒柯克《图谱》38 页。

〔43〕应注意者,此类希腊、罗马、萨珊作风之得达中亚,不必假道于地中

海东同伊兰。克里米亚 Kertch 地方撒儿马惕族(Sarmates)之壁画,绘有裸体有翼之小爱神,是为输出境外之罗马主题,与在新疆所见者同,并有衣铁铠而执长矛之撒儿马惕骑士,又与在库车、吐鲁番所见之波斯骑士颇相类。此种撒儿马惕族占领俄罗斯南部迄于纪元后3世纪时,曾将其仿自萨珊、希腊式之艺术传之其后诸种族如峨特族等。如此看来,中亚之接受古典派同伊兰派之作风,亦得循克里米亚达戈壁之商道(参看 Rostovzev《南俄之伊兰人同希腊人》121 页同图二十九,163 页)。可是主要影响,要为发自窣利境内。至若此伊兰化的艺术传布中亚之时代,勒柯克曾位置其灿烂时代于6世纪至8世纪之间,约在700年左右(和色尔海马洞壁画,6、7世纪时作品;画师洞壁画,6、7世纪作品,附有8世纪时之绘画;十六剑带洞壁画,7世纪时作品;浑图拉骑士洞壁画,700年左右作品;和色尔摩耶洞骑士群,700至750年间作品)。应注意者,此时代恰为萨珊文化被阿剌壁人逐出波斯而受突厥同唐人保护延存于窣利境内之时代:一种流谪域外的波斯艺术保存残喘于戈壁(Gobi)门户者约百年。

〔44〕《佛教古寺院》108 页;勒柯克《中亚晚古佛教》第四册图十。

〔45〕《西域考古记》第三册图画二九五,1198 页。

〔46〕同书第四册图一三二。

〔47〕同书第四册图一二七。

〔48〕《基迈博物院考古学报》第二册《中亚与西藏》图一,9 页。赫士金《基迈博物院目录指南》图十一,47 至 48 页。

〔49〕《西域考古记》第四册图一三六。此类硕尔楚克之同一马像,业经勒柯克转录(《图谱》176 页),并与萨珊时代浮雕之马共比较。

〔50〕《亦都护城考古报告》图一、十五、十九、二十等。勒柯克《和卓》图五四。《和卓》图三九转载吐鲁番壁画之一残片,恰与前此所言成批制作的像头与婆罗门像相同。

〔51〕格领维兑《亦都护城考古报告》图二四。

〔52〕同书图四;勒柯克《和卓》图十四甲,五三,五四。

〔53〕参看《和卓》图十七至二一。

〔54〕参看胜金之天女,见《亦都护城考古报告》152 页。

〔55〕就中可以引证大谷伯爵在吐鲁番所得之女子画像,曾经 Ssiichi Taki 教授转载于《考古》,1919 年 11 月刊,三五四号(《中国古代之民俗画》)。

〔56〕《和卓》图五六。

〔57〕参看不列颠博物院藏唐代沙门像,曾经转载于 Hobson 中国陶器第一册封面。

〔58〕参看《佛教古寺院》238 页。

〔59〕《和卓》图十四。

〔60〕《亦都护城考古报告》95 页,图画八五、八六,《和卓》图三一;《图谱》,图画七〇,60 页(勒柯克位置时代于 9 至 10 世纪间)。

〔61〕《亦都护城考古报告》58 页,《和卓》图一、三至六;《中亚晚古佛教》第二册散见。

〔62〕《亚细亚报》1909 年刊第二册 327 页。参看《和卓》图一。

〔63〕例见勒柯克《中亚晚古佛教》第二册图七乙。

〔64〕吐鲁番佛教绘画中花饰亦同。参看胜金沙门在群鸟所栖之树下向弟子说法图,见《亦都护城考古报告》124 页,图画一一六甲。

〔65〕格领维兑《佛教古寺院》240 页、311 页;勒柯克《中亚晚古佛教》第三册(1924),图十四同十八。并参看《和卓》图三十六转载别哲克里克之剃度王子图。

〔66〕《和卓》,图画十八、十九、三三。

〔67〕《佛教古寺院》274 页、参看《亦都护城考古报告》162 页,164 页,图画一五五至一五六。

〔68〕此类绘画下有回鹘文题记。Waldschmidt 在其《犍陀罗库车吐鲁番》一书中(图十六至二一)分别种型为吐火罗人、回鹘人、西亚人。并

将中亚艺术分为两个时代:一为吐火罗时代,以库车为中心,一为中国、回鹘时代,以吐鲁番为中心。

〔69〕《佛教古寺院》333 至 335 页,《和卓》,图三十至三二。参看《亦都护城考古报告》,图三一,图画三;勒柯克《中亚晚古佛教》第三册图十七。勒柯克考订诸画时代在 9、10 世纪间,回鹘帝国强盛之时。可与撒马剌(Samarra)地方同一时代之阿剌壁、波斯壁画比较(Herzfela《撒马剌绘画》柏林 1927 年本)。

〔70〕《和卓》,图五十。

〔71〕伯希和陈列室第十五号。赫士金《目录指南》46 页。

〔72〕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四册图七八、八七,同 R. Petrucci《敦煌佛教绘画》图五,插画八、图七,插画九同十。

〔73〕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四册图七一。

〔74〕赫士金《目录指南》图十。参看《基迈博物院考古学报》第二册 12 至 20 页。

〔75〕关于此点者,可参看 Curt Glaser《东亚塑像术》图七八影印之高丽所造菩萨像。

〔76〕赫士金《目录指南》47 页。具有同一作风者,可参看《伯希和考察报告》第二册一〇五图,敦煌第五十洞壁画中之比丘,同勒柯克《和卓》二七图别哲克里克,第九寺之跪地比丘;关于浮雕者,可参看《目录指南》十二图之龙门迦叶,同 Glaser《东亚塑像术》七七图之高丽造罗汉像。

〔77〕可参看《伯希和考察报告》第二册一〇六图,第三册一七三图所载敦煌第六一同第八三乙洞之壁画;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四册七二、七三、八四等图。并参看郭鲁柏《西域考古记举要》,《远东法国学校校刊》第二十五册 531 页。

〔78〕参看郭鲁柏《西域考古记举要》,见《远东法国学校校刊》第二十五册 533 页。

〔79〕参看赫士金《目录指南》34 页。

〔80〕参看《西域考古记》第四册七十四图绘佛本行幡之阑外画，其中人物皆服中国衣冠。并参看郭鲁柏《西域考古记举要》，见《远东法国学校校刊》第二十五册 530 页。

〔81〕参看《伯希和考察报告》，《敦煌诸洞》，就中如第十九乙洞，见第一册，图五二至六二。——第四六洞，见第二册，图七八、七九、一二八。——第七四洞，见第三册，图一三二。——第一一七洞，见第四册，图二〇七、二〇八。——赫士金基迈博物院《目录指南》，图八、九。

〔82〕与此相近之绢画（《西域考古记》第四册，图六三），彩色亦鲜明可爱，绘一观自在菩萨为会众环绕之图，不幸菩萨像已损坏。敦煌第六洞右壁所绘菩萨（《伯希和考察报告》第一册图五三）同第一〇二洞所绘不幸残毁的菩萨（同一《报告》第三册图一八五），优丽亦不下于前。

〔83〕相类魔型见于别哲克里克者，可参看《和卓》，图三二。同一标型已见阿然吒第一窟中，Griffiths 已转载于其书第一册图八。

〔84〕其他绘画地狱者，有和色尔、别哲克里克两地之绘画，见勒柯克《中亚晚古佛教》图九、十九。

〔85〕赫士金《目录指南》图七，39 页。

〔86〕《伯希和考察报告》第三册，图一八九。

占　婆　史

附：鄂卢梭占城史料补遗

〔法〕马伯乐　著

冯承钧　译

重刊说明

法国人马伯乐所著《占婆史》(刊《通报》·1910—1913年)是一部研究古代越南历史比较完备的书,早在一九二八年经冯承钧先生迻译,最近中华书局决定将冯先生的这一译本重印,因此把它仔细校读了一遍,除将译序稍加整理,和更正了一部分误引我国的古代文献外,并没有较多的变动。

马伯乐的《占婆史》发表后,法国人鄂卢梭又写了一篇《占城史料补遗》,(刊《河内远东法国学校校刊》第十四卷)添补了不少材料,冯先生也曾译出,原收《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续编》,现为了读者的方便,将它加上标点,附录在本书之后印出。至于占婆一名,他在这里已一律改译为占波,今仍其旧,以保持原译的面目。

陆峻岭

1956年2月25日

目　录

译　序……（179）
叙　言……（183）
第一章　土地及人民……（187）
第二章　起源……（199）
第三章　林邑……（208）
第四章　环王国及宾童龙之霸……（217）
第五章　占城……（221）
第六章……（230）
第七章……（237）
第八章……（243）
第九章……（250）
第十章……（257）
占婆诸王年表……（265）
附:鄂卢梭占城史料补遗 ……（272）

译　序

越南为古之交趾、越裳、骆越之地。汉武平南越，即隶中国版图。时其南境或抵今日承天府之隘云山，山南即史称之“徼外蛮夷”，亦即后汉末年建林邑国之占婆。林邑国疆，北起汉之象林，南迄今之平顺，约当今日安南本部之地。交州为中国郡县千馀年。至宋开宝初，州人丁部领建瞿越，始自立为国，其领土仅有古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之地，南土尚属占婆也。至李圣宗改国号为大越，略地占婆，割其三州，遂南拓地而有今之广平广治二省。黎季犛篡立，为明所灭，复为中国府州。因中官侵刻，不十年又为越人黎利所据，复建越国。至成化时，黎圣宗取占婆之三州，以为广南道，拓境愈南。清康熙中，阮氏立国安南，略并占婆仅存之地，以为靖化平顺二省，占婆遂亡。阮氏复南略南圻，北并东京，统一越国。光绪十年，脱中国藩属，沦为法国领地。法国分其国为五部：以昔之占婆今之中圻为安南；昔之交趾今之北圻为东京；以南圻为交趾支那；合柬浦寨（注：今译“柬埔寨”，下同）老挝二部，总名之曰印度支那。

综计二千年来，越南隶中国千馀年；自主之时亦近千年。自主以后，以中国文化南布占婆，古占婆所受之印度文化，逐渐消灭。则一部越南史，实一部越占交争史。质言之，中国印度文化交争史也。故欲知越南史者，不可不知占婆史。

我国史籍，昔称占婆为林邑。唐元和以后，改称环王，五代时

又改称占城，其名凡三变。但据占婆诸碑，其国始终自号占婆，未有林邑环王之号。林邑之号，或因区逵初王象林，故省称为林邑；环王似为当时王号之省译。惟占城一名，始为“占婆补罗”音义之对称。考《唐书》，环王亦名占婆，又考《西域记》名摩诃瞻波，又考《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亦名占波。则占婆、瞻波、占波、占城，实为其国名之对音。兹依名从主人之例，概名之曰占婆。其国自后汉末年建国以来，虽时为中越真腊所侵占，但其占种王朝相续不绝。至明成化六年，始夷为越南附庸。宋史以其国亡于真腊，明时占婆仅保宾童龙一地；明史尚以其国建都佛逝，皆误也。

今人之研究占婆史者，鲜有完备之书，惟马伯乐所撰之《占婆史》为较完善。原文一至四章见1910年刊通报，五至九章见1911年刊通报，十章见1913年刊通报。其书乃集中越载籍、梵、占、吉蔑诸碑等史料而成。所引史籍，固不无遗漏之文，而原稿亦不乏错误之点。但首尾完具，为今日《占婆史》空前之撰述。其辨正补辑中国史书错误遗漏之处，亦复不少。爰重译之，并校订其误，或可为整理东洋史者参考之一助也。

古之占婆既为今之安南，占婆诸州，即为越之府县。夫欲详其沿革，取越史考之，其事似甚易易。孰知有不然者，缘越国史书流通外国者甚少，四库所收，惟《安南志略》一种。私人所藏之少可知。国人之撰越南地志者，惟盛庆绂之《越南地舆图说》较详，而其间错误亦甚多。至国人所撰之越南史，多以自大之官书为蓝本，谬点尤众。在越人未脱属藩之时，国人对于越事已茫昧莫明，而今尤甚。盖自法国据有越南之后，推行其所谓“安南国语”。以罗马字传越语之音，汉文几废。余前在巴黎时，以越地汉名询诸其国之留学生，皆瞠然不能答。后在巴黎图书馆，获读《越史略》、《越史记》、

《地舆志》诸书，乃据以对照其所谓国语之译名，始略得其概。二十馀年前，曾将《越南地理汉名考》，刊诸《东方杂志》之中，顾今日国人之昧于越事，仍如故也。新撰图籍，尚有译昆仑山为“波鲁宫得罗岛”，边和为“平化”，永和为“文黑”，高平为“古邦”者。西贡附近有一地名宅郡，为越南华侨最大之城聚。乃居其地之华侨，竟不知其名，而称之曰“堤岸”，本国地图亦译其音为“绍沦”。长此以往，以讹传讹，势必以大越为“代维特”，哀牢为“爱老”，河静为“哈丁”，归仁为“基农”，衙庄为“耶特郎”。余译此书，所有特名，皆依汉名。其音有未能确定者，则暂为假定一名，附罗马字名于其下，以俟考证。1928 年 3 月冯承钧识于北京。

叙　言

占婆国自为安南攻灭以来，久不国矣。其遗种今散居柬浦寨及安南南圻一带；既乏联络，故于其过去之伟迹，亦久焉自忘。其史表乃谓其国王为阿罗（Allah）回教上帝之称遗胤，显系后人伪造，故传说多而事实少。则今日占人之为占人，从可知矣。

所可幸者，古之占婆人已将其胜败之迹，刻之于石。而与占婆通使交战之外国民族，亦将其事，或铭之于石，或记之于书。

故欲研究占婆史，自不能取材于今日占种遗民之传说及年表，应注重下记之两种材料：

（一）古占人留存之石刻文；

（二）外国民族之记载。

1. 占人石刻

首先搜集占人石刻者，不能不归功于艾莫涅（Aymonier）君。彼于1885年在安南南圻调查时，搜罗占文石刻多种。其拓本已寄藏于国立图书馆及亚洲协会。

此种石刻之文字，为占文与梵文。艾莫涅君从事于占文石刻文之研究，已译释其一种，旋于1889年又撰“《占语文法》”（Grammaire de la langue Chame）一书，1891年又于《亚洲报》（Journal Asiatique）中，就历史及语言方面，为一种占文石刻之研究。后省称占碑

至梵文石刻，同时由贝尔甘（Abel Bergaigne）君着手研究。曾刊行“《据碑文考证越南半岛之古占婆国》”（L'ancien Royaume de

Campa dana l'Indo-Chine d'après les Inscriptions.)一书。至碑文之译文甫竣,不幸作古。旋由巴尔特(Barth)烈维(Sylvain Levi)二君刊布之,名其书曰"《占婆之梵文碑志》"(Inscriptions Sanscrites de Champa)。后省称梵碑

自远东法国学校(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成立之后,其创业而兼校长之芬诺(Finot)君,即于《校刊》(Bulletin)后省称校刊第一号中,撰有"《据建物考据占人之宗教》"(La Religion des Chams d'après les Monuments)一文,附以《安南之占婆建物简明目录》(Inventaire sommaire des Monuments Chams de l'Annam),并请拉容节(de Lajonquière)君制作"《越南半岛考古地图》"(Atlas Archéologique de l'Indo-Chine)。其中有二图,专为占人古迹。艾莫涅君去后,拉容节君继之,从事考求。而远东法国学校建筑师巴尔茫结(Parmentier)君与伽尔波(Carpeaux)君,亦在广南将东阳按原文作 Dong-du'ong,考其音应为东阳,不知汉文原文是否此二字。此后凡法文以所谓安南国语字母译越语而未能考定明确者,皆附原文于其下。废址掘见碑文二种,亦经芬诺君于其"《碑铭考证》"(Notes d'épigraphie)一书中译释矣。

当 1897 或 1899 年时,据侨民巴黎(Paris)君之报告;美山在东阳东南南三十三公里有祠庙六十所,1899 年,芬诺与拉容节二君曾往调查。1902 年,巴尔茫结与伽尔波二君又往调查,经十一月之发掘,于 1903 年将所有建物发见。巴尔茫结君,因以刊布"《占人建筑之概性》"(Caractères généraux de l'architecture Chame)一书,并在《校刊》发表"《美山谷建物》"(Les monuments du Cirque de Mi-son)一文。芬诺君翻译考究之结果,于美山诸碑中,同时发见占婆诸王之《世系表》,始释利魔国(Çri Mara),终阇耶僧伽跋摩(Jaya Sinhavarman)至 1908 年,戈岱司(Georges Coedès)君又在《校刊》中刊布其"《占婆

与柬浦寨之碑文目录》”。(Inventaire des Inscriptions du Champa et du Cambodge)后省称目录

自是以后,无重要发见可以记述也。

2.外国史料

外国史籍所供给之占婆史料甚多,尤以中国之史料为富,吉蔑(Khmèrs)即真腊安南次之。爪哇亦有数种,欧洲旅行家之记述最少。除后二种史料随时引证外,兹将前三者分志于下:

(1)中国之史料

占婆之古史料,即得之于中国史书之中。中占之关系,自汉武迄宋初,已逾千年。今日吾人所称之东京,几继续隶属中国,中国既与占婆境界相接,战争不息。及大越建国,今东京中占之关系虽较前为少,然从未间断也。中国史书中此项材料之富可知。

今兹以前,利用中国史料者,固不乏其人,如基烈(de Guignes)之“《匈奴突厥蒙古鞑靼史》”,1756至58年版冯秉正(Mailla)“《中国通史》”1783年版中宋君荣(Gaubil)撰之“《南圻史传》”,皆旧著之著名者也。近来伯希和(Pelliot)君亦据贾耽路程撰“《八世纪中国赴印度两道考》”,(Deux Itinéraires de Chine en Inde à la fin du Ⅷ siècle)载于校刊已将8世纪中叶前中国史乘中占婆诸王暂定之名录列出。

顾右述诸著,为一种简略的引证。夫欲详知中国史书中之占婆事迹,非广罗史料不可。故本书所引者,正史中有《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隋书》、《南史》、《旧唐书》、《新唐书》、《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元史》、《明史》诸史。此外兼考《水经注》、《册府元龟》、《唐会要》、《五代会要》、《岭外代答》、《岭表录异》、《诸蕃志》、《文献通考》诸文。

(2)安南史料

越国继中国之后，而据有交趾，其境亦与占婆相接。越占之争亦久，越国败时少而胜时多，自北至南，渐蚀占境。至1470年，安南军入占婆国都佛逝(Vijaya)城之后，占婆王仅保有平顺一省，虚拥国名而已。则安南史乘中之战事，亦可供占婆史末一时代之参考矣。近人引用此项史料者，固亦不乏其人，第多为附带的及浅薄的叙述。兹取安南载籍中凡关于占婆之史事，皆采辑之。所采之书，为《安南志略》、《越史略》、《大越史记》、《大越史记全书》、后省称全书《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后省称纲目《西南边塞录》、《皇越地舆志》后省称地志等书。

(3)吉蔑史料

吉蔑为占婆之南邻，亦曾侵入占境，且有时统治占婆数年者也。是以《吉蔑文碑志》、不乏叙述通使及交战之文。关于此项史料，可参考余著之“吉蔑帝国”(Empire Khmèr)。关于吉蔑碑文，可参考艾莫涅君之“《柬浦寨》”(Le Cambodge)一书，及戈岱司君之“《目录》”。

由外国史料之搜辑，参以占人石刻记载，余拟合编《占国史》一书；叙述此民族之过去，及其宗教、政治、法律、风俗、艺术。第此种事业甚难，无论如何，终不免有疑点及争点在其中。兹将所有材料皆引举之，俾后之考究者，或反证者，皆有所依据也。

余僻处属地，编辑此书，极感困难。无论私人藏书如何丰富，欲求材料之完备，不能不借助于他种藏书。故余对于芬诺迈特(Maitre)、伯希和诸君之赞助，余兄亨利(Henri Maspero)之翻译中籍疑文、考狄(Cordier)与沙畹(Chavannes)二君之刊布此文于《通报》之中，皆表感谢云。

1909年12月20日马伯乐识于巴黎。

第一章　土地及人民

安南逼处山海之间，东岸海潴遍布。自南至北，南为平顺省，有海湾三。其北靖化、富安、平定、广义、广南五省，岛屿环列、小湾无数。又北承天府，及广治、广平二省，海潴相连，形如串珠。除江口外，无避风浪之所。再北之乂安、清华，海岸较良，稻田亦富。综观越南半岛东岸，海中风波甚恶，良港甚少；陆地山路崎岖，交通亦极不便。诸水流域甚狭，土地虽富，而养给之居民甚少。此即昔日占婆王国建国之所也。

中国载籍号其国曰林邑、曰环王、曰占城。据其所志，其国四时皆夏。诸蕃志上地气冬温，不识冰雪，常多雾雨，《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草木常青，《明史》卷三百二十四四时皆食生菜。《旧唐书》卷同

国无二麦，力穑者少，故收获薄。《明史》卷同有秔米、粟、豆、麻、莲、甘蔗、蕉子、椰子，《宋史》卷四百八十九以槟榔汁为酒，《旧唐书》卷同椰叶为席。《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下无茶，《诸蕃志》上或占人不饮茶，非地不产茶也。

其国有桑、棉，棉名吉贝。“其华盛时如鹅毳，抽其绪纺之，以作布。洁白与纻布不殊，亦可染成五色，织为斑布也。”《梁书》卷五十四

其高山深林甚富，有沉香、乌榄木、苏木、白藤、黄蜡。《宋史》“沉木者，土人斫断之，积以岁年，朽烂而心节独在。岁置水中则沉，故名曰沉香。次不沉不浮者曰筏香也。”《梁书》卷同

占婆之实际的富源，为地腹出产。“其国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梁书》卷同现广南固有金矿，但占婆之金多产自老挝也。越南矿产及地质图说又有银、铁、《宋史》卷同宝石。唐高祖时，其王范头黎遣使献火珠，大如鸡卵，圆白皎洁，状如水精。《旧唐书》卷同又产琥珀、《新唐书》卷同琉璃、珊瑚。《宋史》卷同

动物种类较少。森林之象，野窟之犀，今昔皆有。占人常以象运物作战；犀角亦甚宝之。亦产虎。至若1011年入贡于宋越之狮，非越南半岛之出产，或非狮而名为狮。盖观占婆吉蔑诸雕品，全不类狮。皆可证其人之不识狮也。

此外动物有黄牛、水牛，而无驴。《宋史》卷同林中产鹦鹉，631年贡于唐，李百药为之赋。《旧唐书》卷同

家畜有牛、象，其国似不产马。买马于中国。《通考》卷二十四宋常以白马赐之。《宋史》卷同

占人善航海，以渔为生，已见诸旅行家之记载。

昔日居民似不甚众。今日安南除清华义安二省外，居民不及二百八十万。占婆昔之居民，似未及此数之多。昔日居民分为占人(Chams)及蛮人；蛮人又分野人(Mlecchas)、山人(Kiratas)二种。

今日占人多类柬浦寨人。其人种原来颇难详其为何种，第就其现存之语言考之，其间固不少借用邻近诸种语言之事。顾与碑文所载之俗语，尚大致相类。似可列入“马来群岛(Malayopolynésien)统系”之中。

据占人碑文所志，中国籍文所载，其人深目高鼻，发拳色黑。《隋书》卷八十二当其未与外来血统相杂之时，其形状似如是也。男女皆以横幅吉贝绕腰以下，谓之“干曼”，亦曰“都缦”。《梁书》卷同今日占人及马来人尚衣(kama)也。冬月衣袍，《隋书》卷同贵者著革履，贱

者跣行。《梁书》卷同撮发为髻，散垂馀髻于其后。《宋史》卷同穿耳贯小钚。《梁书》卷同其浴如马来人之爱洁，以麝涂身，再涂再澡。《新唐书》卷同

当2世纪末年，占人出现于历史之时，已建立一印度王朝，或印度化之王朝。观其古碑靖化省之Vo-can碑梵文之善，可知其受印度文化之深。

印度文化既输入占婆，故占婆即用其宗教、风俗、文字、思想、政治、法律。

占婆之主要宗教，即为印度教。印度教云者，崇奉大梵天王(Brahma)、幻惑天王(Visnu)、大自在天王(Çiva)三身一体(trimurti)之教也。占人亦信奉佛教，但常与印度教相混。《校刊》卷一占人之宗教

印度之三身，此处以大自在天神居首，故碑文云："敬礼摩醯首罗(Maheçvara)、即大自在天王优摩(Umâ)大自在天王之妇"，然后始言"敬礼大梵天王及幻惑天王"，"敬礼地、风、空、五处、火"。大自在天王"为诸世界之主，其身无定，其形在语言思想之外，其体为地、水、火、风、空、日、月，而有(Içana, Bhima, Rudra, Mahadeva, Ugra, çarva, Bhavam Paçupati)诸名。辅以诸神，首数幻惑天王、大梵天王、火神、(Agni)"彼"已伏压制世界之一切阿修罗(Asuras)"。彼"为占婆国之根本"。"占婆第一国王优珞阇(Uroja)，即为商菩大神(Çambhu)所派"，"保护占婆城者"，即此神也。美山碑

占人之祀大自在天王，设像linga以奉之，像面覆以金。占人之宗教

大自在天王之妇，亦有专祠。占人名其神为婆伽婆底(Bhagavatî)，与其原有女神杨浦那竭罗(Yan Pu Nagara)混而为一。美山碑及衙庄浦那竭罗碑

大梵天王在印度本国及柬浦寨无专祀，占婆亦然。其像皆附于大自在天王祠或幻惑天王祠之中。占人之宗教

幻惑天王之祀，虽不如大自在天王之盛，尚不乏专祠可觅。有时与大自在天王合而为一，而名那罗延(Narayana)神。至幻惑天王之妇落悉密(Lakçimi)，碑文上未见其名，然祠中则间有其像也。占人之宗教又梵碑

占婆、爪哇、柬浦寨诸地之佛教，证以佛像及圆形浮雕诸品，应属大乘。但据《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云："南至占婆，即是临邑。此国多是正量。〔按即小乘之阿离耶三密栗底尼迦耶(Arya Sammiti-nikaya)，《唐云圣正量部》是也。〕少兼《有部》。"〔按即小乘之萨婆悉底婆拖尼迦耶(Sarvâstivâda - nikaya)《唐云说一切有部》是也。〕则占婆当时亦奉小乘也。

顾占人之信佛教，亦有兼信大自在天王教者。昔有大臣，同时建佛寺以祈福，又建大自在天王祠以积善；宁顺之 Glailamo 碑又有建观音(Avalokiteçvara)(占人名为 Lakçmindra Lokçvara Svabhayada)寺而首先歌赞"商菩拔陀罗首罗(Çambhubhadreçvara)"者(按此名即合 Çambhuvarman，Bhadravarman 二王及 Içvara 自在天神之名为一。)。东阳碑更据广平省(Phong Nha)古佛洞中所见之圆形徽章，又可见佛教密宗(Tantrisme)之肖像，与婆罗门教(Brahmanisme)之肖像又极相类。占人之宗教是又无怪占人之合佛教与印度教为一也。

上述者为外来之宗教。至占婆本土之宗教，仅存数种神名而已。如昔日古笪(Kuthara)即今靖化省所奉之"释利摩落陀古笪罗(Çri Maladakuthara)"神，其留存旧名之一也。占婆古之旧神，咸为婆罗门教诸神所代。如占人所祀之婆伽婆底(Bhagavati)，即其固有之浦那竭罗(Po Nagar)女神之例是也。占人之宗教

至若今日之占人，多奉回教。今日柬浦寨占人六万，皆奉回教。安南占人九万，奉回教者三分之一，而自称曰“占白尼（Chams Beni）”。占者占人，白尼者阿剌伯（注：今译阿拉伯）人宗教子弟之称。《回教世界杂志》卷一卷二然则回教输入占婆约在何年耶？据俞贝（Ed. Huber）君之说，《校刊》卷三《宋史》卷四百八十九《占城传》有“阿罗和及拔”一语，盖为阿剌伯语（Allah Akbar）之对音。《宋史》误译其意为早教它托生则回教输入占婆似在宋时。而占婆之传说亦有阿罗（Ovlah 即 Allah）浦 Pô 意为君于 1000 年至 1036 年君临（Shrî Banöy）都城之事。《回教世界杂志》卷一第考 1470 年占婆灭亡之前，无一碑文证明其事。其尤可注意者，今居安南之占人三分有二，尚信奉婆罗门教；而迁徙柬浦寨之占人，乃全奉回教。又安知非柬浦寨之回教徒为马来人所化，因以传布回教于安南欤？

占婆之神名，常与建立祠像之王名合称。如毗建陀跋摩（Vikrantavarman）之建祠则名其神为毗建陀首罗（Vikranteçvara）；诃梨跋罗建像，则名其神为诃梨灵伽首罗（Harilingeçvara）。其自在天王（Içvara）祠，昔为拔陀罗跋摩（Bhadravarman）所建，后又为商菩跋摩（çambhuvarman）所重修，则名其神为商菩拔陀罗首罗（Çambhubhadreçvara）之类是也。国王战胜，常施舍财物于神祠之中。设祠为敌人所毁，即兴修之，而建碑或刻文于像座之上，志其王名及其施舍之物。

各神祠除祠以外，尚有巨产。如被舍之居民、仓禀、村庄之类是也。故一祠之中，有僧徒，有奴婢，有乐人、舞女，有金银、宝饰，有象、牛、家畜。《梵碑》占碑

占人社会阶级，亦采用印度之四级制度，分婆罗门（Brahmanes）、刹帝利（Ksatriyas）、吠舍（Vaiçyas）、首陀罗（Çudras）四种。美

山碑毗建陀跋摩一世(Vikrantavarman I)云:"罪无过于杀婆罗门者。"占碑因陀罗跋摩二世自矜"惟以婆罗门刹帝利二种人为大臣"。美山碑其国王之以自出刹帝利婆罗门者,为例不少。美山碑顾此种阶级之分,亦不甚严。旧有之部落制度,昔尚存也。兹录马耳(A. Marre)君撰"《满者八夷及占婆》(Madjapahit & Tchampa.)"一文中所集占婆部落之故事如下:

"昔日占婆国王王宫附近,有一槟榔树;有果甚大,至期不开。国王命奴取此果下。国王破果,其中有儿甚美,遂名之曰罗阇浦克龙(Radja-Po-Klong),命人乳哺之。儿拒不食。时国王有一五色牝牛,又命取牛乳哺之。儿乃食。是以占婆之人,不杀不食牝牛。浦克龙长大,妻国王之女,继王其国,而建一大城于七陵之上,而名其城曰波耳(Bal)。"又有一故事相类,惟以椰子易槟榔耳。

是为占婆两大部落之神话的起源。兹二部落时争战,时联姻。槟榔部落主南方之宾童龙(Panduranga)椰子部落据北方。

占人古俗虽"贵女贱男",《南齐书》卷五十八但自印度文化输入之后,王位遂依印度之习,父死子继。子以嫡出者为贵。

王太子号为瑜婆罗阇(Yuvaraja)。继承之先,须由大人会议认可。今柬浦寨此俗尚存如国王之势强,无嗣子时亦得以外族王子为嗣王。篡位者亦引大人会议之认可为重,惟以兵力夺位者则不然也。如国王欲立其爱子,则于生前禅位,然亦不免有为其族人所废之事。

新王即位之日,即有王号 Abhisekanama。死者亦有谥号。即位之礼,不常举行于即位之时,如阇耶波罗密首罗跋摩二世(Jaya Parameçvaravarman Ⅱ.)即位于 1220 年,其礼于 1227 年始举行;又如阇耶僧伽跋罗(Sinhavarman)"索位"于 1265 年,至 1277 年始举行即

位典礼，而有因陀罗跋摩六世(Indravarman Ⅵ)之王号。美山碑

占婆国君之侍臣，有刹帝利、婆罗门、博士、太史、仪师。美山碑每听政子弟侍臣皆不得近之。《晋书》卷九十七王每日午坐禅，官属谒见膜拜一而止。白事毕，复膜拜一而退。或出游看象采猎观渔，皆数日方还。近则乘软布兜，远则乘象，或乘一木杠，四人舁之。先令一人持槟榔盘前导，从者十馀辈，各执弓箭刀枪手牌等。其民望之膜拜一而止。日或一再出。每岁稻熟，王自刈一根，从者及群妇女竞割之。《宋史》卷四百八十九

王之内宫，有后妃、嫔妇、歌女、舞女甚众。王死有遵印度风从殉之例。美山碑

据《马可波罗(Marco Polo)游记》1285年，彼"游此国之时，王有子女三百二十六人，其成人可以执军器者百五十人"。"国中女子王未见者不能适人，王欲之即以为妇，否则给资嫁之。"

"每夕唯王升床而卧，诸臣皆寝于地。亲近之臣见王即胡跪作礼，疏远者但拱手而已。"《宋史》卷四百八十九

王权之表征为"伞"。若云"独伞御国"，美山碑即言其为王也。其色白。梵碑王服圆金冠，《校刊》卷五《南齐书》所谓"天冠如佛冠"，即指此也。身被黑色或绿色金花缨络以系之衣。《校刊》卷五"足蹑革履，时服锦袍"。《隋书》卷八十二其项胸指腕皆有宝饰。衔庄浦那竭罗碑

其王专制，有生杀任免之权。国之"尊官有二：其一曰西那婆帝；其二曰萨婆地歌。属官分三等：其一曰伦多姓；次歌伦致帝；再次乙他伽兰。"《隋书》卷八十二

"其王或以兄为副王，或以弟为次王。设高官凡八员，东西南北各二，分治庶事。别置文吏五十馀员，分掌资储宝货等事。"《宋

史》卷四百八十九

其国划为三区或四区。《宋史》云，南曰施备州，西曰上源州，北曰乌里州。阿摩罗波胝(Amaravati)为其北区，按即《明史》之阿木(误作本)喇补诸蕃志之乌马拔今之广南省也。以因陀罗补罗(Indrapura)为都会，今之东阳(Dông-du'o'ng)废城是也。《水经注》引江东旧事所记林邑都城，似即此城。卷三十六又有僧伽补罗(Sinhapura)港，应亦为《水经注》卷三十六之大占海口及林邑浦。馀见美山碑

毗阇耶(Vijaya)为其中区，今之平定省也。都会名亦同，即史之"佛逝"、"佛誓"、"阇盘"，在富家多江上。地志卷一自纪元1000年以来，即为占婆之新都。有港，中国史书名"尸咧皮奈"、"设皮奈"、"毗尼"；安南史书名"尸耐"、"皮耐"。今还原为 Çri Vinaya，未敢以为无误也。

宾童龙(Panduranga)为其南区。土人名其地为 Panran，安南人译为藩笼，今日平顺潘郎(Phan-rang)二省之地也。其都会毗罗补罗(Virapura)，一名罗阇补罗(Rajapura)曾一度为占婆之首都。地在今之潘郎城附近。此区最大，古笪罗(Kauthara)一地附焉。此地即史之古笪，今之靖化省也。不知何时别成一区。其都会为杨浦那竭罗(Yanpunagara)城。

区以下之区域，据碑文有 pramana 与 vijaya 之别。前者或为行政区域之称，后者或为封建采地之号。考《诸蕃志》，占城之属国，有旧州、乌丽、日丽、越里、微芮、宾瞳龙、乌马拔、弄容、蒲罗、甘兀、亮宝、毗齐、诸名。今惟知宾瞳龙即宾童龙，乌马拔即阿摩罗波胝，毗齐即毗阇耶或佛逝，此外未详。又据碑文，其行政区域有 Sipakhya, Thu, Ulik, Vuyar, Jriy, Traik. 诸名。今为何地，亦待考也。

当诃梨跋摩三世(Harivarman Ⅲ)之时，占婆"所统大小州三十

八，不盈三万家。其国无城郭，有百馀村；村落户三五百或至七百。亦有县镇之名。”《宋史》卷四百八十九又据《明史》卷三百二十四云，占城“国所有土地本二十七处，四府一州二十二县。”四府盖指四区，一州疑指都会，明史所称之新州（Vijaya）是也。又据《隋书》，卷八十二“外官分为二百馀部，其长官曰弗罗，次曰可轮，如牧宰之差也”。官吏“无资俸，令其所管土俗资给之”。《宋史》卷四百八十九

占婆诸王，大致多为好战之王。范文时有众四五万。《晋书》卷九十七制蓬峨时兵数更众。8世纪时王有卫兵五千。《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下占婆之兵几尽为步队。至1171年始，有闽人教之“习骑射。”《宋史》卷四百八十九，但《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云：“王出则列象千头，马四百匹，分为前后。”又五代会要卷三十云：“乘象马，”则昔亦有马也。其兵器用“弓箭刀槊，以竹为弩，傅毒于矢。”《隋书》卷八十二“以藤为甲。”《旧唐书》卷同战“建旗鼓”、元史卷二百一十“吹海螯为角”。南齐书卷五十八“战则五人为甲，走则同甲皆坐”。《通考》卷二十四舟师有“楼船”。《宋书》卷九十七

领军者号大队主（Mahasenapati）。队主，（Senapati）委质于王，誓为死战。平定之 An-Thuân 碑“主军卒者二百馀员，皆无月俸。胜兵万馀人，月给粳米二斛，冬夏衣布各三匹至五匹。”《宋史》卷同

自范文以来，始起城池。《南齐书》卷同又《水经注》卷三十六《水经注》卷同引林邑记述区粟城似在今富春（Huế）附近之制曰：“其城周围六里一百七十步，东西度六百五十步，砖城二丈。上起砖墙一丈，开方隙孔。砖上倚板，板上五重层阁；阁上架屋，屋上架楼。楼高者七八丈，低者五六丈。城开十三门。”又据《隋书》，卷八十二“以砖为城，蜃灰涂之。”又有“木城起楼棚，立回回三梢炮。”《元史》卷二百一十此外《水经注》所引江东旧事所志林邑都城之制，亦可参考也。《水经注》卷三十六

占婆人民应资给官吏,《宋史》卷同服徭役。美山碑以地之所出纳一部于封君,一部于国王。或由国王转施神祠。美山碑神祠不纳赋税。东阳碑"民获犀象,皆输于王。"《宋史》卷同"山多香木,每岁官监民入山斫香输官,谓之身丁香。如中国身丁盐税之类。纳足听民贸易。商舶到其国,则差蕃官折黑皮为策,书白字钞物数,监盘上岸,十取其二,外听交易。"《诸蕃志》卷上

其司法制度今无遗文可考。但据碑文,没收财产及丧失自由,应为刑罚之一种。负债为奴之制,亦与前此柬浦寨老挝相同。入狱者,"施枷锁。小过以四人拽伏于地,藤杖鞭之,二人左右更互捶扑,量其或五十六十至一百。当死者,以绳系于树,用梭枪舂喉而诛其首。若故杀劫杀,令象踏之,或以鼻卷于地,象皆素习,将刑人即会豢养之,以数谕之,悉能晓焉。犯奸者,男女共入牛以赎罪。负国王物者,以绳拘于荒塘,物充而后出之。"《梁书》《诸蕃志》《宋史》《通考》卷同

人民生活与其风俗,中国记述可资参考者颇多。"嫁娶必用八月,女先求男,由贱男而贵女也。"《梁书》卷同"每有婚媾令媒者赍金银钏,酒二壶,鱼数头,至女家。于是择日夫家会亲宾,歌舞相对。女家请一婆罗门送女至男家。婿盥手,因牵女授之。"《隋书》卷八十二"女嫁者,迦蓝衣横幅合缝如井阑。首戴花宝,婆罗门牵婿与妇握手相付。咒愿吉利。"《南齐书》卷五十八

"王死七日而葬;有官者三日,庶人一日,皆以函盛尸。鼓舞导从,舆至水次,积薪焚之,收其馀骨,王则纳金罂中,沉之于海。有官者以铜罂沉之于海。庶人以瓦送之于江。男女皆截发随丧至水次,尽哀而止。妇则不哭,每七日然香散花,复哭尽哀而止。尽七七而罢。"《隋书》卷同居丧翦发谓之孝,燔尸中野以为葬。"《晋书》《南齐

书》卷同“其寡妇孤居，散发至老。”《梁书》卷同

占人历数亦由印度输入。其纪年即用塞伽(Çaka)纪年；其纪元晚于基督纪元78年，以阳历二三月间新月初生时为年初。其每年节庆亦似印度，但有定期，或遵占婆旧俗也。“正月一日牵象周行所居之地，然后驱逐出郭，谓之逐邪。四月有游船之戏。定十一月十五日为冬至。人皆相贺。州县以土产物帛献其王，每岁十二月十五日城外缚木为塔，王及人民以衣物香药置塔上，焚之以祭天。”《宋史》《诸蕃志》《通考》卷同

“人有疾病旋采生药服食”，《宋史》卷同亦有厚币祷于神者。美山碑

占人“不知酝酿之法，止饮椰子酒。”《宋史》《诸蕃志》卷同新旧《唐书》云，以“槟榔汁为酒”。卷同但今日越南半岛居民，未闻有以槟榔酿酒之事。

占人“性凶悍，勇于战斗”。《晋书》卷九十七平原少，生活于海岸山地之中。以海事为业，求其所乏于国外。寇掠海舟，或北侵安南，南袭柬浦寨。

占人不专以寇掠为事，亦知开拓其利源。今日平顺一带平原，尚存昔日灌溉之迹，可知其谙悉农圃。取乌木香木于山，矿物于地，又可知其利用森林矿产。既习海航，故其舟常至中国爪哇，亦常贩卖奴婢。《诸蕃志》

至其度量，今据碑文可知者，一跋罗(bhara)合二十都罗(tula)，一都罗合百波罗(pala)，一波罗合四竭娑(Karsa)。又据碑志，似有货币，但不通行。梵碑互市无缗钱，止用金银较量锱铢，或吉贝锦，定博易之直。《宋史》卷同

占人亦知工艺，“施椰叶为席。《通考》女子织布帛，精于女红”。

观现存“古占婆王之宝物”,《校刊》卷五可以知之。

男子亦精熔铸造像之术。国“有金银人像大十围。”南齐书卷同以金银制盛槟榔之函,盛尸骨之器。水瓶、剑柄、神面、雕嵌金刚石、宝石、珍珠,制作宝冠、项圈、手镯、足环诸物。碑文载籍皆可考也。

“其国俗居处为阁,名曰于阑。门户皆北向”。《梁书》卷同昔日占人砖屋柱殿,现已无存。但观今日诸神祠之遗制,可知占人于建筑之术亦非不谙练者也。惟其壮丽不及吉蔑建物耳。

其祠大致为方塔。其门东向,三面有假门。塔为数层,愈上愈小。建筑以砖,用石甚少。其装饰多类印度而未精。故就古物言,就艺术言,实不及吉蔑建物也。

祠中所藏神像宝物,今皆毁灭无存,惟据碑文始知富盛。

顾奉教不能无乐,占人之乐,据《隋史》卷八十二云:“有琴、笛、琵琶、五弦,颇与中国同。每击鼓以警众,吹蠡以即戎。”今于诸祠浮雕上,尚可见其乐歌之状。美山谷建物

有乐舞必有歌曲,但占人歌曲今已无存。诸碑用语,皆为俗语。惟志其施舍之事,而无文学性质。虽间引有一二梵文书文,亦不足以窥其全豹。梵碑占碑

占人之梵文程度,时愈晚而愈低。柬浦寨之碑志,梵文极正确。而占婆则错误甚多。具见其知识不备,而与越国频年争战,全国之力已罄于斯,故未暇修文饬。敌兵数入其都,渐以中国文化移植。及至越人完全占领占婆之后,毁其建物碑铭神像,遂使安南领地中之印度文化遗迹,今遂为世人所遗忘矣。

第二章 起 源

考碑志所载，占婆相传古代之故事有二：其一属于槟榔部落；其一属于椰子部落。

前一事相传昔有“承运之王名毗支多罗娑伽罗（Vicitrasagara），亦省称为毗支多罗（Vicitra）者，于堕婆罗（Dvapara）纪，5911 年时，在古笪（Kauthara）国建释利商菩（çri çambhu）神祠”。此王之名与印度古史诗（Ramayana）中所纪 Ayodhya，王娑伽罗（Sagara）之名相类。其为印度故事之移植，非本地之史事明矣。靖化省衙庄之浦那竭罗碑

后一事神话尤多；相传昔有名毕求（Bhrgu）者，为伊舍（Iça）所遣，于地上建释利商菩拔陀罗首罗（çri çambhubhadreçvara）神祠。后商菩（çambhu）“命优珞阇（Uroja）曰，汝应承运显荣，下地为王”。嗣后王占婆补罗（Campapura）者，皆以系出优珞阇，僭位诸王咸引此事。如因陀罗跋摩一世（Indravarman I）。因陀罗跋摩二世，阇耶诃梨跋摩（Jaya Harivarman）三王僭位之后，皆称系出优珞阇是也。见广南省东阳 Dong du'o'ng 碑“优珞阇”此言“胸中”“内部”，亦属神话，非史实也。

右述二故事，所传毕求或优珞阇所建之神祠，实为拔陀罗跋摩王一世（Bhadravarman I）所建，商菩跋摩王（Çambhuvrman）后又因其毁而重修。但考碑文，亦得谓始建祠者为释利魔罗（Çri Mara）。

释利魔罗即为占婆有史以来之第一国王。其子或孙即以碑文

志其系出此王，其碑或为越南半岛诸碑之最古者。靖化省之 Vo-Can 碑碑文固未系以年代，第为古物决无可议。大致为纪元 3 世纪时物，或亦可上溯至 2 世纪时也。

此开始建国之释利跋摩，似为 2 世纪末年之人。而中国史书适亦志有南方建立新国之事。

纪元前 111 年，汉武帝平南越，开置九郡，最南者为日南，言其在日之南，所谓开北户以向日者是也。《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下其地人民蛮野，“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后汉书》卷一〇六任延传时常叛变，侵寇州郡，焚掠官寺民居。

日南属县之最南者为象林，其民骚动尤数。纪元 100 年时，“日南象林蛮夷二千馀人，寇掠百姓，燔烧官寺。郡县发兵讨击，斩其渠帅，馀众乃降。于是置象林长史以防其患”。《后汉书》卷一一六则当时汉人之与日南徼外民族交际之少可知；而其记载故亦模糊不明。

象林一县，今尚难确指为何地。大致应属今之承天府。《皇越地舆志》卷一又有谓日南之南界为隘云山，同上则亦得为今之广南省也。总之，中国军队昔未逾广南以南，即或有抵其地者，亦非纪元 43 年时之马援。援立铜柱为汉之极界，然未从北至南，经过占婆也。注《后汉书·马援传》注引广州记曰：“援到交趾立铜柱。”顾马援行军止于居风，则其地不能在清华省之南。乃《晋书》卷十五，《唐书》卷四十一，以其柱在象林，则又在今之承天或广南也。《水经注》卷三十六又明言柱在林邑之北，象林之南，《越史略》卷一则引《后汉书》注，而《大越史记全书》则又以柱在广东之钦廉二州。说虽不一，要不能在广南之南也。

当时日南以南居民为何种民族，虽无明证可引，疑即为占(Cham)种；至其据地为何，政治状况如何，分隶于诸国欤，抑统治

于一王欤？皆难详也。

据占种之神话的传说：其王朝古不可稽。第详审之，最古之王，实不能逾纪元2世纪之前也。

安南史籍关于当时之记载，皆录中国史籍之文，然亦引有佚书之文者。据《越史通鉴纲目》所引"《胡孙旧史》"一书，《大越史记全书》即以其地为占婆。据云，占种为胡孙精之后裔、"昔居安南及貙貉境外。有国名妙严者，其王号鬼王，亦号长明王，或名十 头王(Daçanana)。其国之北为胡孙国，其王名十车王(Dacaratha)，太子名征姿、太子妃名白净；妙丽无双。鬼王欲得之，乃以兵侵胡孙国，取白净妃以归。太子征姿怒，统率猴军，拔山填海，破妙严国，杀鬼王，得妃以归。胡孙精，猴种也；今之占种，乃其后裔"。此种传说，显非事实。

夫欲详其古史，惟有中国史书。据史载之"象林蛮夷"，在2世纪初年，为无文化之野人，故记述甚简。至纪元137年时，记事始见明确。据《后汉书》卷一百十六云：是年"日南象林徼外蛮夷区怜等数千人，攻象林县，烧城寺，杀长吏。交阯刺史樊演发交阯九真二郡兵万馀人救之。兵士惮远役，遂反攻其府；二郡虽击破反者，而贼势转盛。会侍御史贾昌使在日南，即与州郡并力讨之。不利，遂为所攻围。岁馀而兵谷不继，帝以为忧。明年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属问其方略，皆议遣大将发荆、扬、兖、豫四万人赴之。大将军从事中郎李固驳曰，若荆扬无事，发之可也。今二州盗贼槃结不散，武陵南郡蛮夷未辑，长沙桂阳数被征发；如复扰动，必更生患，不可一也。又兖豫之人，卒被征发，远赴万里，无有还期，诏书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温暑，加有瘴气，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远涉万里，士卒疲劳，比至岭南，不复堪

斗,其不可四也。军行三十里为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计人奉五升,用米六十万斛,不计将吏驴马之食,但负甲自致,费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设军到所在死亡必众,既不足御敌,当复更发,此为刻割心腹以补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发其吏民,犹尚不堪,何况乃苦四州之卒,以赴万里之艰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将尹就讨益州叛羌。益州谚曰:虏来尚可,尹来杀我。后就征还,以兵付刺史张乔。乔因其将吏,旬月之间,破殄寇虏。此发将无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验也。宜更选有勇略仁惠任将帅者,以为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阯。今日南兵单无谷,守既不足,战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阯,事静之后,乃命归本,还募蛮夷,使自相攻。转输金帛,以为其资,有能反间致头首者,许以封侯列土之赏。故并州刺史长沙祝良,性多勇决。又南阳张乔,前在益州有破虏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为云中守。哀帝即拜龚舍为太山太守;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四府悉从固议,即拜祝良为九真太守,张乔为交阯刺史。乔至开示慰诱,并皆降散。良到九真,单车入贼中;设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数万人。皆为良筑起府寺。由是岭外复平。"

据右引之文,当时占种尚未建国,部落分立,最北部落或名"区逵"也。据《水经注》所引《林邑记》可以证之。记曰:"林邑建国起自汉末初平之乱。人怀异心,象林功曹姓区,有子名逵,(亦作达作连)攻其县,杀令,自号为王。"则林邑之建国,质言之,占婆之建国,约在纪元192年时也。

前引之最古碑文,吾人已言"为纪元3世纪时物,或亦可上溯至2世纪"。建碑之王,自称为释利魔罗王之裔。此释利魔罗王,与建立占国之区逵,似为一人。设此说不误,此"日南象林徼外蛮

夷”，盖可知矣。

是乃占种也。百年以来，已受印度之文化，奉婆罗门教，习用南印度之一种文字。或者分其地为若干国，即后之成为宾童龙(Panduranga)、佛誓(Vijaya)、古笪(Kauthara)等区者是也。其中有一国，即后日之阿摩罗波胝(Amaravati)，似即为汉日南郡之象林。区逵即于此地建林邑国，统一诸国。若区逵即释利魔罗之说不误，其北境当北至象林北界之隘云山，南至古之古笪今之衙庄(Nhatrang)。其国势或延及宾童龙，但无明确之证明耳。

第一王朝 自 192 至 420 年

释利魔罗之后裔

释利魔罗之子，或即为建立古碑之人；继续前王统一之事业。而诸国有未忘其独立者，遂不免于内讧。据此王所建之碑，当时曾以金银财物施之神祠，祠殆为前王释利魔罗所建也。

此王以后，因“国无文史，失其纂代，世数难详”。《水经注》卷三十六引《林邑记》惟知其国自“孙权以来，不朝中国”。《晋书》卷九十七 220 至 230 年间，吴孙权时“交州刺史吕岱遣从事南宣国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三国吴志卷十五吕岱传 248 年，林邑以兵侵交阯九真，攻没城邑。三国吴志卷十六韩胤传交州与林邑战于古战湾，失区粟之地《水经注》卷三十六引林邑记孙权以韩胤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入南界，喻以恩信，韩胤传林邑乃息兵。然保有区粟侵地也(又据《水经注》，248 年“林邑进侵至寿泠县以为疆界”。寿泠似为今之承天。)。

范熊 自 270 至 28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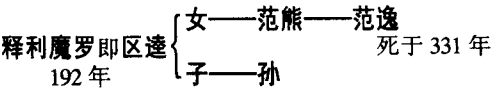
释利魔罗之后裔无嗣，外孙范熊代立；《水经注》卷三十六《晋书》卷九

十七连接扶南王范寻,数攻破郡县,杀害吏民。孙皓以陶璜领交州,十馀年间,前后征讨,翦其魁杰,280年吴亡,璜亦降晋。《晋书》卷五十七《陶璜传》

范逸 自不详何年至331年

熊死子逸立。《晋书》卷九十七《水经注》卷三十六 284年始遣使入贡中国。《晋书》卷九十七此王在位甚久,曾制造城池,缮治戎甲,其臣范文所教也。文日南西卷县夷帅范稚奴也。本扬州人,少被掠为奴,常牧牛于山间,得鳢鱼二头,化而为铁,因以铸刀。铸成,文向石而咒曰,若斫石破者,文当王此。因举刀斫石,如断刍藁。年十五六,遇罪当得杖,畏怖因逃,随林邑贾人渡海,北到上国,多所闻见。于纪元315年,南至林邑,教王范逸作宫室造城池及兵车器械。王爱信之,使为将帅,能得众心,文谗王诸子,或徙或奔。331年王死,无胤嗣,文迎王子于外国,海行取水,置毒椰子中,饮而杀之,遂胁国人自立为王;取前王妻妾置高楼上,有从己者,取而纳之,不从己者,绝其饮食。《水经注》卷三十六《晋书》卷九十七《梁书》卷五十四

第一王朝世系 自192至331年



第二王朝 自331至420年

范文 自331至349年

范文害王二子,自立为王。《水经注》卷三十六引江东旧事于是乃攻大岐界、小岐界、式仆、徐狼、屈都、乾鲁、扶单等诸国并之,有众四五万人。340年,遣使通表入贡中国,其书皆胡字。按:即印度文字林

邑少田，贪日南之地肥沃，常欲略有之。初徼外诸国常赍货物自海路赴中国贸货，而交州刺史，日南太守多贪利侵侮，十折二三。至刺史姜壮《大越史记》卷四作羌庄时，使韩戢领日南太守。戢估较太半，又伐船调袍，动云征伐，由是诸国恚愤。戢死，继以谢擢，《梁书》卷五十四作谢稚侵刻如初。347年，台遣夏侯览为太守，侵刻尤甚；览又耽荒于酒。政教愈乱。范文因民之怨，举兵攻陷日南害览，杀五六千人，馀奔九真，以览尸祭天，铲平西卷县城，遂据日南；告交州刺史朱蕃，求以日南北鄙横山为界。是岁文还林邑，朱蕃便督护刘雄戍于日南，文复攻陷之。次年，(348)文又袭九真，害士庶八九。明年，(349)征西督护滕畯，率交广之兵伐文于卢容，为文所败，退次九真。其年文被创死，子佛代立。《晋书》卷九十七《水经注》卷三十六《梁书》卷五十四

范佛 自349至380年

范文死，子佛立，犹屯日南，进攻九真。《安南志略》卷八督护滕畯，与交州刺史杨平，九真太守灌邃，率交广之兵讨之。进军寿泠浦、入顿郎湖，讨佛于日南故治。佛婴城固守，畯平破之。佛逃窜川薮，遣其帅面缚请罪军门；遣武士陈延劳佛，与盟而还。(351年)353年交州刺史阮敷讨范佛于日南，破其五十馀垒。《晋书》卷八志其事在353年，《水经注》则于351年一役云，佛连垒五十馀里，畯平破之，馀见《水经注》卷三十六，《晋书》卷九十七，《梁书》卷五十四。晋哀帝升平初，林邑复为寇暴。359年，交州刺史温放之率兵讨之；水陆累战，佛保城自守，重求请服，听之，佛还日南，以温公浦为界。《水经注》卷三十六《晋书》卷八

范佛自此役之后，至死未渝盟。372年，遣使贡献，孝武帝宁康中，(373至375)与377年，亦曾入贡中国，380年佛死，子胡达立。《晋书》卷九又卷九十七

范胡达 自380至413年

按《晋书》卷九，太元七年，(382)“林邑范熊遣使献方物”，或因胡达尚幼，范熊监国，故贡表称熊名欤？399年，胡达复寇日南，执太守炅源，又进寇九德，执太守曹炳；交趾太守杜瑗遣都护邓逸等击破之。《梁书》卷五十四

其后无事者数年。义熙中，(405－418)每岁又入寇。407年，复寇日南，杀长史，刺史杜瑗遣海逻督护阮斐讨破之；斩获甚众。《梁书》卷五十四时晋祚已衰，卢循据广州，交州刺史杜瑗卒，诏除其子慧度为刺史，循袭破合浦，径向交州，(411)慧度击斩之；《宋书》卷九十二《慧度传》范胡达亦乘隙入寇。413年复寇九真，行郡事杜慧期与战，斩其息交龙王甄知，及其将范健，生俘胡达息那能，及虏获百馀人。《梁书》卷五十四

拔陀罗跋摩一世

梵碑中有三碑，为法大王(Dharmamaharaja)拔陀罗跋摩一世(Bhadravarman I)所立。是为释利魔罗碑后之最古者。三碑未载年月，审其文体。似为纪元400年时之刻物。顾范胡达在位之年，始380，终413，与拔陀罗跋摩似为一人也。考《水经注》卷三十六，“林邑城开四门，东为前门，有古碑，夷书，铭赞前王胡达之德”。其事亦可参证。拔陀罗跋摩曾建第一神祠于美山，后王多于其地建祠，其遗迹今尚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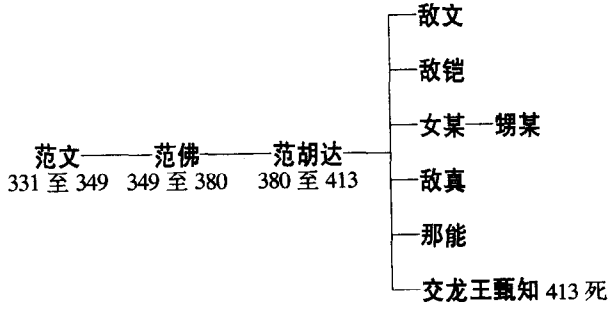
敌真

胡达死，子敌真立。“其弟敌铠携母出奔，敌真追恨不能容其母弟，舍国而之天竺，禅位于其甥。”《梁书》卷五十四考美山碑有一碑文云：“昔有恒河王(Gangaraja)明智勇武，禅让王位，以见恒河为大乐，乃自此赴恒河。”顾当时航海者尚畏海行(《水经注》卷一引康泰

《扶南传》云，昔范旃时有嘾杨国人，尝从其本国到天竺，展转流贾至扶南，为旃说天竺土俗；言天竺去此可三万里，往还可三年，逾乃行四年方返。），何况国王。故此王之独赴天竺，其后裔尚引以为荣。此事与《梁书》所志舍国而之天竺之说亦合。敌真即为恒河王无疑也。

敌真禅位，国相藏麟固谏不从。其甥既立，而杀藏麟；麟子又攻杀之，而立敌铠同母异父之弟曰敌文。《梁书》卷五十四由敌文至阳迈，史文颇欠明了。《梁书》以当根纯范诸农事次于此后，疑误，后别有说也。

第二王朝世系 自 331 至 420 年



第三章 林邑

第三王朝 自420至538

阳迈一世 自420至未详何年

林邑内乱数年,国属阳迈。《梁书》误以阳迈为范诸农子,《水经注》卷三十六则谓为胡达之子。今姑以其为第三王朝之始祖。

阳迈之母或因出身低微,故以灵梦表其灵异。考《水经注》卷三十六云:"初阳迈母怀身,梦人铺阳迈金席,与其儿落席上;金光色起,昭晰艳曜。华俗谓上金为紫磨金,夷俗谓上金为阳迈金。"此事《南齐书》卷五十八,《南史》卷七十八,亦载有之。考占婆语阳迈(Yan mah),意言金王也。《水经注》又云,此王"能得人情"。

林邑与晋之交际,有时为平和的,如414年417年两次贡献是也;有时为军事的,考《晋书》卷九十七云:"义熙中,每岁又来寇日南、九真、九德等诸郡,杀伤甚众,交州遂致虚弱,而林邑亦用疲弊。"415年冬又寇交州,《大越史记》卷四420年宋高祖践阼,交州刺史杜慧度率文武万人南讨林邑,所杀过半,前后被抄略悉得还本。林邑乞降,输生口大象金银古贝等,乃释之。遣长史江悠奉表献捷。《宋书》卷九十二《杜慧度传》

次年(421),阳迈遣使贡献,《宋书》卷九十七宋武帝以阳迈为林邑王,《梁书》卷五十四彼或以为大国之藩臣,足以巩固其地位,后之诸王多遵效之。

阳迈二世 自未详何年至446年

阳迈死，子咄立篡其父，复曰阳迈。初“杜慧度子弘文继为交州刺史。阳迈侵暴日南九德诸郡。弘文欲讨之，闻有代乃止。”(427)《梁书》卷五十四后任刺史王徽《安南志略》卷八亦未能讨。430年阳迈入贡，《宋书》卷五次年(431)又遣楼船百馀寇九德，入四会浦口。交州刺史阮弥之遣队主相道生三千人赴讨。《宋书》卷九十七阳迈出婿不在，奋威将军领七千人先袭区粟，已过四会，未入寿泠，三日三夜无顿止处，凝海直岸，遇风大败。阳迈携婿都部伍三百馀船，于寿泠浦里相遇，暗中大战。谦之手射阳迈柁工，船败纵横。昆仑单舸接得阳迈。谦之追逐至占笔罗(Culao Cham)乃还。《水经注》卷三十六以为424年事道生攻区粟城不克，亦引还。《宋书》卷九十七

433年阳迈遣使上表献方物，求领交州，答以道远不许。《宋书》卷九十七十二月以李秀之为交州刺史。《宋书》卷五

阳迈愤恚，虽常贡献，434、438、439、441而寇盗不已。所贡亦陋薄，宋太祖忿其违傲，446年使龙骧将军交州刺史檀和之高平人伐之；遣太尉府振武将军宗悫受和之节度。和之遣府司马萧景宪为前锋，悫仍领景宪军副。阳迈闻将见讨，遣使上表求还所略日南民户，奉献国珍；太祖诏和之，阳迈果有款诚，许其归顺。其年2月，军至朱梧戍，遣府户曹参军日南太守姜仲基，前部贼曹参军蛎弘民，随传诏毕愿高精奴等，宣扬恩旨，乃“执仲基精奴等二十八人，遣弘民反命，外言归款。猜防愈严，景宪等乃进军向区粟城。”《宋书》卷九十七

阳迈遣将范毗沙达来救区粟，和之遣偏军拒之，为贼所败。又遣悫，悫乃分军为数道，偃旗潛追，讨破之。《宋书》卷七十六《宗悫传》5月《宋书》卷九十七以飞梯云桥悬楼登垒，钲鼓大作，虎士电怒，风烈火扬，城摧众陷，斩区粟王范扶龙《越史略》作车伏龙首。十五以上坑截无赦，楼阁雨血，填尸成观，《水经注》卷三十六获金银杂物，不可胜计。

和之入象浦,《憝传》至彭龙湾上鬼塔。《水经注》卷三十六阳迈倾国来拒,以具装被象,前后无际,士卒不能当。憝曰,吾闻师子服百兽,乃制其形与象相御。象果惊奔,众因溃散,遂克林邑(Campapura),收其异宝杂物,不可胜计。《憝传》阳迈父子并挺身奔逃,《宋书》卷九十七又销其金人,得黄金数十万金。《梁书》卷五十四是年12月,以萧景宪为交州刺史。《宋书》卷五

此役中国国威远播。484年,扶南王阇耶跋摩(Jayavarman)上表,尚追叙其事曰:"林邑昔为檀和之所破,久已归化,天威所被,四海弥伏。"《南齐书》卷五十八

和之"军还之后,阳迈归国,家国荒殄,时人靡存,踌躇崩擗,愤绝复苏,即以元嘉二十三年(464)死。"《水经注》卷三十六

范神成 自446至不详何年

阳迈死后,王林邑者有范神成。455年遣使范龙跋贡献,458年又遣使范流奉表献金银香布诸物,472年又遣使贡方物。《宋书》卷九十七

当根纯 自不详何年至491年

范神成死,夷人范当根纯攻夺其国,篡立为王。此当根纯,亦即扶南王阇耶跋摩之子鸠酬罗也。注:按《南齐书》卷五十八云:"杨迈子孙相传为王,未有位号。夷人范当根纯攻夺其国,篡立为王。永明九年(491)遣使贡献金簟等物诏以为林邑王。范阳迈子孙范诸农率种人攻当根纯,复得本国。十年(492)以诸农为林邑王。永泰元年(498)诸农人朝,海中遭风溺死。以其子文款为林邑王。"《梁书》卷五十四则以范诸农事在敌真禅位之后云:"敌文后为扶南王子所杀,大臣平其乱,而自立为王。诸农死,子阳迈立。"两说不同,证以《水经注》及《南齐书·扶南传》,自应以当根纯篡立范诸农复国之事次在范神成之后为是。

鸠酬罗在扶南得罪,逃至林邑,故扶南国王阇耶跋摩于484年表上齐武帝曰:"臣有奴名鸠酬罗,委臣逸走,别在馀处;搆结凶逆,

遂破林邑，仍自立为王，永不恭从，违恩负义，叛主之僭，天不容载。伏寻林邑昔为檀和之所破，久已归化；天威所被，四海弥伏。而今鸠酬罗守执奴凶，自专狼彊。且林邑扶南邻界相接，亲人是臣奴，犹尚逆去；朝廷遥远，岂复遵举。此国属陛下，故谨具上启。伏闻林邑顿年表献简绝，便欲永隔朝廷。岂有师子坐而大鼠伏，愿遣军将伐凶逆，臣亦自效微诚，助朝廷翦扑，使边海诸国一时归伏。陛下若欲别立馀人为彼王者，伏听敕旨。脱未欲灼然兴兵伐林邑者，伏愿特赐敕在所随宜以少军助臣，乘天之威，殄灭小贼；伐恶从善，平荡之日。上表献金五婆罗，今经此使，送臣丹诚，表所陈启，不尽下情。谨附那伽仙(Nagasena)并其伴口具启闻，伏愿愍所启，并献金缕龙玉坐像一躯，白檀像一躯，牙塔二躯，古贝二双，琉璃苏鉢二口，瑇瑁槟榔拌一枚。"《南齐书》卷五十八

那伽仙，印度人也。奉表至京师，齐武帝报曰："知鸠酬罗于彼背叛，窃据林邑；聚凶肆掠，殊宜翦讨。彼虽介遐陬，旧修蕃贡，自宋季多难，海译致壅，皇化惟新，习迷未革。朕方以文德来远人，未欲便兴干戈。王既款列忠到，远请军威，今诏交部，随宜应接，伐叛柔服，实惟国典；勉立殊效，以副所期。"《南齐书》卷五十八

当时阇耶跋摩是否兴师讨其叛臣，吾人不知。即有是事，其结果必亦未副其望。观史载491年范当根纯尚入贡南齐一事，可以知之。"永明九年，(491)遣使贡献金簟等物。诏曰，林邑蠹尔，介在遐外，世服王化。当根纯乃诚款到，率其僚职，远绩克宣，良有可嘉。宜沾爵号，以弘休泽。可持节都督缘海诸军事安南将军林邑王。"《南齐书》卷五十八此诏未到，"范阳迈子孙范诸农率种人攻当根纯，复得本国。十年(492)以诸农为持节都督缘海诸军事安南将军林邑王。建武二年(495)进号镇南将军。永泰元年(498)诸农人

朝，海中遭风溺死。”《南齐书》卷五十八

文款

诸农死，子文款亦作文赞立，齐册为林邑王。永明中累遣使贡献。《梁书》卷五十四

天凯

天凯为 Devavarman 之意译，文款之子也。梁天监九年(510)奉献白猴，梁册为林邑王。511 年至 514 年天凯累遣使贡献，俄而病死。《梁书》卷五十四

弼毳跋摩

天凯死，子弼毳跋摩(Vijayavarman)立。奉表贡献。普通七年(526)高式胜铠按：上二字译音，下二字译意，亦即弼毳跋摩之同名异译。遣使献方物，诏以为林邑王。大通元年(527)又遣使贡献。

第三王朝世系 自 420 至 528 年

阳迈一世—阳迈二世(至 443)—神成—当根纯(至 491)—诸农(491—498)—文款—天凯—弼毳跋摩

第四王朝 自 529 至 757 年

律陁罗跋摩一世 自 529 至不详何年

高式律陁罗跋摩一世(Ku çri Rudravarman I)，据碑文美山碑云：“父为著名的婆罗门，母为有荣誉的…rathavarman 原名上半已漫漶之孙女。非弼毳跋摩之后嗣，乃其远族，系出恒河王。”即敌真即位不久，于 529 年入贡梁朝。诏以为林邑王。《梁书》卷五十四 534 年又入贡。自是至陈朝时。惟于 568 年及 572 年两入贡。时交州刺史萧谘不得民心，《安南志略》作侯谘大通中除交州刺史九德参军《梁书》卷三作土民李贲

《越史略》卷一云贲为中国人，七世祖在西汉时徙居太平，于544年称南越帝，建前李朝。作乱，人民应之。谘逃广州，贲据龙编，《纲目》作龙渊交州州治也全州皆没。542年1月事林邑王律陁罗跋摩破九德攻贲，贲将范修又破林邑王于九德，林邑王败走。《大越史记》卷五

拔陀罗跋摩一世（范胡达）所建之拔陀罗首罗（Bhadraçvara）神祠，即焚于此王在位之时。

商菩跋摩即范梵志 自不详何年至629年

律陁罗跋摩死，子商菩跋摩（Çambhuvarman）立，法名Praçastadharma。陈朝衰微，久不入贡。隋高祖开皇二年，（582）始遣使贡方物，《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其后朝贡又绝。“时天下无事，群臣言林邑多奇宝。”《隋书》卷八十二时前李朝544至602再传至李佛子，为交州道行军总管刘方所破。佛子降，交州复隶中国。《大越史记》卷五仁寿末，（604）乃授刘方“驩州道今义安行军总管，以尚书右丞李纲为司马，经略林邑。方遣钦州刺史宁长真，驩州刺史李晕，上开府秦雄。以步骑出越常。方亲率大将军张愻，司马李纲，舟师趣比景。炀帝大业元年，（605）军至海口，灵江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险。方击走之。师次阁黎江，贼据南岸立栅。方盛陈旗帜，击金鼓，贼惧而溃。既渡江，行三十里，贼乘臣象四面而至。方以弩射象，象中疮却蹂其阵。王师力战，贼奔于栅，因攻破之，俘馘万计。于是济区粟度六里，前后逢贼，每战必擒。进至大缘江，贼据险为栅，又击破之。迳马援铜柱，南行八日，至其国都。林邑王梵志弃城奔海。”《隋书》卷五十三《刘方传》

“方入其都，获其庙主十八枚，皆铸金为之，盖其有国十八叶矣。《隋书》卷八十二得佛经合五百六十四夹、一千三百五十馀部，并昆仑占文书。”《续高僧传》卷二《彦琮传》“刻石纪功而还，士卒脚肿死者四

五，方在道遇患而卒。”《刘方传》

隋平林邑，分其为三州。注：置守令，道阻不得通（《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下）（按：三州为一荡州，寻改为比景郡，统比景，朱吾，寿泠，西卷，四县；二农州，寻改为海阴郡，统新容，真龙，多农，安乐，四县；三冲州，寻改为林邑郡，统象浦，金山，交江，南极，四县。）。

隋兵引还，“梵志复其故地。《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下云梵志聚遗众别建国邑遣使谢罪，于是朝贡不绝。”《隋书》卷八十二

唐兴，武德六年，（623）范梵志遣使来朝。《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八年，（625）又遣使献方物，高祖为设九部乐以宴之。及赐其王绵彩，同贞观二年（628）献驯象。《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

时林邑与吉蔑即真腊（Khmers）之国交亦甚亲密。吉蔑王摩醯因陀罗跋摩（Mahendravarman）曾遣使僧伽提婆（Simhavarman）至林邑。吉蔑碑摩醯因陀罗跋摩者，建国前王跋婆跋摩（Bhavavarman）之弟也。

商菩跋摩即梵志在位时，重兴前王时梵毁之神祠。美山碑

建达婆达摩即范头黎 自629至不详何年

629年商菩跋摩死，子建达婆达摩（Kandarpadharma）立，即中国史书之范头黎也。此王“无嗜好，爱民如子”。美山碑贞观四年，（630）入贡入唐。次年与婆利罗刹二国使者偕入贡。林邑使言不恭，群臣请治罪，太宗赦不问。《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下所献诸物有白鹦鹉，数诉寒，太宗悯之，并付其使令放还于林薮。《旧唐书》《新唐书》卷同太宗崩，诏于陵所刊石图头黎之形，列于玄阙之前。《旧唐书》卷同并见美山碑

其嗣王之名，碑已漫漶难识。但据中国史书，知其王名范镇龙，原名不可考也。

范镇龙 自不详何年至645年

头黎死，子范镇龙立。新旧《唐书》卷同640年献犀角等物，《唐会要》卷九十八642年又入贡。《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645年镇龙为其臣摩诃慢多伽独所弑，灭王之宗。摩诃慢多伽独应为(Mahamantrakrt)之译音，此言大臣，非姓名也。今日柬浦寨(Cambodge)之大臣，尚有称为(Moha Montrei)，暹罗大臣中亦有称为(Maha Montri)者。

拔陀罗首罗跋罗 自645至不详何年

镇龙死，国人立镇龙妹之子拔陀罗首罗跋罗(Bhadreçvaravarman)为王，婆罗门(Chandasys Satya Kauçika Svamin)之子也。美山碑《唐书》误作头黎婿婆罗门为王。后大臣感恩旧主，乃废之而立头黎之嫡女为王。《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

头黎之女

女王不能定国，大臣共迎波罗迦含达摩(Prakaçavarman)为王，妻以女王；美山碑王号毗建陀跋摩一世(Vikrantavarman I.)。

毗建陀跋摩一世即诸葛地

毗建陀跋摩一世，为林邑王律陀罗跋摩一世外孙之子，吉蔑王伊赏那跋摩(Içanavarman)之外孙。中国史书所称为诸葛地。《唐会要》九十八之铸迦舍波摩是也。诸大臣迎立之，号为“承运占婆城无上主君大王(Çri-Campapuraparamaçvara Maharaja)，王号毗建陀跋摩(Vikrantavarman I.)，时在653年也。美山碑

王即位后，建立神祠，657、679入贡于唐。653、657、669、670美山碑及《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

毗建陀跋摩二世即建多达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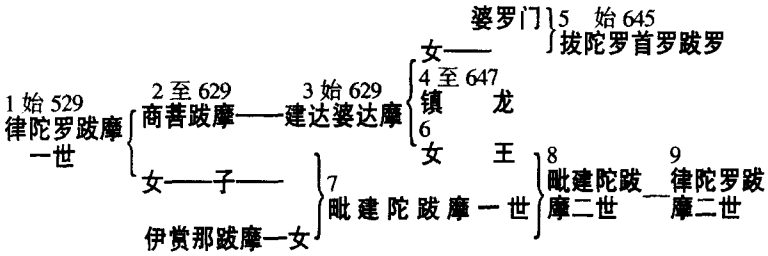
嗣王亦号毗建陀跋摩，即《唐会要》所称之建多达摩是也。入贡于唐十五次。《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一，按中国史书名其王为建多达摩；建多

似为 vikranta 之省译。达摩又似为 Prakaçadharma 之省译。第此王即位于 653 年至 731 年,人贡之时已有 78 年,不应尚存也。遂又疑建字为律字之讹,或为后王律陀罗跋摩二世(Rudravarman II.)之省译,亦即《唐会要》卷九十八之卢陀罗。《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一之卢陀也。若以此说为是,但此王殁于 749 年,自 653 年至 749 又为时太远,其中间似又有一王,兹采芬诺(Finot)之说。臆定其间有毗建陀跋摩一世、毗建陀跋摩二世、律陀罗跋摩二世三王,但未敢确定不误也。

律陀罗跋摩二世即卢陀罗

律陀罗跋摩二世,为占婆第四王朝最末之王。中国史书惟志其 749 年贡使一次。综计第四王朝君临占婆。约有 225 年云。

第四王朝世系 自 529 至 757



第四章　环王国及宾童龙之霸

第五王朝 自 758 至 859 年

中国史载占婆于 758 年后更号环王，不名林邑。《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唐会要》卷九十八此种对译，在占文梵文中皆无法寻译原名。

考诸碑志，占婆（Campa）皆称“占婆王”或“占婆国”，从未改易称号。昔中国号占婆为林邑之时，商菩跋摩殁于 629 年有“求神降福占婆土”之语。毗建陀跋摩即位，自号“占婆补罗此言占婆城无上主君大王”。在中国号占婆为环王之时，毕底邠陀罗跋摩称“享有占婆全土”。因陀罗跋摩一世（Indravarman I.）云：“君临占婆全地”。诃梨跋摩一世（Harivarman I.）号“承运占婆补罗无上主君”。美山碑梵碑则除占婆之外，无别名也。

惟当中国号占婆为环王之时，即 758 至 877 年间，第五王朝君临占婆之际。商菩拔陀罗首罗神祠中，未见有此朝之碑文。其碑皆建于南方宾童龙古笪二地。至第六王朝时，始重在占婆补罗附近，见有碑文，然在东阳，不在美山也。其第一碑为 875 年物。又据中国史籍，占婆于 877 年前后改称占城。据岭表录异乾符四年占城献驯象三占城为占婆之对称，绝无可疑。环王之称，非第五王朝诸王之尊号，即为王室发源国土之名。吾人既承认占婆南部为槟榔部落之采地，此对译之原名，或可于浦那竭罗（Po-Nagar）及宾童龙（Panran）诸碑中寻求得之。

毕底邠陀罗跋摩

律陀罗二世,大约殁于757年。国中大人奉一大人为王。碑志未载其世系,似非王族。据碑文云:"昔日此土(占婆)强盛光荣,国人富贵,诸富家常奉一人为此国惟一君王;汝毕底邠陀罗跋摩(Prithivindravarman),如地上诸神之因陀罗(Indra),"东阳碑此王必属宾童龙诸侯大族,为南方之槟榔部落也。但彼"享有占婆全土",则其威权所及,必已北至横山,南抵吉蔑国境。

此王未留碑文,其甥因陀罗跋摩一世(Indravarman I.)曾建碑颂其功德云:"承运之王毕底邠陀罗跋摩,门阀威严,诸方显耀;在位之日,威服诸敌。此无上之王,享有占婆全土。诸物丰饶,翦灭盗贼,一如日光消尽黑暗。王种光耀,如月在天"。占碑

萨多跋摩

王死,其甥释利萨多跋摩(Satyavarman)立。当此时马来、爪哇海盗侵寇越南半岛东岸。据史载。767年,昆仑阇婆贼犯镇南都护府。757年改镇南,768年复名安南。肆焚掠,近府治。都护张伯义命都尉击之,破贼于朱鸢,贼遁入海。《大越史记》卷六

774年,贼侵占婆之古笪,"其人产于异地,黑瘦凶暴如鬼,所食诸物,恶逾死尸。贼以舟来掠释利商菩神祠,取诸神物饰品,金银、宝石、瓶盎、金笏、白伞、拂蝇、金瓶诸物以去。神居既空,以火焚之。萨谛跋摩王闻耗,以舟载诸兵将逐击之海上;神面暨诸宝物,与贼舟共沉,王甚痛惜"。衙庄之浦那竭罗碑

寇盗既已驱除,萨多跋摩乃重兴神祠;前以木建,今易以石。嗣后诸王复广大之,今尚存于古笪及海之附近。建造十年之久,始于784年落成。同上

萨多跋摩居宾童龙,建一壮丽居所。今日稻田中有高丘,上植树木,疑即遗址。此王在位不久即死。占碑

因陀罗跋摩一世

前王死，弟因陀罗跋摩（Indravarman）继立。据碑文所志，此王在位，内治昌明，外摧敌人，威及四方，恢复侵地。占碑占婆之北，境接安南都护所领驩爱二州。驩州为古之日南，今之义安河静；爱州为古之九真，今之清华。其地是否为占婆所据，中国及安南史籍无记载可引。当时唐德宗新立，（780）藩镇之乱正炽，恐亦无暇顾及南极也。

占婆南境之吉蔑，亦为此王"足迹所至富庶之地"。时其国亦有内乱，分为二国，即《新唐书》卷二二二下所志之水真腊陆真腊是也。占婆或乘乱侵入，亦意中必有之事。

787年，马来海盗又入占婆，焚毗罗补罗（Virapura）西方神祠，掠其实物。其地战士奴婢，皆为杀掠。梵碑因陀罗跋摩重建此祠。占碑

793年，因陀罗跋摩又修第四王朝以来已绝之朝贡，德宗命其贡使谒见太庙。《唐会要》九十八嗣后或因唐帝未厚待其使，或因朝贡无益，贡使又绝。目录及占碑

诃梨跋摩一世

因陀罗跋摩一世死，其妹婿诃梨跋摩（Çri Harivarman-Deva-Rajadhiraja）继为"承运占婆补罗无上主君"。衙庄之浦那竭罗碑

803年1月，诃梨跋摩"陷驩爱二州"（《新唐书》卷七惟载环王陷二州，未举王名。大致占婆新王即位，即有侵犯中国之事，故以此役属之诃梨跋摩。），大获而归，时当安南经略使裴泰时也。六年后，（809）"复寇，安南都护张舟败之"。《新唐书》卷七"执其伪驩爱州都统，斩三万级，虏王子五十九，获战象舠铠"。《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张舟此役，或有虚报，不然所获者似属驩爱二州之人民，盖诃梨跋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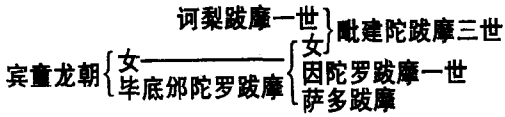
曾留碑铭云:“伸其如太阳之长臂,以焚暗如黑夜之中国民族”,尚在矜言其胜迹也。衙庄之浦那竭罗碑梵碑

诃梨跋摩以世子释利毗建陀跋摩(Çri Vikrantavarman)为宾童龙镇使。因其幼,命队主(Senapati)波罗(Par)辅之。波罗率军,数胜吉蔑。“破其如密林之城,如象之民,如狮之王”。衙庄浦那竭罗碑时吉蔑王为阇耶跋摩二世。顾吉蔑史书未记败于占人之事,或者波罗之所谓胜战,或为边境之侵略,特张大其辞耳。顾其所获,不在少数,波罗于813年817年,即以掠得之物建立神祠。同上碑

毗建陀跋摩三世

王死,世子释利毗建陀跋摩立。目录 Çri Vikrantavarman 碑文惟志其数建神祠之事而已。宁顺之 Glai Klong Anöh 碑衙庄之浦那竭罗碑目录

第五王朝世系 自758至859年



第五章 占 城

第六王朝 自 860 至 900 年

因陀罗跋摩二世

毗建陀跋摩无嗣，生前曾“指定落悉密因陀罗（Laksmindra Bhumiçvara Gramasvamin）继承王位，国中诸长迎之占婆”。东阳碑王号释利因陀罗跋摩（Çri Indravarman）。

新王自称“系出波罗密首罗（Parameçvara），亦优珞阇（Uroja）、达摩罗阇（Dharmaraja）、律陀罗跋摩（Rudravarman）诸王，及其祖其父拔陀罗跋摩（Bhadravarman）所自出也”。“彼得嗣位者，不由其祖若父，乃由其无欲，有智力，故国中诸长奉之为君”。东阳碑其非王族明甚。

新王应为北方阿摩罗婆胝（Amaravati）地方之人，似属于椰子部落。即位后居于因陀罗补罗（Indrapura）。

此王时代之建碑，惟因陀罗补罗附近之东阳有之。中有一碑，其后赞扬其城之丰盛云：“因陀罗（Indra）城壮丽灿烂，如白莲之花，昔为毕求（Bhrgu）所建，厥名占婆（Campa）。”

此王在位之时，平和无事。南方之吉蔑王阇耶跋摩二世在位六十七年，殁于 869 年。阇耶跋摩三世，因陀罗跋摩一世（Indravarman I.）相继在位，二十年间，正昂古（Angkor）古祠建造之时，无暇治军侵略外国也。参考吉蔑帝国

北方之交州，于 863 年至 866 年又为南诏王世隆所占领。南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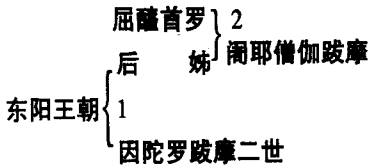
野史安南都护高骈正在经略安南，亦无暇顾及占城。自是以后中国史书称占婆为占城因陀罗跋罗惟于 877 年入贡中国一次。惟《岭表录异》卷上志之据碑文，此王笃信佛教，于 875 年曾建佛祠，其遗址现在东阳也。梵碑

王无子，以王后姊夫释利阇耶屈醯首罗（Çri jaya Guheçvara）之子为嗣。梵碑是为阇耶僧伽跋摩一世。

阇耶僧伽跋摩一世

因陀罗跋摩二世死，释利阇耶僧伽跋摩一世（Jaya Sinhavarman I.）立。其王号为 Sinhavarmadeva Campapura Parameçvara。亦都因陀罗城，王在位时，曾建数像，为其姨母姨父及其父母祈福。梵碑

第六王朝世系 自 860 至 900 年



第七王朝 自 900 至 986 年

诃罗跋摩

阇耶僧伽跋摩死，第六王朝遂亡。槟榔部落之诃罗跋摩（Haravarman）建立第七王朝。其如何易代，吾人不知，惟知北方无碑志可证，惟南方诸神祠中始见有第七朝之碑文。目录

因陀罗跋摩三世即释利因德漫

诃罗跋摩死，子释利因陀罗跋摩（Çri Iudravarman III.）继王占婆，即中国史书中之释利因德漫是已。据碑文所载，此王嗜好文

学。衙庄之浦那竭罗碑即位未久，于918年在古笪地方杨浦那竭罗(Yan Pu Nagara)神祠，建婆伽婆胝(Bhagavati)女神金像。梵碑

神之不能保佑建像之人，及所建之像者，莫若此神。约当945或946年时，吉蔑王罗阇因陀罗跋摩二世(Rajendravarman II.)侵寇占婆，"取此女神金像以去"。衙庄之浦那竭罗碑旋占婆以兵逐之，大败吉蔑侵人之军。

占婆与中国断绝贡使已久，自877年以来自唐末至梁、唐、晋、汉，皆无使臣往来。至周太祖广顺元年(951)，此王始遣使臣莆诃散贡方物。《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二周世宗显德五年(958)，又遣莆诃散入贡方物。《五代史》卷十二及卷七十四

阇耶因陀罗跋摩一世即释利因陁盘

因陀罗跋摩三世未几死，目录阇耶因陀罗跋摩一世(Jaya Indravarman)继立，即中国史称之释利因陁盘是已。960年，宋太祖即位，其年占婆王即遣使入朝。961年、962年、966年、967年、970年、971年，又入贡六次。《宋史》卷四百八十九惟971年之入贡，《宋史》又名其王为悉利多盘，殆阇耶因陀罗跋摩之异译也。

965年时，此王重建吉蔑人掠去之神像，不用金铸，代以石像。目录

波罗密首罗跋摩一世

前王死，波罗密首罗跋摩一世(Parameçvaravarman I.)继立。《宋史本纪》名之曰"波美税"，《占城传》又名之曰"波美税褐印茶"，亦名之曰"波美税阳布印茶"。972年、973年、974年、976年、977年、979年，《宋史》卷三卷四卷四百八十九凡六次入贡。

先是交趾十二州大乱，驩州刺史丁公著之子部领，与其子琏平其乱，自立为帝，国号瞿越，定都花闾；(968)唐林州使君吴日庆吴权

之子自号陈公览奔占婆。《越史略》卷一 979 年,“丁先皇帝被害”,《大越史记》卷一交趾复乱。吴日庆乃乞师占婆,兴复故地。占婆王波罗密首罗跋摩,亲率舟师助之,入富良江,法译作红河逾大鸦、亦作大亚大鸦今大安县群连村小康,今宁平县境乾港海口,距花闾今安庆府宁平县境都城不远。暴风沉舟,吴日庆及占婆兵多死于水。惟占婆王单舸遁归本国,时 979 年也。《大越史记》卷一

后数月,瞿越十道将军副王黎桓,废幼主璿,自立为帝。使告中国,《越史略》卷一欲以占城俘献于京师。宋太宗令广州止其俘,存抚之,给衣服资粮,遣还占城,诏谕其王。《宋史》卷四百八十九

黎桓又遣吴子庚使占城,波罗密首罗跋摩留不遣。黎桓怒治海舟,亲攻占城;败占城兵,斩其王,兵迫其都城。

因陀罗跋摩四世

因陀罗跋摩四世(Indravarman Ⅳ.)即中国史书之“施一作舍利陀盘吴日欢”也。甫即王位,黎桓兵迫都城,弃城南遁。越兵入城,焚掠诸神祠,虏宫女百人,天竺僧一人,得金银宝物无数而还。《越史略》卷一 985 年,占城王“遣婆罗门金歌麻献方物,且诉为交州所侵。太宗诏答令保国睦邻。”《宋史》卷四百八十九(按:982 年与 983 年,占婆贡象至中国,不知为因陀罗跋摩所贡,抑为刘继宗所贡。)

第占婆此时,虽欲“保国睦邻”,不可能也。越兵尚占据国境,而国内亦有内讧。当因陀罗跋摩南奔之后,有越人刘继宗者,初为管甲,越史世袭乡职分为大老诸位郎将三等因事奔占婆,至是举兵斩黎桓养子。水陆象马数万人,侵寇瞿越,黎桓讨之不利,时 983 年也。《大越史记》卷一

刘继宗势愈振,因陀罗跋摩死,遂自立为占婆王。《大越史记》卷一遣使李朝仙入贡入宋。《宋史》四百八十九继宗,越人也;虐遇占民,

占民多逃避外国。986年占城人蒲罗遏率其族百口逃儋州，今海南岛求宋保护。987年宋“广州上言，雷恩州关送占城夷人斯当李娘并其族一百五十人来归，分隶南海清远县”。988年，“广州又言占城夷人忽宣等族三百一人求附”。《宋史》卷四百八十九

第七王朝世系 自900至986年

诃罗跋摩——因陀罗跋摩三世——阇耶因陀罗跋摩一世——波罗密首罗跋摩一世——因陀罗跋摩四世

附刘继宗 自986至988年

第八王朝 自989至1044年

因陀罗跋摩五世

占婆国人乃于988年奉国人俱释利因陀罗跋摩(Ku Çri Indravarman V.)至佛誓(Vijava)。989年刘继宗亡，遂推之为占婆王，《大越史记》卷一即越史之“冰王罗”，亦名“俱尸利呵呷排麻罗”，宋史之“杨陁排”是也。

990年，瞿越黎桓乘占婆之弱，侵寇占婆之地里州，今广平广宁府地获人物甚众。

因陀罗跋摩五世，上诉入宋，据《宋史》卷四百八十九云：“淳化元年(990)，新王杨陁排，自称新坐佛逝国杨陁排，遣使李臻贡驯犀方物；表诉为交州所攻，国中人民财宝皆为所略，上赐黎桓诏，令各守境。”

因陀罗跋摩五世虽为越侵，不欲报复。989年，瞿越管甲杨进禄以驩爱二州叛，求助占婆，至是拒之，故瞿越得平其乱。黎桓德

之，于992年放前所掳占婆地里三百六十人归国。《大越史记全书》卷一

同年占婆“遣使李良莆贡方物，赐其王白马二兵器等”。994年，占婆王以孙制茭质于瞿越。《大越史记》卷一

995年正月，占婆王遣使入贡于宋，“奉表言，前进奉使李良莆回，伏蒙圣慈，赐臣细马二匹，旗五面，银装剑五口，银缠枪五条，弓弩各五张，及箭等；戴恩感惧，稽首稽首。臣生长外国，夐远天都，窃承皇帝圣明，威德广大；臣不惮介居海裔，遣使入朝，皇帝不弃蛮夷山国，曲加优赐。然臣自为土长，声扬尚卑，常时外国颇相侵挠；况以前民庶如芥，随风星散，流离各不自保。近蒙皇帝赐臣内闲驵骏，及旗帜兵器等，邻国闻之，知臣荷大国之宠、而各惧天威，不敢谋害。今臣一国安宁，流民来复，若非皇帝天德加护，何以至此。臣之一国，仰望仁圣，覆之如天，载之如地。臣自思惟鸿恩不浅，且自天子之都。至臣所居之国，涉海绵邈，不啻数万里，而所赐之马及器械等，并安全而至，皆圣德之所及也。自前本国进奉，未尝有旌旗弓矢之赐；臣今何幸，独受异恩，此盖天威广被，壮臣土疆，臣虽殒身，无以上报。兼臣贡使往复，资给备至，恩重山岳，不可具陈。今特遣专使李波珠，副使诃散；判官李磨勿等，进奉犀角十株，象牙三十株，玳瑁十斤，龙脑二斤，沉香百斤，夹笺黄熟香九十斤，檀香百六十斤，岗鸡二万四千三百双，胡椒二百斤，簟席五。前件物固非珍奇，惟表诚恳。臣生居异域，幸遇明时，不贵珠珍，惟重良马。傥皇帝念及外国，不辜恳求；若使介南归、愿垂颁赐，臣之幸矣。兼臣本国元有流民三百，散居南海，曾蒙圣旨，许令放还。今有犹在广州者，本国旧有进奉夷人罗常占，见驻广州，乞诏本州，尽数点集兵籍，以付常占，令造舶船，乘便风部领归国，冀得安其生

聚，以实旧疆。至于万里感恩，一心事上，臣之志也。上览表遣使诣广州询问，愿还者悉付波珠使还，复赐白马二，遂为常制。"《宋史》卷四百八十九

995至997年，占婆累侵瞿越边境。《大越史记》卷一

毗阇耶

继因陀罗跋摩五世者，吾人惟据宋史，知其王名"杨普俱毗茶室离"，或"杨普俱毗茶逸施离"。审其对译之音，其原名应为Yan Pu Ku Vijaya，惟非全名也。咸平二年(999)，入贡宋朝；则999年时，其王已即位矣。《宋史》卷四百八十九

因陀罗跋摩五世虽即位于佛逝城，仍回居椰子部落历代王朝之古都因陀罗城。毗阇耶(Vijaya)立，因旧都已为瞿越破毁，乃迁都佛逝(Vijaya)。按：佛逝与毗阇耶原名皆同。兹译其王为毗阇耶者，名从主人也。又名其城为佛逝者，名从旧译也。自是以迄占婆之亡，遂为王都。《大越史记》卷一

1004年毗阇耶遣使朝宋，时瞿越帝黎桓亦遣其子黎明提入贡。次年"上元节，赐明提钱，令与占城大食使观镫宴饮。"《宋史》卷四百八十八及卷四百八十九

1007年，占婆王遣使奉表朝宋。"表函藉以文锦。词曰：占城国王杨普俱毗茶室离顿首言；臣闻二帝封疆，南止届于湘楚，三王境界，北不及于幽燕，仰瞩昌时，实迈往迹。伏惟皇帝陛下乾坤授气，日月储英，出震居尊，承基御极，慈悲敷于天下，声教被于域中。业茂前王，功芳徂后，苍生是念，黄屋非心；无方不是生灵，有土并为臣妾，真风遍布，霈泽周行，凡沐照临，共增耸抃。臣生于边鄙，幸袭华风；蚁垤蜂房，聊为遂性；龙楼凤阁；尚阻观光。再念自假天威，获全封部，邻无侵夺，俗有舒苏。每岁拜遣下臣，问宁上国，蒙

陛下恩沾行苇,福及豚鱼,特因回人,颁赐戎器。臣本土惟望阙焚香,欢呼拜受,心知多幸,曷答洪恩。君既念于宾王,微恳宁忘于述职。今遣专信臣布禄爹地加,副使臣除逋麻瑕珈邪,判官臣皮霸抵,一行人力等,部署土毛,远充岁贡,虽表楚茅之礼,实怀鲁酒之忧;虔望睿明,甫宽谴戮。专信臣等回日,军容器仗耀武之物,伏愿重加赐赉。盖念忝为臣子,合告君亲;服饰车舆,威仪斧钺,不敢私制,惟望恩颁。干冒冕旒,不任死辜。布禄爹地加言,本国旧隶交州,后奔于佛逝,《宋史》误作游北去旧所七百里。"《宋史》卷四百八十九

诃梨跋摩二世

毗闍耶王之后,吾人据宋史四百八十九知继立者为大中祥符三年(1010)入贡之"施离霞离鼻麻底"。其原名似为 Harivarmadeva,今姑名之曰诃梨跋摩二世(Harivarman II.)。1010 年之后,1011 年贡狮子于宋越二国之贡使,及 1015 年入宋贡使,应亦为此王所遣。至 1018 年遣使入贡之"尸嘿排摩喋",疑亦此王也。《宋史》卷四百八十九

先是瞿越黎桓之子龙铤,为大校李公蕴所废,自立为帝。是为李朝太祖(1009 至 1028)。《越史略》卷二 1021 年,命长子开天王李佛玛(一名德政即越太宗,1028 至 1054)侵占婆之布政寨,杀其布令。官名《大越史记》全书卷二

毗建陀跋摩四世

据《宋史》,卷四百八十九"天圣八年,(1030)占城王阳补孤施离皮兰德加拔麻叠遣使来贡",则占波又易新王矣。审其译音,原名应为 Yan Pu Ku çri Vikrantavarman IV.,殁於 1041 年。

阇耶僧诃跋摩二世

毗建陀跋摩四世死,子阇耶僧诃跋摩二世立。1042 年入贡中

国,即宋史之“刑卜施离值星霞弗(Yan Pu çri Jaya Sinhavarman II.)”,亦即越史之“乍兜”也。《宋史》卷四百八十九《大越史记全书》卷二

1043年,其舟师侵寇瞿越海岸,掠劫居民,兵至始遁。越帝佛玛亦以占城十六年来不修藩礼欲讨之,治龙凤鱼蛇虎豹鹦鹉之舟百馀。1044年1月12日,命长子开皇王日尊(即越圣宗,1054至1072)监国,亲讨占城;道遇风浪,舟停大鹀避之,改名其地为大安州。次麻姑山,山在河静奇英县境紫云盖日。次河脑湾,云随帝舟,为停一日。次思明海口,白鱼入舟,海风甚顺。一日越大长沙、小长沙,至鸟龙(Dièn long)海口,在承天府富荣县东南,今名思贤。闻占城王顿军五蒲江南岸,乃舍舟登陆;举旗击鼓,取径渡江进攻,兵刃未接,占城将卒遁走;斩占城王首。占城人死者三万馀,俘五千馀,战象死者六十。7月师次佛逝,进取其城,入据王宫,虏获宫嫔舞女,遣官招抚各地。8月回师乂安,9月还涖仁,今河内里府献俘太庙,配所俘占人于永康、今襄阳府永和县登州今归化府一带。纳宫嫔入后宫,宫女有自沉者。《越史略》卷二《大越史记全书》卷二《纲目》卷三第八王朝遂亡。

第八王朝世系 自989至1044年

第一佛逝王朝——因陀罗跋摩五世——毗阇耶——诃梨跋摩——毗建陀跋摩——僧伽跋摩二世

第六章

第九王朝 自1044至1074年

阇耶波罗密首罗跋摩一世

第九王朝之先,战士也。建国者王号阇耶波罗密首罗跋摩一世(Jaya Paraineçvaravarman I.)。

"宾童龙之人,愚昧暴恶,数叛诸王,不奉新主,叠载诸人为此土之王。波罗密首罗跋摩国王,辛勤有为,民从甚众。数总新军,又命其甥王子大队主 Yuvaraja Mahasenapati 偕诸将士,往平其乱。宾童龙之人,出而应战,王师逐击,皆败藏洞窟。王师众多,诸方搜捕,尽俘其人,与牛象奴婢。王子以其半数重修此城,以其半施诸祠寺;命诸军采石建立神像,复建石柱,以矜武功。俾此地之人,知其信奉自在天王(Çiva),而不忘此年(1050)之战。"宁顺之 Po Klaun Garai 碑

1050年,此王遣使入贡于宋(译者按:宋史,其使名俱舍唎波微收罗婆麻提杨卜应为此时国王之名 Ku çri Parameçvaravarmadeva Yan Po 之译音,殆修史者误以为贡使之名也。)。1053年又入贡。1056年其使"贡方物还至太平州,江岸崩沉,失行橐。明年正月,诏广州赐银千两"。《宋史》卷四百八十九

此王对越亦修藩贡。1047年,其使至越,为越所留,不遣还国。《越史略》卷二,天感圣武四年,占城人贡,命流其使于登州,因其王不逊也。1050年,又贡白象。1055年,越圣宗日尊新立。太宗去年死圣宗立改号

大越在位 1054 至 1072。遣使朝贺 1057 年、一作 1059 1060 年，又入贡。《纲目》卷三《越史略》卷二《全书》卷二卷三

“此地上常胜之君”，兴复前此越兵及内讧所毁之故迹，并再造神祠之宝藏。1050 年重修浦那竭罗(Pu Nagara)女神神像。以田地金银诸宝物，及占婆、吉蔑、中华、蒲甘、(Pukam)即缅甸暹罗奴五十五人施之。衙庄之浦那竭罗碑

拔陀罗跋摩二世

前王死，拔陀罗跋摩二世(Bhadravarman II)立。其即位时应在 1060 年或 1061 年年初。宋嘉祐六年(1061)献驯象之使，应为此王所遣也。《宋史》卷四百八十九

律陀罗跋摩三世 1061 至 1074 年

1061 年年终，前王之弟即位，王号律陀罗跋摩三世(Rudravarman III.)，衙庄浦那竭罗碑亦即《宋史》所称之“施里律茶盘麻常杨溥(Çri Rudravarman sam yan po)’及“杨卜尸律陀般摩提婆(Yan Pu çri Rudravarmadeva)”。《越史略》所称之“第矩”，《大越史记》所称之“制矩”者是也。

即位后，修武备以抗交趾。《宋史》卷四百八十九 1062 年入贡中国。宋神宗“赐其王白马一，从其求也”。同上但律陀罗跋摩三世尚未敢对越用兵，于 1063 年、1065 年、1068 年入贡于越。《越史略》卷二《全书》卷三

此王又求天佑，于 1064 年，以银瓶、金伞诸物，供献杨浦那竭罗(Yan Pu Nagara)女神。衙庄之浦那竭罗碑

1068 年又入贡于宋。“乞市驿马，诏赐白马一，令于广州买骡以归”。《宋史》卷四百八十九本年未终，以兵侵袭越境。《全书》卷三

越李圣宗于神武元年(1069)二月兴师讨占城。舟师停南界海

口，进占日丽海口，复占大小长沙，至尸唎皮奈（Çri Banöy）登陆。闻占城顿兵须毛江，以待越师，越军进击之；斩其将布皮陀罗，占城兵败走。律陀罗跋摩三世闻军败，夜弃佛逝城遁。越军次同罗津，佛逝城人开城迎降。李圣宗入城，遣军逐占城王于真腊界。吉蔑四月虏占城王而归。五月圣宗大宴诸臣于占城王宫，《越史略》卷二并上表于宋。“言占城国久阙贡，臣新帅兵讨之，虏其王”。《宋史》卷四百八十九

佛逝城有户二千五百六十，圣宗命尽焚其城郭居屋。六月师还越都，入城时诸将拥帝车；律陀罗跋摩白衣麻冠，缚手偕其王族步随于后。七月献俘太庙。《越史略》卷二

律陀罗跋摩三世，割地里、今临平州见《纲目》卷三至《大越史记》卷三作今广平误麻令、后改明灵州今广治省北部布政今广平省平政明政布泽三县地三州地以求释。越地遂南抵越（Viet）海门，占婆土地大削。圣宗乃释律陀罗跋摩归国。（1069年终）《越史略》卷三

占婆国王被虏以后，国中大乱，十王竞立，互相攻伐。衙庄之浦那竭罗碑

律陀罗跋摩归国之后，是否复位，吾人不知。1071年、1072年（其年越圣宗死，子乾德立，是为仁宗。）、1074年，占城贡越之使，1072年贡宋之使。是否为其所遣，亦无从知之。惟据宋史所志；卷四百八十九 1074年，“李乾德上言，其（占婆）王领兵三千人并妻子来降”，则律陀罗似未能复位也。

第九王朝世系 自1044至1074年

阇耶波罗密首罗跋摩一世
- **律陀罗跋摩三世**
- **拔陀罗跋摩二世**

第十王朝 自 1074 至 1139 年

诃梨跋摩三世 自 1074 至 1080 年

时有“淡(Than)”王名“杨毗悉纽磨第(Yan Visnumurti)”,或名“摩陀婆磨第(Madhavamurti)”者,母出槟榔部落,父出椰子部落之两大族,以兵力自王占婆补罗(Campapura)。考碑文云:“越兵侵占占婆,王神财富,皆为所得。占婆诸州祠寺、宫殿、村庄、马、象、牛、谷,咸为掠劫。于是毗阇耶释利诃梨跋摩提婆(Vijaya çri Harivarmadeva,yan Devatamuti)即位,大破敌兵,君临占婆城(Nagara Campa),兴复神祠;国之隆盛,一如往昔。诃梨跋摩(Harivarman III.)功成,享受王福。”美山碑此王“克敌者十二次,在战场取国王大将诸人之首者九次”。美山碑当时律陀罗跋摩三世或即其“敌”之一,故奔投越国。

1075 年越仁宗或欲律陀罗跋摩之复位,特命李常杰讨占城,为占婆新王所败,仅保所割三州而已。《大越史记》卷三

宋臣王安石,以交趾新败可取,乃大治戈船。越仁宗李乾德乃先发制之,分三道寇宋。1075 年 10 月 31 日陷钦州,11 月 6 日陷廉州,1076 年 2 月 12 日陷邕州。《宋史》卷十五诏以宣徽南院使郭逵代赵离为安南道行营都总管,《宋史》卷三百三十二《赵离传》又卷十五《本纪》命真腊占城协击交趾,《宋史》卷十五遣小校樊实(赴占城)谕旨;实还言,其国选兵七千扼贼要路,其王以木叶书回牒,诏使上之,然亦不能成功。《宋史》卷四百八十九

至此役究竟胜属何方,颇难明也。安南史书谓乾德胜,《越史略》卷三中国史书则谓郭逵胜,《文献通考》卷二十四即诃梨跋摩亦不知之。故英武昭胜二年(1077)入贡于越,《越史略》卷二熙宁十年(1077)亦入贡于宋。《宋史》卷十五

此王在位时，曾在苏摩首罗（Someçvara）破吉蔑亲王释利难陀那跋摩（Çri Nandanavarmadeva）之兵。又命其弟盘（Pan）王为主将，侵入吉蔑境，取商菩补罗（Çambhupura）、〔今（Sambor）〕俘掠人物甚众，归献神祠。

自是以后，外患既宁，诃梨跋摩乃重修占婆城（按即因陀罗补罗古都）宫祠。又命其弟盘王，重修诸州神祠。美山碑诃梨跋摩三世，盖为“恢复占婆隆盛”之国王也。美山碑

1076年，占城使至中国，言“所治聚落一百五，大略如州县。王年三十六岁，著大食锦或川法锦，大衫七条，金缨珞，戴七宝装成金冠，蹑红皮履。出则从者五百人，十妇人执金桦合，贮槟榔，导以乐”。《宋史》卷四百八十九

1080年，诃梨跋摩三世禅位于其子浦良罗阇堕罗（Pulyan Rajadvara）。嗣王时年九岁也。王号阇耶因陀罗跋摩（Yan po ku çri Jaya Indravarman）。次年诃罗跋摩三世死，妇女投海以殉者十四人。美山碑

阇耶因陀罗跋摩二世 1080年

阇耶因陀罗跋摩二世，“在位甫一月，年甚幼稚，未明善恶，不谙治国，乃与诸队主（Senapati），婆罗门、太史、博士、（Pandit）仪师，暨诃梨跋摩诸妇，寻求堪以治国之王。王叔盘王，有大王 Maharaja 之表；深明善恶，诚实公平，惠人爱物，堪以治国。阇耶因陀罗跋摩偕同婆罗门博士、太史、仪师，暨诸妇等，以宝器王徽奉之，共戴为王。释利波罗摩菩提萨埵（Çri Paramabhodisatva）依法即位，厚赏诸队主，及占婆之人，有幸如睹前代。其侄阇耶因陀罗跋摩退位，任享财富安乐，释利波罗摩菩提萨埵治理占波王国”。美山碑据此碑文所志，殆为一种废立也。（1080）

波罗摩菩提萨埵 自1080至1086年

先是律陀罗跋摩三世被俘之后，内乱随起，宾童龙有人自立为国王，至此王即位之时，已十六年矣。占婆人之避乱至宾童龙者，皆为掳索。新王既立，乃讨灭伪王，统一占婆。以其所获金银宝器诸象，施供杨浦那竭罗女神。衙庄浦那竭罗碑

波罗摩菩提萨埵每年入贡越国，《越史略》卷二惟未遣使至中国。目录

诃梨跋摩之子见废，其侍臣若队主、将士、博士、前王诸妇，阴谋复位。运动成熟，遂举兵灭波罗摩菩提萨埵，再奉阇耶因陀罗跋摩二世为王。美山碑

阇耶因陀罗跋摩二世之复位 1086年

阇耶因陀罗跋摩复位之后，重与中国联十年来已断之国交，遣使入贡。(1086年)《宋史》卷十七重兴为此次内乱所毁之占婆补罗城，美山碑建神祠，施供物，美山碑复入贡越国，《越史略》卷二但尚不忘割地之耻也。占婆与越国同入贡中国之时，占婆使臣"乞避交人，诏遇朔日朝文德殿，分东西立，望日则交人入垂拱殿，而占城趋紫宸，大宴则东西坐。"《宋史》卷四百八十九1092年，占婆未入贡越国，而上表中国，言"如天朝讨交趾，愿率兵掩袭"。宋神宗"以交趾数入贡，不绝臣节，难以兴师，答敕书报之"。同上

占婆既绝越贡，越仁宗遣使责之。占婆王惧，复入贡于越。(1095年、1097年、1098年、1099年、1102年)。《越史略》卷二

初龙符三年，(1094)越国人李觉以演州叛，李常杰讨之，李觉奔占婆。1103年，觉言越内乱可乘虚复所割三州，占婆王信之，兴兵取三州。李常杰师至，占婆弃三州，复遣使入贡于越，《越史略》卷二并遣使入贡中国。《宋史》卷十九自是以后，占婆对越之朝贡不绝，

并遣贡使至中国。(1104年1105年)《越史略》卷二《大越史记》卷三《宋史》卷二十

诃梨跋摩四世

约当1113年时,阇耶因陀罗跋摩二世之侄诃梨跋摩四世(Harivarman IV.)继立,美山碑即宋史之杨卜麻叠是也〔译者按:即Yan Pu (Harivar)made(va)之省译〕。是年建祠塔。

1116年、《宋史》卷二十一 1127年、《通考》卷二十四 1129年,《宋史》卷二十五及卷四百八十九入贡中国,累受册封。1117年贡金花于越。次年使至,参加越国胜严圣寿二寺落成典礼。《越史略》卷三嗣后1120至1124年,每年遣使入贡于越。1126年,使至越,越帝赐御宴。同上

第十王朝世系 自1074至1139年

- 槟榔部落、椰子部落
  - 波罗摩菩提萨埵
  - 诃利跋摩三世
    - 诃梨跋摩四世
    - 阇耶因陀罗跋摩二世

第七章

第十一王朝 自 1139 至 1145 年 十一王朝惟有一王

闍耶因陀罗跋摩三世 自 1139 至 1145 年

继诃梨跋摩四世而王占婆者，为闍耶因陀罗跋摩三世(Jaya Indravarman III.)。此王似非王族，盖据碑文，其王自以系出优珞闍(Uroja)、拔陀罗跋摩(Bhadravarman)、闍耶僧伽跋摩(Jaya Sinhavarman)、因陀罗跋摩(Indravarman)诸王也。美山碑

此王生于 1106 年。1129 年封提婆罗闍(Devaraja)，1133 年封瑜婆罗闍(Yuvaraja)，此为印度制王嗣之号。意者诃梨跋摩无子，因其系出前朝，故立之为嗣欤。1139 年前王死，嗣位，即位后建立神祠。美山碑衙庄浦那竭罗碑

初吉蔑国王苏利耶跋摩(Suryavarman)于 1112 年嗣王位，欲“征服大地诸王”。时女真建金国于中国北方，宋朝南迁，正防御金国，无暇顾及南夷。越国仁宗死，侄神宗立，(1127 至 1138)年甫二十一岁，得疯疾死，子英宗嗣立。(1138 至 1175)英宗死，子高宗立。(1175 至 1210)皆幼年嗣位，大权操诸宫廷及大臣，亦无暇顾及国外。苏利耶跋摩以为有机可乘，适越国亦常容留吉蔑占婆叛人，遂于 1128 年兴师二万讨越。为李公平败于义安。同年秋，又遣海舟七百寇掠清华，自是遂以为常。占婆亦有时加入。1131 年吉蔑占婆联寇越国之师败于义安。1136 年闍耶因陀罗跋摩不欲助吉蔑侵寇越国，仍修藩贡。1145 年吉蔑王遂移师以寇占婆，取

佛逝城。阇耶因陀罗跋摩不知所终。《越史略》卷三目录梵碑

第十二王朝

律陀罗跋摩四世 1145年

第十一朝亡,律陀罗跋摩四世(Rudravarman IV.)继立,避吉蔑之兵,南奔宾童龙。宾童龙奉其子湿婆难陀那王(Çivanandana)为国王,时1145年也。宁顺之Batau Tablah碑

阇耶诃梨跋摩一世 自1145至1167年

湿婆难陀那王立,王号阇耶诃梨跋摩一世(Jaya Harivarman I.)。母族为刹帝利(Ksatriya)族。自以其先系出波罗摩菩提萨埵王,美山碑幼奔外国。父死,在宾童龙嗣位为王。美山碑及宁顺Batau Tablah碑

吉蔑王苏利耶跋摩闻占婆新立国王,命诸队主复往攻之,阇耶诃梨跋摩破之于罗阇补罗(Rajapura)平原。(1148)吉蔑王复以"千倍之师来",又败于毗罗补罗(Virapura)平原。美山碑宁顺Batau Tablah碑

苏利耶跋摩战既不能胜,乃立其妻弟刹帝利族之诃梨提婆(Harideva)王为占婆国王。使诸队主护之至佛逝,阇耶诃梨跋摩击斩之,遂入佛逝,"即位为无上国王"。(1149)美山碑

时诸山蛮(Kiratas)亦奉占婆王之妻兄般舍罗阇(Vançaraja)为王,占婆王又击走之。般舍罗阇《越史略》作雍明叠《大越史记》作雍明些叠奔越国乞兵,越英宗册之为占城王,命上制官名阮蒙率清华义安兵五千人助之。《越史略》卷三据碑文美山碑云:"越yavana王见阇耶诃梨跋摩雄武无敌,欲制阻之,命占婆人般舍罗阇为国王,予以越将多人,强兵十万馀。阇耶诃梨跋摩率佛逝诸军击破之,死者不可胜计。美山碑般舍罗阇与阮蒙亦亡于阵。《全书》卷四时在1150终或

1151 年初也。

1151 年，占婆王又平阿摩罗婆胝。衙庄浦那竭罗碑 1156 年宾童龙叛，亦讨平之。宁顺 Batan Tablah 碑外患内乱皆平，乃建神像，献供物。美山碑

1155 年遣使进方物于宋，宋史云邹时阑巴嗣立求封爵。宋高宗授之。《宋史》卷四百八十九对越亦屡贡屡寇其境，《越史略》卷三有时贡使兼为掠寇。《全书》卷四越国久欲正其罪，闻新王阇耶因陀罗跋摩四世(Jaya Indravarman Ⅳ.)立，以为有机可乘；命苏宪诚讨之。兵至占境，新王惧，遣使献宝石方物乞降，乃命师还。《全书》卷四

阇耶诃梨跋摩二世

阇耶诃梨跋摩一世死，子阇耶诃梨跋摩二世(Jaya Haravarman Ⅱ.)立。美山碑此王在位至少数月，至多亦不过四年；盖宋孝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宋史》卷三十三前王尚入贡中国，嗣后何年死，其子何年立，皆无从知之。惟知 1166 年末或 1167 年初，王位为阇耶因陀罗跋摩四世所篡耳。

阇耶因陀罗跋摩四世

阇耶因陀罗跋摩四世，即《宋史》卷四百八十九之邹亚娜。乾道三年(1167)“遣使入贡，福建市舶司言大食国人乌师点等诉占城入贡，即所夺本国物”。“孝宗以争讼却之”。“臣僚亦言邹亚娜承袭，若以礼入贡，则当议封；既与大食争讼，难即降诏。俟再贡如礼，然后赐命”。《通考》卷二十四

时阇耶因陀罗跋摩欲取真腊；即吉蔑欲修好越国，俾守中立。乃于 1170 年入贡于越。北方既安，乃兴兵侵取真腊。时真腊王为陀罗尼因陀罗跋摩二世(Dharnindravarman Ⅱ.)在位也。《越史略》卷三《校刊》卷三

1171年占婆与真腊战，“皆乘大象，胜负不能决”。《宋史》卷四百八十九时宋“有泛海官吉阳军者，飘至占城”。见之，“乃说王以骑战，教之弓弩骑射，其王大悦，具舟送之吉阳军，今崖州厚赍随以买马，得数十疋。以战则克，次年复来，人从甚盛，琼州不受。怒归，肆行劫掠”。《通考》卷二十四淳熙二年(1175)，宋孝宗诏“严马禁，不得售外蕃。三年(1176)，占城归所掠生口八十三人，求通商。诏不许”。《宋史》卷四百八十九

1177年“占城用舟师袭真腊，传其国都”。《宋史》卷同

1182年，真腊王阇耶跋摩七世(Jayavarman VII.)嗣立，《校刊》卷三誓复此仇。1190年〔按美山碑云：“柬浦寨亦即吉蔑真腊王取佛誓，俘其王阇耶因陀罗跋摩。”衙庄浦那竭罗碑云：“是为柬浦寨国侵取全地之君，名阇耶跋摩(Vrah pada çri Jaya Varma deva)者是也。其王取占婆都城，掠其神像”云云。二碑皆作1190年。《宋史》作庆元1195至1200年以来，《通考》作庆元己未，1199年皆误 。〕占婆又侵寇柬浦寨，美山碑阇耶跋摩七世乃命释利毗多难陀那(Çri Vidyanandana)王统率诸军讨之。王为占婆人，(1182年)至真腊王廷，甚见宠爱。国王命授以学艺武略。后因平摩良(Malyan)按：《真腊风土记》有地名莫良，疑即此也，之功，封为瑜婆罗阇。美山碑至是命总真腊诸军取占婆都城；衙庄浦那竭罗碑虏其王美山碑目录而归。

占婆之分为二国 1192年

毗多难陀那既平占婆，以真腊王之戚英(In)王为王。王号苏利耶阇耶跋摩(Suryajayavarmadeva)，都佛逝；彼则去之宾童龙为王，王号苏利耶跋摩(Çri Suryavarmadeva)，都罗阇补罗。美山碑占婆遂分为南北二国：北为佛逝国，真腊亲王割据之；南为宾童龙国，王其国者虽为占婆人，然为真腊之附庸也。

佛逝国王旋为占婆人罗苏婆底(Rasupati)王所逐,奔归真腊。罗苏婆底代为佛逝国王,王号阇耶因陀罗跋摩五世(Jaya Indravarman V.)时在1191年也。美山碑明年真腊王释阇耶因陀罗跋摩四世之囚,使归国复位,归经宾童龙,求助于苏利耶跋摩。苏利耶跋摩领兵取佛逝城,杀阇耶因陀罗跋摩五世,不以王位予故王,自立为占婆国王。(1192)美山碑

苏利耶跋摩 自1192至1203年

阇耶因陀罗跋摩四世不能复位,乃走阿摩罗婆胝。招聚诸地兵,欲取佛逝,苏利耶跋摩迎击斩之。占婆至是复为一国。(1192)美山碑

明年真腊王以兵讨占婆不胜,又明年(1194)命诸队主率诸军讨之,又败。美山碑

1194年入贡于越。1199年越高宗李龙翰册之为占城王。《大越史记》卷三其王名布池

1203年真腊王命占婆王之叔陀那婆底(Dhanapati Grama)统真腊军讨占婆王。美山碑占婆王不胜,遁入海,奔越之九罗。今奇英让海口越人拒不纳,复入海,不知所终。时1203年8月也。《越史略》卷三

真腊之并占婆 自1203至1220年

陀那婆底既平占婆,献捷于真腊王。真腊王置省于占婆,即以陀那婆底为省主。

先是阇耶诃梨跋摩二世有子名庵舍罗阇(Ançaraja uran Turaivijaya),育于真腊宫廷。至是随陀那婆底至占婆,曾率真腊军累侵越之义安。美山碑至1220年遂王占婆。

阇耶婆罗密首罗跋摩二世

1220年真腊军退归本国,以王权移附庵舍罗阇,遂即位为占

婆王。王号阇耶波罗密首罗跋摩二世(Jaya Parameçvaravarman II)。梵碑百年来占波吉蔑之争战于是告终。而暹罗勃兴,真腊又添一新敌矣。

第八章

真腊既为暹罗所牵制，自不能再有事于占婆。此时占婆之敌不在南而在北方，新入主中国之元朝，及越国之陈氏耳。

当阇耶波罗密首罗跋摩二世中兴祖业之际，亦即越国易代之时。越高宗死，子昰嗣立，是为惠宗(1222)。1224年，惠宗禅位于女佛金，亦号天馨又号昭圣时年七岁；纳越臣陈守度之侄煚为婿，煚时年八岁也。次年(1225)煚承帝位，是为越国陈氏太宗。新朝既建，与占婆之争，自在难免。而占婆自李氏末代诸帝之时，乘国势衰弱，常以轻舟寇掠越国沿岸。后太宗亲政，占婆虽贡献未缺，(仅于1228年1242年入贡二次)因其寇边，遣使责之。占婆乃求退还前割三州。陈太宗怒，于元丰二年(1252)命皇子钦天王日皎监国，亲往讨之。虏占婆王后布耶罗宫嫔大臣甚众而还。《全书》卷五《纲目》卷六

阇耶因陀罗跋摩六世

占婆王死，弟诃梨提婆(Harideva)王继立，是为阇耶因陀罗跋摩六世(Jaya Indravarman VI)。梵碑

新王好学多闻，美山碑1265年入贡于越。其甥释利诃梨提婆(Çri Harideva)弑之，梵碑占碑并斩其舅宝脱秃花左右二大指。《元史》卷二百一十至1277年即位为王，王号因陀罗跋摩六世。

因陀罗跋摩六世 自1265至1287年

据《马可波罗(Marco Polo)游记》，1278年时，其王已老。此王

欲结好越国，于1266年、1267年、1269年、1270年入贡。

当时蒙古勃兴于北方，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于1264年即位，遣使谕越圣宗入朝。1267年、1275年、1278年叠遣使征其入朝不至。

当时占婆自亦不免为元所征召。《元史》卷二百一十至元间广南西道宣慰使马成旺常请兵三千马三百匹征之

1278年，元"左丞唆都(Sagatou)以宋平，遣人至占城还，言其王失里咱牙信合八剌哈迭瓦(按：此其王亦名 Çri jaya Sinhavarmadeva。此名亦见碑载，惟1277年以后诸碑皆称之为因陀罗跋摩。)有内附意，诏封占城郡王"。《元史》卷二百一十 1279年"六月，占城马八儿诸国遣使以珍物及象犀各一来献，赐诸王所部银钞、衣服、币帛、鞍勒、弓矢及羊马、价钞等各有差"。《元史》卷十 1280年初，遣使"与唆都等使占城，谕其王入朝。2月，占城国王保宝旦拿啰耶邛南詑占把地啰耶疑为尊号 Pu Pon tana raja…Campadhiraja 之译音，非王名也。遣使贡方物"。《元史》卷二百一十"六月复招谕占城国"。《元史》卷十一"八月占城马八儿国皆遣使奉表称臣，贡宝物犀象"。同"11月谕占城国主，令其子弟或大臣入朝"。同1281年"10月命失里咱牙信合八剌麻合迭瓦为占城郡王"。同同月，"朝廷以占城国王孛由补剌者吾似亦尊号非王名也曩岁遣使来贡，称臣内属，遂以唆都为右丞，刘深为左丞"。即其地立省以安抚之。《元史》卷十一又卷二百一十"既而其子补的〔按即诃梨纪特(Harijit)王〕负固不服"。《元史》卷二百一十唆都等乃归。

1282年"六月以占城复叛，发淮、浙、福建、湖、广军五千人，海船百艘，战船二百五十，命唆都为将讨之"。《元史》卷十二师未出发，元遣使暹国马八儿国诸使"舟经占城，皆被执。故遣兵征之"。帝

(元世祖)曰,老王无罪,逆命者乃其子与一蛮人耳。苟获此两人,当依曹彬故事,百姓不戮一人。11月,占城行省官率兵自广州航海至占城港。港口北连海。海旁有小港五,通其国大州。东南止山,西旁木城。官军依海岸屯驻。占城兵治木城,四面约二十馀里。起楼棚,立回回三梢炮百馀座。又木城西十里建行宫。孛由补剌者吾亲率重兵屯守应援。行省遣都镇抚李天祐,总把贾甫招之,七往,终不服。12月,招真腊国使速鲁蛮请往招谕,复与天祐、甫偕行。得其回书云,已修木城,备甲兵,刻期请战。二十年,正月,行省传令军中,以十五日夜半,发船攻城。至期,分遣琼州安抚使陈仲达、总管刘金、总把栗全,以兵千六百人,由水路攻木城北面。总把张斌、百户赵达,以三百人攻东面沙觜。省官三千人,分三道,攻南面。舟行至天明泊岸,为风涛所碎者,十七八。贼开木城南门,建旗鼓出万馀人,乘象者数十,亦分三队迎敌。矢石交下。自卯至午,贼败北,官军入木城。复与东北二军合击之,杀溺死者数千人。守城供饷馈者数万人,悉溃散。国王弃行宫,烧仓廪,杀永贤、伊兰等,与其臣逃入山。17日整兵攻大州。19日国主使报答者来求降。20日兵至大州东南,遣报答者回,许其降免罪。21日入大州,又遣博思兀鲁班者来,言奉王命来降。国主太子即后至,行省檄召之。官军复驻城外。22日遣其舅宝脱秃花等三十馀人奉国王信物杂布二百匹、大银三锭、小银五十七锭、碎银一瓮为质,来归款。又献金叶九节标枪,曰:国主欲来,病未能进,先使持其枪来,以见诚意。长子补的期三日请见,省官却其物。宝脱秃花曰,不受是薄之也。行省度不可却,姑令收置,乃以上闻。宝脱秃花复令其主第四子利世麻八都八德剌,第五子利世印德剌来见,且言先有兵十万,故来战,今皆败散;闻败兵言,补的被伤已死,国王

颊中箭。今小愈,愧惧未能见也。故先遣二子来议赴阙进见事,省官疑其非真,子听其还,谕国主早降,且以问疾为辞,遣千户林子全、总把栗全、李德坚偕往觇之。二子在途先归,子全等入山两程,国主遣人来拒,不果见。宝脱秃花谓子全曰:"国王迁延不肯出降,今反扬言欲杀我,可归告省官,来则来,不来我当执以往。"子全等回营,是日又杀何子志、皇甫杰等百馀人。2月8日宝脱秃花又至,自言吾祖父伯叔前皆为国主;至吾兄,今孛由补剌者吾杀而夺其位,斩我左右二大指,我实怨之。愿擒孛由补剌者吾补的父子,及大拔撒机儿以献。请给大元服色。行省赐衣冠,抚谕以行。13日居占城唐人曾延等来言;国主逃于大州西北鸦候山,聚兵三千馀,并招集他郡兵未至,不日将与官军交战。惧唐人泄其事,将尽杀之。延等觉而逃来。15日宝脱秃花偕宰相报孙达儿及撮及大师等五人来降,行省官引曾延等见。宝脱秃花诘之曰:"延等奸细人也,请击缧之。国主军皆溃散,安敢复战。"又言:"今未附州郡凡十二处,每州遣一人招之。旧州水路,乞行省与陈安抚及宝脱秃花各遣一人乘舟招谕攻取;陆路则乞行省官陈安抚与己往禽国主补的及攻其城。"行省犹信其言,调兵一千屯半山塔,遣子全德坚等领军百人与宝脱秃花同赴大州进讨,约有急则报半山军。子全等比至城西,宝脱秃花背约间行自北门乘象遁入山。官军获谍者曰:国主实在鸦候山立砦,聚兵约二万馀,遣使交趾、真腊、阇婆(Java)等国借兵,及征宾多龙(Panduranga)旧州等军未至。16日遣万户张颙等领兵赴国主所栖之境,19日颙兵近木城二十里。贼泼濠堑,拒以大木。官军斩刈超距奋击,破其二千馀众。转战至木城下,山林阻隘不能进。贼旁出截归路,军皆殊死战,遂得解还营。行省遂整军聚粮,创木城,遣总管刘金、千户刘涓、岳荣守御。《元史》卷二百一十

1283年6月14日,“占城行省已破占城,其国主补底遁去,降玺书招徕之”。《元史》卷十二唆都“又败之于大郎湖,斩首六万级。唆都造木为城,辟田以耕,伐乌里越里诸小夷皆下之”。《元史》卷一百二十九《唆都传》

元军虽累胜,终未能平服占婆。国王避居山中不出。唆都所损亦多。初有军五千人,1283年五月阴历复调军万五千人以从征,并给唆都弓矢甲杖;1284年二月阴历又发兵万五千人,船二百艘,助征占城。船不足,命江西省益之。三月阴历唆都领军回,九日后忽都虎、忽马儿、刘万庆等率援军至占城。军次新州,(Çri Banöy)护占蛮,始知元军已还,令人招其国主来降。“其国国王遣阿不兰又作文劳邛大巴南来称,其国经唆都军马虏掠 ,国计已空,来岁当遣嫡子以方物进,继遣其孙路司又作济目理勒蛰等奉表诣阙”。“七月占城国王乞回唆都军,愿以土产岁修职贡,使太盘亚罗日加翳大巴南等十一人奉表诣阙献三象”。“十一月又遣使奉表贺圣诞节,献礼币及象二”。《元史》卷十三又卷二百一十

贡使虽累至,而占城终未征服。元世祖遂欲舍海而由陆路运兵赴占城;顾兵行陆路,须假道越国。先是越圣宗禅位于长子陈昑,是为仁宗。元世祖曾征之入朝不至,止令其叔陈遗爱入觐。元世祖(1255)立遗爱为安南国王,1164年以来中国改称交趾为安南置安南宣慰司。越仁宗拒不纳,并拒唆都军假道。至1283年世祖命越国助兵粮以讨占城,1284年仁宗又上表辩明未与占城通谋,遣兵二万及船五百之事。是年终,元命皇子镇南王脱欢(Togan)征占城。1285年1月28日军至越境,责仁宗运粮送至占城助军。仁宗复书言;其国至占城水陆非便,遣兵分道拒守。脱欢累破越军,入其都城。唆都等兵亦至自占城,与大军会合。仁宗与其父逃窜清华。

四月阴历仁宗集诸军进攻，破脱欢军。唆都尚未知脱欢军败，越兵复邀击之。唆都力战而死。《元史》卷十一卷十二卷二百〇九《全书》卷五《纲目》卷七

此役蒙古损军无数，结果毫无。占婆既免军祸，然惧元军之再至，于1285年10月6日偕真腊贡乐工十人及药材鳄鱼皮诸物于元。《元史》卷十三自是以后，元世祖似放弃侵略占城政策矣。惟占城行省至1289年始废。

据《马可波罗游记》，彼于1288年至占婆时，因陀罗跋摩六世已不居王位，似已让位，或已老死。

阇耶僧伽跋摩三世 自1287至1307年

阇耶僧伽跋摩三世(Jaya Sinhavarman III.)继立，是即碑文之阿梨纪特(Harijit)王，亦即元史之补的或补底，越史之制旻也(按元史越史之译法，越史盖翻其王号原名首末 Çriman 二音，元史补的或亦为 Pu De(va)音之转)。彼对元世祖未修朝贡；对越惟至英宗陈烃即位之年(1293)始遣使朝贡。按：仁宗于1293年禅位于长子英宗在位自1293年至1314年仁宗退位后，于1301年曾因占婆使臣归国，偕往占婆。占婆王待之甚厚，离占婆时，许以女玄珍妻之。后越廷诸臣多谏阻，《全书》卷六〔时占婆王已有后，并娶爪哇王女多婆西(Tapasi)为妃。宁顺之 Po Sah 碑〕故至1305年，尚未以女下婚占婆。占婆遣使制蒲苔至越行聘，并许以婚后割乌里二州于越。英宗力排众议，允妻以妹。越人耻之；以为此举无异汉高之以女妻冒顿，王嫱之下降呼韩。诗人作歌讽之。(1306)《全书》卷六

次年春，英宗命段汝谐至占婆，受割地，以为顺化二州。《全书》卷六

阇耶诃梨跋摩死于其年(1307)之五月，阴历越英宗命行遣陈克

终迎其妹归越。《全书》卷六

第十二王朝世系

律陀罗跋摩四世 — 阐耶诃梨跋摩一世 — 阐耶诃梨跋摩二世
- 阐耶波罗密首罗跋摩二世
- 阐耶因陀罗跋摩六世
- 宝脱秃花
- 女、□ — 因陀罗跋摩六世 — 阐耶僧伽跋摩三世
  - 制能
  - 阐耶僧伽跋摩四世

第九章

阇耶僧伽跋摩四世 自1307至1312年

阇耶僧伽跋摩三世死，子阇耶僧伽跋摩四世(Jaya Sinhavarman Ⅳ.)立，占婆后拔释伽罗(Bhaskaradevi)所出也。《梵碑》越史名之曰制至或制鸷者是也。《全书》卷六即位之后，虽遣使朝越，然占人尚不忘所割二州，故时侵寇越境。英宗以其反侧，于1312年五月阴历亲讨之。师次临平，广平中部南部分兵三路：一路由海路进，一路由山路进，一路段汝谐领之。由平原进，至俔占寨，命其寨主谕占城王来降。阇耶僧伽跋摩率其族由海道至英宗军前纳款，占军有不愿降者，乘象攻英宗营。越军击平之，虏占城王。英宗命占城王之弟制陀阿婆粘为亚侯，摄行占城国事。六月师还，封占城王为效忠王，旋改封为效顺王。1313年初，占城王以忧死，依其国俗火葬之。《全书》卷六

此时之占婆，事实上无异越国一省，但于1312年入贡于元一次。《元史》卷二十四1313年终，暹逻王侵占婆，越英宗命杜元为义安临平经略使，击走之。《全书》卷六

制能 1312至1318年

赵国所立之占城王制陀阿婆粘，旋即位。据越史，其王号为制能，《纲目》卷九乘越明宗陈奋英宗1314年禅位于第四子奋在位自1314至1329年新立无备，以兵袭顺化二州，越将范五老击破之。制能畏越国之声讨，出奔爪哇。(1318)《全书》卷六十二王朝遂亡。

第十三王朝 自 1318 至 1390 年

制阿难 自 1318 至 1342 年

制能出奔，占婆无继王者，越将范五老奏以土酋阿难为占城王，越帝允之；册封为效诚亚王。(1318)《全书》卷六制阿难立，欲结连元朝以制越。先是 1316 年制能在位时，元仁宗谕安南国归占城王；《元史》卷二十五至 1320 年，元英宗新立，遣马扎蛮等使占城、真腊、龙牙门索驯象；《元史》卷二十七 1322 年初，占城遣使贡方物于元；《元史》卷二十八 1323 年占城王遣其弟保佑八剌遮奉表入贡于元；《元史》卷二十八 1324 年元泰定帝立，命马合谟杨宗瑞奉即位诏，往谕安南《元史》卷二十九勿侵占城地；《纲目》卷九云使来颁新历 1326 年越明宗亲讨占城，为制阿难所败，自是占城遂不朝越，但仍入贡于元；(1327 年 1328 年 1330 年)《元史》卷三十卷三十五 1329 年越明宗时年二十禅位于其幼子陈旺，是为宪宗，时年十岁亦不能讨，元朝亦将亡，故占婆得保小康。

制阿难之婿茶和布底为布提，宰相甚见幸任，得军民心。制阿难死，遂废王子制某而自立，时在 1342 年 6 月也。《全书》卷七

茶和布底 自 1342 至 1360 年

制某不甘，与茶和布底兵争者十年，不胜奔越。先是越宪宗已于 1341 年死，弟陈皞继立。时年六岁 1346 年使责占城布提不修藩贡，占城以其势不敌，入贡于越，至是制某至，许以兵助其复国。次年(1353)以舟师送之返国，未至古垒，今广义省即回师，制某旋死。《全书》卷七茶和布底见越师不敢至占婆，欲以兵袭化州未果，时 1353 年九月阴历也。《全书》卷七

制蓬峨即阿答阿者 自 1360 至 1390 年

继荼和布底而王占婆者为越史之制蓬峨，明史之阿答阿者，艾莫涅君以为即年表之 Binasuor 是也。其即位之时，及其与荼和布底之关系，吾人不知。其名初见于《大越史记全书》卷七隆庆元年1372年记事之中。《明史》卷三百二十四云："洪武二年，1369太祖遣官以即位诏谕其国，其王阿答阿者先已遣使奉贡来朝，贡象虎方物。"其即位似在此时之前。顾越占之争，始于1361年，终于1390年。制蓬峨之死，兹姑以其王即位之时为1360年。1361年占城王侵寇陀里海门，今布泽县之里和社逐其守兵，杀戮居民，大掠而去。《全书》卷七越裕宗命临平省知府范阿窗防御之。次年占城又寇化州，裕宗命杜子平守御临平顺化等处。同

自是占城未入寇者二年。1365年正月，越之波阳男女依化州土俗作秋千戏，占人已于前月隐伏附近山中，至是虏其男女舟载以去。《全书》卷七

1366年占人以舟至临平，甫登岸，为大知府行宣守御使范阿窗击走之。《全书》卷七

1368年，越以占城数寇境，以明字官名陈世兴为统宣行遣官名偕同知尚书左司事杜子平讨之。师未发，占城使牧婆摩至越求还化州，不许。制蓬峨闻越师至，伏兵于占洞，昔升华府今广南省升平府破越兵，执世兴，子平败走，时1368年5月也。《全书》卷七

是年明太祖建国，定都金陵。次年遣使诏谕诸国，占城王阿答阿者即制蓬峨先已遣使贡象虎方物。太祖甚喜，即遣官赍玺书大统历文绮纱罗，偕其使者往赐其王，册封为占城国王。次年，(1370)占城复遣使入贡。自后或比岁贡、或间岁，或一岁再贡。1370年，明遣使往祀其山川，寻颁科举诏于占城，并谕安南占城解兵。《明史》卷二卷二百三十四

越裕宗死于1369年6月，越太后（明宗后）以长子恭肃王昱之养子杨日礼为嗣。裕宗弟恭定王暊举兵废之为昏德公，自立为帝，是为艺宗，时在1370年终也。日礼废后，旋被害。其母杨姜奔占波，告制蓬峨越国边境无备，可以侵袭。1371年阴历三月，占军入大安海口。如入无人之境，遂克都城。艺宗奔东岸，今北宁东岸县占军取子女玉帛，焚烧宫殿图籍而去。（闰三月）《全书》卷七

次年，《明史·占城传》作洪武四年即1371年，本纪作洪武五年即1372年，兹据本纪以为次年。占城王遣使奉金叶表入朝于明，表曰："大明皇帝登大位，抚有四海，如天地覆载，日月照临，阿答阿者譬一草木尔，钦蒙遣使以金印封为国王，感戴忻悦，倍万恒情。惟是安南用兵侵扰疆域，杀掠吏民，伏愿皇帝垂慈，赐以兵器及乐器乐人，俾安南知我占城乃声教所被，输贡之地，庶不敢欺凌。"明太祖命礼部谕之曰："占城安南并事朝廷，同奉正朔。乃擅自搆兵，毒害生灵；既失事君之礼，又乖交邻之道，已咨安南国王，令即日罢兵。本国亦宜讲信修睦，各保疆土，所请兵器，于王何吝。但两国互搆，而赐占城，是助尔相攻，甚非抚安之义。乐器乐人语音殊异，难以遣发。尔国有晓华言者，其选择以来，当令肄习。因令福建省臣勿征其税示怀柔之意。"《明史》卷三百二十四

按越史文，1372年无兵侵占城之事，制蓬峨即阿答阿者所言讹也。

1373年，占城贡使至中国，言"海寇张汝厚林福等自称元师，剽劫海上，国主击破之，贼魁溺死，获其舟二十艘，苏木（Cæsalpina）七万斤，谨奉献。帝嘉之，命给赐加等。冬遣使献安南之捷，帝谓省臣曰：去冬安南言占城犯境，今年占城谓安南扰边，未审曲直，可遣人往谕，各罢兵息民勿相侵扰。"《明史》卷三百二十四

越都河内为占军所取，事在1371年阴历三月二十七日。次月，艺宗即传位于其弟恭宣王敬，是为睿宗。明宗之第十一子睿宗即位，欲雪破都之耻，1374年初，即言率师亲讨占城。至1376年夏，师尚未出，适是年阴历五月占城又侵化州，乃决意亲征。诸臣谏不听。阴历十月，与上皇艺宗大阅于白鹤江，江在山西境阴历十二月，率师十二万出征占城，时已在1377年1月矣。《全书》卷七

制蓬峨闻越师出，惧而献十金盘以求息兵，为化州守将杜子平所收没。越师次日丽，留一月，命黎季犛由海道运军需赴弥沦海口。今广平省平政县涨沦社1377年阴历正月，师至尸耐港（Çri Banöy），驻倚忙洞，迫阇盘城。即佛逝城占人牧婆摩来言城空，制蓬峨已逃，可追获之。睿宗拒大将杜礼之谏，自引军偕御沟王勖鱼贯而入，占城伏兵尽起，睿宗《明史》名之曰陈煓败死。大将杜礼阮纳和行遣范玄龄等死之。御沟王勖降，黎季犛逃入海，制蓬峨乘胜率师入越境。阴历五月十三日，上皇立睿宗子晛为帝，是为废帝，命恭正王师贤守大安。制蓬峨军由神符海门今大汛入越都，大掠终日阴历五月二十一日而去。《全书》卷七是年占城又入贡于明。《明史》卷二

1378年制蓬峨以女妻御沟王勖，封以“伪号”，居之义安。复领军逾大黄江，今嘉远大有江破杜子平军，又入越都，杀其留守黎桷，大获而归。《全书》卷七是年占城又入贡于明。《明史》卷二

越国畏占城之兵复至，1379年，废帝迁其宝物财货于天健山。今河内青廉县天健社境1380年，制蓬峨以所募新平顺化等地军侵略义安清华，迫越都。上皇命黎季犛率舟师，杜子平总陆师，待敌于虞江。在今清华省弘化县境占城兵至，黎季犛击走之，以功授行海西道都统制。《全书》卷八《纲目》卷十

是年占城遣使贺明太祖万寿，“帝闻其与安南水战不利，赐敕

谕曰:曩者安南兵出,败于占城,占城乘胜入安南,安南之辱已甚,王能保境息民,则福可长享,如必驱兵苦战,胜负不可知;而鹬蚌相持,渔人得利,他日悔之,不亦晚乎?"《明史》卷三百二十四

制蓬峨虽败,事实上犹保有顺化、新平、义安、清华诸地;越虽胜,国势愈弱。1381年增赋,并征"天下僧"及"山林无度牒"者为兵,斩清华民之降占城者。越帝又惧占兵复至,迁其诸陵神像于安生,今海阳省东朝县境一社时在阴历六月也。《全书》卷八《纲目》卷十

1382年春,制蓬峨侵入清华,黎季犛守龙岱山,清华省东山县境占城舟师至,击走之。《全书》卷八

越廷欲乘胜命黎季犛追击之,并平其堡寨。次年初,越舟师出海,遇风引还。《全书》卷八

制蓬峨旋偕其首将罗皑,即《明史》之阇胜由陆地侵入越都城北方之广威镇。今山西广威府都城震动,越上皇命黎密温御之。密温兵败被执。阴历六月1383年上皇以都城交金吾卫大将军阮多方留守,出奔东岸。1384年春,占城兵始退。《全书》卷八

明太祖年受占城之入贡,自不干涉越占之争。但于1386年曾谕越废帝,言欲征占城,令备象五十对,自云南达义安设站备粮。事见《全书》卷八使臣名李瑛,《明史》未载其事。越廷不报,而同年占城王又遣子宝部领诗那日忽至中国,朝万寿节,献象五十四,皇太子亦有献。明太祖嘉其诚,赐赉优渥,命中官送还,明年(1387)复贡象五十一,及伽南犀角诸物。明太祖加宴赉,还至广东,复命中官宴饯,给道里费。《明史》卷三百二十四

真腊贡象,占城王夺其四之一,其他失德事亦甚多。明太祖闻之怒,1388年命行人董绍敕责之。绍未至,而占城贡使抵京,寻复遣使谢罪,乃命宴赐如制。《明史》卷三百二十四

时越国亦有事也。昌符十二年十二月，应为1389年1月越上皇从黎季犛之谋，废越帝为灵德大王，命人缢杀之，别立上皇己子昭定王颙为帝，是为顺宗，时年十二岁也。清华省人阮清举兵称废帝，据虞江叛；而阮忌亦倡乱号鲁王，黎季犛将率兵讨之。闻占城又起兵已过古无，乃结寨自守。《全书》卷八《纲目》卷十一

制蓬峨兵至，决水淹越军，圣诩军将阮忌等七十馀人死之。黎季犛以军付范可永，奔还都城，可永亦偕神魁军将阮多方收兵还。制蓬峨进兵至黄江，今里仁府南昌县境都城震恐，上皇命陈渴真御之。占城兵众，渴真不敢战，退守海潮江。今兴安省兴仁仙侣两县分界水越帝之弟元耀入占城军降；而僧人范师温亦在都城作乱。二帝出奔，招还前派往黄江防御罗皑之军将黄奉世。《全书》卷八《纲目》卷十一是时越国国势已濒危矣。制蓬峨偕元耀率战船百馀，溯江而进。时有占城将名波漏稽者，得罪畏谴，叛降陈渴真军，告渴真，占城王之舟绿色易辨识。渴真乃集军聚攻绿色王舟，毙制蓬峨，元耀割其首还投越军，占城残军归其首将罗皑。时光泰三年正月二十三日，即1390年2月也。《全书》卷八《纲目》卷十一

元耀持占城王首投龙捷大队副范汝勒军。汝勒杀元耀，以占城王首献上皇，上皇大喜曰："今见之尚如昔汉高祖之见项羽；制蓬峨死，大局安矣！"《全书》卷八《纲目》卷十一

制蓬峨死，占婆第十三王朝遂亡。此朝有王三人。

制阿难 自1318至1342年

茶和布底 自1342至1360年

制蓬峨 自1360至1390年

第十章

第十四王朝 自1390至1458年

罗皑 自1390年至1400年

制蓬峨死，首将罗皑依国俗焚其尸葬之。按：《明史》误以大臣阁胜（即罗皑）弑王引军还，越军追击，罗皑以象阵拒之：越军不敢近逼。归国之后，占婆军奉之为王。制蓬峨二子制摩奴陁难，制山拏奔越，越授制摩奴陁难为校正，制山拏而亚侯。《全书》卷八《纲目》卷十一

新王自立，明年（1391）遣使奉表入贡于明，明以其悖逆却之。1397年后复连入贡。明成祖即位，（1402）诏谕占城。《明史》卷三百二十四

制蓬峨死，潘猛以新平今广平顺化今广治及承天降越，越授明威将军，使仍守二地以防占城，又命黎季犛守化州。1392年以来，占城兵常侵越境。《全书》卷八《纲目》卷十一

1400年阴历二月末，黎季犛逼越少帝禅位，季犛自立为帝，国号大虞，更姓为胡。在位十月，传位其子胡汉苍，自称太上皇。圣元元年十二月，即1401年1月兴兵十五万讨占城；杜满领兵由水路进，陈问副之，陈松杜元拓由陆路进。《全书》卷八《纲目》卷十一

阇耶僧伽跋摩五世 自1400至1441年

时罗皑死，其子继立，王号阇耶僧伽跋摩五世（Jaya Sinhavarman V），即《越史》之巴的吏，《明史》之巴的赖或占巴的赖是也。越译汉译诸名，实为占婆王号Campadhiraja之译音，非王名也。越

兵入境，因军食不继引还。《全书》卷八

1402年秋，越兵又讨占城，占城王遣制叱难御之，殁于阵。占婆王惧，命其舅布田布田之名常见，疑为官号非人名。厚币以止越师，并许割占洞今广南升平府以求和。此地盖为占婆古都因陀罗补罗（Indrapura）所在之地也。季犛又索古垒，今广义省以为思义二州。占婆之阿摩罗波胝（Amaravati）全土尽失；北方膏腴可耕之地，皆入于越，所保存者广义以南山岳贫瘠之地而已。越设安抚使以治四州。《全书》卷八

占婆王虽已割地，心实不甘。1403年遣使奉金叶表入贡于明，且告安南侵略，请降敕戒谕。明成祖乃遣行人蒋宾兴王枢，使其国，赐以绒锦织金文绮纱罗，并遣官切责安南。《明史》卷三百二十四乃越少帝胡汉苍即《明史》之胡奎一面请明赐封爵；一面命杜满等以兵二十万讨占城。师行九月至阇盘城（Vijaya），围攻不下，军食不继乃还。其舟师亦遇明战船九艘，退归本国。《全书》卷八缘明“以安南王胡奎即汉苍奉诏戢兵，遣官谕占城王。而王遣使奏安南不遵诏旨，以舟师来侵，朝贡人回，赐物悉遭夺掠。又畀臣冠服印章，俾为臣属，且已据臣沙离牙诸地，更侵掠未已。臣恐不能自存，乞隶版图，遣官往治。”《明史》卷三百二十四成祖怒，令战船九往助占城；道遇越舟师，鸣锣命之返棹，越舟师遂归，主将因以获谴。《全书》卷八成祖又敕责胡奎，而赐占城王钞币。《明史》卷三百二十四越乃进所掠占城贡象二于明。（1404年）

1406年，占城贡白象方物于明，复告安南之难。明成祖“大发兵往讨，敕占城严兵境上，遏其越逸，获者即送京师”。1407年，明师攻取安南，在奇罗海口今河静省奇英县境获季犛父子而归。《明史》卷三百二十四胡朝传二世亡。

占城王亦乘势攻取安南所侵地，“获贼党献俘于明，并贡方物。明成祖嘉其助兵讨逆，遣中官赍敕及银币赐之”。《明史》卷三百二十四初占城王闻明讨越，遣其子鄂克（Ngauk Glaun Vijaya）取所割于越诸地。制摩奴陁难为越守思义二州力战而死。《全书》卷九《纲目》卷十二

占城王阇耶僧伽跋摩五世恢复故地之后，感明之恩，1308年郑和使其国，王遣其孙舍杨该贡象及方物。1309年1310年又入贡。1312年其贡使乞赐冠带，1313年又入贡。《明史》卷三百二十四又卷六

1307年，明平安南，置交趾布政使司，故越朝陈氏在清华谋恢复，立艺宗之子颓为简定帝。1309年被执，陈季扩继立，是为重光帝。至1415年又被执，安南遂为中国领土。当1415年明师之征陈季扩，“命占城助兵。尚书陈洽言其王阴怀二心，愆期不进；反以金帛战象资季扩，季扩以黎苍女遗之。复约季扩舅陈翁挺侵升华府所辖四州十一县地，厥罪维均，宜遣兵致讨。成祖以交趾初平，不欲劳师，但赐敕切责，俾还侵地。占城王即遣使谢罪”。自是以后，年年入贡，“惟1421年及1437年无贡使至中国。1436年琼州知府程莹言：占城比年一贡，劳费实多，乞如暹罗诸国例，三年一贡，英宗是之；敕其使如莹言，赐王及妃彩帛。然占城利中国市易，虽有此令迄不遵。”《明史》卷七卷八卷九卷十卷三百二十一卷三百二十四

明统交趾十一年，清华人黎利夺据之。于1428年复兴大越，是为黎氏太祖高皇帝。占城王于前一年平定王十年二月已入贡于越。1433年黎利死，舍长子思齐而立幼子元龙，是为黎氏太宗文皇帝。时元龙年甫十一，占城以其主幼国弱，1434年以兵侵化州，舟师亦至越海门，今广治省登昌县境越太宗命入内少尉黎魁总管黎烛讨之。

兵至境，占军已归；惟逢其贡使二人，进象求和。自是以后，遂相安无事。《全书》卷十一，按：安南与占婆老挝15、16世纪之交际，并见《西南边塞录》。

占婆又常以兵侵真腊。1414年“真腊使至中国，言其国数被占城侵扰，久留不去。明成祖遣中官送之还，并敕占城王罢兵修好”。《明史》卷三百二十四占城王似未以此敕为意；盖1421年其子鄂克尚以其累次所掠真腊之物建立神像施舍神祠也。《校刊》卷四边和碑

相传占婆以王妹多罗波底（Daravati）嫁爪哇（Java）之满者八夷（Madjapahit）国王；因以输回教入其国之事，或在斯时。参考Crawfurd之《印度群岛史》（History of the Indian Archipelago）

阇耶僧伽跋摩五世死于1441年，在位四十年，大致无事。此后诸王以迄占婆之亡，皆继承于外患内讧之中。《明史》卷三百二十四正统六年王占巴的赖卒

占文诸碑，晚见者即其子鄂克所建之《边和碑》。碑中鄂克自称为“胜越人者”，不知缘何未嗣王位；第观《明史·占城传》，其间难免无争位之举。

摩诃贲该 自1441至1446年

据明史，占巴的赖死，侄摩诃贲来为世子，欲令嗣位。时年幼，逊位于舅氏摩诃贲该。卷三百二十四则贲该为阇耶僧伽跋摩五世妻之兄弟，非其孙也。《明史》卷同1441年遣使朝贡于明，且乞嗣位。明英宗遣使赍诏封为王，新王及妃并有赐。《明史》卷同

贲该既受中国册封，又依占婆旧日策略，于黎朝仁宗太宗子1442年袭位即位后，侵略越边之化州。1444年、1445年夏，两次掠边。越欲讨之，乃先奏至中国。《全书》卷十一 1446年，明英宗“敕谕摩诃贲该曰：迩者安南王黎濬遣使奏王欺其孤幼，曩已侵升华思义等州，今又累攻化州，掠其人畜财物。二国俱受朝命，各有分疆，岂可兴

兵搆怨，乖睦邻保境之义。王宜祗循礼分，严饬边臣，毋恣肆侵轶，贻祸生灵，并谕安南严行备御，勿挟私报复”。《明史》卷三百二十四是年越国已集兵屯粮于河华，疑即河静省奇英县奇罗社命总管黎可黎受等为将，率兵侵入占城境，破占城兵。阴历四月二十三日，进至尸耐海口，摩诃贲该退保阇盘城，其甥摩诃贵来谋夺其位，内应越兵。越兵遂入阇盘城，获贲该及其妻妾象马军器甚众而还。《全书》卷十一《纲目》卷十七

阴历六月，越仁宗献俘太庙，留贲该及其妻妾数人，馀皆放还本国。1447年，赐贲该冠带，许与外国使臣朝宴。《全书》卷十一

摩诃贵来 自1446年1449年

摩诃贵来即位，遣使至明越二国请册封，二国皆许之。明英宗且“谕以保国交邻，并谕国中臣民共相辅翼”。1447年贵来又入贡于越。至1449年，其弟摩诃贵由废之，自立为占城王。《全书》卷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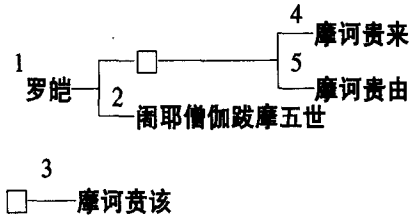
摩诃贵由 自1449至1458年

贵由自立，遣使至越入贡，并告即位。越仁宗却其贡云：“臣弑君，弟弑兄，古今法所不容，命勿受其贡”。并遣使阮有光至占城按其事。有光还报，仁宗又命程昱赴占城索越人之居占城者，且敕责占城曰：“一国之有君臣，为立国之常经；而汝占城违之。前王死，不立其子，而立贲该；贲该不奉朝命，已擒正其罪。汝国前为贵来请册封，今又改立贵由；视易君如奕棋。”1449年，贵由送越人之在占城者七十人还国。自是以后，贵由在位时，与越国交遂绝。《全书》卷十一

1453年，据《明史》本纪至《明史·占城传》作1452年占城王始遣使至明入贡，且告王讣。明代宗遣使封摩诃贵由为王。1457年英宗复辟又入贡。《明史》卷十一又卷三百二十四本年或次年初，贵由为槃罗悦所

弑,第十四王朝亡。

第十四王朝世系



第十五王朝 自 1458 至 1471 年

摩诃槃罗悦 自 1458 至 1460 年

摩诃槃罗悦为明史占城王名之译音。《纲目》作槃罗茶悦,《边塞录》作槃罗米悦,疑为 Bhadravarman 或 Bhadreçvaravarman 之对音(译者按原音似为 Parameçvaravarman,著者考订恐有误也。),为摩诃贲该之婿,《边塞录》卷二命其乳母之子弑贵由而自立为占城王。《纲目》卷二十一

1458 年遣使奉表朝贡于明。1460 年复贡,使者诉安南见侵。明英宗因敕谕安南王。阴历九月,占城使至中国告王丧,英宗遣使封王弟槃罗茶全为王。《明史》卷三百二十四

槃罗茶全 自 1460 至 1471 年

新王即位后,越人数侵其国。1364 年入贡于明,"使者诉安南(时越圣宗宜民已于 1360 年立)见侵,求索白象;乞如永乐时遣官安抚,建立界牌石,以杜侵陵"。明"兵部以两国方争,不便遣使;乞令使臣归谕国王,务循礼法,固封疆,捍外侮,毋轻搆祸"。宪宗从之。《明史》卷三百二十四 1467 年,占城乃入贡于越。越索占城犀象

宝货，令以事明之礼事之。占城不从，1469年一面遣使入贡中国诉其事，《全书》卷十二《明史》卷三百二十四一面诉诸武力。

1469年阴历三月，占城侵越之化州。1470年阴历八月，占城兵十馀万人，战象无数，又侵化州。守将范文题闭城不敢出敌，遣使告急。《全书》卷十二

越圣宗讨占城之志，至是遂决。其年阴历十一月初六，檄告占城，申讨其罪：列举占城不应潛诉于明；待越使不敬，弑王立茶全；厚敛苦民，拘留越国男女；容留罪人，焚烧驿站诸罪。且言大兵至则摇尾乞怜，现率强兵猛士，以申天讨，务取其国，以雪先帝之耻云云。《全书》卷十二

是月初七日告庙，十六日出师，十二月初六至铁山，义安省兴元县境与舟师前锋会，十八日舟师入占城境。次年(1471)正月初二整军以进，师至新压，今大压港广南省河东县境板江三岐江入海处旧坐，今小压港距大压七里占城官吏来降。二月初，茶全命其弟率兵五千人，乘象袭圣宗营。圣宗命黎希葛黎势等在沙奇今广义省平山县港名登岸，率军断其归路；自引军七万人在新压旧坐登岸迎击之。占城军四面受敌，一败于幕奴山，又败于采芹港。今广义省平山县港名茶全惧，命其戚某请降。圣宗不许。二十七日取尸耐港，又二日师至占城都城阇盘。三月初一，圣宗集诸将谕之曰："贼之士气已丧，可即取之。得城之日，勿焚府库，必生擒占城国王"。谕毕攻城，先入东门，占城兵死者六万人，擒者三万人，劫符印；执国王槃罗茶全，及家族五十馀人，以见圣宗。占城国王跪地俯首以谢。圣宗问曰："汝为占城主欤？"答曰："是。"又问曰："汝知馀为何人？"答曰"一见知为皇帝。"又问曰"汝有子几人？"答曰："十馀人。"问毕命于宫外筑室居之。且谕卫士曰："彼为一国主，不可虐遇也。"后占城王病殁于义

安附近海舟之中，依其俗焚其尸，枭其首于御舟之前；而书其侧曰："古占城元恶茶全之首。"《全书》卷十二《纲目》卷二十二《边塞录》卷二《明史》卷三百二十四

据明史"王弟槃罗茶悦逃山中，遣使告难。兵部言安南吞并与国，若不为处分，非惟失占城归附之心，抑恐启安南跋扈之志，宜遣官赍敕宣谕，还其国王及眷属。帝虑安南逆命，令俟贡使至日赐敕责之。(成化)八年(1372)以槃罗茶悦请封，命给事中陈峻行人李珊，持节往。峻等至新州港，守者拒之，知其国已为安南所据，改为交南州，不敢入。十年(1474)冬还朝，安南既破占城，复遣兵执槃罗茶悦，立前王孙斋亚麻弗庵为王，以国南边地予之"。《明史》卷三百二十四

《明史》之斋亚麻弗庵〔Jaya(var)ma Fougan〕，或即越史之逋持。持其人为占城大将；占城破后，集残兵守藩笼即宾童龙 Panduranga 自立为王，遣使入贡于越。自是以后，越与占城，以今富安靖化二省间之石碑山为界。《全书》卷十二《地志》卷二古之占城北部阿摩罗波脎，初于 1402 年割让于越，1407 年复取之，至是又失。中部之佛逝，从未沦入外国，今亦为越所并。距制蓬峨之时，仅八十年，已失地五分之四，仅保有宾童龙与古笪二地而已。越圣宗取占城地，以为广南道；分为占城或大占、华英、南蟠三州。后阮朝太祖时，(1603 年)改为升华思义怀仁三府。《纲目》卷二十二

占婆历史遂至是告终。其仅保之地，虽晚至 17 世纪末年，始为广南国所并，常受明之封册，求谕安南尽还故地。然地瘠兵少，不足与言为国矣。今日其人或伏处山地，或逃亡柬浦寨；其相类者，惟占人之名，而此占人之名，恐不久亦为人类所遗忘也。

占婆诸王年表

占　　名	汉名	越名	即位年	亡退位年	在位年
第一王朝　192—336					
Çri Mara	区逵		192		
……	子				
……	孙				
……	范熊				270
……	范逸			336	
第二王朝　336—420					
……	范文		336	349	
……	范佛		349		377
Bhadravarman Ⅰ	范胡达				399　413
Gangaraja	敌真				
第三王朝　420—530					
……	范阳迈（一）				421
……	范阳迈（二）				431　446
……	范神成				455　472
……	范当根纯				484　491
……	范诸农			498	492

占　　名	汉名	越名	即位年	亡退位年	在位年
……	范文款				502
Devavarman	范天铠				510　514
Vijayavarman	弼毳跋摩				526　527
第四王朝　530—758					
Rudravarman Ⅰ	律陀罗跋摩				530　541
Çambhuvarman	范梵志			629	605
Kandharpadharma	范头黎		629		
……	范镇龙			645	640
Bhadraçvaravarman			645		
……	女王				
Vikrantavarman Ⅰ	诸葛地		653		679
Vikrantavarman Ⅱ	建多达摩				686　713
Rudravarman Ⅱ	卢陀罗				749
第五王朝　758—860					
Prithivindravarman					
Satyavarman					774　784
Indravarman Ⅰ					787　801
Harivarman Ⅰ					803　817
Vikrantavarman Ⅲ					854
第六王朝　860—900					
Indravarman Ⅱ					875

占　　名	汉名	越名	即位年	亡退位年	在位年
Jaya Sinhavarman Ⅰ					898
第七王朝　900—988					
Haravarman					
Indravarman Ⅲ	释利因德曼				918　959
Jaya Indravarman Ⅰ	释利因陁盘				960　965
Parameçvaravarman Ⅰ	波美税			982	972
……					978
Indravarman Ⅳ	施利陀盘吴日欢		982	986	
……	刘继宗		986	988	
第八王朝　989—1044					
Indravarman Ⅴ	杨陀排	冰王罗	989		997
Yan Pu Ku Vijaya (çri)	杨普俱毗茶室离				999　1007
Harivarman Ⅱ	施离霞离鼻麻底				1010
Parameçvaravarman Ⅱ	尸嘿排摩惵				1018
Vikrantavarman Ⅳ	皮兰德加拔麻叠			1041	

占　名	汉名	越名	即位年	亡退位年	在位年
Jaya Sinhavarman Ⅱ	刑卜施离值星霞弗	乍兜	1041	1044	
第九王朝　1044—1074					
Jaya Parameçvaravarman Ⅰ		雍尼	1044		1050
Bhadravarman Ⅱ	杨卜尸利律陀般麻提婆				
Rudravarman Ⅲ	施里律荼盘麻常杨溥	制矩	1061		1074
第十王朝　1074—1139					
Harivarman Ⅲ			1074	1080	
Jaya Idravarman Ⅱ			1080	1080	
Paramabhodisatva			1080	1086	
Jaya Indravarman Ⅱ			1086		1110
Harivarman Ⅳ	杨卜麻叠				1114 1129
第十一王朝　1139—1145					
Jaya Idravarman Ⅲ			1139		1145
第十二王朝　1145—1318					
Rudravarman Ⅳ					1145

占　　名	汉名	越名	即位年	亡退位年	在位年
Jaya Harivarman Ⅰ	邹时兰巴	制皮啰笔	1145		1160
Jaya Harivarman Ⅱ					
Jaya Indravarman Ⅳ	邹亚娜		1167	1190	
占婆分为二国					
佛逝国					
Suryajayavarman			1190	1191	
Jaya Indravarman Ⅴ			1191	1192	
宾童龙国					
Suryavarman			1190	1192	
占婆之统一					
Suryavarman			1192	1203	
占婆之并入真腊　1203—1220					
占婆之再兴					
Jaya Parameçvaravarman Ⅱ			1220		
Jaya Indravarman Ⅵ					1254
Indravarman Ⅵ	失里咱牙信合八剌哈迭瓦		1265		1285
Jaya Sinhavarman Ⅲ	补的	制旻		1307	1288
Jaya Sinhavarman Ⅳ		制至	1307	1312	

占　　名	汉名	越名	即位年	亡退位年	在位年
……		制能	1312	1318	
第十三王朝	1318—1390				
……		制阿难	1318	1342	
……		茶和布底	1342		
……	阿答阿者	制蓬峨		1390	1369
第十四王朝	1390—1458				
……	阁胜	罗皑	1390	1400	
Jaya Sinhavarman Ⅴ	占巴的赖	巴的吏	1400	1441	
……	麻诃贲该	摩诃贲该	1441	1446	
……	麻诃贵来	摩诃贵来	1446	1449	
……	麻诃贵由	摩诃贵由	1449	1458	
第十五王朝	1458—1471				
……	摩诃般罗悦	槃罗茶悦	1458	1460	
……	槃罗茶全		1460	1471	

上表第一列为梵文占名。有原名可据者，从其原名，汉名可以复元者，复其原名。

第二列为汉名,第三列为越名。两列名同者,举其汉名,越名有异者,并录于下。汉名有异译者,举其一名。馀详本文。

第四列为即位之年,第五列为死亡或退位之年。其在位年数未能详者,第六列约举之。列分三行:上行为距即位较近之年;下行为距死亡或退位较近之年;仅有一年可引,而未能详为何时者,则列于中行。

附:占城史料补遗

见河内远东法国学校校刊
第十四卷第九分8至43页　鄂卢梭(Aurousseau)撰

马伯乐(Georges Maspero)现将他在1910至1913年《通报》中所撰的《占波国考》(Le Royaume de Champa)辑为单行本,[1]并附有一篇很有功用之历史的与考古学的索引。

这部著作表现一种伟大工作的成绩,这是我们应该承认的。马伯乐为此曾苦心鸠集整理关于占波之地方碑文同外国史料,我现在仅对于后者有所补充。就真相言,外国史文,尤其是中国载籍,所供给的材料最可宝贵,并最丰赡;若是没有此种史料,仅据占语碑文同吉蔑语(Khmer)的记事,这部《占波史》就很简略了。

以前有些人,如伯希和等,曾将中国载籍中关于占波的记载引证了若干条,可是马伯乐说:"这仅仅是些浅薄的摘录,应该将中国载籍中关于占波之文与同偶然插入的记载,一概鸠集,不可遗漏一种,这是我所注意之事。"马伯乐虽有此意,好像未竟全功。复次,他手边并没有关系占波之一切中国载籍,其中有很重要的皆未引举,兹将其目列下:

(一)《林邑记》(5世纪末年)

(二)《水经注》(527年)

(三)《岛夷志略》(1349年)

(四)《安南弃守本末》(1404年至1432年)

(五)《瀛涯胜览》(15 世纪初年)

(六)《星槎胜览》(1436 年)

(七)《明一统志》(1461 年)

(八)《西洋朝贡典录》(1520 年)

(九)《越峤书》(1552 年)

(十)《四夷考》(1564 年)

(十一)《东西洋考》(1618 年)

(一)《林邑记》 此记的撰者迄今尚未详为何人,看他的标题同他的内容,撰时好像在 5 世纪末年,其残文现在散见于《水经注》、《说郛》(卷六二)、《东西洋考》、《图书集成·边裔典》等书之中,在别的类书里面检寻,或者还有残文,我现在将我所检出的录次于下。

《水经注》卷三六引《林邑记》

"城(区粟)去林邑步道四百馀里。……其城治二水之间,三方际山,南北瞰水,东西涧浦流凑城下。城西折十角,周围六里一百七十步,东西度六百五十步。砖城二丈。上起砖墙一丈,开方隿孔。砖上倚板,板上五重层阁,阁上架屋,屋上架楼,楼高者七八丈,下者五六丈。城开十三门。凡宫殿,南向,屋宇二千一百馀间,市居周绕,阻峭地险,故林邑兵器战具悉在。区粟多城垒,自林邑范胡达[2]始,秦馀徙民染同夷化,日南旧风变易俱尽,巢栖树宿,负郭接山,榛棘蒲薄,腾林拂云,幽烟冥缅,非生人所安。"

"尽纮沧之徼远,极流服之无外,地滨沧海,众国津迳,……浦通铜鼓,外越安定黄冈,心口。……"

"外越纪粟望都。纪粟出浦阳,渡便州,至典由,渡故县至咸驩。咸驩属九真。咸驩已南,獐麂满冈,鸣咆命畴,警啸聒野,孔雀

飞翔，蔽日笼山，渡治口至九德，……九德，九夷所极，故以名郡。”

“义熙九年(413)，交趾太守杜慧度造九真水口，与林邑王范胡达战，擒斩胡达二子，[3]虏获百馀人。胡达遁。五月，慧度自九真水历都粟浦复袭九真，长围跨山，重栅断浦，驱象前锋，接刃城下，连日交战，杀伤乃退。”

“松原以西，鸟兽驯良，不知畏弓。寡妇孤居，散发至老。南移之岭，崒不逾仞，仓庚怀春于其北，翡翠熙景乎其南，虽嘤谨接响，城隔殊非，独步难游，俗姓涂分故也。”

“渡比景至朱吾。……屈都夷也。……”

“汉置九郡，儋耳预焉。民好徒跣，耳广垂以为饰，虽男女裘露不以为羞，暑裘薄日，自使人黑，积习成常，以黑为美，《离骚》所谓玄国矣。”

“建武十九年(四三)，马援树两铜柱于象林南界，与西屠国分，汉之南疆也。土人以其流寓，号曰“马流”，世称汉子孙也。”

《水经注》卷三七引《林邑记》曰：

“自交趾南行，都官塞浦出焉。”

《说郛》卷六二引《林邑记》，曰：

“槟榔树大围丈馀，高十馀丈，皮似青铜，节如斑竹，下本不大，上末不小，远近为林，千万若一。森秀无柯，端顶有叶。其叶芾条派开破，仰望沙沙如弹蘖蕉于竹杪，风至独动，似举羽扇之扫天。叶下系数房，房缀十数子，家有数百树，云疏如坠绳也。”

“西南远界有灵鹫，能知吉凶，觇人将死，食尸肉尽乃去。家人取骨烧为灰，投之于水。”

“飞鱼翼如蝉，飞则凌云，沉泳海底。”

“延袤六十里，土多香木金宝，物产大抵与交趾同。以砖为城，

蜃炭涂之,皆开北户以向日,或东西无定。……"

"王范文铸铜为牛、铜屋行宫。……"

"林邑王明达[4]献金钢指环。……"

"从林邑往金山三十馀里,远望金山嵯峨,而赤城照曜似天涧。壑谷中亦有生金,形如虫豸,细者似苍蝇,大者若蜂蝉,夜行耀光如萤火。"

"王范文,先是奴,初牧牛洞中,得鲤鱼,私将还炙食之。其主检求,文恐,绐曰:'将砺石还,非鱼也。'主往看,果是石。文知异,看石有铁,铸石为两刀,祝曰:'鱼为刀;若斫石人者,文当为此国王!'斫石即入,人情渐附之。"

《东西洋考》卷一二引《林邑记》曰:

"林邑山杨梅大如杯椀,以酝酒,号梅香耐,非贵人重客不得饮。"

(二)《水经注》 马伯乐很知道《水经注》,并曾利用其中卷三六关于占波的一大部分记载;可是他对于关系此国古地志之文,并未完全采用,仅将伯希和在《交广印度两道考》中所摘录之文转录而已。要知道伯希和不过偶然研究到林邑的史地,并无完全解决这个问题的意思,仅将《水经注》之文节录而已。最要的工作固然业已完成,可是马伯乐既然要撰一部《占波全志》,就应该将卷三六中关于占波诸城的记载完全译释。本卷之文颇为重要,连同其他中国史文,其有助于吾人考订之处很多。

我想将《水经注》凡有关系之文提出:我开始研究时并无成见,末了曾用不同的方法抵于一种结论。我以为此种结论大致可以参证伯希和前此所提出的假定。

《水经注》卷三六云:

“郎湖,湖水承金山郎究,究水北流,左会卢容、寿泠二水。卢容水出西南区粟城南高山,而东迳区粟城北,又东右与寿泠水合,水出寿泠县界。魏正始九年(248),林邑进侵至寿泠县以为疆界,即此县也。寿泠县以水凑,故水得其名,东迳区粟城南。”

《考古志》并无区粟之名。应劭(2世纪末年人)《地理风俗记》曰:“日南,故秦象郡,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间,日南郡治西卷县。”《林邑记》曰:“城去林邑步道四百馀里。”《交州外域记》曰:“从日南郡南去,到林邑国四百馀里,准径相符,然则城固西卷县也。”《地理志》(《前汉书》卷二八下)曰:“水入海有竹可为杖,王莽更之曰日南亭。”《林邑记》曰:‘其城治二水之间……。’”(其文见前,下文接“非生人所安”语后。)

“区粟建八尺表,日影度南八寸,自此影以南在日之南,故以名郡。望北辰星落在天际,日在北,故开北户以向日,此其大较也。”

“寿泠水自城南与卢容水合,东注郎究。究水所积,下潭为湖,谓之郎湖浦口。有秦时象郡,墟域犹存。自湖南望,外通寿泠,从郎湖入四会浦。”(以下述446年檀和之讨范阳迈之役,其文已见《占波史》。兹略。下文接“填尸成观”语后。)

“自四会南入,得卢容浦口。晋太康三年(282)省日南郡属国都尉,以其所统卢容县置日南郡及象林县之故治。《晋书·地道记》曰:“郡去卢容浦口二百里,故秦象郡象林县治也。永和五年(349)征西桓温遣督护滕畯率交广兵伐范文于旧日南之卢容县,为文所败,即是处也。退次九真,更治兵。文被创死,子佛代立。七年(351),畯与交州刺史杨平复进军寿泠浦,入顿郎湖,讨佛于日南故治。佛蚁聚连垒五十馀里,畯平破之。佛逃窜川薮,遣大帅面缚,请罪军门,遣武士陈延劳佛与盟而还。”康泰《扶南记》曰:“从林邑

至日南卢容浦口,可二百馀里。从口南发,往扶南诸国,常从此口出也。"故《林邑记》曰:"尽纮沧之徼远,……"(其文见前)

"朱吾县浦今之封界,……《晋书·地道记》曰:"朱吾县属日南郡,去郡二百里。……朱吾浦内通无劳湖,无劳究水通寿泠浦。"

"阮谦之……渡寿泠至温公浦,升平三年(359),温放之征范佛于湾,分界阴阳圻(此处疑有脱误),入新罗湾,至焉下,一名阿贲浦,入彭龙湾,隐避风波,即林邑之海渚。元嘉二十三年(446),交州刺史檀和之破区粟已,飞旃盖海,将指典冲,于彭龙湾上鬼塔,与林邑大战,还渡典冲、林邑入浦,令军大进,持重故也。浦西即林邑都也,治典冲,去海岸四十里。"

"建元二年(344)(范文)攻日南九德九真,百姓奔迸,千里无烟,乃还林邑。林邑西去广州二千五百里,城西南角高山长岭,连接天鄣。岭北接涧,大源淮水出郁,郁远界,三重长洲隐山,绕西曲街回北。其岭南开涧,小源淮水出松根界上山,壑流隐山,绕南曲街回东,合淮流以注典冲。其城西南际山,东北瞰水,重堑流浦,周绕城下。东南堑外,因傍薄城,东西横长,南北纵狭。北边两端回折曲入,城周围八里一百步。砖城二丈,上起砖墙一丈,开方隙孔。砖上倚板,板上层阁,阁上架屋,屋上构楼。高者六七丈,下者四五丈,飞观鸱尾,迎风拂云,缘山瞰水,鸞翥嵬岑,但制造壮拙。稽古夷俗,城开四门。东为前门,当两淮渚滨,于曲路有古碑,夷书铭赞前王胡达之德。西门当两重堑,北回上山,山西即淮流也。南门度两重堑,对温公垒。升平二年(358),交州刺史温放之杀交阯太守杜宝、别驾阮郎。遂征林邑,水陆累战,佛保城自守,重求请服,听之。今林邑东城南五里有温公二垒是也。北门滨淮,路断不通。城内小城,周围三百二十步。合堂瓦殿,南壁不开,两头长屋脊出

南北。南拟背曰西区。城内石山顺淮面阳,开东向殿,飞檐鸱尾,青璅丹墀,榱题角椽,多诸古法。阁殿上柱高丈馀五,牛屎为泥,墙壁青光,回度曲掖,绮牖紫窗椒房,嫔媵无别。宫观路寝永巷,共在殿上。临踞东轩,迳与下语,子弟臣侍皆不得上。屋有五十馀邱,连甍接栋,檐宇如承,神祠鬼塔,小大八庙,层台重榭,状似佛刹。郭无市里,邑寡人居,海岸萧条,非生民所处,而首渠以永安养国十世,岂久存哉?"

上引《水经注》诸文,虽有脱讹,然而颇有关系。诸文要可别为两类,一类是关系区粟城的记载,一类是关于林邑最古都城的记载。应该将此二城位置于今之何地呢?

关于区粟城者,我以为有将其位置在今日承天府城(Hué)附近之充分理由。至若林邑的最古都城,我以为应在广南省中荼荞废址所在去寻去。为使我这些假定更有力量,我将古籍里面之历史、地理、天文等类记载取来参证,将来可见这些记载,皆能互相证明吾说。

秦代(前255至206)略地南方,曾在前214年时设置最南之象郡。[5]此象郡南界应止于何处呢?沙畹(Chavannes)以为大致与今之东京相合;[6]我以为不仅止于东京,还在东京以南很远。因此象郡在前111年汉武帝时改名日南。[7]6世纪初年,刘昭注《后汉书》(卷三三)云:日南郡"秦象郡,武帝更名,雒阳南万三千四百里。"同卷九真郡下注云:"雒阳南万一千五百八十里。"比较两种距离,可见九真与日南相距有一千八百二十里。我们现在确知汉之九真,就是现之清华,由是汉之日南南去今之清华甚远。此两郡的距离,可以两郡之治所为准,也可以两郡之境界为准。总之,一千八百二十里要有八九百公里之远,由是应在南方,或者应在平定省

外去寻求汉之日南同秦之象郡的南界了。至若北界,应在今日安南关所在之横山。其首先考订此北界的是伯希和(《校刊》第四卷190页并注。),他对于南界,从前未曾表示意见。惟在近来(《通报》1912年刊459页注三)主张日南郡的南界应位置在沱灢(Tourane)方面。我的意见以为尚应位置于其南。考《大南一统志》,[8]日南郡南界在今之大岭。此岭现在富安同庆和两省之间,其入海之岬就是伐勒拉岬(Cap Varella),所以我主张将汉之日南郡位置在安南关与伐勒拉岬之间。汉日南郡的五县皆应位置于此。伯希和(《校刊》第四卷189页注三)曾经说过,《前汉书》、《后汉书》、《晋书》中所列举五县之次序,各有不同。《前汉书》(卷二八下)云,"县五:朱吾、比景、卢容、西卷、象林",伯希和曾以为"郡治在朱吾,好像将他位置在郡北,以便与本部便利交通。《前汉书》中五县之名既然象林在后,而象林又为最南之一县,好像此五县列举之次序是从北至南的。可是此说纯是一种假定。"我以为如果有人证明朱吾不是汉代日南郡治,这种假定将丧失其一部分力量。案日南郡治朱吾之说,曾两见《旧唐书》(卷四一,)伯希和之说必本于此。《旧唐书》虽有此说,然而我以为不能将2世纪末年应劭之说撇开。前此所引《水经注》《应劭地理风俗记》曰:"日南故秦象郡,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间,日南郡治西卷县。"而且《后汉书》(卷三三)列举之五县,首列者即是西卷。此外前引之《水经注》同《前汉书》(卷二八下)并注云:西卷,莽曰日南亭。"考《前汉书》(卷九九中),纪元15年时,王莽改郡为亭,复次不应忘者,282年时晋之郡治在卢容,而《晋书·地道记》曰:"朱吾县属日南郡,去郡二百里。"(见前引《水经注》卷三六)洵如伯希和之说,日南郡治在卢容北方之朱吾,好像在晋时受占人侵略而南境没陷之时,反将郡治南迁,其理洵不

可解。所以我以为汉之日南郡治不在朱吾,而在西卷。

至若五县的方位,只有最南两县可能确实考订。这就是象林同西卷,至若朱吾、比景、卢容三县,尚未能确定其方位。我以为根据《水经注》卷三六所载范文行程之所经,好像他们的次序适与《前汉书》所列举的相反,应作卢容、比景、朱吾。[9]

无论如何,汉日南郡之方位,北至安南关,南抵伐勒拉岬。郡治在西卷,共领五县。此五县自南迄北的次序,似是象林、西卷、朱吾、比景、卢容(后三县的次序虽有前说,然而或者可以倒置)。

纪元初年首先侵犯日南,而在后来渐渐自南而北侵并全郡自成一国之占波人,原处地就在日南郡南,今日衙庄与藩笼两地之间。

伯希和首先研究中国史文于前,马伯乐继续研究于后,林邑建国的史绩因以阐明。此种史文,说初有"象林徼外蛮夷",后说2世纪最后十年中有一国家之建立。马伯乐云:"区怜所建之国名,固然未见著录;可是一切史文皆说林邑王是他的后人,则他所建之国必是林邑。质言之,古之占波,必无疑义。"其实还有更明确的史文而足证实此一说的,比方《水经注》(卷四一)云,"象林县人区连杀县令自称林邑王",就是一例。这个林邑名称,原来必不是一城名,应是由象郡转为象林,又由象林转为林邑的。区连既在象林杀县令而自王,汉人遂以林邑都城之名为古占波全国之称。林邑一名之起源,我以为如此。

由是观之,古占波人在3世纪初年业已确实占领林邑,质言之,确实占领古之象林了。这个第一都城,吾人行将考订其所在。到了同一世纪之中叶,林邑人曾北侵广其疆界。248年时,曾进侵至寿泠以为疆界(见前引《水经注》卷三六之文。)此前所未闻之寿泠县,乃三国吴时(222至280)置于西卷县境,后至晋时(265至

317)始在289年分西卷为寿泠县(《宋书》卷三八),则寿泠应距日南郡治西卷不远。如此看来,古占波人在3世纪时已将此郡最南两县占领。占领以后,自然要寻求一个可能保持占领的根据地,所以前引《林邑记》(《水经注》卷三六)云:"林邑兵器战具悉在区粟。"此区粟城距林邑有四百里。前引《水经注》之文又云:寿泠水流经区粟城南。由是我们可以将区粟位置在寿泠界内。顾寿泠即在西卷县境,则区粟应距西卷不远。又一方面《水经注》说:"248年林邑进侵寿泠以为疆界。"而在此次进侵以前,尚未见有区粟之名。首先著录此名者,就是《水经注》(527年撰)。据《水经注》说:"古志并无区粟之名。"又说:"然则城固西卷县也。"此说在地理与历史方面皆可承认。由是可见区粟与西卷乃是一地之异称。至若其异称之理,我以为区粟在汉语方面无义可训,应是一种译名。其尤可注意者:这个"区"字在徼外蛮夷区怜名称中一见,又在最初林邑王区连名中一见,复在占人居宅一部分之"西区"名称中又一见。设若区粟是一个占语名称,当然用以替代他所攻取的西卷城名。由是应该在占波人于3世纪时所侵地之北境要塞中寻求西卷。然则西卷应该位置于何处呢?

兹将关于西卷、区粟之记载摘要录述于下:

汉之日南郡北境应不逾安南关,南境应不逾伐勒拉岬,以西卷为郡治。此处治所为自北至南之第四要城,可见其距离郡之北界尚远。我们又知道此城距林邑四百馀里,质言之,距第五城象林有四百馀里。至若象林以北之四城,卢容、比景、朱吾、西卷,各相去有若干里,则史无明文。可是要将我对于日南郡古地理的假定主张到底,我以为纪元初时日南郡的诸大诚市距离之远,与今日安南关同伐勒拉岬中间之诸大城市远距情形似同。此说势须加以说

明。我在此处并不涉及考订问题。我并不想说因为洞海或广治是安南关以南的两个要城,便说是古之卢容或比景,不过是在安南关以南既然有三个古城必须位置:我以为应位置在安南关至广治一带。详细研究《水经注》的记载,我以为可以在此点上得有明白的成绩。据我的主张,第四城西卷不得在广治以北,这是第一个要点。西卷既距第五城有四百里,而此第五城又不得在郡南边界之上。由是我们可以南方之极点位置在广义一带,则应在广治同广义之间寻求西卷、区粟。我们如果没有《水经注》的记载作根据,所得的结论只能有这一点。

幸而《水经注》将西卷的地形记下来了,据说西卷在248年为占人所侵取,大约在1世纪以后,便将他组织为藏聚兵器战具的区粟城。此城在两水之间,近在其中一水名曰卢容水者之南。此水出西南,往东北流,复东流与别一水名寿泠水者合而为一。卢容水出区粟之南,东北流与寿泠水会。区粟城三面有山。此二水合流后(余将名之曰卢容江),东行出郎湖,与四会浦注入之水合。复经郎湖出卢容浦口而入于海。此卢容浦口在四会浦口之南。又一方面别有朱吾水,北来注入无劳湖。而此无劳湖又通卢容浦,其地理的大势如此。

现在只要寻究适应这种记载的地方了。取一地图略微审查一下,就可见在广治同广义之间,而且在安南关同伐勒拉岬之间,只有承天府境(Hué)与此完全相合。卢容水就是承天府河,郎湖就是名曰 Càu-hai 的大海湖之东湖,四会浦就是顺安(Thuân-an)海口,卢容浦就是 Câu-hai 湖在 Chu-may 西岬北边入海的海口,[10]无劳湖就是大海湖之西湖,朱吾水就是从此湖注入广治河之水道。可见此处的地势大致与《水经注》所志相符。再就此城附近的形势说,城处卢

容、寿泠二水之间。此卢容水当然就是承天府水之主流,至若寿泠水,或者就是古之罗绮水,后在1836年所开的Phu-cam。[11]

由是观之,古之区粟近在承天府河之南,就在今日Ban bô地方,嗣德陵通道所横断的废址之中。以此废址与《水经注》的一定记载对照,若合符节。其周围有山,卢容水(承天府河)经城北东流与寿泠水(昔罗绮水今Phu-cam渠)会。区粟废址,即在承天河南(月瓢Nauyêt-biêu)至渠水汇流之间。此废址业经Parmentier在他所撰的《安南占种古迹调查表》中说明,我在此处毋庸赘述。[12]我仅提出此处废址就是林邑的区粟同汉代的西卷之考订而已。

还有一种意外相符之点,而足以补充我的第一假定,并可使我提出对于林邑古都之第二假定者:《水经注》说区粟去林邑四百馀里,约合二百公里,则将我们领到现在的广南城了。

前引《水经注》之文有云:"浦西即林邑都也,治典冲,[13]去海岸四十里,[14]……去广州二千五百里,……小源淮水……绕南曲街回东合淮流以注典冲。其城西南际山,东北瞰水,重堑流浦,周绕城下。东南堑外,因傍薄城,东西横长,南北纵狭。北边两端回折曲入,城周围八里一百步,砖城二丈,上起砖墙一丈,……城开四门。东为前门,当两淮渚滨,于曲路有古碑,夷书铭赞前王胡达之德。西门当两重堑,北回上山、山西即淮流也。南门度两重堑,对温公垒,……北门滨淮,路断不通,城内小城周围三百二十步。……"

根据上文所述,林邑国最古都城大致在广南之南,去海约二十公里的一水之上。此水是两条水道汇合而成的,则应在广南水系之上寻求此典冲城。其水应是占不劳(Culao Cham)岛对面入海之Sông Ba-rèn水或Sông Thu-bôn水。若在去海二十公里的交切线上

去寻典冲城，在后一水上毫无可以注意的遗迹，在前一水上则有一个世人所熟识的古迹，这就是茶荞的古迹。按照《水经注》的记载，林邑的古都或者在此。可是按照 Parmentier 所撰的《安南占种古籍调查表》(第二册 375 页注一)之考证，此种或然性竟成事实。表中引有伯希和所撰的《交广印度两道考》中之一段，并云："他说，现在广南尚未寻出一个适应《水经注》的记载之要城。这句话错了。其实距美山十五公里，距洞阳二十公里之茶荞地方，有座砖城，奇合《水经注》的记载。《水经注》说："城周围八里一百步，砖城二丈，上起砖墙一丈。"现在所存的城墙无几，不能确定他的周围。可是他一面靠水，一面陂陀起伏，每面不难宽有一公里。至若城墙是用砖造。其砖之多，致使人可以在附近用其馀砖建造一个大教堂同一个传道会。《水经注》又说："城开四门，东为前门，当两淮渚滨。"现在茶荞的东边就是出入很利便的所在。其东北有种种河流。《水经注》又云："于曲路有古碑，夷书铭赞前王胡达之德。"顾在其西四公里略微偏北之河岸，有一 Hon Cuc 大碑。此处 7 世纪以前的古刻甚稀，殆因岩上刻字的习惯同字体之大，所以能够保存。方位虽然不对，我想只有此种摩崖可以使外人注意。5 世纪初年的范胡达，颇有为建此 Hon Cuc 碑刻的 Bhadravarman 之可能。马伯乐曾在他的《占婆国考》中作此考订。《水经注》又云："西门当两重堑、北回上山。"此处有一直线小支流与河流并行，好像就是此堑之遗迹。其西南则倚一小丘。《水经注》又云："南门度两重堑、对温公垒。"南边并无可以注意之点，可是有一小丘，占波人在此方面防守当然愈严。《水经注》又云："北门滨淮，路断不通。"此处是河流主流经过之所。可是后来河流迁徙，改道昔日距城较远之一支流，就算此支流甚小，亦足使路断不通。《水经注》又云："城内小城周围三百

二十步。"茶荞城中有一小丘,或者不是天然的,其平台每方不过五十公尺,则亦距八十步不远。《水经注》又云:"小大八庙。"茶荞城中有不少古代雕刻,昔在丘上曾建有庙堂一所。今日保存之最古占种砖造古物,不逾7世纪。好像从前营建之物是以木为之,因外侵而被毁,亦理中必有之事。由是观之,谓其为林邑古都并无不可能,反有不少或能性。"

由是观之,前此所提出之区粟在承天府西南,同林邑古都在荞茶两种假定,可以互相证明,迄今尚未见有何种反证。此类考订当然连带有些结果。这些结果,我未能在此处说明,我仅仅在此文中节录我的寻究成绩而已。但是有一天有人编纂安南史地之时,若将此种结论比较,并将散见《水经注》及其他著作之一切细节(各处之距离行程等等)详细审查,必定兴趣不小。不过要作此种研究,必须将《水经注》第三〇卷之文连同其注释详加鉴别,其结果时常可以阐明其细节,比方伯希和(《校刊》第四卷198页以后)所预料关于占不劳问题解决之成绩,就是一个榜样。

兹置《水经注》不言,请言《岛夷志略》。我们由是经过八百年而至14世纪。

(三)《岛夷志略》 《岛夷志略》之撰者,吾人仅据此书序文及若干书录,知其人名汪大渊,字焕章,南昌人,生在1300年前后。要在1309年之前,他在二十岁时即游历海上。大约在1329年时附商舶出发,至1345年则已归国。纪所闻见,至1349年下半年始成此书。[15]此书为钞本者已久,我们知道现在有杭州的钞本(《四库全书》所据之天一阁本),有南京钞本(丁氏善本书室本,或者也是本于前一钞本之本。)。此外现有两种刻本:一种是1892年龙凤镳之《知服斋丛书》本,一种是1912至1913年间附有沈曾植注释

之《古学汇刊》本,[16]《岛夷志略》所记九十九国,占城国次列第八,其文如下:

"地据海冲,与新旧州为邻,气候乍热,田中上等宜种谷。俗喜侵掠,岁以上下元日纵诸人采生人胆以鬻官家。官以银售之,以胆调酒,与家人同饮,云通身是胆,使人畏之,亦不生疵疠也。城之下水多回旋,舶往复数日止,舟载妇人登舶,与舶人为偶,及去则垂涕而别,明年舶人至,则偶合如故。或有遭难流落于其地者,则妇人推旧情以饮食衣服供其身,归则又重赆以送之。盖有此情意如此,仍禁。服半似唐人,日三四浴,以脑麝合油涂体。以白字写黑皮为文书。煮海为盐,酿小米为酒。地产红柴茄蓝木打布,货用青磁花碗金银首饰酒卮布烧珠之属。"

《岛夷志略》尚志有关系占波之文三条:就是第九条之民多朗、第十条之宾童龙、第十三条之日丽。

民多朗之名,据我所知,未见他书著录。《岛夷志略》所志甚泛,据云:此地是临海要津,田沃饶米谷。男女推髻,穿短皂衫,下系青布短裾。民凿井而饮,煮海为盐,酿小米为酒。有酋长禁盗,盗则戮及一家。地产乌梨木麝檀木棉花牛麂云云。此民多朗虽应位置在占波附近,然与 Pāṇḍuraṅga(宾童龙)应有区别。我以为此地即是周去非《岭外代答》之宾陁陵。《岭外代答》占城条下云:"其属有宾瞳胧国宾陁陵国。"伯希和(《校刊》第三卷 650 页)译此文,以为此二名疑皆是宾童龙之同名异译。然而我以为或者是另一国名,也就是《岛夷志略》之民多朗。案藩笼(Phanrang)一地,有种种不同的名称:占文碑铭作 Panraṅ,梵文碑铭作 Pāṇḍuraṅga,编年史国王驻所名 Pandaraṅ,地岬名 Padaraṅ。如是种种不同名称,颇难说是出于一名,而Panraṅ-Pandaraṅ双名并称,迄今尚未得其解,或者与中

国载籍著录两名不无关系,详细研究或可得到一种答解。

关于古宾童龙的记录,伯希和曾将中国史文裒译(《校刊》第三卷649至654页),诸文以外,尚须加入《岛夷志略》之文。此文很有关系,好像就是《星槎胜览》的记载之所本,而《西洋朝贡典录》所本者又是《星槎胜览》,则其重要可知。兹将《岛夷志略》宾童龙条转录于下:

"宾童龙隶占城,土骨与占城相连,有双溪以间之,佛书所称王舍城是也。或云目连屋基犹在,田土人物风俗气候与占城略同。人死则持孝服,设佛择僻地以葬之。国王骑象或马,打红伞,从者百馀人,执盾赞唱曰亚或仆。其尸头蛮女子害人甚于占城,故民多庙事而血祭之。蛮亦父母胎生,与女子不异,特眼中无瞳人,遇夜则飞头食人粪,尖头飞去,若人以纸或布掩其项,则头归不接而死,凡人居其地,大便后必用水净浣,否则蛮食其粪,即逐臭与人同睡,倘有所犯,则肠肚皆为所食,精神尽为所夺而死矣。地产茄蓝木、象牙,货用银印花布,次曰胡麻沙曼头罗沙犗宝毗齐[17]新故越州诸番无所产,舶亦不至。"

《诸蕃志》所志占城诸蜀国中,即有一国名曰日丽。此日丽或者就是《岛夷志略》第十三条之日丽。沈曾植辑证说此日丽就是《诸蕃志》之日啰亭。[18]案:此日啰亭昔为三佛齐(Palenbang)属国,此种考订毫无根据。

《岛夷志略》日丽条云:"介两山之间,立一关之市。田虽平旷,春干而夏雨,种植常违其时,故岁少稔,仰食于他国。气候冬暖。风俗尚节义。男女推髻,白缦缠头,系小黄布。男丧女不嫁。煮海为盐,酿浆为酒。有酋长。土产龟筒鹤顶降真锡。贸易之货用青磁器花布粗碗铁块小印花(中阙数字)之属。"

(四)《安南弃守本末》(一作始末)此书现在只有钞本。据我所知,只有钱谦益(1582—1664)《绛云楼书目》,同丁氏《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七)著录。钱氏本应毁于1650年之火,丁氏本现归南京图书馆,我曾托中国友人为远东法国学校钞录了一部。此书所辑1404至1433年[19]间关于安南之史料,很可宝贵。因为此三十年间,安南历经大变,其初胡氏(1400—1407)废陈氏(1225—1400)而自立,不免与中国争战。明师擒胡汉仓以后,遂于1407年改安南为省县,然是年陈氏复立,后在1414年为明师所平。至1418年,黎利自立为安南王,与明争战。迄于1428年,始又独立,是为黎朝(1418—1789)。黎利后殁于1433年,《安南弃守本末》之记载,止于是年。

此书阙撰人名,观其文体语气,似为身经其事之明人撰述。观其记载,不能不令人忆及明之"《实录》",因为其中纪年纪事诏令言词皆类《实录》。其中且见有张辅、夏原吉、杨士奇、杨荣等诸人之名,或者此书即是钞撮《实录》而成的。

无论如何,这部一百多页的钞本,包含有不少新的史料。其中关于占波(占城)的记载,应该加以研究。比方占城王占巴的赖因胡汉仓之侵,求救于明,永乐帝因以讨伐安南的事迹,即见于此书之中。则15世纪初年明取安南,占城王之求救,为一要因。

《安南弃守本末志》有占巴的赖(Jaya Simhavarman V)所上之表,其文如下:[20]

"永乐二年八月庚午朔,(1404年9月5日)占城国王占巴的赖遣使该序罢尼入朝,贡犀角方物。并奉表曰,"臣近表奏安南侵臣土地,杀掠人民,请降敕戒谕,乃其王不遵诏旨。本年四月(1904年5月9日至6月8日间)复侵臣国界,近朝贡人回,赐物悉遭夺掠。又畀臣官服印章,俾为臣属,且已据臣沙离牙诸地,更侵掠未

已。臣恐不能自存,乞隶版图,遣官往治。"帝怒,命礼部遣官往谕,并赐占城国使钞币。"

由上文可见此书志有15世纪时占城之若干颇有关系的情节,其关系占波之文不止上述一种,我想将此书完全译释。

其他诸书因为时间之所不许,我只能作简单之说明。

《瀛涯胜览》同《星槎胜览》皆有占城专条,未经马伯乐引用。马欢的《瀛涯胜览》对于占城颇有些有关系的记载,尤其是关于归仁、占城都城、风俗、气候、官号、出产等问题,应该特别注意。

《明一统志》的记载也有关系,因为其中有些不见他书之文,其卷九十之《占城传》有云:"秦为象林邑县,汉改象林,属日南郡。汉末区连者,杀县令自立为林邑王。"则林邑之名,在象林以前业已有之,可是未详其所本。此外尚有若干可供研究之点,例如说环王原为占城王诸葛地之称,后为全国之号。又如关系占城迁都之文,皆是可以注意之点。

还有《西洋朝贡典录》,业经W.F.Mayers在《中国杂志》(China Review)里面研究过。还有《越峤书》,据我所知,只有远东法国学校图书馆独有一本钞本。还有"四夷考",用这个标题的撰述不少。此本是1564年本。以上诸书,皆有关系占城的记载,我们很希望马伯乐一并采录。

所馀的尚有《东西洋考》,此书值得特别研究。其卷二节录占城古史,而对于14、15世纪之占城记载颇详;尤其在卷十以后,全录关于中国同占城之公文函件,而皆确有所本。

以上所引诸书,将来必须译释。待至此时,始能说将中国载籍中关系占城之记载裒辑已尽。

马伯乐之书,虽然有些重大缺陷,同一些不可免的小小错误,

然而总算是一种很可宝贵的全部研究。在此书以前，并无相类之撰述，自从 Aymonier 在 1893 年东方学者公会提出他的“《占波史》”以后，马伯乐这部《占波史》，可以说是有一种长足进步了。

注：

〔1〕钧案：此书业已在 1928 年初转为汉文、题曰《占婆史》，前年原著者又将此书增补，重刊新本。

〔2〕其在位时约在 4 世纪末年。

〔3〕《一经庐丛书》本作一子。

〔4〕迄今尚未知有林邑王名叫明达者，此人应是 400 年前后的林邑王范佛（Bhaâravarman I）之嗣王，其汉译名不一，《晋书》作范达、范胡达、范湖达，《梁书》作范须达，又益以此处《林邑记》之范明达，不知何者为是。

〔5〕参照沙畹《史记》译本第二册 168 页：“三十三年（前 214），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钧案原文见《史记》卷六。）

〔6〕参照《史记》译本第二册 168 页；又《校刊》第三卷 234 页注二。

〔7〕见《前汉书》卷二八下、《后汉书》卷三三。

〔8〕见《大南一统志》卷一同卷一三，我不知其何所本。我以为此说不错，所以将他采用。

〔9〕还有几段记载可以采用，如《晋书·地道记》说朱吾距西卷二百里，卢容距西卷三百里之类。

〔10〕根据《水经注》的记载，承天府河（卢容江）不从顺安海口（四会浦口）入海，仅合浦水经东渚（郎湖）而至卢容浦口入海，观此浦口之名可以证之。

〔11〕只有此一点不能完全与《水经注》相合。然而这种假定仍然可以主张，可参考《大南一统志》卷二。

〔12〕欲使此种说明更加完备，尚须附带一言。《越史通鉴纲目》（卷三）曾考

订此处废址就是占城都城佛誓(Vijāya),伯希和业曾反对此种考订(《校刊》第四卷203页以后)。我的意见固然同他们相同,可是我的假定并不因此薄弱。因为将11世纪初年占城都城佛誓位置在承天府境以内,与此说并无抵触的地方,或者这个佛誓城就是建设于3世纪的区粟城故址之上者。

〔13〕典冲一名未详所本,好像就是林邑古都之别称。

〔14〕伯希和(《校刊》第四卷193至194页)曾引《梁书》(卷五四)一段,据说城去海百二十里,去日南界四百里。若是指的是我们所说的林邑古都,此文就难解释,然而毫无证明此文所言之城就是林邑都城之点。

〔15〕吴鉴序,说他五年成书,由此序可以确知汪大渊旅行同成书的年代。此序所题年月是1350年1月23日。又一方面Huber在《校刊》中(第九卷586页)引证有本书中所载1349年5、6月之年月,从1349年年终用中国算法逆数五年,则为1345年,此年汪大渊必已归国。又考本书大佛山条下云:"至顺庚午冬十月有二日,因卸帆于山下。"则汪大渊在1330年11月12日在锡兰岛一地停舟。假定他从中国至锡兰沿路航路同停舶的时间至少应有一年,由是我们确知1330年时他在航行,在1345年时他已归国。又据张翥序,(1350年序)他开始航海之时约有二十岁,则其人出生之年必在1309年以前。

〔16〕《岛夷志略》一书,并见下列书录著录,并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七一,《读书敏求记》(《小琅嬛仙馆》本)卷二,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一二,《天一阁书目》。

〔17〕以上诸名只知毗齐是占波之一地名,馀皆未详。

〔18〕钧案:此日啰亭就是鄙译《苏门答剌古国考》引文三十一中之Mā Yirud-iṅgam,其地应在马来半岛南部。

〔19〕南京钞本同善本书室著录之本皆作1435年,盖误以宣德八年作宣德十年,黎利之死实在1433年。

〔20〕钧案:今未见此钞本,下文乃从法文转译。